帕潘姐妹的双重谋杀

让·阿卢什、埃里克·波尔热、玛耶特·维尔塔尔

中文阅读版 · 2026年10月5日校订稿

据用户所给西班牙语电子文件的中文译稿导出。正文、图版、编号原注和相邻译注均保留。底本缺页、缺图和不可辨文字沿用校订稿中的说明。

目录

封面与前置页 3
编辑说明 9
序言 11
第1章 15
第 2 章 27
第三章 64
第4章 96
第 5 章 109
第6章 131
第7章 146
第二部分：早期研究 164
第 8 章 165
第 9 章 172
第 10 章 197
三人成狂（Tres faciunt insaniam） 212
版权页 220

封面与前置页

帕潘姐妹的双重谋杀

让·阿卢什 埃里克·波尔热 玛耶特·维尔塔尔

EL DOBLE CRIMEN DE LAS HERMANAS PAPIN

JEAN ALLOUCH

ERIK PORGE MAYETTE VILTARD



Pepele

“案例工厂 / 制造中的案例”丛书



编辑委员会

Josafat Cuevas
Patricia Garrido
Manuel Hernández García
Gloria Leff
Marcelo Pasternac（主任）
Lucía Rangel

拉康精神分析学派

让·阿卢什
埃里克·波尔热
玛耶特·维尔塔尔

……的双重谋杀

帕潘姐妹

“案例工厂 / 制造中的案例”丛书



拉康精神分析学派

“案例工厂 / 制造中的案例”丛书



拉康精神分析学派

本书在法国主管文化事务的部委资助下完成。

题为《越入行动的“解决”；帕潘姐妹的双重谋杀》（la “solution” du passage à l'acte; le double crime des soeurs Papin）的著作之西班牙语版，作者为让·阿卢什、埃里克·波尔热与玛耶特·维尔塔尔（原以 Francis Dupré 这一异名发表）。法文版由 Editions Eres 出版。地址：19, rue Gustave Coubert, Toulouse, Francia。1984年10月。

Copyright 1984 ISBN 286586-024-8

西班牙语版译者：Jaime Goldchain R. 与 Manuel Hernández García

版本由 Patricia Garrido 与 Lucía Rangel 负责。丛书设计：Ediciones y Gráficos Eón, S.A. de C.V.

版权归字母精神分析出版社（Editorial Psicoanalítica de la Letra, A.C.）所有。地址：Bahía de Chachalacas 28, Col. Verónica Anzures, C.P. 11300, México, D.F.

ISBN 968-6982-03-5

西班牙语第一版：1995

西班牙语第二版：墨西哥，1999。墨西哥印刷。Printed in Mexico

目录

	编辑说明	9
	序言	13
	第一部分 案例	

第一章	**行动的痕迹** Bouttier 书记员的报告；《La Sarthe》报的报道；第一批图像资料：受害者照片与警方草图；法医记录。	21
第二章	**行动** 犯罪之夜的话语；《La Sarthe》的证词；莱娅的危机；第二轮讯问；公众反应；第三轮讯问；入狱后的最初反应；犯罪重构；撤回供述的声明；最后几次讯问；L. 小姐的介入；越入行动展开过程的重构	37
第三章	**一个迅速被归类的事件：审判** 司法与精神病学；两姐妹的态度；她们在审判期间的一些回答；Logre 医生的讲座：辩护陈词；Tharaud 兄弟的结论	89
第四章	**谱系与年表**	137
第五章	**若干事件及其可能的影响** 克莱芒丝及其两个女儿所看见的与母亲的决裂，由预审法官和精神病学专家转述；市政厅事件；那张纸片	151
第六章	**克里斯蒂娜与莱娅：一个心理学配对及其错位** 莱娅的“神经危机”；克里斯蒂娜的第二次“危机”；同监者的证言；精神病学鉴定；克里斯蒂娜的三封信	183
第七章	**精神病性恶病质** 克里斯蒂娜拒绝承担自己的罪行；转送 Rennes；Lamache 医生的会诊；克莱芒丝的新信件；精神分裂性演变（Guillerm 医生的证词）；尾声 I：克莱芒丝的放弃；尾声 II：莱娅	205
	第二部分 最初研究	
第八章	**是精神分裂症吗**	233

第九章	**自我惩罚还是自恋激情?**	243
第十章	**帕潘姐妹原本是三人。**	277
附录	**三人成狂（tres faciunt insaniam）**	301

编辑说明

编辑说明

1984年，《越入行动的“解决”。帕潘姐妹的双重谋杀》（La “solution” du passage à l'acte. Le double crime des soeurs Papin）在法国出版，署名 Francis Dupré。读者手中这本书，是那一案例制造在我们语言中的版本。

本版中有一些改动和增补，法文版中并未出现，因而有必要作若干说明：

首先，它不再署名 Francis Dupré，而是署名当时选择以这个异名为其工作署名的那些作者。让·阿卢什、埃里克·波尔热与玛耶特·维尔塔尔，是一个工作卡特尔的成员，这个卡特尔完成了帕潘姐妹案例的制造。对于我们语言中的版本，他们向我们指出，纳入他们的名字而不再纳入他们此前选择的 Francis Dupré 这个名字，是恰当的。甚至，在目前正以原文语言筹备的重印本中，异名也将不再出现。

本版包括一篇 Epeele 编辑委员会认为适宜纳入的附录。这篇附录由让·阿卢什1987年4月发表于《littoral》杂志第22期的一篇文章构成。该文题为：Tres faciunt insaniam。

在《La “solution”...》出版之时，拉康精神分析学派尚未成立。1987年，当《Tres faciunt insaniam》发表时，《littoral》杂志已经是 e/fp 的刊物之一。这里谈到这一点，是因为案例制造乃是 e/fp 的工作提议之一，并且即便我们的作者们是在学派成立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阿卢什的文章仍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把重音放到帕潘姐妹的案例上：它意味着对某些陈述采取立场，而这些陈述精确地触及这一案例的传递（不再是一次越入行动，而是一次共同-越入行动）；在这篇文章中

拓扑学与案例提法相遇的效应在场，因此，也有新的问题提法。所有这些理由使《Tres faciunt...》成为帕潘姐妹案例制造与 Marguerite Anzieu 案例制造之间的一座桥梁——后者是让·阿卢什的一本书，不久将由我们的出版社以《Marguerite，拉康称她为 Aimée》（Marguerite, Lacan la llamaba Aimée）为题出版。

这说明了我们这一版的标题。在标题中，已不再出现《La “solution” du passage à l'acte》的译名，而只保留《帕潘姐妹的双重谋杀》。读者在读完构成《双重谋杀……》的十章以及文章《Tres faciunt...》之后，将得出自己的结论，并且在最好的情形下，将会同意我们选择这一标题的理由。

最后，与法文版不同，本版收录了六张迄今未发表过的照片。

> 我的罪行已经够大，足以让我说出它是什么。

> 克里斯蒂娜·帕潘

序言

疯狂的形象（我们不说痴呆的形象）似乎可以按照两个极点来分配，而其全部表现也许就在这两个极点之间排列起来。一方面，是一种有时喋喋不休、另一些时候谨慎小心的话语，但它很少不把书写据为己有，以便让人知道：Schreber 便是典范。另一方面，在另一个极点，言语几乎被缩减为无，呈现为坚决地循规蹈矩，而整个疯狂似乎集中在越入行动的单一实行之中。所谓帕潘姐妹案，将成为这一点的典范。

第一种形象，书写得太多，并没有被阅读（或很少被阅读）。第二种形象，行动得太多，几乎不给阅读留下立足点。因此，尽管无可争议的是，这一种模式和另一种模式都旨在让人知道，但这一目标永远不过是一种尝试；而让人知道并未通达说，未能在大他者那里找到那种接纳，使疯子能够转向不同于这永远失败的、传递一种知识的尝试的别的东西。每一个疯狂案例，从根本上说，仍是在海上耕作。

> “对于那些医生，如果他们只在那里看见与医学毫无关系的数字，我有更精确的信息可供他们支配”，一个疯子在致科学院的信中写道。疯狂：让我们片刻想一想其中系统性地存在着什么：思想传递，直接阅读思想，被迫执行幻觉命令，对行动的评论——这是一个传递的问题。

疯子拥有的那些“信息”，也正是拥有他的那些信息；不要轻率地说他对它们非常执着。他会在传递它们时被拘留、被扣住吗？这并不确定；他的让人知道难道不也是他的异化的一部分吗？而那个借以把他呈现给我们、仿佛他正试图摆脱它们的运动，难道不正是那个又把他重新沉入其间的运动吗？

序言

[14] 帕潘姐妹的双重谋杀

我们会认为这一观察严厉吗？当然，我们会有坚实的论据。我们首先诉诸文学经验；在那里，疯狂难道不是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被把握了吗？正是在遭遇了一位所谓“精神分裂症女性”之后——并且在这次遭遇的发疯之中——Marguerite Duras 写下了《洛尔·V. 斯坦的迷狂》（El arrebato de Lol. V. Stein）。如果这部文本打动我们，甚至扰乱我们，它却并未因此触动那位激发它的人。

此外，如何能够主张，精神病学话语这座临床形式的珍贵收藏，并不懂得也不能够把悬置在疯狂之中的字母[注1]弃置不顾？然而，情形绝对就是这样，而且半个世纪以来，这种话语令人恼人的贫乏，是对此的悲哀确认。精神分析会接替它吗？然而，拉康见证了一种位置，充其量也只是门槛的位置。而困难依然很大。

> [注1] [把字面弃置不顾]

无论如何，也许这是一种幸运，我们被缩减到案例。与 Schreber 案相比，帕潘姐妹案使疯狂问题更为鲜活，因为它以一种坚决凝缩于单一越入行动之中的方式呈现这一问题。它的行动者们，对此实际上只提供了极少的评论，而今天可以接触到的少数要素（本书将其汇集）似乎加深了谜团，与其说解决它，不如说确立它。但把它构成起来也并非小事。

难道正是由于其原因明显的微不足道，这个无言的案例才与 Schreber 案相反，令人谈论如此之多吗？当然，此事并未结案：1983年，Broadway 上演了一出以这一“犯罪事实”为情节而写成的戏剧，同时在当地，在 Le Mans，一位年轻电影人也根据同一草图制作了一部影片。在 Tharaud 兄弟、Eluard 与 Peret、Man Ray、拉康、Sartre、Simone de Beauvoir、Genet、Paulette Houdyer、Nico Papadakis 以及许多其他人之后，这些最新作品证明，帕潘姐妹的这次越入行动仍未被重新吸收，它不停地不被书写。

> 可以用 Francis Ponge 的一项声明来阐明拉康所称的对字母置之不理[注2] 。他指出，显然，最为特殊的东西，如果以最可羞耻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或者更确切地说，并非可羞耻，也就是说，
>
> [注2] [把字面弃置不顾]

序言 15

> 毫不羞耻于其主体性那种绝对主体的、特殊的、也许——我不知道——幼稚的、儿童式的性质，那么，正是这个最特殊的东西，如果它既毫不羞耻地被呈现，同时又尽管如此仍以严谨的方式、以尽可能严谨的方式被呈现，那么，正是这个东西随后产生谚语，并落入陈词滥调之中。它死于陈词滥调之中，你就是为它们而造的。

帕潘姐妹的越入行动不停地不死于陈词滥调之中。更一般地说，凡是满足这里所陈述的全部条件（不羞耻的表达、绝对主体的性质、特殊性、最大限度的唯一性、所传达内容的严谨性），然而又构成上述法则的例外，并且并不因此落入陈词滥调之中的东西，将被称为疯狂。

当一个疯狂案例被呈现为凝缩于单一越入行动之中时，它立即成为公共事务。这并不是说它属于国家，而是更简单地、也更根本地说，它属于“人们说”。这个“人们说”同激起它的疯狂之间有什么关系？事情也许无法在一般性中得到解决。但它被激发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使我们确信：无论“人们说”多么荒谬和丑闻化（或多么有分寸、专注），它都参与了激起它的东西。

> “被说这一事实，”拉康1973年写道，“仍被遗忘在所听之中所说的东西背后。”他随即补充道：“这个陈述，由于以一种普遍形式产生，似乎是断言性的，事实上却是模态性的，作为这样的存在性的：其主体所由以调式化的虚拟式，通过见证而如此。”

第二句话（通常不被引用）通过揭示第一句话的外观，颠覆了它的断言价值。断言普遍地肯定：当有已说之物时，说在那里与已说之物相联结而外-存。然而，如果我们接纳第一句话，不再仅仅把它当作一个普遍命题，而是当作一个存在命题（第二句话正是这样做的），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它的表述并不排除同一文本三页之后提出的问题：“但难道也不可能有一种直接的说吗？”随后是一条临床观察。直接的说，即说-有什么，“仍然是从这一事实出发：‘有什么’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它应当被驱除”。既然自从 M. Foucault 命名为“临床医学的诞生”的那一刻起，医生们已经放弃了这一职责，那么它今天是否属于疯子们呢？

[16] — 帕潘姐妹的双重谋杀

越入行动会不会是这种“直接的说”的发生之一，而“有什么”正借此被驱除？如果注意到，它通过激起“人们说”，经由这一偏斜产生“人们所说”，也就是最接近说的已说之物，那么答案将是肯定的，因为在“人们所说”中，直接的说不停地不被遗忘。

“人们所说”借以抵达说的这座桥，一方面关涉 se 的语法地位。拉康写的不是“Que je dise...”而是“Que se diga...”，在他的句子中把 se 作为主体。他使用不定代词，但正如 Grevisse 指出的那样，这个代词并不像学校里所声称的那样不定。甚至有人提议把 se 纳入人称代词列表，使它能够在动词变位表中作为支撑；而 J. Cellard 在这一分类困难的底部，把它称为“变色龙代词”。也就是说，语法学家在这一点上迷路了，[注3]而在这个案例中更是如此，恰恰因为 se 在起源上是 huem，即拉丁语 homo 在非重读位置发展出来的主格形式（此外，这一派生并非法语所独有，因为德语 Man 显然将产生不定代词 man）。se[注4] 是 homo，但已丧失，是主体，但已变成非重读。se 的全部微妙之处由此而来：这个被弱读化的主体，当然，不停地不能实现它的不定性，但它也不能在人的层面上重新建立自身，不能人格化。总之，与其说 se 是不定的，不如说它是一个“适于替代任何人称代词”的代词（Grevisse）；无论如何，它作为名词的占位者，把人称拖上其去人格化的道路，却又终究没有把它生产为不定者。

> [注3] [对此茫然失措]
> [注4] [人们]

这一语法绕行确认了“人们所说”与去人格化之物之间的邻近关系：于是，正如越入行动的直接的说，在个人的已说之物缺席的熔炉中，激起“人们说”，并因此激起“人们所说”，作为最有条件使直接的说通过已说之物这一诡计而通行的东西；没有这种介入，我们就无法有理由地奠定任何东西。

因此，对这一越入行动之案例的制造，将以特别关注它所激发的“人们所说”为特征：警方报告、司法预审文件、邻近商人的证词、本地及巴黎记者的报道、克莱芒丝·Derée（克里斯蒂娜与莱娅的母亲）与 Launcelin 先生

序言 [17]

Launcelin（她们的雇主）的评论、Le Mans 公众的反应、同监者的观察、历史研究、文学的、绘画的、电影的作品，以及精神病学研究；先验地说，并没有什么促使我们把这些精神病学研究从这一批材料中孤立出来。

J. 拉康的《偏执狂犯罪的动机：帕潘姐妹的犯罪》于1933年12月发表在超现实主义杂志《Le Minotaure》第 3 期，也就是说，仅在审判发生两个月之后。它现在收入其论文的附录（Seuil, 1975），[注5] 这错误地暗示它会是该论文的回响，甚至是一种应用；事实上，它校正了目标，改变了越入行动的位置，即它在“Aimée”案例中被定位的方式。

> [注5] [偏执狂犯罪的动机：帕潘姐妹的犯罪（1933）。载于：《论偏执狂性精神病及其与人格的关系》（De las psicosis paranoica en sus relaciones con la personalidad）。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墨西哥，1976]

拉康的这次介入，以及它的迅速，是由该事件从司法记录向精神病学场域的位移所要求的。精神病学话语很快被感到困惑的司法与公众舆论召唤为一种资源；从判决并没有解决任何东西这一点变得昭然若揭之时起（这正是审判的社会功能之一），它就不得不说明这个问题。幸运的是，精神病学科学已经准确击中了越入行动的解决功能；然而，它并不因此就没有陷入分裂。在其论文发表之时（该论文正是通过对越入行动的解决功能的研究这一偏斜来处理偏执狂精神病），拉康与超现实主义者一起，但又以一种不同于他们的方式，与若干观察者（一些记者，其中包括 Tharaud 兄弟，一些同行，主要是 Logre 医生）一起，采取了反对精神病学鉴定结论的立场。

这里汇集的要素开启了对拉康这篇文本的重新阅读，使我们能够定位他对这一案例的考量，定位“帕潘姐妹对拉康做了什么”：她们激发了一个转变——说实话，是决定性的转变——即为说明越入行动而在论文中提出的坐标发生了转变。

《偏执狂犯罪的动机》的重要性，来自它在自罚性偏执狂的发明与镜像阶段的发明之间所处的枢纽位置。这里所涉及的，绝不亚于确立这样一个点：拉康正是从这个点出发来询问弗洛伊德，而这个点并不

[18] — 帕潘姐妹的双重谋杀

是与弗洛伊德学说中这样一个元素相符合的点（拉康的“我”于是将会〔并将继续〕从根本上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我”），而是某种东西，它将如同伐木工人的金属楔子插入树干那样介入弗洛伊德的学说：只要把它放在正确的位置并敲击，就足以使其纹理显现出来。

镜像之我，就是帕潘姐妹的“人们所说”，在精神分析所开启的道路上。

第一部

案例

第1章

第一章

行动的痕迹

在1933年2月[3]日星期五《晚间萨尔特报》（La Sarthe du soir）的头版上，在宣布“德国人民的大多数支持阿道夫·希特勒”的主标题旁边，可以读到一则狭窄方框中的消息；排版的紧迫只容许把它塞进这个新闻版面上享有特权的位置：“可怕的犯罪：朗斯兰夫人及其女儿热纳维耶芙被她们的女仆杀害”。

“可怕”这个词已经被抛出去了。所有人都会立刻知道，这一次，它所能唤起的“轰动性”，丝毫不归因于任何卑劣的商业考量。

值得注意的相邻关系。一场政治与种族迫害正在组织起来：当时还不知道（尽管很快人们就会对此作出估量），另一场迫害刚刚找到了它的显现之路。

人怎么敢编造这种事呢？最先面对行动痕迹的，分别是姓“真理”（Verité）和“拉戈”（Ragot）的警员[注1]。不久，司法书记员布蒂耶也加入他们，他如下描述那第一次查验的事件：

> [注1] [Verité：真理；Ragot：闲话。[译者注]]

> 1933年2月2日，从在Rouann进行的一次现场勘验返回时，那次勘验涉及Maison Neuve的巴特夫妇谋杀案，有人到我家通知我，另一起谋杀刚刚发生。我以为那会是关于我们刚刚勘验过的那起案件的某种披露；不幸的是，并不是那回事。那是刚刚发生在布吕耶尔街6号、前律师勒内·朗斯兰先生家中的一桩双重谋杀。他的妻子和女儿刚刚成为一桩可憎犯罪的受害者：这是直到那天为止在勒

> 芒最令人憎恶的一桩，而且是由家中的两个女仆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帕潘所犯。诸位先生：预审法官埃贝尔；共和国检察官Riéger；助理检察官Millet Lacombe；Chartier医生以及司法书记员，立即赶到现场；在那里，在楼梯平台上，一幅可怕的景象呈现在众人眼前。两个女人被杀害了——被切开——被剁割，她们的眼睛被挖出；其中一只眼睛，即小姐的那只，在楼梯台阶上被找到。那场可怕惨剧的景象，使所有负责此案的人都陷入惊愕。

《萨尔特报》的记者与司法当局同时来到了事发地点。该日报第二版按照事实呈现在司法机关面前的顺序重构了这些事实。

《萨尔特报》——



LA SARTHE
DU SOIR
Fondateur : A. MAENTJENS
QUOTIDIEN RÉGIONAL

Mme LANCELIN
ET SA FILLE GENEVIÈVE
ASSASSINÉES
PAR LEURS BONNES
5, rue Bruyère, au Mans

IL Y A DU NOUVEAU A L'EST

LA MAJORITÉ DU PEUPLE ALLEMAND
SE TROUVE DERRIÈRE ADOLF HITLER

Un espantoso crimen fue cometido el jueves por la noche, al atardecer, en un barrio de Le Mans habitado por la clase acomodada. Dos sirvientas, dos hermanas, mataron a sus patronas en circunstancias tan abominables que la pluma del periodista casi debería renunciar a describirlas.

Horrible espectáculo

Un brigadier y dos agentes llegaron enseguida. Pero el portón estaba cerrado. Fue necesario pasar por el número 8, y el agente Verité saltó un muro.

Los agentes penetraron entonces en el inmueble. En la planta baja no había nadie. Comenzaron a subir la escalera del primer piso. ¡Qué horrible espectáculo les esperaba!

En el descanso del primer piso, dos cadáveres estaban extendidos casi paralelamente. Eran los de la Sra. Lancelin y su hija. La madre tenía la cabeza volteada hacia la calle, la hija hacia el lado opuesto.

La cabeza y la cara de la Sra.

创办人：A. MAENTIENS 晚报 地区性日报 东方有新情况

朗斯兰夫人及其女儿热纳维耶芙 德国人民的大多数

被她们的女仆杀害——勒芒，布吕耶尔街6号 站在阿道夫·希特勒背后

一桩骇人的罪行发生在周四傍晚，在勒芒一个由富裕阶层居住的街区。两个女仆、两个姐妹，在如此可憎的情形中杀害了她们的女主人，以至于记者的笔几乎应当放弃描述它们。

可怕的景象

一名巡长和两名警员随即赶到。但是大门关着。必须从8号进去，警员Verité翻过一堵墙。

警员们于是进入了那栋房屋。一楼没有人。他们开始登上通往一层的楼梯。等待他们的是多么可怕的景象！

在一层的楼梯平台上，两具尸体几乎平行地伸展着。那是朗斯兰夫人和她女儿的尸体。母亲的头转向街道，女儿的头朝向相反的一侧。朗斯兰夫人的头部和面部

朗斯兰的头部和面部完全被砸碎。五官已无法辨认。

朗斯兰小姐俯卧着，脸朝地。初步检查时，很难知道她是因哪些伤口而死。但身体后部被可怕地毁坏。两道刀口

刀深深割开了身体下部，双腿布满深深的伤口。

请原谅我们作这样的比较，但那双腿看起来像面包，上面有面包师刀子横切留下的痕迹。

两个有罪者

两个罪犯并不远。我们已经说过，从街上可以看到女仆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帕潘房间里有一盏微弱的灯。

警员Verité把尸体留在那里，由同事跟随，继续上楼。他敲了上层各扇门。无人回答。除了一扇门之外，他打开了所有房门；那扇门就是两个帕潘姑娘所在的房间。

中央警长迪皮先生已经到了！他叫来一个锁匠，众人撬开了门。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帕潘就在那里，躺在同一张床上。用于这桩双重犯罪的锤子扔在地板上。

> 迪皮先生和他的人走了进去。两个姑娘惊跳起来，随后以断断续续、颤抖的声音承认她们杀了人；年长的那个已经准备好为自己辩护，声明说那是为了自卫。

调查

接到警报后，警察局长纳穆尔先生，侦查员比永、勒让德和拉韦诸先生，立即赶到现场。

不久之后，共和国检察官Riégert先生、助理检察官Millet-Lacombe、预审法官Hébert、法医Chartier、司法书记员Bouttier，也相继登上楼梯，怀着沉重的心凝视那骇人的场景。

血滴溅在墙上，玷污了一幅挂在离地两米处的画。在朗斯兰小姐的身体下面，找到了一把带血的刀。

> 在通往二楼的楼梯最初几级台阶上，有一只小锡壶，被完全砸扁，并且少了一只把手，这证明其中一个不幸者曾遭到何等暴力的打击。

> 在镶木地板上以及受害者周围，散落着她们的手提包、一串钥匙、骨质发夹以及装饰性餐具的碎片，沾满了血。

但调查人员最令人痛心的发现，是位于楼梯倒数第三个台阶上的一只眼睛。

一种图像志已经确立起来，不到一年之后，超现实主义者们将重新采用它。事实上，伴随这第一份证词的，是两姐妹的一张照片，正如它们在其母亲住所中被摆在显眼位置那样。身份照的仪式性照片，与第一张合在一起，并在次日发表，

将给艾吕雅和佩雷提供补充材料，以便剪接出一个与“之后”相配的“之前”；这个能指之对的成功，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照片方面的加强，竟把它的网撒向犯罪，赋予犯罪一个位置、一个切割的价值；是否有必要再给它加上这份负荷，并不显然。[注2]

> [注2]　请您取一张自己的肖像照，比如一位艺术摄影师在您准备好拍照时，也就是说在您穿着节日盛装时拍下的那种。然后，穿着旧睡袍，头发蓬乱，去让任何一台自动照相机给您的脸拍照。我们保证，通过两张照片的比较，会出现一种惊人的之前/之后效果！这解释了由此产生的眼盲：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两姐妹的第一张照片呈现她们时，是把她们呈现为她们母亲的骄傲；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在那儿，是从克莱芒丝·德雷的观点被安置的，也就是说，在某些确定条件下，如果正如人们所观察到的，从这个“Derée”到“desiré”确有一个间距的话。[desiré：被欲望的。[译者注]]

当克里斯蒂娜断言：“我的罪行足够大，以至于我可以说出它是什么”〔参见第42页〕时，作为说出这样一句话之可能性的条件，难道不能设想：她的犯罪所指向的是其他人，而不是她的受害者；并且她所说的，亦即它是巨大的，其他人也能够加以确认？“如您所见，我的罪行足够大……”

屠杀的景象由此显现为最先算数的东西，也显现为首先应当算数的东西。必须等待大约四十年（到P. Houdyer一书第三版），这一景象才变为公开的，至少以两张受害者照片的局部形式公开；这些照片如同它们在案卷中那样出现，而此前只有陪审团能够接触到。我们在这里复制它们，因为这个越入行动使其言说通过一个视觉的迂回关口而通行。有一个被给出来供人观看的元素，而且尤其如此，因为这一景象不断引发人们移开视线的动作。

两张摄影底片是从同一角度拍摄的；第一张（I）给出两具尸体的整体及其相互位置；第二张从更近处拍摄，记录了屠杀的某些细节（见照片I和II）。

在（I）中，下方中央，是锡壶的壶盖，它曾是犯罪凶器之一；紧挨着的是一把刀；在（I）和（II）中，中央偏右，是一个手提包；在被切割的双腿之间有一串钥匙；离这些钥匙不远、但在照片画面之外，还会发现第二个手提包。

“之前”



«Antes»



«Después»

“之后”

朗斯兰小姐的身体位于前景。她的短裤（按该词当时的意义）被部分拉下，使人在（II）中看到被切割的右臀。照片使人能够衡量莱娅所谓“切痕”的重要性和深度。[注3]若把它们当作笔画来看，也可以注意到它们在双腿上的方向，《萨尔特报》的记者从那时起便把它们比作“带有面包师刀子横向痕迹的面包”。必须相信，在这些照片拍摄之前，某种羞耻感曾介入其间，因为警方绘制的草图显示，朗斯兰小姐的左臀是裸露的，上面还注明了其他切痕。

> [注3] {我们只是把莱娅使用的术语音译为西班牙语：enciselures}

朗斯兰夫人的面部和头部严重毁损。眼睛已经不在眼眶中。

警方报告中的草图提供了其他细节。

在受害者周围的地面上，可以看到盘子的碎片、发夹、纽扣、一顶帽子、手套、一个装有纸和肥皂的包裹、干花、一块小桌布、一只被撞凹的小锡壶、桌几上放着的两块热那亚糕和两个小圆面包；还有最先出现在警员Verité手电筒光下的物件，因为它被抛到了从底层通向犯罪发生处楼梯平台的楼梯上，那是一只眼睛，后来被确认为属于朗斯兰小姐。

这些最初的发现，在法医Chartier医生所进行的检查中得到了延伸：

两名受害者被发现时，伸展在一楼的楼梯平台上，二人仍穿着外套。朗斯兰夫人仰卧，头转向右侧；朗斯兰小姐面朝地面。二人的裙子都被掀起，短裤被拉下。一切都表明，她们是在刚刚回家、尚未来得及脱衣服时遭到袭击的。

1）朗斯兰夫人：给尸体脱衣时，在颈部旁发现一枚钻石耳环和两个眼球；据称，这两个眼球是在尸体下面被发现的，并在搬运尸体时被放在披肩上。衬衫下部和大腿内侧有血迹，可能是由沾血的手造成的



Fotografía I

照片 I



Fotografía II

照片 II

沾满鲜血。手套仍戴在手上，腕表停在7:22。尸体检查显示有许多暴力痕迹，主要集中在头部、面部和颅骨。

A —— 头部创伤相当严重，因其多重性而难以描述，

a. 在枕部区域，头皮在一块^{9}乘^{7}厘米的区域内被剥脱；它被切成一个上方敞开的瓣状，并

向后翻倒；在这片撕裂组织下面，颅骨暴露在外，并可见一些锡片嵌入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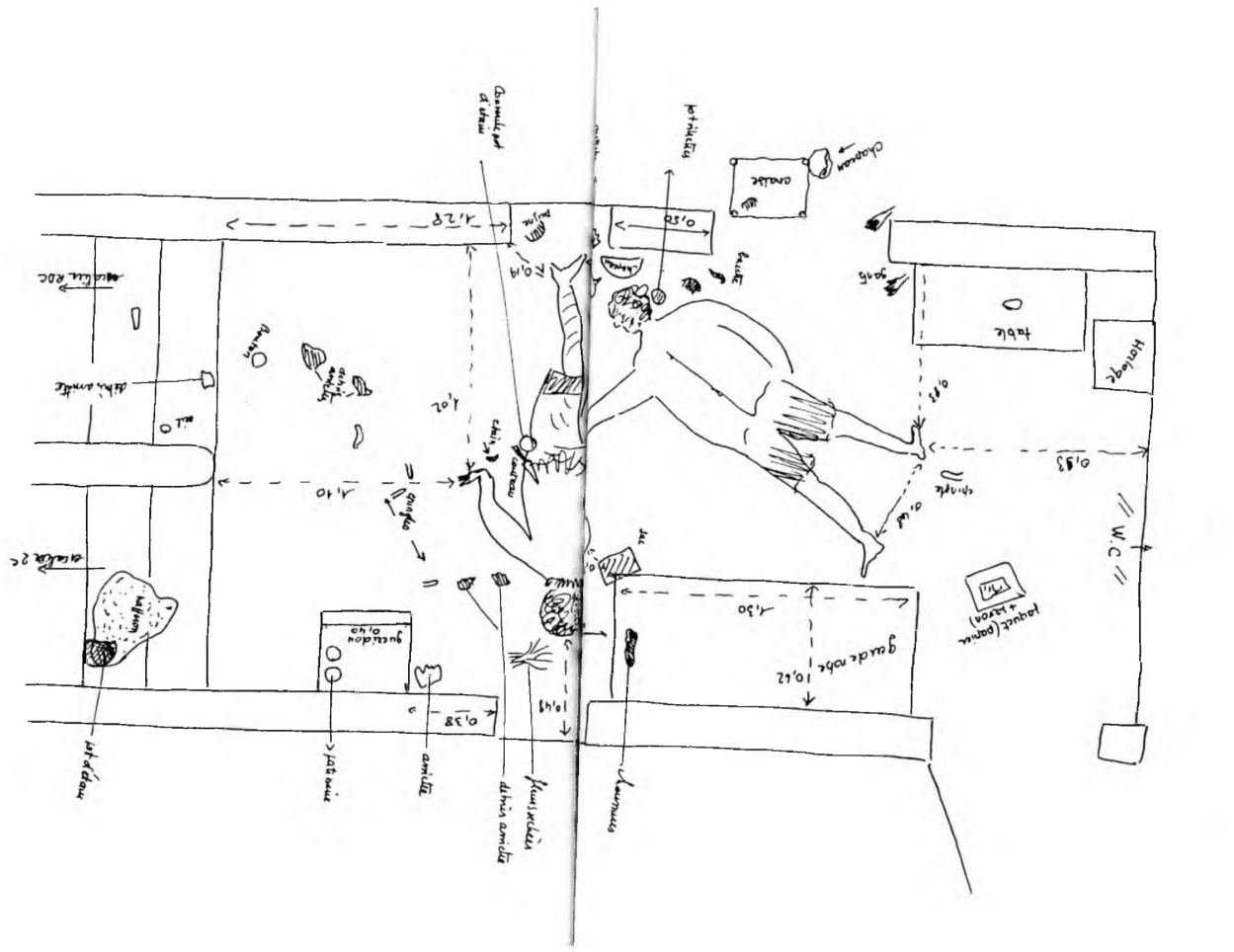
b. 在额部中央区域，有一处瘀斑，大小相当于战前一枚5法郎硬币。

c. 最后，面部以及整个左额部和左颞部，在一大片 11 乘 14 厘米的区域内遭到可怕的毁损；这一区域从鼻子延伸到耳朵，从嘴部延伸到太阳穴上方。这是真正的压碎伤，其中可以辨认出皮肤碎片、骨片、被拔出的牙齿，以及脑物质和血液形成的糊状物。上唇被撕碎，已经辨认不出面颊，也辨认不出眼眶。耳朵在其附着处被切断；下颏处有长 4 厘米的垂直线状伤口，在骨面处深达骨质；颧骨被粉碎，上颌骨也是如此；下颌骨骨折，额骨凹陷，碎裂成片；最后，左侧大脑半球的整个前端都被打成糊状。

B —— 四肢创伤：下肢没有任何暴力痕迹；上臂和前臂也没有任何痕迹，唯一的伤口位于仍戴着手套的双手。

a. 右手：手背有多处瘀斑；拇指与食指之间的指间隙有小伤口；食指第1指骨背面和中指第2指骨处同样有伤口。它们都是浅表的，看起来像是由锐器造成；中指第2指骨骨折。

b. 左手：仅在无名指和中指的掌指关节处、背侧面，以及食指第1指骨背面，可见小瘀斑。



C —— 身体上：没有任何痕迹；尤其是生殖器区域完好无损。

2）朗斯兰小姐：给尸体脱衣时发现，腕表停在7:47。伤口与朗斯兰夫人尸体上的伤口相当，双手上有类似伤口，头部伤口稍微更分散，但臀部和双腿后侧布满刀割伤。

身体下部的这些伤口出血很少，并且似乎是在死后造成的。其中一个眼球在楼梯上被发现。那是左眼，因为右眼仍在眼眶中。

A —— 头部创伤：面部肿胀，无法辨认。

a. 下颏布满打击痕迹，很可能是由带有锐利棱边的器物造成。

b. 一处深伤口，呈水平Y形且顶点向内，占据上唇和右颊；其下方，黏膜被切开，上颌骨骨折；一颗门齿被拔出，并被发现嵌入左额部区域的头皮中。

c. 右耳廓几乎完全被切断。

d. 抬起完好的眼睑时，确认在楼梯上发现的左眼缺失，而右眼仍在原位。

e. 颅骨有数处深达骨质的伤口。两处顶骨伤口大致对称，此外较轻微，呈水平状，长 3 到 4 厘米；左枕部有一处更大的伤口，5 乘 5 厘米，头皮在那里被压碎。

f. 最后，在颞部有一处严重得多的伤口，直径6至8厘米，浅层组织撕裂，骨层骨折并被压碎，脑组织外溢；这处伤口具有刀割伤的性质。

B —— 上肢创伤：

a. 左手仍然痉挛般紧握着一绺栗色头发。其背侧面有许多小瘀斑。中指指骨骨折。

b. 右手上，拇指指腹被切断，几乎所有手指都有小的浅表伤口。

C —— 下肢创伤：内裤被拉低到大腿处，裙子被掀到腰部。两腿之间仍有一块沾血的垫布；受害者当时正在来月经。在暴露出来的部位，即臀部和双腿后侧，有许多抓痕或深伤口，长短不一，但都呈同一水平方向。

a. 臀部：右臀，在骶髂区域水平，有4道平行抓痕，最丰满处约5厘米长；另有一道长13厘米的长伤口，向下略呈凹形，较深，伤及皮肤、皮下蜂窝组织和肌肉。在其下方，还有另外2道小抓痕。左臀有5道类似抓痕，其中上方一道位于骶髂区域水平；其间还有两道10厘米长的伤口，累及肌肉，内侧一道甚至一直到达暴露出来的坐骨。

抬起双腿时，两条腿的后侧，从腘窝直到下三分之一处，布满刀伤。左腿上有5处，在照片底片上十分可见：低处部位、皮肤和皮下蜂窝组织同时被切开，所有伤口都是横向的，并且全都深达骨头。右腿上，伤口较不规则，可以辨认出4处浅表伤，只涉及皮肤，呈纵向，位于小腿内缘，它们彼此延续，显然是在同一动作中造成的。在小腿最丰厚的肉质部分一大片区域上，有一道向内凹入的刀口，在12厘米的范围内，剥离出一大片皮肤和肌肉的撕裂片，直至露出腿部的两根骨头；当把这片组织向内放下时，在这道伤口上方，可见三处与左腿伤口相似的伤口，而在其下方，则有两处外观相同的小型横向伤口。这个描述显然很复杂，只能不完善地给出这些伤口的观念；除多发性和深度之外，唯一应当保留的事实，是没有出血：这一点无可争辩地证明，腿部的伤口是在死亡之后造成的。因此，女凶手们尤其残酷地蹂躏了朗斯兰小姐的身体。

在对犯罪工具作了若干考量之后，沙尔捷医生补充说，他“在法医学文献中没有找到任何例子”，可与这种“如实际所施行的眼球摘除”相比；接着，报告对被称为犯罪“阶段”的东西作出了一种建构。同一个“阶段”一词后来也将被精神病学专家们采用。确定犯罪行为是在一个阶段还是在数个阶段中发生的，对于讨论其地位是重要的。下一章将借助两姐妹的叙述来研究这一点。如果我们不得不作出结论说，事实上确有两个阶段，那么就必须指出，这将构成对拉康所提出的个案分析的一个反驳。事实上，在他的文本《偏执狂犯罪的动机：帕潘姐妹的犯罪》中，一方面是对一种没有诱导因素的二人妄想的诊断，更准确地说，这种妄想被标示为类妄想痴呆的，另一方面，是这种妄想在一次越入行动中的付诸实施，从那一刻起，这次行动就必须是一次“同时的、一开始便被推到狂怒顶点”的攻击，并且在其中，犯罪者只能使用“她们触手可及之物”作为工具。此处汇集的事实引导我们质疑这一描述，这

对于我们对该个案的分析并非没有后果：由于今天所获得的距离（即我们对两姐妹后来命运的了解），这次攻击得以更好地展开，并在某种意义上受益于这种距离，它将显示为异常地比当时最佳进路所能让人猜想到的更为复杂。

那么，以下便是 Chartier 医生的描述：

伤口是按什么顺序造成的？是否发生过搏斗？

克里斯蒂娜与莱娅·帕潘对这场搏斗的叙述已经给出了足够多的细节和精确之处，因此无需在这一点上展开。

— 用锡壶攻击朗斯兰夫人，克里斯蒂娜对仍然活着的朗斯兰夫人施行眼球摘除。

— 莱娅以类似方式攻击朗斯兰小姐。短暂搏斗的第一阶段似乎就是这样。随后，受害者被锤击了结，然后又遭刀刺。朗斯兰小姐臀部和腿部伤口的性质——这些伤口是在死后造成的——似乎表明她

死亡得更快，而且无论如何，遭受了更大的残酷蹂躏。搏斗应当是短暂的，因为受害者身上的瘀斑和附带伤都很少，而犯罪之后在女凶手身上没有发现任何伤痕。因此，可以肯定，最初用锡壶施加的打击非常猛烈，并使朗斯兰夫人与朗斯兰小姐无法有效自卫。最初的打击带有突袭和暴力。也有可能，两名受害者是先后遭到两姐妹袭击的。

[应注意，他的结论重申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断言，这一断言将获得甚至比前/后对比更大的成功。]

结论：

朗斯兰夫人与朗斯兰小姐几乎没有搏斗便被杀害，其残酷蹂躏与残忍的精心程度，在法医学文献中鲜有例证。犯罪工具有多种：锡壶、锤子、刀；而该犯罪最特殊的事实，是在受害者仍然活着、但因已受到相当严重的伤害而无法自卫时，用手指挖出她们的眼睛。

第 2 章

第二章

行动

一旦行动的痕迹被看见（眼球的摘除就是其持久的转喻），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巨大的紧张。事情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所遭遇之恐怖的尺度，给出了召唤司法习性的紧迫性的尺度："发生了什么？"犯罪的"无动机"不能被直接处理，而最终，Tharaud 兄弟在审判八天之后还会再一次为此惋惜；原因的琐屑性将被司法机关忽略，后者首先关心的是事实的确立。

需要漫长的数月，并且奇怪的是，还需要克里斯蒂娜的一次危机，

克里斯蒂娜的一次危机，据她说，类似于越入行动的那次危机，才决定

固守一种能够令重罪法庭满意的事实版本。将会看到，即便仅在事实层面，这些

事情也远非清楚。

若要知道这次攻击究竟由什么构成，我们实际上应当参照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对它所说的话。负责预审此案的当局，在能够确认、至少能够在没有太多矛盾的情况下把被告们的这些陈述同犯罪痕迹——如同它们已被记录下来的那样——加以对照时，便认为自己已经满意。

我们即将呈现并研究的讯问记录，并不是——也并不自称是——克里斯蒂娜与莱娅陈述的转录：一名警察和一名书记员记录了在他们面前所说的话，把一个问题和给出的回答概括为一个肯定句，并赋予这些句子一种学校作文式的风格，在其中，"闲谈"几乎没有进入的权利。在这里，登记事实并不等于固守一份文本。

先是克里斯蒂娜，随后是莱娅，在犯罪当晚接受了讯问，第一次由中央警署署长 Dupuy 讯问，随后由

将负责预审的法官讯问，共和国检察官也加入其间。面对 Dupuy 署长要求她说明，两姐妹出于什么动机、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工具杀害她们女雇主的问题，克里斯蒂娜这样回答：

那天下午，在一个我无法指出的时间，但天还没有黑，我们的女主人们离开了房子，把我妹妹和我单独留在这栋住宅里。她们离开之前没有同我，也没有同我妹妹发生任何争论，也没有给我们任何命令去做任何工作。另一方面，她们也不必这样做，因为我们的工作很早以前就已经固定下来，我们也照常做着。我的女主人们大约五点半回来。天已经黑了，我妹妹已经关上了临街的百叶窗。她们不在的时候，熨斗坏了，另一方面，就像昨天一样，而且已经修好了，因为我曾去布谢里先生的店里取它。夫人回来时，我告诉她熨斗又坏了，我没能熨衣服。当我对她说这话时，她想向我扑过来，那时我们，我妹妹和我以及我的两位女主人，都在1楼平台上。看到朗斯兰夫人要向我扑来，我便跳到她脸

上，用我的手指挖出了她的眼睛。当我说我跳到朗斯兰夫人身上时，我弄错了，我跳到朗斯兰小姐热讷维耶芙身上，被我挖出眼睛的是后者。就在那时，我妹妹莱娅跳到朗斯兰夫人身上，也同样挖出了她的眼睛。我们做完这件事后，她们就在同一个地方倒下或蹲下，随即，我急忙下到厨房，去取了一把锤子和一把菜刀。用这两件工具，我妹妹和我对我们的两位女主人狠命施暴。我们用锤子敲击她们的头，用刀割她们的身体和腿。我们还用一个放在平台上一张小桌上的锡壶打她们，

我们彼此多次交换工具，互相

交换，也就是说，我把锤子递给我妹妹让她去打，

她把刀递给我。我们对锡壶也做了同样的事。受害者开始叫喊，但我不记得她们说过什么话。在我们做完之后，我去把车库门上了门闩，也同样关上了门厅的门。我关门，是因为我宁愿让警察发现我们的罪行，而不是让我们的男雇主发现。接着，我妹妹和我去厨房洗手，因为

沾满了血，然后我们上到自己的房间，

我们脱下了沾满血的衣服，穿上一件罩袍，用钥匙锁上我们房间的门，两个人躺到同一张床上。您破门而入时，就是在那里发现我们的。去睡觉时，我们把锤子带到了房间里，我把它放在我们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况且您也在那里找到了它。我并不后悔，换句话说，我不能告诉您我是否后悔。比起让我的女雇主们剥掉我们的皮，我宁愿剥掉她们的皮。我没有预谋我的犯罪，我并不恨她，但我不能接受

朗斯兰夫人那天下午对我做出的那个举动。

署长向莱娅重复了他的问题。后者的态度同克里斯蒂娜明显不同：她不仅是在第二位发言，而且通过表现出强烈的不愿开口，强调并确认了这个“第二位”的位置；归根到底，她只是满足于专门确认她姐姐所说的话。在这样说时，她说得同克里斯蒂娜一样，也说自己做得同克里斯蒂娜一样，打得“和她一样多，像她一样”：

回答。——我的女雇主们，朗斯兰夫人和朗斯兰 Genevieve 小姐，大约三点半离开家去市中心；她们把我们单独留在屋里。后者熨衣服，我做清洁。今天，在离开之前，我们的女雇主们没有对我们作任何责备，我们之间没有争执。她们大约六点或六点半回来……

在讯问的这一点上，被告拒绝提供更多解释。

问。——您是否愿意让我给您读您姐姐的陈述，然后您告诉我它是否准确？

答。——是的，先生。

于是宣读克里斯蒂娜·帕潘的陈述。听完之后，莱娅声明：

我姐姐对您说的一切都是准确的，罪行发生的经过完全如她向您叙述的那样。我在这件事中的角色绝对就是她向您指出的那样。我像她一样打，也打得和她一样多；我断言，我们并没有预谋杀害我们的女雇主们。当我们听到朗斯兰夫人责备我们时，这个念头瞬间就来了。和我姐姐一样，我并不后悔我们所犯的犯罪行为。和我姐姐一样，我宁愿剥掉我女雇主们的皮，也不愿

她们剥掉我的皮。

问。——在你们打你们的女雇主们之前，您姐姐和您本人是否曾被她们打过?

答。——她们没有打我们，只是做出了想要打我们的动作。我再对您说一遍，我宁愿剥掉她们的皮，也不愿她们剥掉我的皮，而且，我再重复一次，我并不后悔。

第二次讯问。和署长一样，Hébert 先生与 Riégert 先生首先讯问克里斯蒂娜：

问。——（预审法官 Hébert 先生）：请向我们解释，您是怎样着手犯下这起谋杀的。

答。——我在二楼的平台上，当我看见夫人回来时，我对她说："夫人回来了？"然后，我站在第 1 级台阶上，对她说："保险丝又烧断了。"她回答我："又一次！"；她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拖到平台中央，紧紧攥着我的胳膊，我无法挣脱。于是我们像洗衣妇一样打了起来。她摔倒了；她把我抓得很牢，因为她手里攥着我的一绺头发。我没有立刻打她；有一处伤口应当是由于她摔倒时头撞到衣柜脚上造成的。随后我妹妹来帮我，试图让我挣脱。在搏斗中，两扇门之间的椅子从楼梯上摔了下去，我下去把它取上来，又把它放回原处。如果我这样打她，那只是狂怒使我行动。我没有任何以另一种方式行动的念头，也就是说，我绝没有同我妹妹预谋我的犯罪。不是我对电路做了什么，使它不能运转，以便有借口去同朗斯兰家的女士们争吵。再说，当我到他们家工作时，说得很清楚，我只会同朗斯兰夫人打交道，因此既不同热讷维耶芙小姐打交道，也不同朗斯兰先生打交道。

问。——（共和国检察官 Riégert 先生）：在朗斯兰夫人的那个社会里，人们不像洗衣妇那样打架，如您似乎所暗示的那样。那些女士们会像您所说的那样行事，是很奇怪的。

答。——然而这是真的，否则我没有理由那样行动；我按照我认为应当做的方式进行了自卫。

问。——（预审法官 Hébert 先生）：然而朗斯兰先生明确说过，他曾同你们谈到社会保险，而你们对他说你们什么都不愿付。

答。——L. 先生从未对我谈过保险；如果他谈过，我会支付我那一份，这样我就可以要求加薪。

问。——（共和国检察官 Riégert 先生）：您真的确实没有很久以前就和您妹妹预谋您的犯罪吗？您对这些女士们没有任何怨言吗?

答。——没有，先生，我对她们没有任何怨言：我并不不幸，也没有对那些女士们的任何怨言。我重复一遍，只是狂怒使我这样行动。再说，如果我是以另一种方式行动的，我会告诉您。我的犯罪已经足够重大，使我应该说出它是什么。您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您会以另一种方式判断，我把这交给您，我将接受给我的惩罚。L. 小姐随后上来了，她扑向我，抓着我的胳膊，我无法挣脱。我妹妹莱娅帮我挣脱。于是我用放在小桌上的锡壶打她，然后站在她身后，用手指挖出了她的眼睛。我拿着那把不太锋利的大刀，用它来打她。随后我妹妹莱娅用另一把她到楼下取来的刀割她，并用一把我们两人都使用过的锤子打她。由于她倒下时踢了我一脚，我也切割了她，为了报复她给我的那一脚，

问——尸体是怎样摆放的?

答。——Genevieve 小姐的尸体放在 L. 夫人的尸体前面，而 L. 夫人的尸体头部朝向通往临街第二个房间的门，脚在衣柜那边，小姐的眼睛在楼梯的第一级台阶上。三个房间的门都关着。

问——（中央警署署长先生向年轻的克里斯蒂娜提出如下问题）：您去楼梯上取椅子时，把它放在了哪里？

答。——放在你们找到它的地方，但稍微斜放在两扇临街的门之间。

问。——（警察署长 Namur 先生向克里斯蒂娜作如下提示）：但是当我们夜里找到它时，它在临街的房间里；这个房间的门是开着的，女人的帽子在椅子的左角，手套在上面。

答。——然而，它确实就在我把它放在两扇门之间的那个地方，我妹妹会告诉您。

> 问。——（Namur 先生补充）：然而只有一把椅子。答。——然而它确实就是处在那个位置。

应当给这份讯问报告补充《La Sarthe》对此所作的见证。记者对克里斯蒂娜的陈述方式、以及她的态度和话语更为敏感，写道：

> 在供认自己的犯罪之后，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帕潘被带到中央警署，在那里接受共和国检察官 Riégert 先生、我们上文提到的那些司法官，以及中央警署署长 Dupuy 先生的讯问。

> 克里斯蒂娜·帕潘光着腿，穿着拖鞋和粉红色罩袍，棕色头发卷成尾状，面容疲惫，却回答得很肯定，尽管她显得相当亢奋。她讲述说，她的女雇主在傍晚将尽时回来，因为电流保险丝烧断而“责骂”了她。两姐妹当时正在一楼熨衣服。

> ——她似乎想扑向我，克里斯蒂娜·帕潘在谈到她的女雇主朗斯兰夫人时说，于是我先动手打了她，并狠狠给了她几下。

> ——但是，检察官质问道，那些女士们并没有待在那里等着您再给她们更多打击。

> — 她们已经被狠狠收拾过了，克里斯蒂娜犬儒地说。
>
> — 那么，您本来还有时间下楼去找锤子。这不可能。承认吧，您是躲在楼梯平台家具后面伺机等着杀她们，杜皮署长先生说。

> — 我不是正告诉您吗，她们得到了她们应得的惩罚，后来就躺在楼梯平台上了。

> 而女凶手说出了这个犬儒的句子：

> — 最强的那个就赢。等我打败她们以后，我就挖出了她们的眼睛，是的，我告诉您，我挖出了她们的眼睛！！！

> 在这次讯问期间，可以听见妹妹莱娅·帕潘在隔壁房间里嚎叫，她陷入了一场神经危机。

确实如此。当克里斯蒂娜接受讯问时，莱娅发生了所谓的一场“神经危机”。两名警察不得不按住她。第二天，《萨尔特报》提到这场危机时，把莱娅称作“失控的狂怒者”。这种神态同克里斯蒂娜的神态很不相同；克里斯蒂娜表现出确信，带着傲慢、甚至犬儒的方式，声称自己对她所投身的行动负有责任。受委任的精神科专家们（Schutzenberger 医生自2月3日起受委任）在报告中这样定位莱娅那天夜里的危机：

> 我们希望了解这场危机的性质，并且按照委任我们的裁定书所规定的：“听取一切有用证词”，收集了大量人士的信息，尤其是那些在场的市警察员的信息。

> 所有证人一致肯定地声明，他们没有观察到舌咬伤，没有阵挛性或强直性惊厥运动，没有不自主排尿，也没有危机后的意识朦胧；同一些证人对于这场危机的性质也同样作出肯定陈述：这是一种莱娅方面的绝望和恐惧的表现；她（此外，她也这样向我们声明过）同她的姐姐克里斯蒂娜分开了，后者当时在中央警察局长先生的办公室里，她为姐姐担心，想见她，用尽全力呼唤她，而这些（原文 OCR：2s0s）感情使她哭泣并挣扎，因为她想要，她对我们说，“同姐姐会合，再见到她”。

> 这一精确说明是不可或缺的，以免残留任何疑问；关于这场“神经危机”所给出的信息，完全证实了我们的意见，即莱娅在她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没有表现出癫痫，甚至连潜伏状态的癫痫也没有。

无论如何，必须承认，莱娅最终平静了下来，至少平静到足以轮到她回答这个司法—医学—警察的 Areopagus 审判团：

问——（预审法官 Hébert 先生问）：请向我们解释犯罪当天您处于什么情况。

答——我姐姐正在同 Lancelin 夫人扭打，我在楼上料理衣物，听见喊叫声后就下楼；我甚至问 Lancelin 夫人今天她是怎么了，为什么这样虐待我们，因为这不是她平时的习惯。

问——（共和国检察官 Riégert 先生问）：您刚才说，那些女士平时并不习惯那样行事；我想问，为什么她们那天会那样行事?

答——不，那不是平时的习惯，不过那天我们确实就是这样被对待的。我尽我所能想把我姐姐解脱出来，并且同她一样，我出手是为了保护她。于是，Lancelin 夫人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带到柜子旁，把她的胸口顶住我的胸口来弄疼我。于是，等她倒在地上以后，为了了结她，我把她的眼睛挖了出来。她侧身倒下，头朝柜子那边，脚朝门那边。在这个姿势下，我用锡壶打她。

问——但是您所指出的位置并不是受害人的真实位置：相反，头在门那边，腿在柜子那边。此外，凶杀发生时拍摄的照片证明您说的不是事实。

答——（莱娅拿过照片，检查之后说：）可是，我告诉您的尸体摆放位置确实就是这样。

问——除非是您自己动过她们。

答——不是的，先生，我告诉您，确实就是这样，她当时就在那个位置。

问——（Chartier 医生问）：您第一下打在什么地方？答——后脑。问——您打她时，是不是以某种方式抓着她？

答——是的，我一只手抓着她的头，另一只手抓着她的一只胳膊。

问——（共和国检察官先生问）：可是，在那种情况下，难道您有三只胳膊吗？

答——没有，但我就是按我向您指出的那样实施了我的罪行。

问——（中央警察局长先生问）：您说头在柜子那边；这不可能，周围本该有血。

（警察局长 Namur 先生作出如下观察："Lancelin 夫人的头确实在门那边，距离墙十九厘米，这是我量过的；而且，发现的血迹也证明头在那一边。"）

答——不，我向您肯定就是这样。

问——（预审法官 Hébert 先生问）：毫无疑问，您和您的姐姐预谋了这场犯罪。你们对 Lancelin 夫人怀有怨恨，因为她对你们作出过一次没有根据的指摘，而你们认为自己没有理由接受指摘。此外，你们那天并没有怎么工作，因为电中断了。

答——可是我在我的房间里，我有衣物要准备，我从三点一刻一直工作到六点。我只是在听见我姐姐喊叫时才下楼。

问——（预审法官 Hébert 先生问）：您很爱您的姐姐，对她怀有很深的感情，因为您说过，您把她看作您的母亲。您真的犯下了您把自己说成扮演了某种角色的那种骇人听闻的行为吗？您弄错了；您想像她一样承担全部责任。请您明白，您姐姐被指控的罪行丝毫不会减轻您本人所受指控的事实。

如果您说出真相，无论对您姐姐还是对您自己，都会更好。

> 面对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莱娅的姿态中显出激动，她哭了。

答——不是的，先生。我告诉您的是事实，我不能告诉您别的，因为事实就是像我说的那样发生的。

问——（预审法官 Hébert 先生问）：也许您同这件事毫无关系，而是想同您的姐姐克里斯蒂娜共同分担命运。在您被指控的案件中，无论它多么骇人听闻，您都不应该撒谎；在您现在所处的境况中，真相会完全对您有利。

答——我不能改变我的陈述，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发生的。

问——（共和国检察官 Riégert 先生问）：您没有别的要说了。倘若有一天您要说，您应当去找预审法官。

问——（预审法官 Hébert 先生问）：我确信您没有说真话。杀死 Lancelin 夫人的应当是您的姐姐克里斯蒂娜，而且您到达时她肯定已经死了。

答——不是的，先生，朗斯兰夫人还没有死；而且，和我姐姐一样，我参与了我们被归罪的两起犯罪。

问——（同一人问）：您会告诉我真相的，我确信如此；请相信我，这样做既符合您的利益，也符合您姐姐的利益。

答——我没有什么要改变我先前陈述的。

《萨尔特报》的记者在结束他的第一篇报道时，提出了一种个人印象，而这将成为长时间讨论的主题："不能否认，"他写道，"星期四下午见过克里斯蒂娜·帕潘的人，都觉得她的态度特别反常。那么：疯女人的犯罪？"

对于想要确定这场屠杀是如何展开的人来说，这些最初的讯问所带来的问题多于资料。甚至不能说存在一种关于事实的版本，因为这个术语意味着事实至少以最低限度连贯的方式被组织起来。

按照克里斯蒂娜对局长所说的，L. 夫人在她告知熨斗"坏了"之后，似乎曾想扑向她。她是如何知道 L. 夫人的这个意图的？她没有说。随后她声明自己扑向了夫人，接着又纠正：不，是扑向小姐。她挖出的是小姐的眼睛，而莱娅则对夫人做了同样的事。当然，她在叙述中发生迟疑，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可以看到，这一叙述还预设，而且她也这样说了，四个主角在攻击发生时都在楼梯平台上。"紧接着"，她说，由此区分出第二个时刻，"我急忙下到厨房"；而回到楼梯平台以后，两姐妹拿着锤子和刀，据说同样地、不加区分地疯狂攻击两位女主人，把各种器具从一人手里递到另一人手里。

第二次讯问已经以另一种方式呈现事情。克里斯蒂娜似乎首先对夫人说话，用一种半疑问、半肯定的语气，并以此处作为尊敬标记的第三人称方式说："夫人回来了？"；随后便有了回应："保险丝烧断了。——又一次！"克里斯蒂娜声明，L. 夫人当时抓住了她的胳膊。在她难以挣脱的情况下，一场搏斗就展开了；莱娅的介入于是具有了向她姐姐提供"帮助"的价值。无法确定莱娅的这种帮助是在克里斯蒂娜只同 L. 夫人搏斗时发生的（讯问开头似乎是这样说的），还是（如结尾所报告的）发生在小姐介入之后，从而把克里斯蒂娜从两位女主人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莱娅所说的会证实第一种情势。

莱娅补充说，当时 L. 夫人抓住了她的胳膊。这里再次遇到 L. 夫人的这个动作，但这一次承受这个动作的据说是莱娅。在这第二个叙述中，克里斯蒂娜断言小姐"立刻上到"楼梯平台，这就意味着她在搏斗开始时并不在那里，而这一点同她对杜皮局长所说的话相矛盾。只有一个事实似乎不造成太大困难：在第一场打斗中，据说分出了两组搏斗者，一边是夫人和莱娅，另一边是小姐和克里斯蒂娜。挖眼睛就是在搏斗的这个时刻发生的。在第二个叙述中，确实有下到厨房的指示，但克里斯蒂娜说，是莱娅去取刀和锤子；而先前她曾向局长声明，下楼的是她自己。

尽管存在这些矛盾以及其他矛盾（例如受害人尸体的位置，按克里斯蒂娜和莱娅所说本应如何，以及实际上被发现时如何），似乎仍有一个确定点：L. 小姐腿部和臀部的割伤是莱娅造成的，这一事实发生在屠杀的第二阶段。奇怪的是，在这一点上莱娅采取了主动。克里斯蒂娜也确认了这一点，她声明说，莱娅也把她"切割了"，并且精确说明，那是为了报复 L. 小姐在倒下时踢了莱娅一脚。

第二天的讯问使这第一种说法得以更细致。当天《萨尔特报》记者的证词很重要，这不仅因为它叙述了两姐妹的精神状态（“迫害狂”这个术语第一次被表达出来），也因为它报道了勒芒公众的精神状态：他们一方面向 L. 家表示慰问，另一方面又来到报馆的橱窗前，“表达他们对这两名女罪犯的反感”。越入行动有其公众。

> 自从布吕耶尔街的惨剧被发现以来，二十四小时已经过去了。在这一天里，这个悲惨消息口耳相传，到处播撒震惊，同时也播撒愤怒。

> 两名犯罪姐妹于星期五上午在监狱中第一次接受讯问，讯问者是共和国检察官 Riégert 先生和预审法官 Hébert 先生，他们对她们进行了身份讯问。

> 两位司法官在省立精神病院主任医师 Schutzemberger 医生陪同下，记录了两姐妹的陈述；她们用不连贯的句子回避那些她们不愿回答的过于精确的问题，例如谈到“原子”，或者说在某些情况下，“女人会受到灵的造访”。

> 星期五下午，在法院大楼的走廊里，我们再次看见了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帕潘，她们在

> 五点钟，受到 Hébert 先生长时间讯问。

> 她们十分虚弱，身穿杂色布料的罩袍——由一条宽腰带在腰间束起——经过时，我们的摄影师得以用镜头把她们定格下来。

> 我们发现她们依旧恼怒，仍然有着同样恶毒的眼睛，但目光却迷失在空无之中；长长的辫子框住她们那如此苍白的脸；她们的双手神经质地交叉在腰间，也许是为了更有力地束紧一个她们似乎并不准备[1]背叛的秘密。

> 她们顺从地在照相机前摆姿势，似乎只有镁光灯的爆响把克里斯蒂娜从她的昏沉中拉出来；她的妹妹，也许被第一道闪光惊住了，紧绷着等待第二道闪光。

> 她现在是否已经充分理解了她同姐姐一起犯下的这场惨剧的骇人残酷？而后者尽管如此，仍给人一种支配她、使她屈服的印象。

但是，任何见过那可怕的屠杀场景所造成的后果的人，都会对那些不幸的受害者不得不面对的狂怒有一个准确的认识。热纳维耶芙·朗斯兰小姐肯定曾试图保护自己的生命，无疑也保护她母亲的生命，因为沙尔捷医生昨天在这位年轻女子痉挛紧握的手中，发现了一绺来自两名女仆之一头上的头发。

在对那血腥场景作了一个简短勾勒之后——这是审讯所允许重构出来的场景——记者继续写道：

当预审法官问她们选择哪位辩护人来协助她们时，两姐妹回答道，声音里没有丝毫激动的痕迹：

— 我们不需要律师。我们很清楚自己会被送上断头台。

> 奇怪的声明，这一声明本身或许可以作为这些记事的结论，如果不是我们作为报道者的职责迫使我们回顾下面这一事实的话；这一事实表明，这些奇怪的人似乎在何等程度上患有被害狂。

母亲接受询问

我们必须补充说，星期五下午，两名女罪犯的母亲德雷夫人接受了迪皮先生的询问。

她断言，曾在二月和三月通过一名洗衣女工把两封信转交给她的两个女儿，但没有得到回复。这些信由警察在姑娘们的房间里找到，也许会提供一个

关于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帕潘奇异心态的有用线索［参见第155-158页］。

> 毫无疑问，也正是这同一群愤怒的人来到我们办公处的橱窗前，向那两名女罪犯表示厌恶；我们从14时起便得以展出她们的照片。

城市的震动

星期五一整天，大量深受震动的勒芒居民，在布吕耶尔街那座宁静的房子前鱼贯而过；我们看到这个萨尔特老家族的许多朋友前来，带着一种非常

可以理解的激动，把一张名片投进信箱，这是向其悲痛成员表达同情的谨慎见证。

透过关闭的百叶窗，渗入的微光显露出调查人员的在场，他们仍在继续勘查。

预审法官的书记员这样转录克里斯蒂娜的陈述：

我的母亲并没有抚养我，她在50到60岁之间，我不确切知道；她同我父亲离婚已有20年，我父亲是

马里涅的农民：她把我托付给我父亲的一位姐妹，马里涅的伊莎贝尔·帕潘，是她把我抚养到7岁；到这个年龄时，我母亲把我接回去，又把我托付给布朗希斯里街的善牧院。我在这所机构一直待到15岁，在那里我学会了女裁缝和刺绣女工的活计。

在列举了她曾受雇并离开的各家人家之后——她离开这些人家，或者是为了一个薪酬更高的职位（她母亲认为她挣得不够多，而她把自己的全部工资都寄给母亲），或者是因为别人要求她做的工作太辛苦，或者是因为女主人太苛刻——克里斯蒂娜继续说：

……我作为厨娘进入朗斯兰夫人家。到即将到来的四月，我进入她家就满[6]年了。起初我挣250法郎，最后挣300法郎。我在这家待了2个月后，我妹妹莱娅作为女房间女仆进来了。在进入朗斯兰夫人家之前，我自己领取工资，然后交给我母亲，母亲随后不时给我一点钱作小开销。后来，我自己保留工资。为了这件事，我母亲对朗斯兰夫人很不满意，因为正是朗斯兰夫人使她注意到，我们有必要从自己的工资中稍微得到一点好处。我不再把工资寄给母亲。我把钱存进储蓄银行的账户里；为了不让母亲太不高兴，我不时送她一些小礼物。无论如何，母亲都试图让我离开那个地方，她向我指出女主人

非常苛刻；虽然这有一点真实，然而我知道到处都有问题，所以我不愿听她的话，我留在了那个地方，在那里，归根结底，我们受到的待遇和供给的饮食都相当不错。在服务之外，主人们同我们有些疏远。朗斯兰先生从不和我说话，朗斯兰小姐也不和我说话。唯一同我说话的是夫人，为的是对我作出指摘，有时也作出或多或少有根据的责备。进入她家服务时，我被告知，不要期望她那方面有任何亲近，因为这是家规。清扫一结束，她就到处检查；哪怕最小的一粒灰尘都会引发指摘，并重新提起先前同类的事情。她还认为，肉铺和食品杂货店的开销上涨得很多。但是，使我们一点一点地对朗斯兰夫人恼怒起来的，并不是她对我和对我妹妹的这种做法。导致

让我“收拾”她（lui faire son affaire）的原因，是她同女儿回来时扑向了我。她在一楼平台上才待了2秒钟，我就下来了；她是同朗斯兰小姐从市中心回来的，当我们下楼时，我手里拿着一个放在盘子上的小罐，罐里有一支蜡烛，为的是蜡渍不要落到楼梯上；我对她说：“夫人，熨衣服时保险丝又烧断了，像昨天一样。”朗斯兰夫人对我说：“又坏了！”当我向她走近时，她把双臂向我伸过来，打了我的胸口和左臂，并抓住了这只手臂。我对她说：“您怎么了？”我便同她打了起来。朗斯兰小姐过来帮助她母亲，而我妹妹在我身后下楼，扑向朗斯兰小姐，也同她互相挥拳。看到我对付不了朗斯兰夫人，我怒不可遏，把我的指甲插进她眼睛里，把眼睛抠了出来。就是这时她倒下了。我妹妹也对朗斯兰小姐做了同样的事，她也倒下了。她们倒在地上时，我们到厨房去拿锤子和刀，去收拾她们 ｛ les arranger ｝，正如您已经看到的那样。我们两个人都用了它们，把刀留在您找到它的地方，而我们没有意识到，把锤子带上了我们的房间，在那里把门反锁起来，躺下等待警察到来，此前我们已经把通向街道的入口上了门闩。我向您保证，我们没有预谋这件事；如果是预谋的，肯定不会进行得这么顺利。也就是说，如果我事先想过，我肯定不会去实行。如果我知道事情会这样结束，我就不会对朗斯兰夫人说出那句引发一切的话。手里拿着放有蜡烛小罐的盘子的人是我。朗斯兰夫人扑向我时，我让盘子掉了下来，盘子碎了，但小罐没有碎。早上，我在面包店买了——给我妹妹的——您在平台小桌上找到的那两个热那亚蛋糕和两个小圆面包。是我妹妹把它们放在围裙口袋里，也应当是她把它们留在那里的。

……锤子和刀在厨房里；我妹妹和我是在把夫人和朗斯兰小姐的眼睛抠出来、并把她们摔到地上之后，到那里去拿它们的。

……她立刻倒下，大声尖叫。当我下到厨房时，已经听不见她了；当我再上来时，我记得她还在动，但虽然她在叫，却并没有说出多少话。我记得不太清楚了，我马上打了她，因为我怒不可遏。

……所有细节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至于我们是否从厨房拿上了一把或两把刀，我只看见一把，就是后来被拾获的那一把。

我为我们所做的事感到遗憾，如果一切重新发生一次，我肯定不会再那样做。我没有任何理由怨恨我的女主人们。

问：当您的女主人们和男主人住在省府广场时，您妹妹和朗斯兰夫人之间不是发生过一个小小的事件吗？

答：是的，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至少两年前了；我妹妹曾对我说，朗斯兰夫人为了让她从地上捡起什么东西而掐了她；我自己当时在餐厅里，听见我妹妹撞到房间地板上的声音。后来她告诉我，朗斯兰夫人一边掐她，一边强迫她跪下去捡什么东西。她给我看了被掐的痕迹，并对我说：希望这种事不要再发生。她没有再跟我谈起那件事。

……我以为她已经忘了那件事；我们做了我们所做的事，并不是因为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抠出了朗斯兰夫人的眼睛，我倒更相信是小姐的眼睛。我抓住了她们两人中的一个，当时我在她身后，我妹妹和我在平台上转来转去。我妹妹看见我怎么做，想必模仿了我；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没有看她。她和我同时结束。朗斯兰夫人和朗斯兰小姐只有在我们抠她们眼睛时才叫喊。那是非常强烈的痛叫，但没有呼救。我怒不可遏，直到用找到的那些物件打了她们，直到看见她们的状态和满地流出的血之后，我才平静下来。

问：我们到达案发现场时，您似乎还非常激动。

答：很可能，但我已经后悔了。

莱娅也受到讯问：

我是在我祖父德雷的妹妹家受教育的，她住在圣樊尚修道院街。我在圣樊尚街的自由学校上学到八岁，随后在圣夏尔孤儿院待到十三岁。我同母亲在蒂费的帕尔托先生家待了四个月。

同她姐姐一样，她随即列举自己工作过的各个地方、所挣到的逐渐增加的数额，并接着说：

我母亲本来希望我离开朗斯兰先生和夫人的家，也希望我姐姐离开，但我们不愿意，因为我们在那里并没有觉得那么不好。有时，当我们应受责备时，朗斯兰夫人会对我们提出意见。但是那天傍晚，朗斯兰夫人扑向我姐姐，朗斯兰小姐扑向我；在我同她互相挥拳、想让她停下来之后，我被迫抠出了她的眼睛，她便像她母亲一样倒下了。我姐姐和我到厨房去拿刀和锤子；当我们回来时，由于那两位女士还在动，我们便用刀和锤子打了她们两人。我们并没有把全部钱都存进储蓄银行，因为我们还攒下了 2000 法郎，放在我们房间里一个钱夹里，钱夹又在一只皮箱里。我们没有打算逃跑以躲避惩罚，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预谋。

我们有一个姐姐，埃米莉亚，她以圣母诞生修女的名字，在善牧院做修女，她也是在那里受教育的。她十八岁入了修会，违背了我们母亲的意愿；此外，母亲已经不再见她了。我们自己也不同她通信。

这次对克里斯蒂娜的新讯问，尤其使人能够明确在楼梯平台上进入搏斗场景的主角们的出场顺序：首先是朗斯兰夫人，然后是克里斯蒂娜，她借着蜡烛的光下楼。克里斯蒂娜在朗斯兰夫人向她伸出双臂之后，便同她搏斗起来；这个动作据说招来了她一句“您怎么了？”。小姐应当是在这时介入的。最后，才是莱娅。

两姐妹还断言她们两人都下到了厨房；这一点后来将不再受到质疑。

相反，第一次搏斗的结果仍然晦暗不明。克里斯蒂娜起初说自己抠出了朗斯兰夫人的眼睛（于是她妹妹对小姐做了同样的事），随后又改口，同时保留疑问：“我倒更相信是小姐。”莱娅的陈述似乎证实了搏斗的第一次二分。但这同她们前一天暗示的内容相矛盾。

这里第一次提到那两个热那亚蛋糕和小圆面包被放在平台小桌上。正如朗斯兰小姐腿上被切出的伤口一样，这一摆放被明确归于莱娅。

现在只考察行动本身，我们将把那些自最初讯问起便指向所谓她们“动机”的一切都搁置一旁。随后的讯问为我们重构这一行动带来了什么？

2月5日，《萨尔特报》的读者可以读到：

新的审讯

> 星期六傍晚，帕潘姑娘们再次被带到预审法官 Hébert 先生的办公室。

> 克里斯蒂娜，年长者，仍然极度亢奋。至于她妹妹莱娅，则显得虚弱；汗珠布满她的脸，嘴唇毫无血色，她看起来已如此接近体力极限，以至于有一瞬间人们担心她会失去知觉。

> 克里斯蒂娜负责替妹妹回答；当她得知她们房间里只找到两千法郎时，十分惊讶，并不得不指出其余钱款在哪里。

> 她仍然否认预谋，

> 但是，在承认自己有罪并且应受惩罚的同时，她带着炫耀的神态反复说，她希望被送上断头台。

> 星期五，在监狱里，两姐妹被隔离并关进分开的牢房。这个决定使莱娅悲伤，使克里斯蒂娜恼怒。

> 自从到达以来，她们拒绝进食；甚至拒绝躺下，只是坐在自己的床上。

> 鉴于莱娅虚弱的状态，Hébert 先生向她指出她会再次见到姐姐，使她答应吃一点东西并躺下。

> 昨天下午，她又拒绝进食，但躺到了床上，不久之后便沉沉睡去。

同月 7 日，Schutzenberger 医生在同一家报纸上发表一项声明，要求在对两名被告的责任能力作出判断之前进行一个月的研究；就在这一天，莱娅重复了她在 3 日关于搏斗二分所说的话：

我们同她们扭打在一起，把她们打倒；当她们倒在地上时，我们怒不可遏，按住她们的头在地上，抠出了她们的眼睛，我抠的是朗斯兰小姐的，我姐姐抠的是朗斯兰夫人的。

> 问：那时她们一定发出了可怕的叫喊。
> 答：她们只是叫了几声。

问：大概是因为她们之前已经被痛打过，要么是用小罐，要么是用锤子。

答：只有在抠出她们的眼睛之后，我们才用小罐打她们。是我从小桌上拿起了它，我对她们狠下毒手。

先打一人的头，再打另一人的头，从朗斯兰夫人开始；随后我把罐子递给我妹妹，她也用了它。我们下到厨房去拿那两把刀和锤子。之后，我们带着这些武器回来，先后把它们用在我们的两个受害者身上，她们还稍微动着。是我割了朗斯兰小姐的腿，我妹妹用那把很锋利的刀帮我切她的臀部。

关于克里斯蒂娜的讯问，只留下了《萨尔特报》所收集到的痕迹：

《萨尔特报》（La Sarthe）记录道：

> 星期二下午刚开始时，克里斯蒂娜·帕潘，两个有罪者中年长的那个，被从监狱带出，送进预审法官 Hébert 先生的办公室。她极其苍白，四肢发抖，目光固定在地上，对法官的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太困难。但当法官问她："如果您再次处于同样的情境中，您还会这样做吗？"克里斯蒂娜·帕潘用力声明："当然不会，我不会这样做，我非常后悔我做过的事。"Hébert 先生提到公众中持续流传的传闻，据说帕潘姐妹搞招魂术，于是问克里斯蒂娜：

> ——您每个星期四都去搞招魂术，犯罪前那个星期四您不是去了那里吗？

> ——我从来没有去过您说的那个地方。

> ——是的！有人看见您去那里，您不是让桌子转动吗？

> ——确实，我听说过您向我指出的那个人，但我从来没有同她说过话，我向您发誓，我没有去过她家。

> Hébert 先生于是试图让每一名被告在犯罪现场中的作用得到评估，特别是克里斯蒂娜如何抠出朗斯兰夫人的眼睛。

> ——我先抠出一只，然后抠出另一只；我从后面抓住我的女主人，因为我们正在打架。

> ——朗斯兰夫人没有更好地自卫，这很异乎寻常。您应当说实话。您用那把

> 锤子打了她，然后毫不费力地抠出了她的眼睛。

> ——不，不是这样。

> ——您不仅抠出了朗斯兰夫人的眼睛，也抠出了朗斯兰小姐的眼睛。

> ——没有。

——最后，请向我解释犯罪那天下午发生了什么。

——朗斯兰夫人攻击了我。

——这非常令人惊讶，因为，虽说您说过朗斯兰夫人对她的女佣们很疏远，但她待她们很好。你们冷静地实施了你们的罪行。您会告诉我，为什么这样虐待那两个不幸的女人吗？您服从的是哪一种感情？难道是出于嫉妒吗？

——不是，因为我从早上起就在生气。

——因为一个电保险丝烧断，因为这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您竟然以如此凶残的方式向那些不幸的女士们施暴，这是不可接受的。人们会说，您在看到受害者在您的击打下呻吟时，体验到了一种强烈的满足。

当 Hébert 先生把那个半压扁的锡罐、随后又把在一具尸体上找到的刀拿给克里斯蒂娜看时，

——我记得，克里斯蒂娜说，曾用那个（小罐）打过，但没有用刀。

——你们一定还有另一把刀，后来把它扔掉了，这实际上证明你们预谋了你们的罪行。

——没有，先生，我们没有另一把刀。

——用这一把不能切；那么锤子呢，是在屋子里的吗？

——早就在了。

——可不是这样！Hébert 先生抗议说，这把锤子很新，您不愿意对我说实话，但我确信您妹妹会告诉我。这把锤子就是您首先用来击打朗斯兰夫人和朗斯兰小姐的东西。

——不是，先生。

——然而，当您如您所说，下到厨房去拿锤子和刀时，您本来有时间恢复镇定。为什么您不愿意说出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您恨您的女主人吗？

——不，我不恨她，这是假的！

——那么，您是在某种影响之下行动的。来吧！说话！

但是，这名罪犯大概认为自己已经说得太多了，因为从这一刻起，她便封闭在绝对的沉默之中。Hébert先生借此把她送回监狱，并命令看守把莱娅·帕潘带来。片刻之后，这名年轻罪犯出现了，像她姐姐一样发抖。然而，她比前几天平静得多。Hébert先生先问她是否睡了、是否吃了东西，但莱娅固

执地什么也不说。一个多小时里，这位杰出的司法官没有取得任何成功，没能让莱娅·帕潘开口。她似乎处在催眠状态，眼睛睁得很大，失神地望着虚空，嘴唇毫无血色。人们会以为她随时都会昏倒。凭着值得称赞的耐心，Hébert先生试图讯问她：

“来吧，您什么也不想说吗”，或者，“您现在又聋又哑了吗？”

没有效果，法官改变策略：“您在别的雇主那里工作时，他们对您很满意。您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罪犯？”

莱娅用单音节回答，司法官费了很大劲才辨认出来。Hébert 先生让她看犯罪工具，并补充说：

——你们用了这个，然后用了这个。而这把刀，您认得吗？可是请看着我！

分钟一分一分过去。最后，莱娅用极其微弱、几乎听不见的声音，终于承认还有另一把刀，一把餐用刀，切得很利。应当补充的是，关于所使用的凶器，预审法官的确信早已形成。那把刀刃如此磨损、连一个面包都切不开的刀，也就是在朗斯兰小姐尸体上找到的那把刀，并不可能造成在这位年轻女子的大腿和小腿上发现的那些深深切口。莱娅说明：

——我们每人拿了一把刀，其中一把切得很利。

——可是，后一把刀后来怎么样了？——司法官于是问。

——我姐姐拿走了。我不知道她用它做了什么。

因此，在罪行发生八天之后，司法机关仍然不知道该如何确切判断所发生的事情，哪怕两姐妹从一开始就承认她们是杀人者！尽管由于新闻报道的呈现效果而有所夸张，法官的恼怒却是显而易见的。两姐妹在戏弄他！他仍然不知道是否只有克里斯蒂娜才应当被起诉，他仍然不知道是谁挖出了谁的眼睛！相反，他知道的是

侦查几乎没有进展。

因此，必须投身于一种事实重构的仪式，在犯罪现场进行讯问。在另外两名精神病学专家于四月初受聘之后，这次重构于 1933 年 6 月 8 日举行。那天的讯问中，以下要素将被保留下来。

克里斯蒂娜

从声响和脚步声，我马上想到是那两位女士回来了；为了确认，我走到平台前，稍微探身说：“是夫人回来了”，并对我妹妹说：“我要请夫人愿意的话把熨斗修好，这样对我方便 [cela m'arrangerait]，因为我们的熨烫活已经迟了。”

我借着蜡烛的光下楼；当我来到最后一级台阶、到达一楼平台之前时，发现朗斯兰夫人已经到了平台上，就在我面前。我对她说：“我的熨斗坏了”；“又坏了”，她对我说，并且离我很近，没给我时间再对她说话，就抓住我的右臂和胸口，对我说了我不知道是什么的话。我对她说：“您怎么了？让我安静一点”，我并没有反抗；但我妹妹这时到了，帮我挣脱，却没有马上成功。当我被解脱出来时，朗

斯兰小姐——我此前没有看见她，她应当是在平台上——又抓住了我的手腕，我们两人搏斗起来；我对朗斯兰小姐说："您对我有什么不满？"但她什么也没有回答我，只是看着我；我设法使她脸朝前倒下，并腾出一只手。那时，我在她背上，她从后面踢了我一脚，并扯掉我一绺头发。我暴怒起来，抠出了她的眼睛；她只是不断呻吟。她可能是被震懵了，不是因为我此前给她的一击，而是因为她倒下时头撞到柜脚的那一下；在抠出她的眼睛之后，我抓起伸手可及、放在小桌上的小罐，反复击打朗斯兰小姐的头；我停止击打时便放下了小罐。与此同时，我妹妹应当正在同朗斯兰夫人对峙，但我不知道她对她做了什么；当我站起来时，已经结束了。我想到自己挨了朗斯兰小姐那一脚，仍然怒不可遏。我决定去拿锤子，用它在我自己被打过的地方打她；我同时拿了三角刀，而我妹妹，曾经

同我一起下楼，把她要用来割朗斯兰小姐双腿的餐后小刀带上楼来。就我而言，我拉下了朗斯兰小姐的内裤，在脊柱下方给了她两三锤。可能我还在差不多同一个地方，用三角刀切了几刀，是用锤子敲在刀上造成的。受害者们没有叫喊，只是呻吟。我妹妹和我在搏斗中发出了叫喊。我们下到厨房去清洗自己，我们浑身是血。我去给入口大门的门廊和前厅上了门闩……

莱娅

我们只是后来才使用水罐。当我们的女主人们回来时，我姐姐熨衣服的房间里，电和电熨斗已经停止运转了几分钟。那时我在小阁楼里，把衣服铺在暖气片上。我的姐姐对我说："它坏了，我要赶快下到厨房去拿蜡烛，好在熨斗还热的时候把熨烫做完。"朗斯兰母女回来时，她已经又上楼来了。我们听见她们开门，我姐姐对我说："我要下去请朗斯兰夫人试着修理熨斗，以便利用她们今天下午不在的时候把熨烫往前赶一赶。"于是我姐姐下楼去找朗斯兰夫人；她是从楼梯上方看见她来了以后下去的。我比她稍晚一点下去，我听见有人说话，但听不懂说了什么；当我走到最后几级台阶时，我看见朗斯兰夫人抓着我姐姐的胳膊，她们两个都在楼梯平台上。因为听见有人说话，我以为朗斯兰夫人不愿意修熨斗，于是我拿起剪刀和棉花，准备在厨房继续干活。我走近我姐姐和朗斯兰夫人，我姐姐显得非常激动。我问发生了什么。她们没有回答我。于是我抓住朗斯兰夫人的手，要她放开我姐姐，我做到了，但朗斯兰夫人又抓住了她。朗斯兰小姐这时已经来到我们身边，她也抓住了我，同时朗斯兰夫人也抓着我。我姐姐想把我从朗斯兰小姐手里解脱出来，抓住后者的双手，她们一起搏斗，而我则同朗斯兰夫人搏斗。我没有看清

我妹妹和朗斯兰小姐之间发生了什么。至于朗斯兰夫人，一开始她把我推向橱柜，随后我们转向楼梯平台，最后她摔倒了，就是在那时我用手指把她的眼睛挖了出来。朗斯兰夫人发出像临终喘息一样的声音，我拿起我妹妹扔到我身边的水罐，多次击打朗斯兰夫人的头部。

法官随即问道：

问—— 是您击打了朗斯兰夫人吗？

答—— 是我。

问—— 您随后和您姐姐一起下到底层了吗？

答—— 我姐姐比我稍早下去，当时我还在继续击打朗斯兰夫人。我下去是为了到餐厅的抽屉里找一把刀，好也向朗斯兰小姐报复，她曾推搡我和我姐姐。

问—— 推搡并不是很重，因为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受伤。无论如何，您拿上楼的是一把很锋利的餐后小刀，并在朗斯兰小姐的腿上割了许多刀。

答—— 是的，先生，我姐姐把她的衬裙掀起来，把她的内裤拉下来。朗斯兰小姐应该已经死了，因为她什么也不说。我是在朗斯兰夫人摔倒之后把她的眼睛挖出来的，她的头撞到了橱柜，我看见她那双睁大的眼睛看着我。于是我把手指伸进她的眼睛里，把它们挖了出来。我只用手指把它们挖出来，没有用刀，也没有用剪刀。我后悔我所做的事。如果我们事先想一想，就不会那样做。

这些誊录经过了法庭书记员的二次加工。因此，在《萨尔特报》（La Sarthe）刊出的审讯报道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因事实被赋予优先地位而被删去的要素。

在小标题“克里斯蒂娜·帕潘说话”之下，记者写道：

> ……克里斯蒂娜非常平静，与人们可能相信的相反，首先描述了这桩可怕罪行的细节，

> ……莱娅同我的女主人和她女儿对峙着。我不知道我妹妹做了什么，但我同朗斯兰小姐搏斗，她滑倒后，撞到一件家具，摔倒了

> 跪着昏迷不醒，靠近通往二楼的楼梯。我挖出了她的两只眼睛。

> —— 不，不是的，只有一只，进行尸检的尚蒂耶医生评论道。

> —— 我以为我把两只都挖出来了，克里斯蒂娜回答，并继续她那阴森的叙述，我拿起锡水罐……

在叙述了为保护被告免受勒芒群众报复而采取的措施之后，文章以其所描述的一种“奇怪的巧合”作结；两姐妹出狱后便暴露于这些报复之下。

> 有一件奇怪的事实，值得指出，因为它经常重现：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帕潘，

> 她们彼此无法交流，却常常对向她们提出的问题给出相同的回答。

因此，在1933年6月8日这一天，若依照审讯记录，犯罪行动便会如下展开。在所有这些点上，“奇怪地”，克里斯蒂娜和莱娅的陈述是一致的：

1. 在有关熨斗的几句对答之后，朗斯兰夫人据说抓住了克里斯蒂娜的胳膊。

1. 莱娅据说介入进来，以便解脱她的姐姐。

2. 随后朗斯兰小姐据说抓住了克里斯蒂娜，并踢了她一脚。

1. 于是克里斯蒂娜据说同她搏斗起来，莱娅则同朗斯兰夫人搏斗。

1. 挖眼睛的动作据说是同时发生的，在两个受害者被杀死之前。

1. 于是克里斯蒂娜，随后是莱娅，据说下到厨房去取刀和锤子。莱娅据说割了朗斯兰小姐的腿，克里斯蒂娜据说掀起她的衬裙，拉下内裤，随后用锤子和刀像凿子一样击打她裸露的部位，也就是说，击打她自己据说曾被朗斯兰小姐那一脚踢到的地方。

然而，这一版本并未使预审方面完全满意。尤其是，莱娅的叙述同朗斯兰夫人尸体被发现时的位置并不吻合。

随后，在勒芒监狱中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之后，克里斯蒂娜和莱娅作出了一项声明；关于这些事件，我们暂且不作停留，因为它们值得专门研究［参见第188页及以下］。我们将这项声明称为“撤回声明”，因为两姐妹明确修改了她们最初的陈述。

被传唤到监狱处理这一场合的预审法官，在记录克里斯蒂娜声明的同时，按她口述写下：

此刻，我的神经兴奋状态不允许我签署我的声明（事实上，如我们所证实，被告躺在床上，双手被绑，身体穿着拘束衣；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阻止她戳破自己的眼睛，此前她曾有一次非常典型的尝试，其执行先是被同监犯立即介入阻止，随后又被女看守阻止）。

无论她的状态如何，重要的是要注意，与此前的审讯不同，这一次克里斯蒂娜是应自己的请求而说话。

克里斯蒂娜·帕潘声明，日期为 7 月 12 日

帕潘（克里斯蒂娜-热尔曼-克莱芒丝），26岁，勒芒布吕耶尔街6号朗斯兰夫妇家中的女仆；羁押于勒芒监狱。

我请求见您，是为了更正我的解释。我没有把全部真相告诉您。当我攻击朗斯兰夫人时，她并没有挑衅我。我在楼梯平台遇到她时问她，是否愿意修理我的电熨斗。我不知道她回答了我什么；但我陷入了一场神经危机，在她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下扑向了她。我可能拿起了水罐，并把它猛击在站在对面的朗斯兰夫人头上，她跪倒了。那时朗斯兰小姐来了，她站到我面前，我同她搏斗；她扯下了我一绺头发，我也用水罐打了她，这使她倒下；当她倒在地上时，我挖出了她的眼睛。我妹妹是在我同朗斯兰小姐搏斗时到来的，但我不认为她做了什么，除了在朗斯兰小姐腿上割那些刀口，而那时朗斯兰小姐已经不动了。此外，我不太记得一切是怎样发生的。犯罪之后，我不愿确切说出发生了什么，因为

我和我妹妹曾约定平均分担责任。但我刚刚经历了一场危机，同我击打朗斯兰夫人时经历的危机一样，我有了一种回忆，其中细节又回到我这里。我向您陈述，是为了立即告知。

莱娅·帕潘声明，日期为 7 月 12 日

帕潘（莱娅-伊莎贝尔），21 岁，勒芒布吕耶尔街 6 号朗斯兰夫妇家中的女仆，已受过讯问。

上一次您听我陈述时，我没有说出全部真相。当我们的女主人们回来时，我姐姐先下了楼，正如我已经告诉您的那样；而我只是在她之后，听到一声叫喊时，才下楼。朗斯兰夫人已经倒在一楼的楼梯平台上，我姐姐正在同朗斯兰小姐搏斗，就在通往底层的楼梯脚下。我觉得朗斯兰小姐快要倒下了，而我看到朗斯兰夫人正努力站起来，于是我扑向她，把她的头撞向木地板，好把她打昏。她几乎没有抵抗我。随后我姐姐对我喊，要我把朗斯兰夫人的眼睛挖出来，我也看见她自己正在挖朗斯兰小姐的眼睛。我照着我姐姐的样子做，她显得怒不可遏，发出叫喊，呼吸很响；后来我看见她用水罐击打朗斯兰小姐的头，等她让水罐掉下后，我自己拿起它，用它击打朗斯兰夫人，直到她完全不再动弹。我姐姐对我说："我要把她们屠杀了，我去拿一把刀和一把锤子。"我跟在她后面下楼；当她回来时，她对我说她手里的那把刀不锋利。于是我去餐厅抽屉里拿了一把。我姐姐随即开始脱朗斯兰小姐的内裤，并试图用她的刀割她的臀部，而我则用我手里的刀，在更下面割她的腿，模仿她。朗斯兰小姐应该已经死了，因为她已经不动了。我不知道我姐姐可能用锤子做了什么，但我没有用它。对于我的其他解释，我没有什么要修改的。

> 问—— 您的解释同您姐姐给出的解释不一致；她说，当她熨衣服的房间里电停止运转时，您陪她下到底层，到厨房里去找一支蜡烛。

> 答—— 这不准确，她是一个人下去的。

> 问—— 她同样说，是她独自攻击了朗斯兰夫人，并没有受到挑衅；她随后使朗斯兰夫人倒下；也是她挖出了两个受害者的眼睛，甚至也是她一个人用水罐打碎了她们的头；您只是给朗斯兰小姐的腿割了那些刀口，而当时她已经不动了。

> 答—— 我确认，是我用水罐击打了朗斯兰夫人，并且在我姐姐对朗斯兰小姐做同样的事时，我挖出了朗斯兰夫人的眼睛。犯罪之后，当我们上到自己的房间时，我和我姐姐约定，我们要说两个人都做了同样的事，以便承担同样的责任，承受同样的刑罚；还必须说是我们的女主人们攻击了我们，我们只是在自卫，即使那并不是真的。我姐姐因她的熨斗坏了而生气，正是这样她才发起怒来；我从未见过她处于这种状态，起初我以为她遭到了攻击。只是后来她才向我解释，她是因为生气才变得激动失控的。

签名：莱娅·帕潘

克里斯蒂娜没有签名并非偶然，这一点将由其重复得到确认。事实上，她将拒绝签署她的上诉请求，也同样拒绝签署总统赦免请求。这个拒绝重复三次，因而具有一种肯定性价值，是她立场中一个执拗的特征；因此，不应把它同她1933年7月12日那天的神经状态联系起来。

撤回主要指向挑衅这一点；克里斯蒂娜现在说，朗斯兰夫人并未挑衅她。她同样声明，她据说先是独自同朗斯兰夫人搏斗，并把她击倒，随后又同朗斯兰小姐搏斗，并也把她击倒（至少，如果考虑到她的那项断言，即莱娅的角色据说仅限于在朗斯兰小姐腿上割刀口这一动作）。

同一天莱娅的声明否认了对事实的这一描述。至少从她自己登场开始是如此。她据说是在克里斯蒂娜同朗斯兰小姐搏斗时，攻击她看见正在站起来的朗斯兰夫人，从而介入。但她的声明的新意在于这一断言：她据说是在她姐姐明确命令之下挖出了朗斯兰夫人的眼睛，而当时她

看见姐姐正在挖朗斯兰小姐的眼睛。还有克里斯蒂娜的另一句话也很重要，由莱娅引用：“我要把她们屠杀了，我去拿一把刀和一把锤子。”

两人都承认，她们曾达成一致，以便平均分担责任，并声明自己遭到了攻击。

这一协议在那一天已不再成立，停止在两姐妹之间具有法律般的力量。发生了什么，导致她们契约的破裂？是什么促使克里斯蒂娜把两桩罪行的全部责任承担到自己身上？她所称的那种“相同”的危机，也就是她击打朗斯兰夫人时经历的危机，究竟是什么？在研究监狱中发生的事情时，我们将回到这些问题［参见第六章］。

预审将根据7月12日的撤回声明而改变，仿佛确定女主人们一方不存在挑衅，本质上才是关键。在接下来的审讯中（克里斯蒂娜为7月26日，莱娅为27日），现在是法官开口，说出所发生的事；他期待被告们给出的，不过是对其陈述一种预先认定的认可。他不再向她们发言，而是向检察官发言，并通过检察官向陪审团发言。给检察官的命令，“因由其请求，按其将办理之程序……”，日期为同月28日。

1933年7月25日对克里斯蒂娜的审讯

> 问—— 您28岁，原籍马里涅，属勒芒区。就您被指控的1933年2月2日事实发生之时而言，您是否已经在勒芒布吕耶尔街6号朗斯兰夫妇家中约7年?

> 答—— 是的，先生，我想我是1926年进去的。

> 问—— 您的妹妹莱娅同样在您之后不久来到朗斯兰夫妇家。她当时只有14岁。她受雇为房间女仆，而您本人在那里做厨娘。您是否曾经，而且现在仍然，对您的妹妹怀有一种排除任何其他人的亲情?

> 答—— 我非常爱我的妹妹。

> 问—— 她似乎同样对您怀有很大的亲情，但似乎有点处在对您的依赖之下。你们的雇主对你们的服务非常

> 满意于您的服务。就您而言，您没有什么可抱怨他们的；从1926年至1933年这段很长的时期里，您一直留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一点证明了它，而且您也毫无保留地承认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朗斯兰先生并不隐瞒您的服务在他家中多么受到赞赏。只有一片阴影自1929年起出现：那一年，您出于一个界定不清的原因同您的母亲闹翻了，朗斯兰先生注意到，自这场争执以来，您的性格变得阴郁，您变得神经质而不稳定，不再像从前那样利用空闲时间在星期日同妹妹外出；而您偶尔见到的朗斯兰先生的小舅子勒纳尔先生甚至说，自某一段时间以来，您的性格变得不太和善。

答—— 我承认，也许是因为我疲倦了。

问—— 您从7岁到15岁在勒芒的善牧院长大，您的母亲把您托付到那里，而您在那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随后您进入家政服务行业，在进入朗斯兰夫妇家之前，您做过几份工作，或是独自一人，或是同您的妹妹一起。总体而言，您所有的雇主都对您满意；然而，在其中一些人提供的信息中，关于性格方面出现了某种保留。比如勒芒的一位梅纳热夫人，她曾在1925年3月7日至随后的4月21日雇用您和您妹妹，并且此外对你们的服务非常满意；当她就某个星期五您在市场逗留太久一事向您提出意见时，她听见您生硬地回答她；在女主人走开时，您在一种勉强压抑的愤怒影响下，开始在厨房里大声说话，并把炉灶的火眼弄得哐当作响；几天后，您母亲接到通知，来把您接走。

答—— 我记得在梅纳热夫人家里的那件事。

问—— 同样也是那一年，另一次，当您同妹妹莱娅在一位迪厄勒弗夫人家做女仆时，由于您女主人提出的一项意见，您说出了一句被评为不愉快的话，并导致您被辞退。

答—— 这是事实。

问—— 当您母亲来接您时，迪厄勒弗夫人建议她不要把您同您的妹妹安置在一起，您的妹妹给她留下了好印象。早在1924年，一位通泰夫人，您在她家只待了15天，她就注意到您性格难处，并且显得傲慢

而且抗拒。但是这种困难的性格，在您到朗斯兰先生家里之前很久、以及在1929年与您母亲发生争执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它不能解释您被控告的那起双重犯罪，那是在难以想象的恐怖情境中犯下的，我稍后还会回顾。因此问题就涉及您的刑事责任；在这些事实发生之时，您难道不是处在一种精神有缺陷、多少有些疯狂的状态中吗?

答——我只是激动失控了。

问——无论如何，从精神角度对您进行检查，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必要的。受委任的三位专家，在对您作了检查，并了解了案卷、事实以及您的解释之后，在我已经告知您的报告中，提出意见认为，您同您的妹妹一样，对自己的行为负有完全责任；一言以蔽之，从刑事角度看，您的责任是完全的。

答——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问——我向您回顾您被控告的同一些事实。1933年2月2日，傍晚7点左右，警方接到您的雇主朗斯兰先生通知：他想进入自己家中去接他的妻子和女儿，她们本应同他一道去 Rinjard 先生家吃晚饭；但他无法打开从里面锁上的门，而您和您的妹妹，您们的房间亮着灯，却都没有回应他的呼唤。警员翻过花园围墙后，从室内打开入口大门，并在第1层的楼梯平台上发现了夫人和热纳维耶芙·朗斯兰小姐的尸体，两具尸体并排躺着——朗斯兰夫人的头被砸碎，眼睛被挖出——朗斯兰小姐的头同样被毁坏，一只眼睛被挖出，双腿被深深割伤。两人都穿着外出服，似乎是在已经回家、来到楼梯平台时被出其不意地击倒的。人们发现您同您的妹妹一起锁在您们的房间里，躺在同一张床上，两人都穿着晨衣。您立即承认，是您同您的妹妹一道把受害者弄成了人们所看到的那种状态；而您声称，是她们攻击了您，您不过是在自卫。在您的女雇主们回来前不久，您正在使用的电熨斗突然停止工作，您所在房间的照明也同时熄灭了

> 。因此，朗斯兰夫人一到楼梯平台，您就把这个让您觉得完全不愉快的事故告诉了她。您解释说，朗斯兰夫人做出仿佛要向您扑过来的样子，于是您便双手在前扑向她的脸，并挖出了她的眼睛。随后，您立刻更正说，您扑向的是朗斯兰小姐，并挖出了她的眼睛，而您的妹妹莱娅则对朗斯兰夫人做了同样的事。只是在挖出受害者的眼睛之后，您和您的妹妹才用锤子和锡壶砸碎了她们的头，并用刀切割她们。

> 答——确实如此，那就是我说过的话。

> 问——第二天，2月3日，在预审中听取您的陈述时，您说明了关于您作案方式的细节，以及您们二人分别扮演的角色——是您击倒了朗斯兰夫人，并在抵抗她的攻击时挖出了她的眼睛；与此同时，您的妹妹莱娅则对介入进来的朗斯兰小姐做了同样的事。同一天，2月3日，您的妹妹确认了您的解释；而当您入狱时，由于人们想把您同您的妹妹分开，您试图抓伤女看守的脸。

> 答——这是真的。

> 问——2月7日，再次接受讯问时，您说，您并不确切知道自己挖出眼睛的是朗斯兰夫人还是朗斯兰小姐，并且您更倾向于认为是朗斯兰小姐。但无论您的解释如何，它们都显得不可信；事实上，您声称您的女雇主们发动了攻击，随后发生了一场搏斗，在搏斗中您和您的妹妹占了上风。然而，并没有搏斗，两名受害者是被出其不意袭击并很快被击倒的，她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自卫。这一点不仅可以从您和您的妹妹身上都没有搏斗痕迹或任何暴力痕迹这一事实看出，也可以从对受害者尸体进行尸检的法医的查验中看出。我向您宣读他的报告：

> “最初用锡壶打出的几下非常猛烈，使朗斯兰夫人和小姐不可能适当地自卫。存在突袭和对打击力度的控制。也可能两名受害者是由两姐妹一个接一个地殴打的。”而这位

专家总结说：“朗斯兰夫人和小姐几乎是在没有搏斗的情况下被杀害的，其残忍的执拗和精心的酷虐，在法医学文献中少有先例。犯罪工具有多种：锡壶、锤子、刀；而这起犯罪最特别的事实，是用手指挖出了仍然活着的受害者的眼睛，尽管她们由于已经身受重伤而衰弱，无法自卫。”受害者那几乎只是刚刚显露的防御，难道不似乎尤其在于用手保护脸和眼睛吗？这些手带有殴打和切割的痕迹，甚至在两名受害者身上，都有一根手指骨折。

答——我不记得了。

问——6月8日，您和您的妹妹被带到事发地点，您维持了您最初的说法，并作出了一些解释，这些解释被记入您们各自讯问的笔录中。但是7月12日，您主动给出了许多解释。是您，在一次神经危机中，扑向了——这是您说的——朗斯兰夫人，当时您和她都来到一楼的楼梯平台。可能——这是您说的——起初您趁她没有料到，用锡壶击打她头部，将她打倒。当朗斯兰小姐到那里时，您同样用锡壶打了她。朗斯兰小姐出于防御的动作抓住您的头发，并扯下了一绺，于是您亲自将她打倒，并挖出了她的一只眼睛。据您说，您的妹妹莱娅在那时到来，只是在朗斯兰小姐已经不动的时候割了她的双腿。您说，您认为您的妹妹没有做别的事。同一天，您的妹妹更正了她的解释：她也说，她来到楼梯平台时，朗斯兰夫人已经被打倒。她看到您正同朗斯兰小姐对峙，后者正要倒下。这是否属实？

答——是的，先生。

问——您的妹妹当时没有帮助您制服朗斯兰小姐吗?

答——没有，先生，是我一个人做的。

问——您的妹妹说，她看到朗斯兰夫人正要站起来，便冲向她，抓住她的头，把她往地板上撞。

答——这是我对她说的。

问——她声明说，您还对她说要挖出朗斯兰夫人的眼睛，她立刻就这样做了。然后她用锡壶击打朗斯兰夫人的头；在挖出朗斯兰夫人的一只眼睛之后，您曾用这个锡壶砸碎朗斯兰夫人的头。

答——是我在自己用过之后，把锡壶递给我妹妹的。

问——接着，从您们使用锡壶的情形来看，本可以以为您们的狂怒已经平息了，但完全不是这样。按照您妹妹的说法，您在一种极端过度兴奋的状态中，这时对她说："我要把她们杀个粉碎。"

答——我不记得了。

问——您说："我要去拿一把刀和一把锤子"；于是您下到底层去那里取这两件武器。当您回来时，您对您的妹妹说——她是在您之后下楼的——您手里的那把刀不锋利，于是您的妹妹去找了另一把更锋利的刀，这把刀本应用来切割朗斯兰小姐的双腿。法医说，腿部的伤口是在朗斯兰小姐已经死亡之后造成的。

答——她已经不动了。那时我自己用锤子打了她的臀部。

问——这场无法解释的戏剧性场景，其情境仿佛一场可怕噩梦，发生得非常迅速：您先是怀着把过错显示在受害者身上的用心叙述并解释它，随后，最后一次，又带着十分明显的意愿，要使您的妹妹免除一切责任。您对此给出的细节或多或少是准确的。可以认为，它们被您有意或无意地扭曲了，随着您当时的关切而变化。将尸检发现同您的陈述或您妹妹的陈述相比较，可以得出：您被控于1933年2月2日：

1. 同您的妹妹莱娅共同合意，故意致朗斯兰夫人死亡。

1. 故意致朗斯兰小姐死亡。

答——我很想见到我的妹妹，并在羁押期间同她安置在一起。

问——7月12日，也就是您修改自己解释的同一天，您在监狱中发生了一次类似的神经危机——这是您向我声明的——类似于2月2日那次。鉴于某些表现，您的同监人对此作了陈述，首席看守也向共和国检察官先生作了报告；这些表现在行为和言语方面，都可能令人想到一次疯狂发作。由我们委任的精神科医生 Schutzemberger 医生，再次对您进行了检查。我向您告知他日期为本月20日的报告。以下是他的结论：

1. 促成勒芒拘留所首席监视员那份报告的事实，并非出自精神病理。

1. 克里斯蒂娜·帕潘为了不再同她的妹妹分离，任由自己陷入过度愤怒，并作出伪装行为。

答——我当时确实激动而神经过度兴奋。我因为不能同妹妹在一起而痛苦，也因为我刚刚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做错了——我深深后悔自己所做的事。我也无法解释自己怎么会走到那一步。最后，我仍然提出我的愿望：再次见到我的妹妹，并同她团聚。

1933年7月26日对莱娅·帕潘的讯问

问——您21岁。1911年9月15日出生于勒芒。您在勒芒 Léon Bollée 大街的 Saint-Charles 学院受教育直到13岁；您母亲在1912年离婚并去做女仆时，把您托付在那里。1929年，您是否由于某个界定不明的原因同您母亲关系不好?

答——我母亲对我说的那些意见让我反感。

问——13岁时，您母亲把您从 Saint-Charles 学院接出，并带您同她一起去 Tuffé，到 Parteau 先生家，她在那里做女仆。随后，她把您安排到两个地方，和您的姐姐克里斯蒂娜一起；之后又让您独自到药剂师 Neault 先生家，在 Prémartine 街。您在那个地方待的时间很短，不久就去布吕耶尔街6号朗斯兰夫妇家同您的姐姐克里斯蒂娜会合。克里斯蒂娜是厨娘，而您被雇为房间女仆，是吗?

答——是的，先生，在1926年。

问——1933年2月2日，在您们被控告的事实发生时，您们二人已经在那里——7年了——并且两人都参与其中：即您们的女雇主朗斯兰夫人和她的女儿热纳维耶芙·朗斯兰小姐的双重谋杀。当天傍晚7点左右，警方在您们住所一楼的楼梯平台上发现了她们的尸体；警方是由朗斯兰先生报警的，因为他无法进入自己的房子，入口大门是从里面上闩锁住的吗?

答——是我的姐姐克里斯蒂娜在犯罪之后上了门闩。

问——两名受害者的头部因反复击打而可怕地破裂，这些击打以极大的暴力实施；她们已经无法辨认；仰面躺着的朗斯兰夫人，两只眼睛都被挖出；朗斯兰小姐则只有一只眼睛被挖出，被扔到楼梯的第一级台阶上。朗斯兰小姐脸朝前躺着：裙子被掀起，内裤被褪下，露出大腿和臀部，其上有深而横向的切口，以及各种伤口。四处抛掷的碎片、血迹和脑质飞溅，见证着击打的暴力、执拗，以及这起双重犯罪被实施时那可怕的野蛮。发现尸体时，您被锁在自己的房间里，并同您的姐姐躺在一起；您们二人为了换上一件干净晨衣而脱下的带血衣物，是否被放在床边?

答——我们在厨房洗过身并上到我们的房间之后，把它们脱下了。

问——您同您的姐姐一样，毫不困难地以某种傲慢承认，这起双重犯罪是您们共同的作品。您的姐姐给出了解释和细节，而您只是满足于确认它们；您自己还说：“至于我，我又聋又哑。”

答——我记得。

问——完全违背一切可信性的是，克里斯蒂娜声称受害者攻击了她，而她不过是在自卫；您去帮助了她；您们同受害者搏斗；您莱娅，主要是同朗斯兰夫人搏斗，因为您的姐姐说，当她得知电熨斗那天下午又像前一天一样坏了的时候，曾想向她扑过去。

答——我姐姐已经给出了那些解释，而我确认了它们。

问——然而，在那以前，关于您和您的姐姐，只有良好的报告；就您而言，人们对您的评价很好：工作勤勉，干净，服从而顺从，品行无可指摘；当有人对您提出意见时，您不像您的姐姐那样反应，后者常常紧张而易怒。

答——我尽我所能做到最好。

问——另一方面，您没有任何可以抱怨朗斯兰一家的事；您没有，您的姐姐也没有。如果您有什么怨言，无可争辩的是，您不会在那里待上七年——。此外，您们二人的积蓄达到近2400法郎，给了您们某种独立性；如果这个地方不好，您们本可以利用这笔钱去别处。因此，乍看之下，在这起凶残程度前所未闻的双重犯罪中，看不到任何合理动机。关于您精神状态是否完整的问题，从一开始就被提了出来：在经过检查并掌握全部信息之后，我们委任的三位专家，Schutzenberger、Baruk 和 Truelle 医生，于6月1日提交了他们的报告，结论认为，照他们的意见，您的精神状态正常，您的姐姐也是如此，并且，从刑事角度看，您们二人的责任是完全的。以下是他们的结论，我现在宣读（……）。

答——我没有任何意见要提出。

问——所有认识您们的人都能够确认，您们彼此之间——您的姐姐克里斯蒂娜和您——有一种深厚的感情，而且似乎排除了其他情感。此外，就您而言，已经确认您处在您姐姐的影响和道德依赖之下，尤其是在您同母亲争吵之后。

答——我像听从一位姐姐那样听从克里斯蒂娜。

问——关于事实本身及其解释，您长时间以来一直坚持——同您的姐姐一样——一种违背一切可信性的说法，即受害者攻击了您们，直到您在7月[12]日的讯问中，您提出了新的解释，这些解释一方面同可信性更为一致，另一方面也同发现的事实更为一致。同您的姐姐一样，在那天作陈述时，您修改了最初的说法：当

受害者在2月2日下午回来时，您姐姐熨衣服所在房间的电刚刚停止工作——而您的姐姐听到她们进门后，首先下楼去迎她们；与此同时，您正在二楼您所在的房间里，把白色衣物放到暖气设备上晾干。您听到一声喊叫时，正忙着做这件事吗?

答——我听到一声喊叫，不太响，还有一声跌倒的声音。

问——于是您也下楼，当您来到一楼楼梯平台时，您看见朗斯兰夫人躺着、倒在那里，正努力站起来；而热纳维耶芙小姐正在同您的姐姐搏斗，眼看就要倒下。您以为您的姐姐遭到攻击，于是冲向朗斯兰夫人，阻止她站起来。您抓住她的头，把她往镶木地板上撞，使她昏迷。

答——当我来到楼梯平台时，我姐姐克里斯蒂娜对我说："朗斯兰夫人要站起来了，去挖出她的眼睛"，与此同时，我看见她正在挖朗斯兰小姐的眼睛。我服从了她。我姐姐似乎怒不可遏，她喊叫着，呼吸时响亮地喘着粗气。

问——您的姐姐是否用锡壶打了热纳维耶芙·朗斯兰小姐？

答——是的，先生。并且我打朗斯兰夫人的头，直到她不再动弹。我做了同我姐姐对朗斯兰小姐所做的同样的事。但她没有把锡壶递给我；那是她用过之后，我在自己够得到的地方找到的。据我所记得，她没有叫我去打朗斯兰夫人。

问：您声明说，您的姐姐仍然怒不可遏；她站起来对您说："我要把她们砍杀掉，我要下楼去拿锤子和一把刀。"您跟着她，并且在经过时注意到您姐姐的刀不锋利，于是就拿了另一把十分锋利的刀！

答：正是这样。

问：使用你们去取来的武器，您和您的姐姐一定击打了你们的两个受害者；毫无疑问，她们那时已经死了。特别是，您是否割划了 Geneviève Lancelin 小姐的双腿？您的姐姐曾把她的短裤脱下，并使其身体裸露。

答：Lancelin 小姐已经不动了。

问：医生说，根据他的检验结果，朗斯兰小姐在那一刻肯定已经死了。我宣读法医报告及其结论。您可以看到，专家的检验结果可以同您解释的总体内容相一致，而您的解释在某些方面可能是不完整或不准确的，尤其是由于记忆缺失所造成。

答：我已经说了我所记得的一切。

问：您的姐姐 Christine，在她新的解释中，显然出于替您减轻罪责的顾虑，说您的作用仅限于在 Lancelin 小姐已经不动时割划她的双腿。

答：我确实说的是事实。我后悔参与了那桩罪行，并且意识到我表现得多么恶劣。我之所以介入，是因为我看见姐姐正同 Lancelin 小姐搏斗，因为我以为她遭到了攻击。

问：从您的解释以及案卷材料来看，涉及您的起诉事实可如此明确：您被控于 1933 年 7 月 2 日在 Le Mans，与您的姐姐一起并合谋，故意杀害了 Lancelin 夫人。

答：我承认。

预审至此结束，对 Christine 和 Léa 作出不同的起诉。前者被控双重谋杀；后者被控与其姐姐合谋杀害 Lancelin 夫人。

然而，就在一个结论终于开始勾勒出来的同一时刻，事情又将重新出现，但被移置到另一个场域中；在那里，即将进行的审判并非刑事的，而是精神病学的。

精神科专家报告日期为 1933 年 6 月 1 日（因此早于撤回供述的声明），它给出的犯罪行为版本同预审版本相符。然而，其中提到另一个在任何别处都找不到的因素，而且这个因素值得注意，因为 Christine 把它呈现为引发她所表现出的极端暴力的东西。以下就是专家们关于犯罪进程所记录的内容：

> 关于所犯下的罪行，Christine 给我们的解释在各点上都类似于她向预审法官先生所作的解释，并载于讯问笔录之中：她列举了犯罪的不同阶段，告诉我们她和她妹妹各自承担的部分；在这段叙述期间，她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性（脉搏每分钟 [76] 次）。也就是说，她坚持自己的解释：她是 Lancelin 夫人“攻击”的受害者。

> 当我们问她犯罪的理由时，她向我们重复说她是“被攻击的”，这是“一阵愤怒”“一阵复仇”“一阵狂怒”；并且责备朗斯兰小姐插了进来，因为她的凶狠，按她所说，正来自朗斯兰小姐的这一介入，后者“本该制止这场争论，而不是让它变得更激烈”。她自发承认自己走得有点太远：“我本不该像我所做的那样把她毁伤。”

> 既然 Christine 说出了“复仇”这个词，我们便追问这一点，但她又收回了；她对 Lancelin 夫人并无恶感，也不抱怨她。毫无疑问，她的雇主 Lancelin 夫妇在“餐桌服务方面”显得“要求严格”，但她自己说：“既然我留下来了，那就是因为我在那里过得不错。”她的雇主很少对她提出意见：“Lancelin 夫人喜欢工作做得严格，我觉得这很好。”

> 从来没有人在饮食方面责备过她；对于她所拥有的住处，她没有什么可抱怨的。Lancelin 小姐很少说话。至于 Lancelin 先生，他不对她们说话，或者很少说，从不管她，从不对她们提出意见，并且无论在言语上还是态度上，对她始终表现得完全得体；总之，按她自己的声明，她“没有什么可抱怨她的雇主们”。

> 她的女仆身份并未在她那里激起任何贬低感，也没有在她那里产生社会仇恨的感情；她很审慎地告诉我们，她从未“觉得自己的女仆处境是羞辱性的”，并补充说：“如果我这样觉得，我就会换掉它。”“有些行当更羞辱人，比如去鬼混。”

> 我们问她为什么挖掉受害者的眼睛，她毫无情绪地告诉我们，她至今还不知道；她平静地向我们讲述她是怎样着手做的，并说：“在挖出第一只眼睛时，我把它扔到了楼梯上。”我们也问她受害者当时是否已经死了，她向我们承认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不认为是这样。

> Christine 完全记得她实施罪行的细节，记得她妹妹给她的帮助，并否认同她有任何约定：“我们两人谁也没有试图阻止另一个。”她对共同实施行为的解释是：“我们受到了攻击，我们不想让步，我们进行了自卫。”

> 当我们让她注意到，还必须下到厨房去拿一把锤子和一把刀（如果相信

> 预审的声明的话），她向我们解释说，她当时“气得眼盲”，并且想要“敲打受害者的骨头”；她解释这个表达说，就是“把她们的骨头打碎”。

> Christine 同在预审中一样，否认任何预谋，并向我们声明：“如果我不是毫无防备，事情就不会发展到那么远。”对于她和她妹妹用刀割划受害者时所投入的凶狠，她始终给出同一个解释：“我气得眼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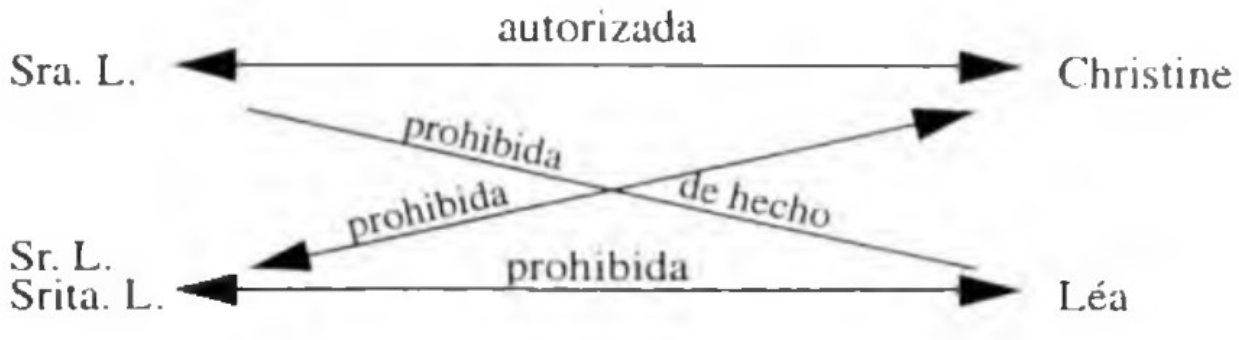
> 关于犯罪之后的事实和举动，克里斯蒂娜向我们确认了她在预审中所说的话，并向我们声明：“我妹妹和我后来彼此说：‘我们这下干得可好了。’我们关上门，因为我们知道朗斯兰先生要回来，而我不想同他争论。我们彼此说警察会来，于是我们等着。”

因此，克里斯蒂娜的凶狠似乎同 L 小姐介入她当时同 L 夫人的争论有关。这一点不应被忽视，而且，如果在这里回想起女仆们与其雇主之间曾有过一项约定，它甚至还得到有力的确认：按照这项约定，她们只同 L 夫人发生关系（克里斯蒂娜从第二次讯问起就指出了这一点［参见第 40 页和第 49 页］）。这项约定、这项从契约开始就被提出的惯例，只承认 L 夫人有权向她们下达命令，并就工作向她们提出意见。我们在此补充，根据 L 先生在预审中所说，这对姐妹之间有这样一种关系：克里斯蒂娜是 L 夫人的特权对话者，甚至呈现出像对待女仆那样对待自己妹妹的外观。于是，我们得到家中居民之间话语流通的一个图式：



L.先生；L.小姐；L.夫人；克里斯蒂娜；莱娅。

可以看到，两个群体之间的一切交换都必须——这就是她们纽带的开端性惯例——必然经过 L 夫人与 Christine 这一沟通渠道；Christine 处于雇主群体与其妹妹 Léa 之间的介入位置。为了更好地突出这项惯例所包含的禁令，可以把这一图式改写为如下形式：



L.夫人；克里斯蒂娜；L.先生；L.小姐；莱娅。

“获准的”；“被禁止的”（三处）；“事实上”。

因此，可以把 L 夫人与 Léa 之间的事件（前者强迫后者捡起扔在地上的纸，而她在清扫时忽略了它）定位为一个并不被交换规则排除、然而仍然被这条规则所禁止的事件；即便不是 de jure，至少也是 de facto。这个事件位于图式中最成问题的那条线上。

尽管如此，以另一种方式发生的 L 小姐介入 Christine 与 L 夫人之间，本来会更为严重，因为这种介入被开端的惯例所排除。因此，可以设想，正是这种介入确实推动 Christine 显示出一种特别的狂怒。

此外，Christine 的这一说法还赋予她第一个版本，即挑衅的版本，很大的分量。也许我们必须把这种挑衅定位在这种介入本身，而不是像她一开始所声明的那样定位在某个交换之中，或 L 夫人的某个姿态之中；因为这种介入违背了从一开始就作出的形式性惯例。

关于越入行动，只要它是由一套能指游戏所决定的，就不能允许自己在两姐妹所呈现的各种犯罪版本之间作出选择；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拒绝选择，正是这种一开始的“一切都可用”，才可能允许定位那些能指。我们在此也照原样重新取用讯问记录。不过，不可能不尝试重构行动本身，因为 Christine 与 Léa 的说，正是在行动中，并作为行动，显现出来。此外，行动的进程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是否确实如乍看那样，那里只有一个说；或者相反，两人各自承担的部分是否在某一点上如此不同，以至于迫使我们放弃把她们合并起来、把她们的团结做成一个统一体。

重构并不容易，因为两姐妹各自给出的描述具有格外混乱的性质，她们

关切于肯定挑衅、承担同等责任，随后 Christine 又关切于为 Léa 开脱。因此，我们首先也将以表格形式重取她们的声明，从左至右分三栏加以区分：1° 据称曾被交换的话语；2° 据她们所说发生的事实；以及 3° 她们给出的评论。

话语	**事实**	**评论**
	I. 犯罪当晚给出的版本	
	1）Christine（对警长） （四个主角都在楼梯平台上）	
“熨斗又坏了，我没能熨衣服”	L 夫人扑向 Christine。 Christine 扑向 L 小姐并挖出她的眼睛，而 Léa 对 L 夫人也做同样的事。 Christine 下到厨房去找刀和锤子。 两姐妹不加区别地击打两个受害者。 她们关上门，洗净自己，然后上床睡觉。	“我并不后悔，换句话说，我不能告诉您我后不后悔” “我宁愿剥掉我的女雇主们的皮，也不愿她们剥掉我或我妹妹的皮。”
	2）Léa（对警长） （有人向她宣读了 Christine 的声明）	
Léa 只是赞同 Christine 的声明，并把她的评论据为己有		“同我的姐姐一样，我不后悔我们所犯下的犯罪行为。像我的姐姐一样，我宁愿剥掉我的女雇主们的皮，也不愿她们剥掉我的皮。”
	3）Christine（向预审法官） （四位当事人都不在楼梯平台上）	
“夫人回来了？” “保险丝又熔断了。”		

话语	事实	评论
——“又来了！”	L 夫人抓住克里斯蒂娜的胳膊。 她们搏斗。 莱娅介入。 L 小姐扑向克里斯蒂娜，抓住她的胳膊。 莱娅帮助克里斯蒂娜挣脱。 克里斯蒂娜挖出 L 小姐的眼睛，此前她曾用锡壶打她。 莱娅下到厨房，随后又上来。 她割 L 小姐的双腿。 克里斯蒂娜参与其中。	“她们被狠狠收拾了；她们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因为她倒下时踢了我一脚，我就切割她，以报复她给我的那一击。” “更强者胜过她。”
	4）莱娅（预审法官） （四个主角不在楼梯平台上）	
莱娅对 L 夫人说：“您今天怎么了，要这样对待我们？”	克里斯蒂娜同 L 夫人搏斗。 莱娅介入，以解救她的姐姐。 L 夫人抓住莱娅的胳膊。 莱娅挖出 L 夫人的眼睛。	“像她一样，我参与了我们被指控的两桩罪行。”

话语	事实	评论
	II. 2 月 3 日星期五的各种版本 两姐妹用语无伦次的句子回避那些明确的问题，谈到“原子”或“被灵魂造访的女人”［参见《萨尔特报》］。 5）克里斯蒂娜	

话语	事实	评论
“夫人，像昨天一样，保险丝在熨烫时又烧断了。 ——‘又坏了？’”	L 夫人来到楼梯平台。	“正是这使我向她‘扑过去’。”
“您怎么了？”	L 夫人把双臂朝克里斯蒂娜方向挥去，击打她的胸部和左臂，并抓住她的胳膊。 克里斯蒂娜同 L 夫人拳斗。 L 小姐来帮助她母亲。 莱娅扑向 L 小姐，并同她互相挥拳。	
	克里斯蒂娜用指甲挖出 L 夫人的眼睛。 莱娅对 L 小姐也做同样的事。两姐妹下到厨房。	“看到我斗不过 L 夫人，我变得怒不可遏。” “为了像您所能看到的那样虐待她们。”
	她们“虐待”夫人和 L 小姐。随后关上房子，去睡觉。	“如果我知道事情会这样结束，我就不会对 L 夫人说出那句引发一切的话。”
	6）克里斯蒂娜（在同一次审讯中修改她的叙述） 克里斯蒂娜挖出 L 小姐的眼睛。 莱娅挖出 L 夫人的眼睛。	“我的妹妹一定是看见我所做的事而模仿了我。”

话语	事实	评论
		“那是一声非常强烈的痛苦叫喊，但没有求救。” “直到看见她的状态和所有流出的血，我才平静下来。”
	7）Léa L 夫人扑向 Christine。 L 小姐扑向 Léa。 Léa 挖出 L 小姐的眼睛。 Christine 和 Léa 下到厨房。	“为了结果她。” “因为女士们还在动，我们就打了她们。”

话语	事实	评论
没有2月4日星期六审讯的痕迹，只是Christine“负责替她妹妹回答”。前一天，她们被关进分开的牢房（这一决定使 Léa 悲伤，使 Christine 恼怒）。她们拒绝进食和上床睡觉。		
	III. 罪行发生后第一周的各种版本 8）Léa（2月7日）	
没有任何新的要素，也没有任何不同于她2月3日审讯内容的要素，只有这一点：	Léa 割 L 小姐的双腿。 Christine 帮助她割她的臀部。	（记者关于另一把刀的注：第一把“连一块面包都切不了”。）
	9）Christine（2月7日——来源：《La Sarthe》）	“不，我不恨她，这是假的！”（关于 L 夫人）
	L 夫人攻击 Christine。 Christine 挖出她的眼睛 （她否认对 L 小姐做过这事。）	

话语	事实	评论
	IV. 事实重构的各种版本（1933年6月8日） 10）Christine	
L 夫人的脚步声。“是夫人回来了吗？”（对 Léa：“如果夫人愿意，我要请夫人修理熨斗，这对我合适，因为我们熨烫已经落后了。”）	Christine 俯身朝楼梯平台看。	
	Christine 走到楼梯平台，在那里遇见 L 夫人。	
“我的熨斗坏了。” “又坏了！”	L 夫人抓住 Christine 的右臂和胸部； Christine 没有反抗。	
L 夫人说了些什么，Christine 不记得。 “您怎么了？让我安静些。”	Léa 要 Christine 挣脱。 L 小姐抓住 Christine 的手腕。她们两人搏斗。	

话语	事实	评论
Christine 对 L 小姐说：“您对我有什么不满？”	Christine 使 L 小姐倒下，抽出自己的一只手，骑到她背上。L 小姐给了她一脚——向后踢；Christine 挖出她的眼睛，然后用壶击打她的头部。	“我发了狂，挖出了她的眼睛。” “我仍然怒不可遏，还想着我从 L 小姐那里挨的那一脚。”
	Christine 到厨房去找一把锤子。	

话语	事实	评论
	Christine 回到楼梯平台，脱下 L 小姐的内裤，对她割了几下。 两姐妹下到厨房去清洗自己；Christine 去关上门闩。	“为了打她（L 小姐），打在我自己曾被打到的地方。”
	11）Léa	
女士们的脚步声， “我要下去请 L 夫人试着修理熨斗，好趁她不在时把熨烫推进。”	Christine 朝楼梯平台俯身，看是谁来了。她下去了。 Léa 听见她们说话，不久在 Christine 之后下去。 她看见 L 夫人正抓着 Christine 的胳膊。 Léa 抓住 L 夫人的手，好让她姐姐脱身。 L 夫人又抓住 Christine。 L 小姐抓住 Léa。Christine 抓住 L 小姐，好让 Léa 脱身。L 夫人把 Léa 推向衣柜；搏斗中，L 夫人倒下。 Léa 挖出她的眼睛，然后用 Christine 扔在 Léa 旁边的那只壶击打她。 Christine 下到厨房。Léa 跟着她。 Léa 在 L 小姐的双腿上割出伤口。 Christine 曾掀起她的裙子，并脱下她的内裤。	“我姐姐显得非常激动。” “我看见她睁大的眼睛看着我。” “为了去找一把刀，也向 L 小姐复仇，因为她曾推了我们，我姐姐和我。”

话语	事实	评论
	V. 翻供的各种版本（1933年7月12日）	
	12）克里斯蒂娜	
克里斯蒂娜问 L. 夫人是否愿意替她修理电熨斗。克里斯蒂娜不知道 L. 夫人回答了她什么。不过，她否认曾有挑衅。	克里斯蒂娜扑向 L. 夫人。 她（也许）用水罐击打她。 L. 小姐介入，同克里斯蒂娜搏斗。 L. 小姐从克里斯蒂娜身上扯下一绺头发；后者用水罐击打她；L. 小姐倒在地上。克里斯蒂娜挖出她的眼睛。 莱娅只是介入，在 L. 小姐的双腿上割出伤口。	“我刚刚经历了一次危机，和我击打 L. 夫人时经历的那次一样。我有一种回忆，细节在其中又回到了我这里。”
	13）莱娅	
克里斯蒂娜对莱娅说：“挖出她的眼睛。” 克里斯蒂娜发出叫喊。	克里斯蒂娜先下到楼梯平台；莱娅听见一声叫喊后同她会合。L. 夫人在地上， 克里斯蒂娜同 L. 小姐搏斗。看到 L. 夫人站起来，莱娅扑向她，把她的头撞向镶木地板。 莱娅看见克里斯蒂娜挖出 L. 小姐的眼睛。 她效仿她姐姐的样子。 克里斯蒂娜用水罐击打 L. 小姐；莱娅捡起它并击打 L. 夫人。	

话语	事实	评论
克里斯蒂娜对莱娅说：“我要把她们砍杀掉。我要去拿一把刀和一把锤子。” 克里斯蒂娜对莱娅说：“我手里的刀不锋利。” 回到她们的房间后，她们约定说她们曾遭到攻击。她们也约定说“彼此都做了同样的事”。	直到她不再动弹。 克里斯蒂娜下到厨房， 莱娅跟着她。 莱娅从餐厅抽屉里拿了另一把刀。克里斯蒂娜褪下 L. 小姐的短裤，割她的臀部。 莱娅割腿。	“为了模仿她。” “我从未见她处于那种状态，起初我以为她遭到了袭击。”

VI. 司法当局采纳的各种版本

14) 克里斯蒂娜（1933/7/25）

讯问重新拾起7月12日那次讯问的要素。克里斯蒂娜表现出要为莱娅开脱的关切，先是重申后者什么也没有做，随后又说，莱娅可能做过的一切，都只是奉她的命令而做的。

“我很想见我的姐姐，并在拘押期间同她关在一起。”

15) 莱娅（1933/7/26）

莱娅确认自己在第一次讯问时曾说：“至于我，我又聋又哑。”

讯问重新拾起7月12日那次讯问。同样由克里斯蒂娜给出的唯一补充要素，是对莱娅发出的命令：“L.夫人在那里起来了，去把她的眼睛挖出来。”

“我像听从一个姐姐那样听从克里斯蒂娜。”

第一阶段

* 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听见女雇主们进门的脚步声。她们辨认出她们。

* 克里斯蒂娜下了几级台阶，探身到楼梯平台上。她问道：

> — 是夫人回来了吗？（3,10）[注1]
> [注1] 括号中的数字指向表格中所给出的讯问编号。

* 她又上了几级台阶，随后对莱娅说：— 我要请夫人，如果她愿意，把熨斗修好；这会合我的意，因为我们熨衣服已经耽搁了。（10, 11）。

* 克里斯蒂娜下到楼梯平台，夫人两秒钟前刚到那里。她说：

> — 熨斗又坏了，我没法熨衣服。（1）— 保险丝又烧断了。（3）— 夫人，熨衣服的时候保险丝又烧断了，像昨天一样。（5）— 我的熨斗坏掉了。（10）— 您愿意修理电熨斗吗？（12）* L.夫人回答：— 又一次！（3, 10）— 又坏了！（5）

* L.夫人说了些什么，克里斯蒂娜不记得了（10, 12）。这个缺失的要素，永远不会被找到。

* L.夫人抓住克里斯蒂娜的右臂（3, 5, 10, 11）。

* 克里斯蒂娜试图挣脱（5）。

* L.小姐介入（5）。[参见尤其是此处的精神病学鉴定，第73页]。

* 克里斯蒂娜用水罐猛击 L. 夫人，后者倒在地上[参见法医学鉴定]。

克里斯蒂娜同L.小姐搏斗。她挣脱出被后者抓住的一只手，使后者倒下，自己压到她背上。L.小姐从后面踢了她一脚（3， 10， 12， 13）。[另参见法医学报告：克里斯蒂娜的头发是在L.小姐手中被发现的。]

莱娅听见一声喊叫，来到楼梯平台；她看见姐姐正同L.小姐打斗；L.夫人开始站起来（13）。

克里斯蒂娜对莱娅说：

— 夫人在那里起来了；去把她的眼睛挖出来。（14,15）

— 把她的眼睛挖出来。（13）

莱娅扑向L.夫人（5, 11, 13）。莱娅把L.夫人的头往地上撞。克里斯蒂娜挖出L.小姐的一只眼睛，并把它扔到楼梯上。

莱娅看见姐姐的动作，便照样做；她用手指挖出L.夫人的两只眼睛（13）。夫人和L.小姐的叫声（6）。

克里斯蒂娜用水罐击打L.小姐；她扔出水罐；莱娅拿起它并击打L.夫人。

莱娅注意到姐姐气喘吁吁，并发出喊叫。

克里斯蒂娜对莱娅说：— 我要屠杀她们；我要去拿一把刀和一把锤子。（13）

第二阶段

克里斯蒂娜下到厨房。莱娅跟着姐姐。

克里斯蒂娜拿着刀和锤子重新上到楼梯平台，莱娅跟在后面。

克里斯蒂娜掀起L.小姐的裙子，褪下她的短裤，割划她的臀部。

> 克里斯蒂娜对莱娅说：— 我手里的这把刀不锋利。（13）

莱娅下到餐厅去找另一把刀（13）。

克里斯蒂娜用刀和锤子击打L.小姐（3, 8, 10）。

* 莱娅在 L. 小姐的腿上做出“凿刻状切痕”（enciseluras）（3, 8, 11, 12, 13）。

* 克里斯蒂娜在看见受害者的状态和流出的血之后平静下来（6）。

尾声

* 克里斯蒂娜去把门上闩锁好。

两姐妹去洗了身，换了衣服，穿着睡袍上床。她们希望发现这场惨剧的是警察（而不是L.先生）。

* 她们约定说自己遭到攻击，并给出一个两人在其中承担同等份额的事件版本。

观察：不知道莱娅是在什么时候把她围裙口袋里的小面包放到楼梯平台的小桌上的。那一天，克里斯蒂娜和莱娅都来月经。

这一重建是假设性的，主要是在某些点上（L.夫人可能抓住了克里斯蒂娜的手臂这一事实，以及此前的交谈）。然而，它仍然是截至那一天所提出的重建中最精确的。它在根本上并不反对起诉书。它要求作出若干观察：

1. 事实上，此行动有两个时间段，其间由两姐妹下到厨房，以及莱娅往返餐厅来加以标点。

1. 看来，克里斯蒂娜和莱娅的参与方式非常不同，莱娅没有参与任何触发。她是在姐姐的命令下介入的，无论如何，是为了把她解脱出来。不管怎样，她是在命令之下挖出L.夫人的眼睛。在整个行动过程中，她跟随克里斯蒂娜并模仿她。

1. 但奇怪且例外的是，她似乎在一个精确的点上拥有主动性：在L.小姐腿上做出的凿刻状切痕。

1. 触发仍然是最成问题的一点。L.夫人本来说过的一个要素缺失了。不可化约地缺失了。

1. 除此之外，克里斯蒂娜知道她要什么，要她所做的，说出她所做的：“屠杀她们”。

第三章

第三章

一桩迅速归档的案件：审判

就在她们的审判进程之中，对克里斯蒂娜和莱娅案件的讨论势必要改变场域，并从司法领域转移到精神病学领域。许多观察者，其中包括Tharaud兄弟，注意到法官、控方和陪审团方面急于一次性作结的匆促（我们并不说草率）。“不，断然说来，不应当这样施行正义，在夜谈与消化不良的热度中”，《L'OEuvre》的专栏作者将在判决次日这样写道。而一个月之后，连续四周，《Allo Police》将追问：“是否判处了两个疯女人？”与此同时，Eluard和Péret、Man Ray，随后还有拉康，正准备介入。

司法接受以这种方式审判，便在它自称要解决此案的同一瞬间，剥夺了自己对此案的掌握。

这一次，在司法与精神病学之间，有一种尤其有缺陷的衔接。是否应当在其中看到一个时代的征兆：精神病学科学随着克雷佩林式大厦和法国学派的扩张而被推至顶峰，并把它的实践延伸到审判厅？当然是的，而精神病学鉴定的运作本身，就凝缩了所有困难。Logre医生对《Allo Police》记者是这样说的：“事实上，专家，尤其是精神错乱病专家，是这桩事情的主人。他作出决定。陪审团，甚至法官，从他的结论中保留的，越来越不是一个信息要素，而是一个信念要素。”Bérillon医生也同样清楚：“专家？什么是专家？这是一个遭受了职业变形的人物。他变成了一种警察，或控方的辅助者。”“对责任的追寻，”Bérillon医生还说，“提出的是一个医生不应当解决的问题。”

po



NCE HAVAS

LA [illegible] DU SOIR

Fondateur : A. HAENTJENS

QUOTIDIEN REGIONAL 30. 9

25 CENT

UNE GRANDE JOURNÉE JUDICIAIRE AU MANS

CHRISTINE ET LEA PAPIN LES SERVANTES CRIMINELLES DE LA RUE BRUYERE, DEVANT LE JURY DE LA SARTHE

L'aînée est condamnée à mort, la cadette à dix ans de travaux forcés

Depuis le matin, les agents de la police municipale gardent les abords du Palais de Justice. L'arrêté du maire dont l'utilité se révélera par la suite, interdit les rassemblements. Les éternels causeurs qui encombrent les trottoirs et la rue se montrent froissés de l'application minutieuse qu'en font les représentants de l'autorité. Ils ont tort. Si, tous les vendredis, un arrêté semblable était appliqué sur tous les points et dans toutes les rues où défile le public, la circulation en serait notablement facilitée.

L'après-midi, la circulation des voitures est canalisée et détournée. C'est qu'il importe d'éviter le retour d'incidents qui marquèrent le procès des époux Anjubault.

Tout se passe d'ailleurs le mieux du monde, grâce à une organisation parfaitement mise au point.

Dans la salle d'audience ou des tables supplémentaires ont dû être installées pour la presse, nous sommes bien quarante journalistes, parmi lesquels Jérôme et Jean Tharaud Géo London, du « Journal » ; [illegible]

Mme et Mlle Lancelin étaient sorties vers 3 h. 1/2.

— Avez-vous eu une discussion avec elles ?

— Non

— Et les jours précédents ?... Non plus. Elles sont rentrées vers cinq heures et demie, six heures.

C'est alors le crime atroce et peut-être sans précédent. On sait comment M. Lancelin, repassant par chez lui, avant d'aller chez M. Rinjard, trouve la porte fermée, d'où d'abord sa surprise, puis son inquiétude.

— Il revient à son domicile, accompagné des agents. On constate qu'il y a de la lumière dans votre chambre. Vous avez allumé une bougie ?... Répondez-moi.

— Oui.

— Ils sonnèrent alors. Vous vous êtes bien gardée de répondre. Les agents, pour pénétrer dans la maison, furent obligés d'escalader le mur de clôture d'une propriété voisine. Quand ils arrivèrent au premier étage, ils eurent devant les yeux un spectacle terrifiant.

La première chose qu'ils aperçurent, ce fut, sur la dernière marche de l'escalier, un globe oculaire. C'était l'œil de Mlle

这是报纸版面边缘的残留识别，不构成正文。

这是报纸版面边缘的残留识别，不构成正文。

N° 63

创办人：A. HAENTJENS

地区日报

d MW pa = Beas cod ¿ Jo. 9（原文识别不清）

勒芒的一场重大司法日

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帕潘，布吕耶尔街的犯罪女仆，在萨尔特陪审团面前

姐姐被判处死刑，妹妹被判处十年苦役

从早晨起，市政警察的人员

就在司法宫周边站岗。市长的命令，其效用后来会显现出来，禁止集会。那些老爱闲谈、堵塞人行道和街道的人，对当局代表一丝不苟地执行这一命令显得很不快。他们错了。如果每逢星期五，在公众游行经过的所有地点和所有街道上都执行一项类似命令，交通将会明显便利。下午，车辆通行被疏导并改道。这是因为重要的是避免重演Anjubault夫妇案审判时所发生的事件。

此外，由于组织安排得十分完善，一切都进行得再好不过。

在审判厅里，为新闻界不得不加设一些桌子；我们确实有四十名记者，其中包括热罗姆和让·塔罗、《日报》的热奥·伦敦；如果

Lancelin夫人和小姐是在3点12分左右外出的。

— 你们同她们发生过争执吗?

— 没有。

— 那此前几天呢？……也没有。她们大约五点

半、六点回来了。

> 这时便发生了那桩骇人且或许前所未有的罪行。人们知道，Lancelin先生在去Minard先生家以前顺路回到自己家，发现门锁着，由此先是惊讶，随后不安。

— 他在警员陪同下回到住处。人们发现你们房间里有灯光。你们点了一支蜡烛吗？……回答我。

— 是。

> — 他当时按了门铃！那么，你们可是小心翼翼地没有回答。警员为了进入房屋，被迫翻越一处邻近地产的围墙。当他们到达一楼时，他们眼前出现一幅令人恐怖的景象。

他们最先看见的东西，是楼梯最后一级台阶上的一个眼球。那是小姐的眼睛

司法机关把自己的信念建立在专家意见之上，因而悖论性地放弃了审判，即使它作出了判决。在判决层面，奠基判决者与宣告判决者之间出现了一种分离，其显著结果是，归根结底，没有任何人承担责任。

另一位善意的评论者说，本来需要一个完全由医生组成的陪审团。这等于承认，每一个普通人都应当把自己的判断异化给科学的判断。而这恰恰就是陪审团所做的。在这里可以看到，于是人们甚至无法设想作出表态，除非以专家的身份；只有当自己不止是一个专家，同时既是专家又是公民时才行，这正是处于陪审员位置的专家的情形，却不是一个公民的情形。后者凭什么敢于从他的无知高处自行作出表态？把专家纳入考虑而不赞同他的观点，这种可能性被排除了。存在一种知识的恐怖主义。

这样一种判决，其形式可以概括为“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这一表达，并非没有后果。它的形式本身要求一个续篇。所有那些身处精神病学领域的人，看到自己的知识被做成一种信念的对象，并由此被赋予一种使其地位变质的效力，又怎么会不感到震惊呢？

由此而来的是Bérillon医生断言的激烈，以及Logre医生断言的坚定。由此也可见，刚刚被记者询问过的所有精神科医生都对Papin姐妹案件的细节了如指掌，这一点让这些记者不无惊讶。由此还有拉康的文章；这篇文章一方面明确反驳专家的结论，另一方面在司法/精神病学关系上却保持一种纯粹核验式的态度：“但是，为了那些被我们正在引导‘责任研究’所走的心理学道路吓坏的人们的利益，让我们注意到，‘理解就是宽恕’这一格言，受制于每一个人类共同体的限度；而在这些限度之外，理解（或自以为理解）就是

定罪。”

由于重罪审判的庭审程序严格来说是口头的，因此没有对所说话语的官方誊录。然而，如人们所知，这毕竟是一种公开程序。

一桩迅速归档的案件：审判 93

在1933年9月30日这一天，公众以双重方式在场。自27日起，勒芒市长作出一项市政决定，改变司法官周边的车辆通行，以便警方控制勒芒人群的示威；正如预料的那样，这些人群没有缺席这场约会。这群人对两姐妹怀有敌意。罪行发生次日，同一人群来到《La Sarthe》的办公室前，表达他们对这两名罪犯的反感；人们不得不给他们一张两姐妹的照片。如今他们要求判罪，并且尽可能重判。在厅内，一个更广泛的公众由巴黎司法新闻界的全部精英代表：不少于四十名记者。只有他们保存了那天所说内容的痕迹。《La Sarthe》像往常一样，本应提供最详尽的报道，

在这场审判中，将令专栏记者们震动的，并不是案件可能由此产生的揭示（所说出的内容，没有什么，或几乎没有什么，是此前未曾从讯问中泄露出来的），而是两姐妹的态度。

首先，这里是《萨尔特报》的证词：

克里斯蒂娜和莱娅·Papin就在三名结实宪兵那可敬的宽背之间。

人们原本担心这些女孩会有怪异举动和喧闹表现。

多么错误！她们两个都在那里，就像督学经过时课堂里的两个小姑娘。

克里斯蒂娜穿着一件浅色外套，开口处可以看见一件扣到领口的衬衫。在整个辩论期间，她都垂着眼睛，却从未表现出丝毫情绪。

奇怪的女孩。她似乎只有在给出一个稍微特别的细节时，才从昏沉中走出来。于是，在她的眼睑并不抬起以显露目光的情况下，她脸上出现一种极难界定的痉挛式笑容。

她是被过去的这些回忆逗乐了，还是因之受苦？谁能有把握地说出来？

哦！那个过度兴奋的泼妇，距离这个蜷缩在外套里的瘦弱姑娘相去甚远；我们在案发当日稍晚时曾在中央警署看见她，她喊叫着，手指竖起，仿佛要重演那个可怕的动作：

— 是的，我挖出了她们的眼睛。啊，可是！……

对于那些在几个小时之后经历了这场可怕悲剧的人而言，这次庭审远远谈不上轰动。

> 谨慎地抓着耻辱席，用老派小说家的说法，那些屠杀了自己女雇主的“可爱少女们”，并未放弃她们拘谨的态度。

而温柔的莱娅，她的眼神不断让人看出一种怯意；在谈到刺向Lancelin小姐的刀伤时，她明确说，她做的是“凿刻状切痕”。

> 克里斯蒂娜很少回答庭长的问题。有时可以看见她动动嘴唇，从中落出几个词，但声音如此微弱，以至于是一个宪兵，有时是辩护人，来转述回答。

Tharaud兄弟方面，则用如下语句讲述这次庭审给他们造成的效果，以及

两姐妹的态度在他们那里激起的问题：

勒芒，9月30日（电话报道）

门打开了，她们来了！没有任何照片能够传达伴随这两个女孩的神秘。莱娅，较年轻的那个，一身黑衣，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克里斯蒂娜穿米色外套，领子竖起。她们坐下，莱娅的双手仍在口袋里，眼睛睁着，但不知道睁向什么；克里斯蒂娜做了一个动作，把外套整理到身下，像一个细心的姑娘知道应当做这个动作那样。她把双手交叉在身前，保持不动，有一种可以说是尸僵般的僵硬。

她闭着眼睛；从下午一点庭审开始，到凌晨三点结束，她一次也不会睁开，甚至在回答向她提出的问题时也不睁开。

莱娅肤色暗哑，橄榄色，黑眼睛十分美丽，却什么也不表达，既无惊讶，也无恐惧，也无不安。一种绝对的冷漠，一分钟也不会活跃起来；而我把它称为冷漠是错的，我更应当说是缺席。

克里斯蒂娜看起来睡着了，但人们预感她并没有睡。从人们叫她起，她立刻站起来，准确地——

正如她在抚养她长大的修道院小堂做弥撒时站起来那样。她像一个即将被提问的灵媒。

> 两人都有轮廓分明的额头，像聪明人的额头，尽管她们二人谁也不聪明；头发梳理得整齐而细致。啊，不，这些女孩毫无庸俗之处！雇用过她们的人常常这样评价她们：

— 她们很高傲！

这种高傲，她们甚至在审判席上也保持着。

> 庭长十分机敏地讯问她们，显然希望从这些可怜生灵那里掏出一切可能对她们有利的东西。但实际上，这次讯问并非讯问，而是庭长的一段长篇独白；他在她们面前描绘她们自己的生活，时不时停下来问道：

— 是这样，对不对？

> 克里斯蒂娜闭着眼睛，用一个几乎察觉不到的点头回答；这只表明她并不处于强直性昏厥状态。随后她坐下，仍旧以同样细心的动作再次交叉双手，并落入她的僵硬之中。

莱娅用一个永恒的“是”回答，一个听不见的“是”。

神秘仍在持续……

多么奇异的生灵！她们给我的印象又是多么奇异！

一整天，我听着这样一桩罪行的那些可怕细节；这桩罪行在犯罪学编年史中显然没有另一个例子。整个

一天我都将听着，而同样

> 可怕的，是那些从紧闭却在犯罪期间或之后说话的嘴里吐出的词语；然而，奇特的是，看着这些姑娘时令我目瞪口呆的是，我没有一瞬间感受到与她们行为之可怕相对应的恐怖。

那么，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存在于这些可怜姑娘身上的神秘，并且在审判之后同审判之前一样依旧如此不可穿透，我想，在我这里，它压过了我本应感到的厌恶。

我带着一种热切的欲望，追随了这整个漫长的庭审，想要发现被告们这一野蛮行为的一个理由；而直到她们的犯罪开始之前的一分钟、一秒钟，她们一直过着所有人都宣称堪称楷模的生活。但在这里，没有人给出理由。

控方坚持认为，人们面对的是一次愤怒发作，后来演变成了狂怒。这一解释似乎完全令舒岑贝格、巴吕克和特吕埃尔诸先生满意，他们是受委托研究两名女杀人犯精神状况的精神科医生。

另一方面，既然愤怒并未被列入疾病之中，它不过是一种可以并且应当被克服的激情；又既然，另一方面，克里斯蒂娜和莱娅没有表现出任何器质性疾病，他们便毫不犹豫地作出结论：她们负有完全责任。

是的，但是，这种愤怒是从哪里来的呢？它竟然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通向这场屠杀：熨斗的故事？如果我接受克里斯蒂娜对犯罪所给出的最后一个版本，而在普遍意见看来，这个版本是最可信的，那么它甚至缺乏动机。

> 这样一种狂怒的爆发，如果缺乏动机，就来自病理。可是，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没有显现出任何动机：人们谈到克里斯蒂娜沉默寡言的性情、易怒。但在一种易怒状态与她所进行的屠杀之间，插入的是一个悲剧性的、不可穿透的形象；在我面前，在那堵墙之上，它采取了两姐妹的形式，而它名为：疯癫。

> 如果我对审判一无所知，仅仅看见她们，便足够了（而我会长久地在脑海中看见她们）：她们二人各自以不同姿态同样令人震骇；我会立刻产生这样的印象，即自己正面对着异常之物、不可解释之物、未被解释之物。

关于审讯本身，这里只保留那些并非对预审最后报告的简单照抄的要素。我们将把克里斯蒂娜和莱娅的“非回答”视为完整回答：

- “您是否有什么要责备朗斯兰先生、夫人或小姐的地方？”克里斯蒂娜没有回答。

- ——以另一种方式提出后，这个问题第二次仍未得到回答。

- 庭长提到与母亲的不和；这种不和似乎是由母亲想要掌控女儿们工资的意愿所引起的：“起初，您把钱寄给她吗？——自从我在 L. 先生家以后就没有了。”

在这次不快之后，克里斯蒂娜的性格变得更加阴郁：

“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有这种转变？是什么在折磨您？”

没有回答。

关于发现犯罪时的情形：“您点了一支蜡烛？……回答我！”

“L. 夫人得知熨斗又坏了，只简单地说了一个词：‘又来了！’，仅此而已。正因如此，您（……）以您所知道的那种残暴殴打了这个女人。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吗？”

沉默。

“L. 夫人是否向您伸出手来打您？说是或不是。

——不是。

——她只是对您说了“又来了！”。

——她什么也没说。是我攻击了她。

——您拿起锡壶，击打 L. 夫人的头部。是这样吗？

——我把她打昏了。”

“您对您妹妹说了什么？”没有回答。

“我一直在为您的罪行寻找一种解释。我没有找到别的解释，只有这一种：愤怒犯罪。您有什么解释要向陪审团先生们陈述吗？说吧。”

克里斯蒂娜默不作声。

关于两姐妹各自的责任：

“您曾就这个问题同您妹妹交谈过，这是真的吗？

——我们在没有决定的情况下决定了。”

关于市政厅事件：

“您向（市长）要求了什么？

——是为了一份出生证明。

——……问题涉及迫害。您抱怨过吗？——没有。”

关于两姐妹彼此之间的感情：

*

“这是基于一种家庭感情，还是基于性秩序方面的理由？仅仅因为她是您妹妹吗？

——我们之间没有别的东西。”

现在轮到莱娅接受审问。

“您有什么理由抱怨 L. 一家，并向他们复仇吗？——没有。”

*

关于两姐妹的感情：

“你们之间没有发生过别的事吗？

——没有。

——我说的是性秩序方面的理由，是异常关系。没有那种事吗？”

莱娅没有回答。

“您有理由感到不满吗？回答。您没有任何理由吗？”

不会知道更多了。

关于犯罪：

“您到达时看见了什么？说出来。”沉默。

“如果您不愿说，我就替您说。”于是莱娅微弱地声明：

“我把 Lancelin 夫人的眼睛挖了出来。”

“是您姐姐对您说：‘把她的眼睛挖出来’的吗？”

从厨房回来之后，莱娅做了什么？Germaine Briere 转述了她的当事人微弱的回答：“我划了刻痕。”

《萨尔特报》的记者总结说：“审讯在被告中较年轻者的完全缄默中结束，和较年长者一样。”

在法医作证之后，法庭讯问警员Vérité。

“当您到达时，她们看起来慌乱、惊讶吗？——完全没有，

——您觉得她们正常吗？

——她们处于过度兴奋状态。”

随后 Dupuy 警长前来作证：“克里斯蒂娜是这样说的：‘她们想打我们，我们自卫了，您看见了。’”

在一些同囚者被传唤到证人席，就她们在 Le Mans 监狱中目睹的场景作证之后（我们将在专门讨论克里斯蒂娜在监狱中所发生之事的一章中重新讨论这些证词，[参见第 188 页及以下]），又在精神科专家们被听取之后（我们将详细研究他们的报告），他们确认了自己关于她们被认定完全负有责任的判断，接着轮到 Logre 医生发言。应当指出，他是以辩方证人的身份介入的，因为一项反鉴定被拒绝了。

这次介入被称为“Logre 医生的演讲”。由于我们没有他那天所说内容的文本，我们必须参照记者们所作的笔记，以及后来别的记者向他提问时他所能说出的内容。这场演讲是一个枢纽点，此后，这一案件将重新出现在精神病学领域之中。这里首先是《La Sarthe》所作的报道：

Logre 医生

> Logre 医生，警察总署医师兼杰出的精神病医师，受辩方传唤。

> 他将就此案作一次非常有意思的演讲，并以

> 很大的技巧和谨慎，重新谈到若干在他看来他的同事们没有强调的点。此外，他向这些同事致敬，他们认真详尽的报告值得最高的敬意。但阅读该报告并未使他信服，他认为仍然存在疑点。

> 首先，他强调，这是一桩似乎缺乏直接动机，或动机极其微弱的犯罪。与此相反，人们注意到其暴力、甚至凶残、残忍纠缠，以及这种史无前例的眼球摘除。奇特的是，某些伤口似乎标记着一种性的冲动，几乎是一种虐待狂。随后，医生

> Logre 列举——

> 举若干本可以被纳入考虑的诊断。

> 原则上，首先是可能存在迫害观念。并且他援引市政厅事件来支持自己的意见。

> 被姐姐的个性完全抹消。

> 并且他把那些似乎属于克里斯蒂娜在监狱中的性方面的萦念，同受害者身体上划出的伤痕作比较。

> 于是他提出这个问题：

> “虐待狂是否在犯罪的决定作用中发挥了作用？”

> 最后，他考察了歇斯底里-癫痫的可能诊断。当然，支撑这一诊断所缺少的是完全失忆，尽管曾有部分失忆。而在第二次发作之后，即发生于

> 监狱中的那一次之后，记忆又回来了。

我们注意到，在 Logre 医生作证的整个过程中，庭长先生非常公正地向他指出庭审中的精确细节；这些细节显然是他漏掉了的，因为这些精确信息是在他不在场时提供的。

> 并且 Logre 医生坚持认为，有必要在
> 专门机构中进行检查。

——他说，判断一个人患病，总是可能的，即便人们不能立刻说出疾病的性质是什么！

在他看来，补充调查势在必行。但如果不下令进行，疑点将继续存在。

> 于是 Baruk、Truelle 和 Schutzenberger 医生被邀请提出他们的意见。他们三人坚持自己报告的结论。

就塔罗兄弟而言，他们以如下措辞报道Logre医生的讲演：

> Logre 医生来到证人席，反驳三位官方专家；后者的结论是被告们完全负有责任。

> 在他看来，有一些证词和事实既不能回避，也不能像他的同事们所做的那样予以采纳。城市市长、他的秘书、中央警长的证词就在那里；早在犯罪之前，他们就曾有过一种印象，觉得自己面对的是受迫害者。还有两姐妹身上的性变态观念；当人们看见她们掀起受害者的裙子并凶猛地切割她们时，这种观念又因施虐狂而复杂化。

> 同样，人们也不能否认犯罪之后所见到的东西，至少在其中一名女杀人犯身上如此：那些同性恋的萦念，而专家们对此完全保持沉默。最后，是犯罪行为中闻所未闻的暴力和凶狠，以及后来那些爱欲与神秘主义的发作；我在昨天的文章中曾提到过所有这些事情，而据 Logre 医生说，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呈现出一种病理性质。因此，他认为补充调查势在必行。

Logre 医生的精细论辩，在这样的场所里，在依法受委任的专家们反复断言面前，并没有多大分量。这些人以这种身份发言，而他则以辩方证人的名义发言；这些人审问过两姐妹，而他只是凭传闻（ouï-dire）说话。当然，后来的事件本应证明他是对的。而在这里可以看到，就精神疾病而言，“人们所说”（on-dit）的价值，也许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有所降低。这一点在拉康的介入中重复得到验证：当 Logre 医生提出不同的诊断假设时，“人们所说”（on-dit）的重叠，使拉康得以提出“对问题的一种更为单义的解决”。

审判之后，《Allo Police》去采访Logre医生，而他在此期间已经能够同两姐妹会面。

Logre 医生对我说，报告没有提到两姐妹之间异常的依恋。它确认一种健康的感情，而这与一切相矛盾。两姐妹在被询问她们结合的性质时，回答说其中没有隐藏任何异常。这个声明对专家们来说已经足够，尽管他们把这些姑娘视为伪装者，因而也就是撒谎者。我们不可能跟随他们。帕潘姐妹呈现出一种异常而淫荡的情感的一切外貌。她们不出门。人们不知道她们有任何感情冒险（……）当她们在监狱中被分开时，一种疯狂的绝望在克里斯蒂娜身上显现出来。一个同自己所崇拜的爱人分离的情人，也不会有更糟的痛苦表现。她日日夜夜呼唤她亲爱的妹妹。在一种狂暴且未获满足的欲望影响下，她说出猥亵的话语。当她们被重新安置在一起时，克里斯蒂娜发生了一场真正的危机。她扑向莱娅，紧紧抱住她，撕扯她的衬衫，想看见她赤裸的肉体。她反复说：“说是！说是！”（……）Logre 医生还对我说，克里斯蒂娜对这种态度给出过一个必须保留的解释：“在前世，我妹妹是我的丈夫。”（……）犯罪的性质明显是虐待狂式的。（……）仅仅挖出眼睛、随后把它们扔进一名受害者的罩衫里这一事实，就足以赋予它这种性质。爱欲的萦念是持续不断的。可是，专家报告甚至连提都没有提！（……）的确，我没有见过她们。这不是我的错。毫无疑问，那样本来更可取。不过，我必须告诉您这一点：在精神病学事项中，为了形成一个意见，我不是说一个确定性，并不需要见到主体。如果我治疗一个心脏病人，我需要听他的心脏。但为了研究一个疯癫者，我可以通过他的行为比通过他的话语更好地了解情况。寄给我的卷宗告知了我关于行为以及由被告们表达出来的思想的情况。

> 由被告们表达出来的。有了这些，对我来说已经足以形成一种意见（……）帕潘姐妹声称 Le Mans 市长对她们怀有恶意。她们是“受迫害者”。可是，专家们做了什么？他们询问她们：“你们去市政厅和警察局做什么？”她们回答：“是为了取得文件，以便获得我们的解放。”据此，专家们得出结论说，两名女仆的态度是正确的。总之，他们不相信 Le Mans 市长，也不相信警察局长。但他们相信帕潘姐妹。这不太合逻辑。——他们不是宣称，经确认的爱欲危机是装出来的吗？——确实如此。但他们没有确认任何伪装性质。他们参照的是克里斯蒂娜·帕潘的供认。可是，她是一个受暗示者。一个伪装者从不承认伪装。女看守对她们说：“你们是伪装者。”她们回答：“是。”还必须想一想，对于她们那些激情场景所带来的羞耻，她们后来能够给出什么解释。当我们想观察一个可能的伪装者时，在像这样不确定的案例中，必须进行精神分析。这可能持续数月。而且需要专门人员。（……）Truelle 医生回答我时，把我没有作出的断言归给我，说两姐妹会同时发生一场癫痫危机。我从未主张过类似的东西。癫痫？我不知道。我相信

某些基于事实的诊断：带有唾沫的发作。但不是双重表现。当一个疯子

> 产生一种邻近的疯癫时，这是常见情形，总有一个主动主体和一个被动主体。这里正是这样的情形。克里斯蒂娜是主动的，并发出命令。莱娅是被动的，并服从。专家们没有注意到这一观察。——您在作证之后见到了这些姑娘；有人责备您此前没有见过她们。您听了她们说话。她们态度的性质难道不足以改变您的结论吗？——不。

> 但我并没有以获得一种确定性所必需的方式见到她们。我见到的是一些无定形、冷漠、退

> 缩、沉默寡言、无动于衷的姑娘；正如我想象她们的那样。也正如她们必须是的那样，以确认我已经表达过的意见。

在法院驳回辩方提出的补充调查请求之后，辩论陈词开始了；这一请求与 Logre 医生演讲的方向相同（检察官 Riégert 先生强烈反对此类延期，因为他说[您简直无法相信他所说的话有多么精确！]，三位无可争议的专家已经给出了意见，“案件已经判定”）。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辩论陈词几乎在审判之后立即发表了。这一发表与拉康文章的发表同时发生。它们是帕潘姐妹越入行动所激起的“人们所说”的一部分，并因此值得重新加以讨论。人们将会注意到，美的功能对于其首次发表具有决定性；事实上，它之所以被正当化，是因为它为一部司法雄辩选集提供材料。

评论

诸

重大审判

当代的

司法雄辩汇编

每两个月刊出主要辩护词与公诉词全文

在……指导下

ÉMILE DE SAINT-AUBAN

巴黎上诉法院律师 律师公会会长



目录

《艺术家的权利》。卡农先生诉卡尔科先生。——塞纳法院；格勒内先生主持；1933年10月25日庭审；Chanvin 律师的辩护词（续）；助理检察官 Raisin 先生的结论。

阿尔贝尔·乌斯塔克先生在重罪法院受审。——塞纳重罪法院；1933年5月29日庭审——总检察长先生的公诉词；Rizos 律师的辩护词。

帕潘姐妹在重罪法院受审。——萨尔特省重罪法院；1933年9月29日庭审；昂热上诉法院顾问 Boulmer 先生主持；律师公会会长 Houlière 先生的辩护词；共和国检察官 Riegert 先生的公诉词；克里斯蒂娜·帕潘的辩护人 Germaine Brière 律师的辩护词。

萨雷案。——罗讷河口省重罪法院；1933年10月30日庭审；Lucien Escaffier 律师的辩护词；Raoul Brion 律师的辩护词。

目录

巴黎 法律与法理学总书店 原 Chevalier-Marescq 及合伙人书店、原 F. Pichon 出版社合并

A. Pichon 与 R. Durand-Auzias，管理人 国务委员会与比较立法学会书店

苏弗洛街20号（第五区）

律师公会会长 HOULIÈRE 先生的辩护词，民事当事方。代表 LANCELIN 一家

诸位先生，

2 月 3 日早晨，我们的城市在最强烈的激动、最正当的愤慨中醒来。通过本地报刊，这座城市刚刚得知，一桩可憎的双重犯罪——尤其因其实施条件而可憎——已于前一天下午，在市中心，在 Bruyère 街，对两位名声极好、极受尊敬、属于最好的资产阶级社交圈的女性犯下：Lancelin 夫人与 Lancelin 小姐。

Lancelin 夫人与小姐，是一位荣誉律师的妻子和女儿；这位律师多年来曾在 Le Mans 省政府广场从事其职业，并在法院里留下了最好、最亲切的回忆。她们被杀害时所带有的残酷精致程度，以至于乍一看来，理性拒绝承认事实的现实；而受委托检查受害者尸体的法医，竟能够在报告中毫不夸张地写道，人们面对的是一桩在法医学年鉴中没有先例的犯罪，它带有一种只有在未开化民族那里才会见到的酷刑精致。

而这桩可憎的犯罪，这桩骇人的犯罪，是由谁犯下的？由这家的两名女仆，帕潘姐妹犯下；两人都为雇主服务，而在她们为这些雇主服务的七年间，她们对他们没有任何责备可提出。

在这些情形下，此案属于那些必然会激起公众舆论热情并占据报刊版面的案件。报刊代表本不应失职；但是，如果所有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几乎所有人，都将以适当方式评价并谴责帕潘姐妹的行为，那么 Lancelin 先生及其家庭成员却要痛苦而惊愕地在某些日报中，例如《人道报》，以及某些插图周刊中，例如《侦探》，看到一些文章；这些文章虽然没有走到为犯罪辩护的地步，却仍然把它置于这样一种光照之下，以至于消息不够充分的读者有权发问：这场可怕悲剧的真正受害者，是否并非帕潘姑娘们本人，因为按照那些记者的说法，她们的

生活曾经艰难而悲惨，她们在曾经待过的不同地方，特别是在朗斯兰家，被要求承担的服务是如此艰苦而痛苦。这就是促使朗斯兰先生及其家庭成员成为民事当事人的最初理由之一。

另一方面，公众舆论在寻找一个动机，一个能够使它满意的帕潘姐妹行为的理由；而由于找不到，想象力压倒了理性，想象力便误入歧途。

最不可信、最离奇也最虚假的流言被散布开来。人们把帕潘姐妹的名字同第三者的名字连在一起，而这些第三者的名誉和道德本应使他们不但免于任何指控，甚至也免于任何恶意影射。人们甚至把情人安到这两个姑娘身上，而且把这些情人选在她们受害者家庭的成员之中；然而，从案卷中的全部文件来看，她们始终厌恶男人，并且至少从这一点来看，她们的品行一直无可指摘。人们把帕潘姐妹说成是招魂术的受害者，可她们从未实践过招魂术；如果此刻我们问她们那是什么，她们会很难回答我们。最后，在某些圈子里，并以最为不同的形式，《人道报》（l’Humanité）的论点、《侦探》（Detective）的论点——我刚才才影射过它——都有其拥护者；并且可以听到类似这样的议论：显然，帕潘姐妹犯下了一桩可怕的罪行，但是，她们难道不是被她们所服务的雇主逼到这一步的吗？雇主们的严厉、要求、态度激怒了她们。

诸位先生，你们明白，必须打掉所有这些小报的气焰，终结所有这些从未建立在任何严肃基础上的闲言碎语；如果我今天在这里，代表朗斯兰家族，针对帕潘姐妹说出有权针对她们说出的严厉话语，我也在这里向你们证明，在这件可悲的案子中，没有任何事情能够玷污朗斯兰夫人或朗斯兰小姐的名誉，并且从来不存在任何可能损害家族某一成员名誉的隐情。

罪行是可怕的，是可憎的，令人恐怖的；它一开始也许会使理性困惑：可是，全部而完整的责任都归于帕潘姐妹，她们不可能

在事实中，在她们雇主对待她们的举止和态度中，找到任何借口或减轻情节，哪怕是最轻微的借口或减轻情节。

那么，帕潘姐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她们是在什么情形下于1926年进入朗斯兰夫妇家服务的？在她们为其服务的七年中，她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她们的生存方式是什么样的？这将是我要考察的第一点。随后我们将处理罪行及其动机；而既然在辩方那边，尽管预审法官先生委任的精神病医生已经提出意见，我们仍然听到有人争论被告的责任能力，我也将预先回答可能提出、有利于她们的反驳。

克里斯蒂娜·帕潘，如你们所知，一直到十三岁，都在位于 Louis-Blanc 大街的“善牧”修道院受教育，

Louis-Blanc；在那里，她的姐姐是一名修女。这个机构保留下来的关于她的记忆，是一个勤劳的小女孩，关心把事情做好，并且无论从身体角度，还是从心理或智力角度，都没有呈现任何缺陷。十三岁时，她的母亲 Derée 夫人，已同 Marigné 的一位农民帕潘先生离婚，把她从修道院带出来，将她安置为女佣；从十三岁到二十一岁，克里斯蒂娜·帕潘辗转于若干个雇主家；她从未在每一家停留很长时间；或者是因为交给她的工作类型使她不喜欢那里；或者是因为她的性格并不总能同雇主的性格相合；也或者，更经常地，是因为她母亲会来把她带走，总是认为她挣得不够多。母亲对此越发有利益关系，因为她攫取女儿的工资，并按自己的意愿支配这些钱。

在这些不同的地方，克里斯蒂娜从服务的角度看会使她的雇主满意；但是在其中一些地方，她易怒的性格会受到责备。于是，勒芒一位企业主的妻子Fonteix夫人在预审期间声明，她只让克里斯蒂娜为她服务了十五天，因为她骄傲、傲慢、轻蔑，无法管束；同样，Flore街的一位房东Ménage夫人，也在预审中被听取陈述，她声明，从工作的角度看，在克里斯蒂娜在她家服务的那几个月里，她没有什么可责备她的；但是有一天早上，

她本应十点钟回来，却到中午才从市场回来，Ménage夫人便对她作了提醒；在她面前，克里斯蒂娜还能克制自己的怒气，但只是在随后，在厨房里，她却表现出如此激烈的暴怒，以致Ménage夫人认为有必要通知她的母亲；几天之后，她母亲便把女儿从Ménage夫人家带走；几周后，她又让自己被Dieuleveult夫人辞退，因为她无法忍受后者对她的一次提醒；而由于Dieuleveult夫人同时也雇用了她的妹妹莱娅，两人便同时被辞退。然而，在辞退她们以前，Dieuleveult夫人曾把母亲Derée夫人叫来，并让她承诺不要把两个姑娘安置在同一家里，理由是克里斯蒂娜对她妹妹莱娅施加着有害影响。Derée夫人没有认为自己必须听从刚刚有人给她的、而且来自一位非常有洞察力之人的建议，这是极其令人遗憾的。离开Dieuleveult夫人家后，克里斯蒂娜将进入朗斯兰夫人家，她的妹妹几个月后也会在那里同她会合。

至于莱娅，她像她姐姐一样，一直到十三岁都在Marianites修道院受教育。十三岁时，她母亲把她从修道院带出来，让她做女佣；在同她姐姐一起待过几个雇主家之后，特别是在Ménage夫人家和Dieuleveult夫人家之后，她将在1926年期间到朗斯兰夫人家同克里斯蒂娜会合。

在朗斯兰夫妇家，克里斯蒂娜被雇为厨娘，莱娅为贴身女佣。前者熟悉服务工作，适合成为一名出色的女佣；后者还只是个孩子，几乎什么都不会，必须把她训练成贴身女佣。朗斯兰夫人是一位出色的家庭主妇，她曾询问过两人的情况；在我刚刚告诉你们那些情况之后，如果我补充说，那些评价并非不利，你们不会感到惊讶。另一方面，克里斯蒂娜的性格引发的那些少数事件，并不足以使朗斯兰夫人改变决定。

我不知道在帕潘一方，Derée夫人或主要当事人是否曾询问过她们即将进入的这个家庭，以及她们即将服务的雇主的情况；无论如何，这些评价只能是极好的，而这个职位也只会显得有利。预审法官先生不愿留下任何

含混之处，便让人询问了几名在帕潘姐妹进入朗斯兰先生和夫人家之前曾为他们服务过的女佣。哦！人数很少，理由非常充分：因为这个地方好；而且她们到了那里，就会尽可能长久地留下来。一个人在那里待了十年，另外两个待了六到七年，其中一人没能找到；近来她回到萨尔特时，给我写信说：

这些就是证词。这就是那封信。

随后是朗斯兰家四名前女佣的四封信，全都对这个可敬的家庭有利。

没有任何理由让朗斯兰夫人面对帕潘姐妹时采取不同于她一直对待以前女佣的方式；而且此外，无论从朗斯兰先生本人和帕潘姐妹向预审提供的陈述来看，还是从宅邸附近的人们所给出的陈述来看，帕潘姐妹都不可能找到一个更令人愉快、更有利的职位。若不信，请你们自己判断：

从物质角度看，她们吃得同雇主一样，不仅从必需品的角度如此，而且

从非必需品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凡是在雇主餐桌上供应过的甜点或小菜，没有一样不同时供应在女佣们的餐桌上。

她们的工资起初为每月200和100法郎，后来逐步增加到300和200法郎；作为赠礼，雇主又在此之外加给她们半个月工资；再加上小费和零钱，这些女仆每月能多得一百五十多法郎。

至于社会保险，朗斯兰先生自法律颁布起，曾试图向她们解释这项法律的运作；帕潘姐妹只看到了一件事：她们每个月都必须向基金缴纳一定金额；于是她们声明自己什么也不会付。别担心，朗斯兰先生回答说，我们会替你们付；这个举动不会使朗斯兰先生的任何朋友感到惊讶；也不会使任何认识他并懂得赏识他内心细腻和情感的人感到惊讶。从那时起，

朗斯兰先生便支付了两份款项，雇主的那一份和女佣的那一份。如果你们再加上这一点：帕潘两姐妹有住处，有干净衣服，由雇主出钱供养，你们就会明白，她们为什么能够在七年之内轻易积蓄下她们所积蓄的款项，而这些款项在她们被捕时达到接近二万五千法郎。

从工作的角度看，朗斯兰夫人对服务工作有要求。她希望她的女佣们细心。也许如此；可是这不正是一位好主妇的特点吗？而且，此外，她的要求并没有达到会吓坏帕潘姐妹的程度，因为她们本来就是勤劳的人。然而，也不应夸大向这两个女佣要求的工作时间。早上七点已经起床之后，晚上她们在晚餐后立即可以自由上楼回自己的房间，也就是九点左右。其间，她们在用餐时间享有完全的自由，而且她们并不滥用这种自由；晚上，当服务工作允许时，朗斯兰夫人会把两小时交给她们支配，让她们为自己做活！你们很少会看到有资产阶级家庭提供类似的好处。因此，当人们询问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帕潘在朗斯兰夫妇家中的生活方式时；当人们问她们是否有什么可责备雇主之处时，她们总是回答说，她们觉得这个地方不错，如果她们不认为它好，就不会在那里待很久。我还补充一点：如果克里斯蒂娜·帕潘一开始没有觉得这个地方合意，她就不会把妹妹叫来；因为不要忘记，正是应克里斯蒂

娜的要求，莱娅才进入朗斯兰夫妇家；最后，如果她们二人在那里不自在，那么当她们的母亲在1930或1931年想让她们离开这个家时，她们就不会抵抗母亲的愿望，因为朗斯兰夫人曾冒昧地向Derée夫人指出，她总是想攫取女儿们的工资，这样做并不对……

我听到帕潘姐妹还补充说，朗斯兰先生和夫人，以及朗斯兰小姐，从未同她们有任何亲近；先生和小姐都不对她们说话，夫人只在给她们下命令或作出多少有些应得的提醒时才同她们说话。我也听到，莱娅声称，在她为朗斯兰夫人服务的最初几个月里，后者看到一张纸掉在地上，曾要求她跪下来把它捡起来……

至于缺乏亲近，原则上，一个人可以是出色的雇主，而不必在仆役面前显得亲近；不过在这个案子里，如果朗斯兰夫妇有些疏远，我们就有理由问一问：是否正是帕潘姐妹面对雇主时的同一种态度，引导了后者的态度。在他们的报告中，精神病医生研究了这两个被告的性格；他们声明，克里斯蒂娜和莱娅是两个从未爱过任何人的女人，甚至没有爱过她们的母亲；她们从未能够对他人产生哪怕最轻微的依恋，最轻微的奉献。生活中只有一种情感引导着她们：那就是她们彼此之间相互怀有的情感；可是除这种情感之外，除一种对金钱的无度之爱之外，这些女人的心里从来没有任何东西；而这能够解释许多事情。她们履行服务，因为人们付钱让她们这样做；就这些；但是由于除了她们彼此感到的这种奇特而特殊的情感之外，显然没有任何其他人在她们眼里算数，她们的性格不可能使她们非常讨人喜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服务之外，朗斯兰先生和夫人在她们面前避免一种以她们为对象的亲近，因为那既不会被她们理解，也不会被她们欣赏。

至于那张纸片的事件，我们有权问一问它是否确实存在；首先，因为莱娅起初只是为了替自己辩护，并解释犯罪当天对女主人发动的攻击，才援引了它；其次，因为她声明事情发生时曾同自己的母亲谈过此事，而她的母亲在就此被询问时回答说从未听说过这件事。此外，即便这是真的，也不应忘记，在据称发生此事的时期，莱娅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不大聪明，尚未成熟；而朗斯兰夫人确实可以像对待一个倔强、不愿服从的孩子那样对待她。从所有这些观察来看，显而易见，朗斯兰先生和朗斯兰夫人在对待女佣的态度方面，从未有哪怕最轻微的可自责之处；他们始终对她们表现得尽可能善良、尽可能仁慈；也正因为如此，帕潘姑娘们对她们女主人本人犯下的罪行才是

更加骇人、更加可憎！

*

* *

这桩罪行是怎样犯下的？它是在什么条件下实施的？

诸位先生，为了让你们了解发生了什么，我必须先给你们描述一下这座房子。Bruyère街6号的入口是一道大门，房屋的入户门嵌在其中。大门后面，是一个开放式门廊，通向院子和花园。严格说来，在门廊下方，右侧是住宅的入户门；底层有一个门厅，门厅上开着两扇门，右边那扇通向临街的餐厅，左边那扇通向餐厅，中间有一段楼梯通往二层楼梯平台，也就是犯罪地点。在这个二层楼梯平台上，有三扇门；两扇通向位于客厅和门廊上方的两个房间，因此面向街道，另一扇通向一个面向花园的房间；那是朗斯兰先生和夫人的房间。最后，还有第二段楼梯，是第一段楼梯的延续，通向三层。犯罪发生时，这个平台上有一只箱柜，箱柜上放着一只锡壶——重逾一公斤——，

三层有两个房间和一间阁楼，女佣的房间里有两张床，还有一只衣柜，帕潘姐妹习惯在那里工作和熨衣服，全部由电灯照明。

那天晚上，二月二日，朗斯兰先生、夫人和小姐大约在十六点外出：先生像每天习惯的那样去他的俱乐部，夫人和小姐去城里办几件差事，特别是去一次慈善义卖买些东西。家庭的不同成员应当在六点半到六点三刻之间，在Bruyère街会合，一起去朗斯兰夫人的兄弟Rinjard先生家吃晚饭；（他是我们勒芒律师公会最杰出的同事之一）。在这段时间里，帕潘姐妹本应把时间用于熨烫家里的衣物；由于一只电熨斗需要修理，她们前一天被迫中断了这项熨烫工作。

事情将会开始像预定那样发展；而至少在朗斯兰家庭成员的心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人设想两小时后即将上演的惨剧。

至于帕潘姐妹，她们开始熨衣服——至少根据她们所说是这样——而直到六点，都没有任何事件会

扰乱。将近六点钟时，发生了一起电力故障，使电熨斗不能使用。克里斯蒂娜于是下到厨房去找一支蜡烛来照亮房间；她已经回到这个房间几分钟了——她声明说——这时她听见朗斯兰夫人和朗斯兰小姐从慈善义卖会回来，手里拿满了她们带回并在那里买下的物品。朗斯兰夫人上到二楼，很可能是为了去把那些物品放到她的房间里，而朗斯兰小姐则留在底层的楼梯平台上。就在这时，克里斯蒂娜从三楼下到二楼，并在二楼的楼梯平台上同她的女主人相遇。她于是向朗斯兰夫人解释所发生的事故，并让她知道，由于这一事故，熨烫没有能够完成。朗斯兰夫人当时是否说了一句反映出她所感到的不快的话，这是可能的；甚至也是十分自然的。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还没有来得及作出一个手势、一个动作，克里斯蒂娜·帕潘便抓起放在箱柜上的锡壶，用它朝她女主人的头部猛击一下，力量如此猛烈，以至于后者发出一声痛苦而惊恐的叫喊，半死不活地倒在地上。由于身体倒下的声响以及母亲发出的叫声，热纳维耶芙·朗斯兰三两步便奔上通向二楼楼梯平台的楼梯，要来救助她的母亲；但是，还没有等她有时间介入，克里斯蒂娜仍握着她的锡壶，又朝她头部打了一下，也把她打得昏迷过去；热纳维耶芙·朗斯兰同她母亲一样，昏倒在地；不过在此期间，她出于防卫的动作，仍有时间抓住克里斯蒂娜的头发，并在倒下时扯下一绺头发，紧攥在她痉挛的手中。

莱娅听见这一切声响后也赶来了，正好赶到那两个可怜的受害者被击倒、瘫倒在地，却还在作最后的努力，试图站起来面对她们的攻击者之时。唉！一股疯狂的怒火攫住了克里斯蒂娜；并且她立刻就要把这股怒火传给她的妹妹莱娅！看见朗斯兰夫人跪着撑起身来，她对妹妹喊道：干掉她！把她的眼睛挖出来！莱娅便扑向已经再也没有力气作出丝毫抵抗的朗斯兰夫人！她以一个老练拷问者的动作，以一种真正令人骇然的手法准确性，把弯钩般的手指插进朗斯兰夫人的眼眶，

挖出两只眼睛，把它们扔到楼梯上；与此同时，她的姐姐克里斯蒂娜也用同样的动作挖出了朗斯兰小姐的左眼；两个不幸的女人痛得嚎叫；而由于帕潘姐妹害怕受害者的叫声会被外面听见，她们便不停地把她们的头往镶木地板上撞；只在彼此传递锡壶时才停一下，随后继续她们的杀戮之作。受害者的呻吟渐渐微弱下去，死亡的喉鸣开始被听见，她们的身体被临终挣扎的抽动所震颤。克里斯蒂娜被她女主人们的鲜血灌醉了；面对这可怖景象，她唯一能说出的话就是这一句：我要把她们屠杀掉！我要把她们消灭掉！两人下到厨房；一个抓起一把锤子，另一个抓起一把刀；当她们发现匆忙中拿到的是一把不锋利的刀时，莱娅又折回去拿那把锋利的大刀。配备了这些新的武器后，她们凶残地继续摧残

受害者的身体；她们把朗斯兰夫人的头打成肉泥；血和脑浆四处飞溅；墙壁、房间的门上，血迹一直溅到两米五十的高度。她们剥开朗斯兰小姐身体的一部分，在她身上切出深深的伤口。最后，她们一直不停地打、不停地割、不停地砍，直到筋疲力尽、浑身是血，体力到了极限，再也无法继续为止！

这就是这些女人所造成的可怕屠杀！其最细微的细节也都是由她们自己向我们揭示的，因为只有她们才能把这些细节告诉我们……

然后，她们做了什么？还是她们自己告诉我们的。她们知道朗斯兰先生随时会回来，而她们不想——她们已经这样声明——向他作出解释，因为她们的解释还没有准备好……于是她们采取预防措施，去把入口大门闩牢，以便禁止他进入屋内！采取了这一预防措施之后，她们去洗自己完全沾满鲜血的双手，并脱下同样被血浸透的衣服。一个半小时后，警察发现她们两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躺在同一张床上，穿着一件

睡袍，彼此蜷缩相依，正在商量她们的辩护手段！……

无论如何，这一屠杀场面——被指控为帕潘姐妹所犯下的罪行——在负责预审的司法官们看来是如此可怕、如此骇人，以至于想到这样一桩罪行竟可能由有理性的人完成，这样的想法如此令他们作为正直之人的理性反感；因此，我非常理解预审法官们为什么要让帕潘姐妹接受精神检查，以便评估她们的刑事责任，并且为什么召来三个人进行这项检查，他们是精神疾病方面的专家，原则上准备给予被告人她们有权享有的一切保障，并向你们这些法官提供你们可能需要的一切要素，以便凭良心权衡这样一桩可憎的罪行！这桩罪行，被法医沙里耶医生称作法医学年鉴中独一无二的罪行。

三位精神病医生受委托从精神角度检查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帕潘，三位精神科医生，而且是最优秀的。其中一位是舒岑贝格医生：他是萨尔特省精神病院的主任医师；他的经历、著作、声望本身就足以成为一种保证，使你们的良心得以免除任何顾虑。

第二位是巴吕克医生，曼恩-卢瓦尔省精神病院主任医师。他作为精神病医生的漫长经历为法庭所熟知；我们地区的法院如此频繁地求助于他的智慧，以至于我无需再花时间对他作本来就是多余的赞扬。我能对你们说的一切，也是庭审主席先生刚才愿意同我一起承认的，就是他的意见在精神病医生的世界里具有权威，而且他的声望早已远远超出了西部地区的边界。

最后，第三位是特吕埃勒医生，巴黎圣安娜精神病院的临床主任，当今法国最杰出的精神病医生之一。他是塞纳省法院的鉴定专家，几乎在所有棘手而轰动的案件中都受委托，而对他的选择已经足以说明他的品质。尤其是他，曾由负责戈尔古洛夫案的塞纳省预审法官委托，去检查戈尔古洛夫，即杜梅总统的刺杀者；也是他刚刚受委托去检查维奥莱特·诺齐埃尔，而我几乎无需向你们指出，如果特吕埃勒先生在塞纳省受委托在这类案件中提出意见，那显然是因为人们认为他胜任交付给他的使命。

那么，正是这三位名家，预审法官先生在共和国检察官先生同意之下，把检查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帕潘的职责托付给了他们，要他们在她们的遗传前史中调查是否有某种缺陷，其性质可能对她们产生一种影响，足以解释或减轻她们的罪行；要他们从身体、生理和心理的角度检查她们，并看看从这项检查中是否能够得出对她们责任的减轻。

然而，你们知道他们的回答。你们已经听到了他们的证言。不可能比这些先生中的每一位更加清楚、更加精确，同时也显得更加确信自己了。从遗传角度、从身体角度、从病理学角度，我们没有在这两个女人身上发现——我们已经说过——任何可能在任何程度上减轻其刑事责任的缺陷。她们既不是疯子，也不是癔症患者，也不是癫痫患者：从医学上说，她们是正常的，我们认为她们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负有完全而完整的责任。

诸位，你们要怎样呢！当具有受委托三位专家那样经验与权威的医学名家，在被检查对象接受了严肃而深入的检查之后，前来在宣誓保证之下提出如此精确的结论时，我实在要问：外行人怎么还能够自以为可以有益地讨论一份作为本次辩论基础的报告，并试图削弱它的分量呢?

此外，辩方是最先明白这一点的：如果没有另一位精神病医生在旁支持，它就无法试图反驳医学专家们的结论，而在重大场合，通常也习惯于找到这样一位医生。我指的是洛格尔医生。

诸位，我绝无意在任何方面批评洛格尔医生的学识，也无意以我这个精神病学外行人的身份，把自己摆成预审法官委托的医学专家意见与辩方传唤的洛格尔医生之间的仲裁者。

但是，你们仍会允许我向你们说明一些理由，正是由于这些理由，在我看来，在一位预审法官委托的专家意见与一位由辩方传唤的医生意见之间，由

司法机关委托的专家意见，必须毫无疑问地、在你们心中毫无顾虑地胜出。

首先，由司法机关委托的专家，既不顾及辩方，也不顾及控方；他们没有任何利益要朝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表态，人们请他们就一个棘手案例发表意见，而那是在诉讼尚未产生的时刻，在只有当被告人的责任被确认时庭审辩论才会发生的时刻；如果庭审辩论出现，那么这一意见有利于控方还是辩方，对他们并不重要，他们的独立性是绝对的。

由辩方传唤的医生也能如此吗？在某种程度上，他难道不是服务于其中一方吗？他难道不是带着前来作出有利于辩方的证言这一使命来到法庭栏前的吗？……我明白，你们会对我说，在这种条件下被传唤的医生，仍然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良心所指示的方向发表意见，而且他之所以接受所请求于他的使命，也只是因为这一使命符合他的信念。可能如此！但是，为了形成一种信念，是谁向他提供信息？是谁给了他必要的材料？是辩方，而且完全是辩方；辩方只告诉他它认为有利于其当事人事业的内容，也只能把它判断为有益于被告人利益的材料交到他手中。他就是这样形成了一种信念；而如果这种信念仍然摇摆不定，辩方也已经善于在它希望其作证的那位医生面前找到不可抗拒的论据，足以克服他的疑虑。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位由辩方传唤的医生前来作证；而我要说，原则上，这些条件不允许他获得完全的信息，并且随即夺去了他一部分独立性。

我没有荣幸认识洛格尔医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听到他说话。请他首先允许我告诉他，我对他那场卓越的讲演抱有多么大的兴趣；也请他随后允许我说，他给我的印象是具有一位心地慷慨之人的面貌，总是准备向被告伸出慈善的手；我几乎可以说，他是绝望案件的医生，是面临死亡危险的被告人的医生。在戈尔古洛夫案中，辩方传唤来反驳特吕埃勒医生报告的也是他，而且他竟说，与特吕埃勒医生所声明的相反，戈尔古洛夫是无责任能力的。此外，我不会惊讶于，在今天的

审判中，特吕埃勒医生与洛格尔医生之间这种惯常的意见分歧，正是辩方想到传唤洛格尔医生的理由之一。因为第一个人说是，第二个人就有很大可能说否！他们是两位持有不同学说的精神病医生。贵族身份带来义务！不能错过可能出现的支持自己学说的机会；而我确信，洛格尔医生并不觉得找到这个机会有什么不好，因为他可以借此肯定自己的学说。明天，在诺齐埃尔案中，特吕埃勒医生又一次受委托检查被告人；我确信，如果特吕埃勒医生及其同事们认为维奥莱特·诺齐埃尔对被指控的罪行有责任能力，洛格尔医生将会再一次站在辩方一边，准备声明维奥莱特·诺齐埃尔无责任能力，就像他声明戈尔古洛夫无责任能力一样。不过，我很希望他在诺齐埃尔案中获得成功，那是他在戈尔古洛夫案中没有获得的成功，也是在帕潘案中不会获得的成功——我对此确信不疑！

此外，让我们推理一下，诸位！你们怎么会想认真依靠洛格尔医生的意见呢？他没有见过被告人，没有检查过她们，也没有机会同她们面谈！为了在本案中作出意见，他只拥有预审法官委托的另外三位医生所掌握材料中的一部分。

当你们家里有一个病人，想知道他患的是什么病，想给他所需要的照料时，你们会想到去请一位没有见过你们病人的医生作出诊断吗？显然不会！因为你们会有理由地说，一位既没有见过也没有检查过你们病人的医生，不可能有效地、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作出意见；我还要补充说，如果这位医生是有良心的，他会告诉你们，只要他尚未见过并检查过你们的病人，他就无法对你们说任何东西。而这事实上正是洛格尔医生的意见；因为请你们记起特吕埃勒医生刚才在这个法庭栏前回忆起的那一事件。

事情发生在里尔，几个月前。洛格尔医生曾受委托从精神角度检查一名被告人。这一次，辩方传唤的是特吕埃勒医生；然而，洛格尔医生断然声明，一位既没有见过也没有检查过病人的医生，不能自许前来发表一种严肃而有权威的意见！……让我惊讶的是，洛格尔医生在这一情形下竟没有想起一条如此出色的

准则，并且竟以为自己应该违背它；再说，洛格尔医生在这个法庭栏前做了什么？他从一种纯粹理论的观点出发，对他同事们的报告作了批评。他做得有判断力，有礼貌，用的是最为文雅的语言，但也带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快乐！他就一个自己熟悉的主题发表了一场学说讲演；我再说一遍，他非常高兴找到一个机会，来展开那些他珍视的、尤其是同特吕埃勒医生及其同事们所发表的看法相反的观念。

这一切都很好，甚至对你们中的某些人来说可能显得有趣；但是，你们认为我们所见证的医学辩论，其性质能够在你们的推理中以任何方式改变司法机关委托的专家们的结论吗？显然不能……辩方的可敬代表们也十分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只是满足于依据洛格尔医生的结论，要求补充医学鉴定……法庭驳回了这一新的鉴定，而且做得对。已经进行过的鉴定，是由你们所能找到的最有权威、最有良心的精神病学家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需要新的鉴定呢？此外，如果法庭准许所请求的鉴定，而在这次鉴定中，有某些要素被发现与第一次鉴定的结果相矛盾，那么在随后的辩论中，共和国检察官先生或我本人，作为民事当事人利益的代表，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要求第三次鉴定；而审判便可能这样持续数月。

法庭心中对于帕潘姑娘们完全而全部的责任能力已不存在任何疑问，我确信，在你们心中也不会存在任何疑问。

如果你们不给予两名被告任何减轻情节，你们的决定将产生什么后果？这里需要在克里斯蒂娜和莱娅之间作一区分。事实上，由于两人都只是因杀人罪而受到司法追诉，且承认就她们而言并无预谋，杀人罪原则上在没有减轻情节时只导致无期苦役的刑罚；而有减轻情节时，则导致有期苦役刑，期限为五年至二十年，或者五年至十年的监禁刑。

但是，当杀人罪随后于、先行于或伴随另一项犯罪而发生时，那么刑罚就与为谋杀罪所颁布的刑罚相同，也就是说，与有预谋的杀人相同：无减轻情节时为死刑；有减轻情节时为“终身”强制劳动，或五年至二十年有期强制劳动。

在本案中，克里斯蒂娜·帕潘因双重犯罪而受到司法追诉，即对朗斯兰夫人和朗斯兰小姐的犯罪，其中一项接续另一项发生：由此可见，对她而言，适用的是无减轻情节时的死刑；若有减轻情节，则为终身强制劳动或有期强制劳动。

至于莱娅，她只是作为其姐姐克里斯蒂娜的共同正犯，因杀害朗斯兰夫人而受到司法追诉；因此，对她不适用死刑，而只适用有期苦役，视诸位是否承认减轻情节而定。

我再说一遍，我没有资格要求对两名被告处以这些刑罚，但我有权以各位家庭成员的名义，以朗斯兰先生——名誉律师——的名义向诸位请求，帕潘姐妹从他那里夺走了一位妻子和一位女儿；以 Rinjard 先生——我们尊敬的同僚——的名义向诸位请求，她们从他那里夺走了一位姐妹和一位侄女；以 Renard 夫妇的名义向诸位请求，她们从他们那里夺走了一位母亲和一位姐妹；我有权以他们全体的名义请求诸位：面对帕潘姐妹时，要表现得绝对毫不宽贷！

她们不值得任何怜悯，而且既然她们心中对女主人怀有的仇恨，在她们所犯下的罪行中启发了种种折磨和残酷的精细手段，而这些只有在野蛮民族中才可见到——既然她们的举止如同凶猛野兽——就必须像对待野蛮人和凶猛野兽那样对待她们。必须消灭其中一人——既然法律允许诸位消灭她——并且必须使另一人永远不再有作恶的可能。

共和国检察官里埃热尔先生的公诉词

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必须审判的这桩罪行，属于刑事编年史所记录的最可怕、最骇人的罪行之列……而理性在这罪行的暴虐面前，在所施加打击的野蛮面前，在罪犯的凶残面前，都陷入迷乱。

在已经颇为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我多次得以接近那些倒在杀人者打击之下的受害者尸体……可是从来，从来我未曾见过人的肉体被毁坏得如此厉害、被切割得如此厉害……我向诸位保证，我必须作出努力，才能镇定下来，并再次看见我双眼在 2 月 2 日傍晚所见到的那幕恐怖景象。

我立即赶到犯罪现场。到处都是血，地上、墙上，血甚至溅到挂在人高处的画上。地上有两摊血，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一摊，因为两名受害者的血已经混在一起。而在这片红色外衣之中，有两具女性尸体，半裸着，躯干被深深的切口划出条纹，其中一人的小腿上有被刀割下的肉片。

我让人把尸体翻转过来，便惊恐地后退！其中一人的眼眶空了，那位母亲的两个眼睛被摘了下来，就在近旁的血泊中漂着。更远处，在楼梯平台的第一级台阶上，有一只从眼窝中被扯出的眼睛，即较年轻的那名受害者的右眼，已经滚落并粘在地板上。

法医已经对诸位说过：法医学文献中没有任何足够的限定语能够描述受害者的伤口。

共和国检察官随即进入主题核心。他描述了这四名女子在同一屋檐下的共同生活。

一边是受害者，两位德行高尚的女性，属于勒芒社会的精英；另一边是两位出身极其寒微的年轻姑娘，但其品行同样无可指摘。在七年间，这四名女子并肩过着单调而平静的生活：一边是出钱并有权受人服侍者的仁厚权威；另一边，是提供其

服务者应有的恭敬而尊重的顺从。在这漫长的七年间，没有一片阴云，没有任何困难，完全和谐，双方都忠实履行着一份自由同意的契约。突然之间，后两者转而攻击前两者，给予她们最残酷的死亡。当我们看到引发这场可怖灾难的原因竟如此微不足道时，我们不禁迷乱。

检察官强调了人类计划的虚妄，它们在“不可预见的不可衡量因素”面前崩塌。“一切都已经被计算好，使这两位女性还能幸福地生活许多年，而她们的幸福却在不可预见的不可衡量因素面前崩塌了。”

公诉机关解释说，一切都是围绕一只电熨斗而发生的。这只熨斗前一天已经坏过，并在当天早晨修好了；这只熨斗又在克里斯蒂娜·帕潘手里再次坏掉。克里斯蒂娜是个头脑狭窄的姑娘，从十五岁起就当女佣，她唯一的目标就是她的厨房和她的熨斗。她恼怒、紧张，焦急地等待女主人回来，好让她修理自己的熨斗；当她等了很久的女主人回来时，她立刻把熨斗递给她。不幸的是，朗斯兰夫人急着再次出门——她有比听厨娘诉苦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便责备了她，并想把她推开；克里斯蒂娜坚持，恼火起来，并在身旁一张小桌上发现一个沉重的锡壶，她拿起它，击倒了女主人；也许她不会走得更远，也许她会就此停手，假如命运没有让朗斯兰小姐听见声响赶来，并扑向克里斯蒂娜·帕潘，扯下她一绺头发的话：

在疼痛的打击下，克里斯蒂娜的愤怒变成了狂怒；她用手里的壶击倒朗斯兰小姐，捶打她的脸，砸碎她的颅骨，并蹲在她身上，把自己的指甲嵌进她的眼眶，挖出她的眼睛，就是后来在楼梯平台上找到的那只眼睛；她把它挖出来，就像十五年来她为了厨房处理兔子 [lapin] 时把兔子的眼睛挖出来一样。

检察官接着叙述莱娅·帕潘如何登场：她四级四级地冲下楼梯，前来援助姐姐，跳到试图起身的朗斯兰夫人身上，把她的头往地板上猛摔，并在姐姐命令她模仿自己的要求下，挖出了她的受害者的双眼。随后两人跑向

厨房，拿起锤子和刀，切割朗斯兰小姐的躯干，而她已经只是一具尸体。随后，阴森的任务完成后，她们洗了手，给房子上了门闩，便上床等候警察。公诉机关不接受那种阴郁仇恨的假设，即这种仇恨只等待一个机会爆发，而长达七年的同处又使这种假设变得不可接受。它也不接受阶级仇恨的假设；帕潘姑娘们是母女相继的女佣，她们自己首先就反对这种假设。它同样排除了招魂术实践的假设，即某些神秘暗示由此产生，而某些不了解案卷的报刊期待把犯罪的原因同这些暗示联系起来。

由于动机的微不足道和所造成打击的残暴，公诉机关曾有一瞬间以为，这桩罪行是疯女人所为。

于是我们求助于三位学识渊博的人，求助于三位从最博学者中选出的学者，并对他们说：“我们不是医生，我们是法官，请告知我们，请为我们阐明。”这三个人检查了两名罪犯；细致地，在数月之间，他们研究了她们、审视了她们、分析了她们；他们过了她们的生活，从道德上解剖了她们，而他们的解剖刀一直抵达大脑，试图追踪那道道德裂隙，精神错乱正是通过它显露出来。凡是涉及这些姑娘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不陌生。三人来到我们面前，举起右手作宣誓姿势，说：“凭我们的灵魂和良知，这些姑娘不是疯子，她们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事情已经判定了！公诉机关站在一堵青铜墙之后。帕潘姑娘们属于法庭的管辖，而不是疯人笼子的管辖。因为如果监狱的大门此刻在她们面前打开，她们的自由将是完全且不受限制的；对她们的收容将是任意的，对她们的拘禁将是非法的。啊！我很清楚，很快就会有人拿相反的结论来反对这些正式结论。这种策略并不新鲜；就我微薄的经验而言，我看到这种策略被施行很快就要有三十年了。没有什么是绝对的，这多么真实；如果希波克拉底说是，盖伦有时就会说不。

然而，辩方求助于 Logre 医生。Logre 先生就是那位把一种奇特使命赋予自己的执业医生：到法庭上来提出反驳。正是他，在审判厅的法庭上

面向官方专家，对他们说：“你们三位在这里，你们错了，你们什么都不懂，只有我掌握真理”；在那个从草原来到这里刺杀法国国家元首的斯拉夫人的审判中，正是他高喊：“且慢！你们犯了一个错误，你们声称这个人精神健全，而我主张他疯了，陪审团必须宣告他无罪。”……而塞纳省陪审团判处了 Gorguloff 有罪，就像片刻之后萨尔特省陪审团将判处帕潘姑娘们有罪一样。

毫无困难地，凭街上普通人的常识，我转向辩方并说：“控方的三位专家，都是和 Logre 医生一样造诣深厚的科学人士，他们见过被告，研究过她们，彻底审查过她们的整个存在！你们的证人——我有权指出，他是由你们付钱来到这里的——甚至不认识她们，从未见过她们。你们的证人给我的印象是，他完成了一项壮举：在不知道数据的情况下解决一个问题。”

共和国检察官，由于自己的非专业性而禁止自己试图为专家报告辩护，同时原则上提出，然而并不禁止一个有常识的人试图就一个并非其专业范围的问题形成意见。于是他细致地研究被告的家庭背景，在她们的过去中寻找一切可能揭示失衡外观的东西，并得出结论：

因此，明智的人被引向在专家结论的逻辑面前俯首：“克里斯蒂娜和莱娅没有遗传缺陷；她们不罹患任何精神疾病；她们绝没有承受沉重遗传的负担；从智力、情感和情绪的角度看，她们完全正常。”她们不是疯子，然而她们却犯下了一桩疯子的罪行！这是真的，但激情就是如此，心灵的激动就是如此，它虽不是疯狂，却能造成同样的迷误，导致同样的泛滥。专家们对诸位说：这里涉及的是愤怒，被犯下的是一桩愤怒的罪行。我绝无意在这里就愤怒展开一篇与我的主题完全无关的哲学论文。愤怒只应从医学角度占据我的注意，而我正是在两位精神病学家 Sollier 和 Carbon 的一项著作中寻找定义：愤怒，这些作者说，是

一桩迅速归类的案件：审判 123

一种对任何恼人之事的阵发性情绪反应方式，无论这种恼人之事来自人、事物还是事件。它是一种易怒底色的扩张，并可能达到狂暴。在他们之前，贺拉斯和塞涅卡难道没有说过——我为这些古典回忆表示歉意——ira brevis est furor，愤怒是一种短暂的疯狂。愤怒不是疯狂；它没有任何病理性；它属于心理学；它不是某种疾病、某种缺陷的表达，而是一种特殊性格倾向的表达，这种倾向叫做易怒；我刚刚对诸位说过，它是一种易怒底色的扩张。

一个性情易怒的人在争论中激动起来，并殴打他的对手，他并非不负责任，因为他应当遏制自己的狂怒；而凭借他的精力——他是其唯一主人——他能够控制自己。帕潘姑娘们同样如此；她们易怒，她们激动，但这不是一种疾患、一种疾病、一种精神缺陷；她们激动起来，却没有做任何事来遏制自己的激动，她们自愿对良心的声音充耳不闻；她们自愿熄灭了那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闪耀、引导他并照亮其道路的小灯。当诸位在这第一个源于易怒的原因之外，再加上第二个源于克里斯蒂娜·帕潘所体验到的精神疼痛的原因——她的头发被一绺绺扯下——诸位就会衡量到支配这名罪犯面对其不幸受害者时的愤怒程度。在剧烈疼痛的打击下，克里斯蒂娜的狂怒达到了顶点；她越打越重，胡乱地打，到处打。就在那一刻，发生了所有刑事学家都熟知的现象：血的景象刺激了她们；她们胡乱地打，毫无理由地打；她们对无力反抗的受害者穷凶极恶，挖出她们的眼睛，切割她们的躯干，掀起一片片肉。

一切环环相扣：开端的冷愤怒，那种从侮辱逐渐上升到出手打击的愤怒，变成了红愤怒，即需要鲜血的愤怒；受到鲜血刺激，她们一直打到自身力气耗尽。在这一切之中，没有任何病理性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属于医学。一切都是心理学的。这里没有疯狂发作，而是一次愤怒发作，使其作者对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

我们有疯狗，它咬人、撕裂，因为它病了，因为疾病迫使它咬人和撕裂。

我们有暴躁的狗，它咬人，因为它受不了被挑衅，因为它性格恶劣。第一种无论发生什么总会咬人，它在强制性的病态影响之下不由自主地咬人：它不负责任。第二种能够有感情：它会舔主人抚摸它的手，但如果这种抚摸显得太粗暴，它也会咬这只手。帕潘姑娘们没有病；她们不是疯狗；她们是暴躁的狗！

检察官还想在克里斯蒂娜·帕潘的态度中找到罪犯负有责任的又一证据。她是二人中较聪明的那一个，完全意识到自己处境的严重性，于去年七月，在要把她移送到审判庭的问题提出之时，模拟了一场疯狂发作。他这样结束了自己的陈词：

罪行是显明的；罪犯是负有责任的。在这里，没有任何人怀疑，诸位将会在有罪问题上回答“是”。但摆在诸位面前的是减轻情节的问题。凭全部良知，我告诉诸位，这里没有任何怜悯的位置。她们对这两个不幸者没有任何怜悯，而这两人只希望她们好，并且只求活下去。

先生们，诸位将会唤起这两名无辜受害者在最后一息之前，在其肉体中受到残酷折磨的可怕痛苦。先生们，诸位也将祈请那位年老丈夫和父亲的深切痛苦；由于这两名可憎罪犯的行为，他永远同两个无限亲爱的人分离，而他唯一的慰藉，就是带着永远含泪的眼睛，去跪在两座过早打开的坟墓前，从此以后，那两座坟墓就是她们可悲的遗迹。

今天，社会把保护它的职责托付给诸位；而诸位刚才已经宣誓不背叛它的利益。诸位在这里是法律的执行者，法律命令，诸位必须服从。对这些骇人的挖眼者绝无怜悯！我恳求诸位无情，恳求诸位毫不宽贷！我要求最高刑罚！对这个，苦役监禁！对那个，断头台！

热尔梅娜·布里埃尔女士为克里斯蒂娜·帕潘所作的辩护词

先生们，

首先，辩方愿意向一个受到极其残酷考验的家庭低头致意。有些痛苦如此深沉，以致会引来甚至冷漠者的同情；有些痛苦如此深沉且如此庄严，以致应当使所有人肃然尊重。

当今年2月3日上午，人们得知前一天在宁静的布吕耶尔街发生的惨剧时，没有人能抑制住恐怖的姿态。所给出的寥寥细节——而且还不完整——显示出凶手们如此残酷的凶狠，以致同一种愤慨之情在所有人身上显现出来。第二天，在法院的走廊里，偶然使我遇见了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帕潘。看到她们，我惊愕不已。我曾想象，这些野蛮的女凶手会是粗野的、高大的、强壮的，面貌厚重。可在我面前的是两个柔弱的姑娘，步伐紧绷，身体僵硬，苍白得她们的脸仿佛蜡做的一样，她们那遥远的、缺席的目光令人产生一种不适感。几天之后，受托为她们辩护——我在监狱里见她们——我再次体验到同样的惊愕。她们有礼、恭敬、教养良好，举止和言语都十分含蓄；我很难，甚至几乎不可能想象她们犯下被指控的那种野蛮行为。然而，确实，就是她们！我询问她们犯罪的动机，询问犯罪本身。她们的回答令人困惑。犯罪没有动机，没有任何真正能够被保留下来的理由。而也许最令我惊讶的是，她们对自己的受害者仍保持着她们一直表现出的尊敬。于是，一个念头不可抗拒地在我心中形成，并且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在我面前的是两个不幸的精神失常者。

我不是精神科医生，这是事实，也许我没有丰富的人生经验，而且无疑我的判断没有任何价值。然而，我并不是唯一一个因这件事的怪异、因两姐妹如此特别的态度而感到惊讶的人。预审法官先生，他确实有着丰富的经验，从最初几天起便依职权下令进行精神检查。是的，依职权——

辩方并未介入——，在那一刻甚至还尚未成立。从一开始，甚至在了解这两个年轻姑娘生活的全部细节、这场惨剧的全部情形之前，仅仅根据最初的发现，法官就已经想到这些女凶手并不正常。而且必须说，从那一刻起，一切都促使提交给诸位的这个案件变得更加不可理解。更加不可理解、奇怪，而且也许随着人们深入这两姐妹如此奇特的人格，每一天都更加奇怪。

克里斯蒂娜生于1906年，今天二十七岁，二十七岁：青春啊！这是这样一个年龄：当一个人转向过去时，几乎只看见充满阳光的、幸福的日子；这是这样一个年龄：当一个人望向前方时，未来显得装点着一切幻想。二十七岁，是的，克里斯蒂娜只有这个年纪，可她的命运多么悲伤而阴郁！从童年起，命运就对她显得严酷。由于她的父母离婚，她被安置在善牧孤儿院，那时她只有七岁！她的童年和青春期是在那座修院里，在环绕它的高墙之间度过的。这个女童、这个小姑娘、这个年轻女孩在这所严厉的房子里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并非不幸，但确实悲伤，因为她有一种敏感、深情的天性，并且因孤独而受苦。然而，在她身上没有任何反叛，因为她不知道在一个父亲和一个温柔殷勤的母亲身边的家庭生活的甜美；她那些同样不幸的小伙伴们，可悲的是，也不能向她揭示她未曾认识的那些欢乐。克里斯蒂娜只是因为与妹妹莱娅以及母亲分离而受苦，而且甚至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受苦。在善牧

院，克里斯蒂娜学会了工作，学会了服从。她的天性并不反抗，并且乐于顺从修院的纪律。她甚至如此温顺、如此驯服、如此虔诚——这个小克里斯蒂娜——以至于修女们想让她发愿。她的母亲不得不介入，人们已经夺走了她的大女儿……她想把两个小女儿留在身边。她把克里斯蒂娜从善牧院接了出来，于是这个姑娘被安置去做女佣。她十五岁。我们见过了

从那时起直到她进入朗斯兰家为止雇用过她的所有雇主。诸位可以看到这些资料；再没有比这更称赞她的了。那时，克里斯蒂娜唯一的快乐，就是每个星期天见到她的母亲，尤其是见到她的小妹妹。事实上，她对妹妹有一种真正的崇拜。她当然很爱自己的母亲，但是

她更爱莱娅，而莱娅也向她表现出巨大的温情。因此，从莱娅到了可以被安置做工的年龄起，克里斯蒂娜就请求母亲找一户能让她们在一起的人家。正是这样，在1926年，两姐妹进入了朗斯兰家服务。

在朗斯兰家，克里斯蒂娜和莱娅仍是她们一向所是的样子：完美的女佣。勤劳、干净、诚实，完全懂得自己的服务工作，人们很少需要对她们提出意见，而即使提出，也从来不是严重的。她们在朗斯兰家不幸吗？她们从未抱怨，从她们唇边从未吐出过任何一句能够让人认为她们在那里可能因任何事情受苦的话。而辩方也同民事当事方一道，抗议围绕此事可能流传的那些带有倾向性的谣言。两姐妹中的任何一个，在任何时候，都未曾对朗斯兰家对待她们的方式提出过哪怕轻微的批评。此外，如果她们不幸，她们早就离开了：她们有极好的推荐证明，有积蓄，如果她们在雇主家受到虐待，没有任何东西会迫使她们留在那里。她们在那里感到自在吗？她们服务的方式——完美——回答了这个问题。克里斯蒂娜、莱娅，她们是模范女仆！她们沉默地，如同在修院里一样，辛勤地工作，不停歇。晚上她们从不外出。甚至星期天，当她们本可以允许自己有一些消遣时，她们也常常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三个星期天里，她们几乎只有一个星期天下午外出两个小时。此外，她们完全端庄，没有人能够对她们的行为提出哪怕最微小的批评。这里有两个年轻女子——尽管这在当今时代可能显得十分不同寻常——她们从未被带去参加舞会，从未走进剧院，也从未走进电影院。她们不阅读……她们唯一的快乐是为自己置办嫁妆，她们的空闲时间都用来缝纫和刺绣。直到犯罪前夕，直到当天早晨，直到前一刻，克里斯蒂娜的存在仍然就是如此。

修院，在别人家里工作，没有任何消遣，监狱或疯人院，这就是克里斯蒂娜一生所曾认识的一切。我说站在那里、在我身后的那个女人被命运严酷地打上了烙印，难道我没有道理吗？陪审团诸位先生，你们难道没有被震动吗，怎么可能不被震动呢：那骇人、可怕、令人惊骇的罪行，与这两个年轻女子之间存在着粗暴的反差，而她们正是通过这种平静、安宁的生活呈现出来的。

还有另一件事，并未出现在案卷资料中：父亲曾性侵或试图性侵自己的大女儿，甚至曾经开启过一项侦查。这个细节，多么重要，却只是在报告提交之后才向辩方透露；但专家们本应通过比他们实际所做更为详尽地询问母亲来取得这一信息。这个信息有什么价值？它难道不显示出父亲身上的一种失衡，也许由他的酗酒所引发，无论如何是一种真正的失衡，而当人们调查子女责任程度时，了解这一点是有意义的吗？

那么母亲呢？专家们见她的时间很短，我想大约半小时；他们认为她完全正常。当然，她是一个很好的女人，然而案卷中有一些精神病学家们似乎没有看过的信件。那些信是她写给自己女儿们的。它们非常奇特，因为它们显示出这个女人身上有一种完全不正常的宗教观念执念……这种执念，另一方

面，也见于她的谈话中。专家们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特殊点，我有充分理由对此感到惊讶。我们还被告知，被告母亲的一个侄子曾被收容，而她的一个兄弟上吊自杀。关于这些，报告中没有任何痕迹……

所以，陪审团诸位先生，你们看到，如果我们允许自己批评这份文件，那是有理由的，因为从一开始，在家庭病史这一章中，就存在一些重要的空缺，而且这些空缺似乎被忽略了；有一些材料本来就在案卷中，然而并非可以轻视。

如果我来看医生们所做的检查，我惊讶于它没有涉及两名被告的生殖器官。然而，这项特殊检查具有重大重要性。事实上，了解这些年轻女子是否为处女是有意义的。有一些精神病特别会在仍是处女的女性身上发展，或者在没有正常性生活的女性身上发展。贞洁可能在易患精神疾患的女性身上导致紊乱。这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因素，并且本来可能构成若干要素之一，使人能够非常清楚地确定被告的刑事责任。专家们似乎认为它没有意义；请允许我认为他们在这一点上的观念令人十分惊讶。

但让我们继续浏览这份奇特的报告。在案卷资料中，有两个事实显得重要：

市政厅事件以及犯罪之前两姐妹的态度；专家们把它们排除了，然而……两姐妹的态度曾让所有接近她们的人感到惊讶。在他的证词中，朗斯兰先生报告说，自从同母亲发生不快之后，克里斯蒂娜和莱娅改变了很多。我在这件不快上停留片刻。人们寻找过原因吗？母亲说没有任何原因。案卷中的两封信表明，这个不幸的女人崇拜自己的女儿们，并因她们的疏远而如此痛苦，以致无法解释这一点。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对这件没有争论却发生并表现为一个粗暴事实的不快给出了含糊的解释。突然之间，在此前没有任何东西预示这一点的情况下，两姐妹拒绝见自己的母亲……而今天她们称她为“夫人”。从那一刻起，她们似乎把她从自己的生活中清除了……而从那以后，朗斯兰先生在她们身上注意到一种很大的变化：她们变得阴郁而沉默寡言。我不禁问自己，在这个无法解释的事实中，是否不应看到一种奇怪状态的最初表现，而从那时起，这种状态便不断加重。因为从那一刻起，两姐妹再也没有恢复正常态度……恰恰相反，她们越来越阴沉。朗斯兰先生的内兄Rinjard先生经常见到她们，他注意到，尤其是在犯罪前六个月以来，她们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他说她们变得“昏暗”。朗斯兰先生还注意到，莱娅的眼睛很奇怪。最后，在犯罪前几周，克里斯蒂娜的状态更加恶化。面包店老板娘Lefort夫人每天见到她们，她已经意识到几个月来在克里斯蒂娜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变化。她说，克里斯蒂娜变得越来越紧张、越来越过度兴奋。她以为她病了。好吧，所有这些事实，专家们都不愿考虑，然而这一切都在案卷中。尽管如此，这种在两姐妹身上是新的态度，这种每天都在改变并使她们显得更加阴郁、更加紧张、更加过度兴奋的态度——尤其是姐姐——似乎甚至表明，那里有一个本应引起专家们注意的事实。它难道不显示出两姐妹身上，尤其是克里斯蒂娜身上，一种极其令人担忧的状态吗？

在被告所受指控的那种犯罪事实之前的状态，具有重大重要性；它可能预告一种危机状态，标志一个异常失衡的时期。我也无法解释，我不明白医生们怎么能够把关于两姐妹在犯罪之前奇怪态度的资料搁置一旁，

把它们判定为无关紧要。也许我更不能理解的是，专家们竟把市政厅事件作为没有意义的事情排除了。诸位还记得这件事。几年前，两姐妹去找勒芒市长，当时是Le Feuvre先生，向他抱怨她们遭到迫害。在这次拜访之后，期间她们表现得非常奇怪，中央警署署长见了朗斯兰先生，并把他的两个女仆的这一行动告知他，也把她们给所有见过她们的人留下的印象告知他。这个非常有特征的事件，在报告中以十分奇特的方式被叙述。报告把两姐妹所作的叙述当作唯一准确的叙述。她们声称去市政厅是为了获得莱娅的解除监护，并否认曾指控市长想要伤害她们，于是马上又相继排除了三份非常严肃的证词，而这些证词却同这一叙述相反。对此至少只能说，这很奇怪。

首先，他们认为Le Feuvre先生——勒芒前市长——的陈述可以轻视，因为他们说，他的记忆非常不精确。然而，Le Feuvre先生在两点上非常断定："我记得，"他说，"（帕潘姐妹）对我谈到迫害。"这同解除监护的问题相去甚远……他又补充说："有一件事使我惊讶，那就是她们过度兴奋的状态。"记忆不精确吗，Le Feuvre先生？也许就那些陈述本身而言是如此，但就态度而言并非如此，而且人们甚至不能蓄意排除这样一份证词。

关于市政厅秘书长Bourgoin先生，报告宣称，这名证人在自己的陈述中是谨慎的……因为他使用了"应当是"这个表达，一个条件式而含糊的词，而不是用"是"，来限定两姐妹的话。Bourgoin先生同Le Feuvre先生一样，确实已经失去了对所作陈述的清晰记忆。但他说："她们的语言应当是前后不连贯而奇怪的，因为我向市长作了如下评论：'如您所见，她们疯疯癫癫。'"市政厅秘书长先生是一个聪明的人，有经验，并且知道词语的价值。如果他对两姐妹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并且如果他在证词中叙述了它，那是因为他对此保有非常精确的记忆，他并不是轻率地说话。尤其如果把它同Le Feuvre先生的证词以及中央警署署长先生的证词联系起来——后者甚至更有意思——这难道不是一份宝贵的证词吗?

为了排除第三份证词，即Dupuy先生的证词，报告先是宣称它没有提供任何精确之处，又补充说，它不过是在叙述一场他没有在场的场景的叙述。请原谅，中央警署署长先生也许没有在整个场景中都在场，但他见到了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并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同她们谈了话。他所叙述的印象并不是关于他没有目击的事实的印象，而是关于他本人亲自参与其中的事实的印象。令我惊讶的是，报告竟会包含这样一种不准确，尤其是这种不准确还是排除Dupuy先生证词的理由之一。

令人深感遗憾——请允许我这样说——这样一些可能产生如此重大后果的错误，竟会滑入一份如此重要的报告中。报告还说，这份证词没有意义，因为它没有就两姐妹的态度提供任何精确说明，也没有准确叙述所说出的话。十八个月之后！专家们补充说，中央警署署长先生在其证词中是谨慎的，因为他声明："我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报告继续说，这样就标示出"那是他个人的感受方式，以及他所拥有的一种确定性"……在这一点上，我承认我不理解个人的感受方式与一种确定性之间的差别。最后，报告说，中央警署署长先生已经足够习惯于介入精神病人事务，因此能够区分一场争论之后两个恼怒的年轻女子与从精神观点来看严重患病的病人。好吧，我很高兴在专家们笔下看到这一评价。由于他的职务，中央警署署长先生确实有条件判断自己面前的是正常者还是异常者。他有长期而非常敏锐的经验，并且知道词语的价值。那么让我们非常准确地看看他声明了什么。他记得克里斯蒂娜指控Le Feuvre 先生不是保护她们，而是在伤害她们；他从未听说过解除监护。他见了 Lancelin 先生，而后者并未反驳——这是证人自己的表达——"他的女仆们有一点奇怪"。Dupuy 先生明确说，这些年轻女子来到他的办公室，他同她们谈了话，最后说道："事实上，在那一刻，我的印象是帕潘姐妹有某

种异常之处，她们认为自己受到迫害。”警署署长先生的印象是，自己面对的是因一场争论而恼怒的年轻女子吗？不是。他的印象是自己面对的是异常者，他坦率地说了这一点。然而，这一正式意见也被专家们搁置一旁，正如他们排除了

Bourgoin先生和Le Feuvre先生的陈述，并宣称

冷冷地说，市政厅事件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重要性。

事实上，这些年轻女子承认曾杀人，关于她们是否确实是罪行的实施者这一问题，并不存在任何疑问。但是向诸位提出的问题隐藏着一个词，一个我要提请诸位注意的词。将要问诸位的不是：克里斯蒂娜和莱娅是否因造成

死亡而有罪，而是，克里斯蒂娜和莱娅是否因故意造成死亡而有罪。

故意地。为什么这个词会出现在问题中？它被有意地包含在向陪审团提出的所有问题中，因为立法者关切被告人的责任。立法者认为，对于一个在实施应受谴责的行为时并无意识的个人，不可能施加判刑，哪怕是最轻微的判刑。司法并非无情而粗暴。它必须评判的不是行为，而是带着其全部弱点的存在者。首先，司法必须是人性的。它必须俯身察看那些被告发到它面前的人，看他们是应当严厉打击的有责任的罪犯，还是应当治疗的病人。如果不是这样，刑法有什么用？法院有什么用？人们会简单地对那个犯了过错的人说：“你将受到惩罚”。不管我们的社会多么乏味，毕竟必须承认，它以某种关切俯身面向那些出庭受审的人。它在必须审判时关心要知道，被交付给它的人是否有责任。而如果他没有责任，它就判定不应当给他定罪。正因如此，“故意地”这个词才被有意插入向陪审团提出的问题之中。

现在我对诸位说：诸位知道自己所作誓言赋予诸位的义务，诸位知道自己将必须回答的问题。诸位能否毫无疑问地，在诸位内心深处没有一个声音升起并提出怀疑的情况下，说：是的，克里斯蒂娜故意实施了那些被指控于她的行为？我无法相信，面对我们向诸位发出的绝望呼吁，诸位会始终麻木不仁、漠然无动。若诸位的确信不是绝对的，就没有任何东西应当引导诸位作出定罪。

尤其是，诸位不能对自己说：归根到底，监狱或疯人院

都无所谓，结果将是一样的：自由被剥夺。诸位没有权利这样对自己说。诸位不能

基于这样的推理来定罪。那将有失诸位的尊严。

不能把病人当作罪犯来对待。如果诸位一边对自己说：她们杀了人，她们很危险，何必去探究她们是否有责任？唯一重要的事，是让她们不可能再做这件事：监狱并不比疯人院更痛苦。若诸位循着这样的推理而定罪，我毫不犹豫地说，诸位就会失职。那么……诸位会想，辩方既然认为诸位只能定罪或宣告无罪，那它要请求诸位的就是宣告无罪。陪审团先生们，辩方并不请求诸位宣告站在这里的这两名女子无罪。我已经对诸位说过。辩方是忠诚的，并且愿意忠诚到底，直到它沉重任务的终结。它并不请求诸位作出一个会激怒诸位良心的裁决。它将请求诸位做一件事，当诸位进入评议室时，如果如我们热切希望的那样，我们已经使诸位相信这些年轻女子似乎并不负有责任，那么诸位可以允准这件事。届时，请把庭长先生请到诸位面前，并简单地对他说：“我们愿意有尊严地履行托付给我们的使

命。我们不愿作出一个可能是不公正的决定。在我们看来，目前我们对此案还没有看得足够清楚。专家们并不知道某些事实，自他们检查之后又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我们认为，下令进行一次新的精神鉴定将是可取的。在这次新的鉴定之后，它届时会给我们所有保证，我们的良心将允许我们以所能希望的全部心神宁静作出决定。”这就是我们请求诸位向庭长先生说的话。而法庭顺从诸位的愿望，我确信，将会下令进行这项势在必行的新检查。

我们所请求的，诸位可以做到，因为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东西与之相反。诸位回到审判庭之后，辩论只需重新开始。其他陪审团，甚至就在近来，也已经面对过一种道德上的不可能性，无法作出裁决，因为辩论未能使他们形成确信。正如我们今天请求诸位所做的那样，他们曾请求庭长先生向法庭转达他们十分正当的愿望，即下令补充

调查。而每一次，法庭都允准了以这种方式向它表达的愿望。

我们请求诸位的事，不可能违背诸位的良心。我们只要真理，在此案中我们热切地寻求的真理。我们并不为这些年轻女子乞求怜悯。今天我一次也没有诉诸诸位的心。今天问题不在于怜悯，而在于正义。我们为站在那里的那些人请求的只是正义，而她们有权获得正义。

我们唯一的愿望，是能够使诸位分享那种鼓舞着我们的炽热确信。陪审团先生们，诸位是我们至高的希望，是我们绝望地转向的对象，我们恳求诸位帮助我们追寻真理。是的，帮助我们吧，陪审团先生们，帮助我们澄清一切，我们只请求诸位这一点，诸位不能拒绝我们。

一项裁决被宣告了。然而，正义并未得到伸张（在所罗门王或桑丘·潘萨的意义上）。而对此，最好的见证人再一次是《Paris-Soir》的特派记者，Jérôme 和 Jean Tharaud。下面是他们9月30日文章的剪报，它将引发激烈反应。[注1]

> [注1] 《格兰瓜尔》（Gringoire）（一份讽刺性与女性向周刊）1933年10月6日写道：“我认为，尽管塔罗兄弟指责陪审员们完全没有理解这场悲剧，但有理的是陪审员们。不能把事情混在一起。司法是一种约定，但社会生活是另一回事……”。在它被维护的那个地方，不能更清楚地承认：已经作出的判决与司法毫无关系。并且，在后文中：“社会不愿变成一个临床实验场，在那里，受害者只会被用来阐明杀人者的心理学。”

帕潘姐妹已受审并被判刑，却仍未透露她们的秘密（本报特派记者热罗姆和让·塔罗）

陪审团没有理解

Germaine Brière 女士，在所有接近过被告的人当中，是最频繁见到她们、也最了解她们的人，因为数月以来，她以仁爱修女般的奉献接近她们；她在一篇热烈的辩护词中提出了她所观察到的事实，这些事实她昨天已向《Paris-Soir》的读者叙述过，但它们并未出现在专家报告中，仿佛被告人在犯罪后五六个月的精神状态已经不再值得关注，也不能阐明她们此前的状态以及犯罪本身。

发言的 Chautemps 先生，作为一位出色的庭审律师，指出了 Logre 先生的观点与其他专家观点之间的矛盾，指出了官方报告的不足之处，因为它把病理学和心理学分离开来，仿佛它们是两个边界封闭的领域！

他最后这一次向陪审团请求，在一个如此令人不安地提出无责任能力的问题的案件中，把庭长召入评议室，请求他准许 Logre 医生所希望、而法庭曾拒绝的那项补充调查。

毫无疑问，那本来是明智的。但首先，那看来会是在司法官习俗中的一场革命；其次，组成陪审团的萨尔特省这些好人，全都远未想到医学检查，例如一次腰椎穿刺，能够给他们提供关于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帕潘状态的说明。

这个请求不仅没有被接受，而且陪审团还拒绝认定克里斯蒂娜存在可减轻处罚的情节，尽管另一方面辩方并没有请求这一点。他们由此标明了自己完全没有不安，并且他们在这场阴暗的悲剧中什么也没有理解；他们在其中只看到了鲜血和恐怖，而那里还有某种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那种可怕的神秘，它能够粗暴地落到任何人的头上，并且比鲜血更为悲剧。

> 最后还有一个细节。当庭长向克里斯蒂娜宣布她被判处死刑，并且将在勒芒广场砍下她的头时，她作出了跪下的姿势，仿佛这样一个来自天上的打击，只能跪着承受。
>
> [注2] 热罗姆和让·塔罗的其他文章可见于《Littoral》，érès出版社，图卢兹，1983年6月，第9号。

第4章

第四章

谱系与年表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把谱系和年代学要素的调查推进到这里所呈现的范围之外。也许这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应当注意到，就克里斯蒂娜和莱娅的祖父母（甚至还有她们的父亲）而言，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既然如此，在民事身份层面上的细致调查，除了一个没有肉的骨架，还能带来什么？我们选择将这些要素的整理限定于那些已经在审判过程中出现的，或后来由对帕潘姐妹感兴趣的人所作调查中出现的要素。

这些部分性的整理，谱系方面的和年代学方面的，需要若干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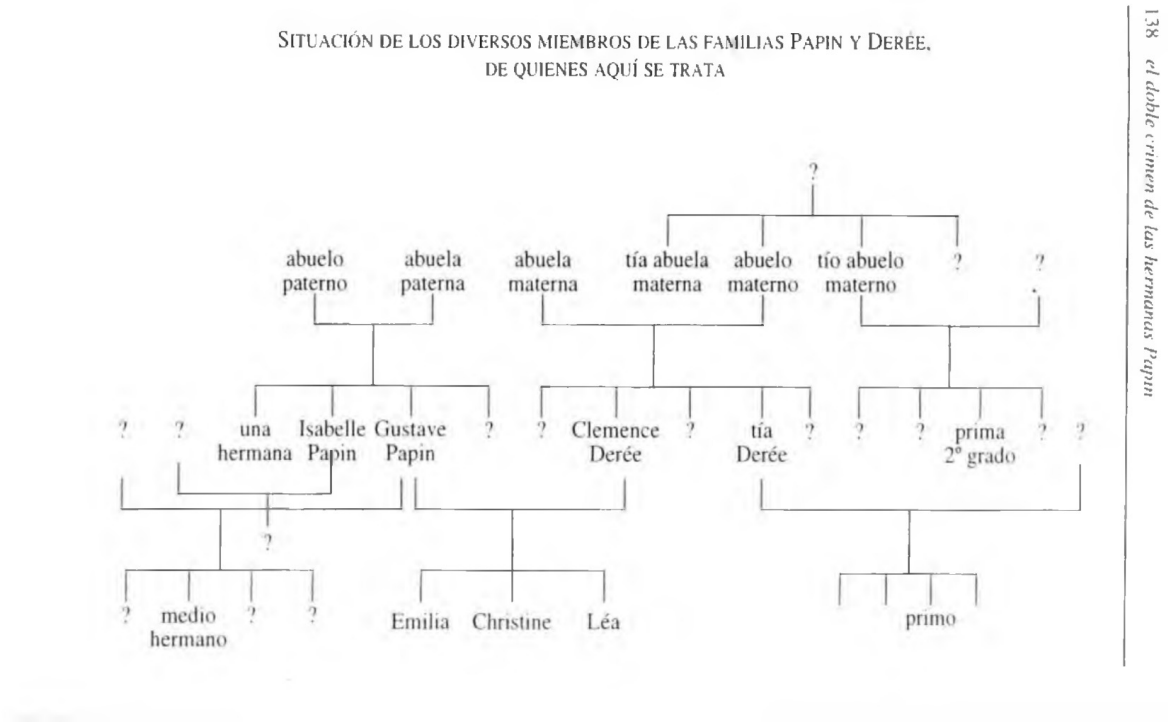
谱系

* Isabelle Papin，Gustave 的姐姐，比他大两岁，出现在这里，是因为她从1905年4月[6]日到1912年5月[25]日抚养克里斯蒂娜；克里斯蒂娜被托付给她的姑母 Isabelle 时只有一个月大。她将一直和她在一起，直到[7]岁。

* 三次妊娠所生的另外两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姐妹），补足了 Gustave 和 Isabelle Papin 的兄弟姐妹群。并不知道他们在这个兄弟姐妹群中的位置如何。

* 除了帕潘姐妹的一个同父异母兄弟，即 Gustave 第二次婚姻所生之外，不知道这第二次婚姻是否还生有其他孩子。Gustave 是在什么日期再婚的？也不知道。可以推测这第二次婚姻是在犯罪之后，因为犯罪发生时，他的前妻声明说他同他的两个姐妹住在一起。

这里所涉及的帕潘与德雷两家的各成员情况



父系祖父；父系祖母；母系祖母；母系姨祖母；母系祖父；母系叔祖父；一个姐妹；Isabelle Papin；Gustave Papin；Clémence Derée；Derée 姨母；二代表亲；Emilia；克里斯蒂娜；莱娅；同母异父或同父异母兄弟；堂/表兄弟；？

* 在 Derée 一方，出现了 Clémence 父亲的一个兄弟及其女儿（她的一个女儿？），因为莱娅曾被托付给她一段时间。并不知道莱娅从几岁起住在她母舅家中：1918年这位舅舅去世时，Clémence 把她接回（莱娅当时7岁）。在此之前，莱娅是在 Clémence 父亲的一个姐妹家里被哺乳的。

* 除了知道 Clémence 有一个姐妹，Clémence 在1913年写信给她，告知她自己与女儿们之间的困难之外，人们对 Clémence 的兄弟姐妹群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她在这个兄弟姐妹群中的位置了。

年表

下面可以看到所提及主要事件的年代排列。方括号中列出的是使每一事件得以定年的来源：

PH	Paulette Houdyer
Doc.	审判档案资料或医院资料
Exp.	精神病学专家鉴定报告。
AL	辩论陈词

报纸以其名称提及：《La Sarthe》，《Paris-Soir》。

* 这一排列所引出的主要困难，涉及 Gustave 对 Emilia 的强奸或强奸未遂的日期。如果我们依据1912年11月30日这一日期，即 Gustave 和 Clémence 获准接受司法援助、以便进行应当以其离婚告终的程序（1913年5月4日）的日期，并且如果我们如通常所做的那样假定，这次强奸未遂发生在程序开始之前，那么就必须承认，Gustave “强奸” Emilia 时，后者最多只有9岁。此外，Paulette Houdyer 在她的书中，谈到 Emilia 和 Gustave 时，说的是一个“十一岁的年轻情妇”。

* 人们不知道是什么理由促使监狱当局把克里斯蒂娜从监狱转送到精神病院，也不知道这次转送的确切日期。它是否与莱娅的转送同时发生?

年表

6月24日	1879	Clémence Derée 出生（鉴定报告第13页给出1879年4月24日）[PH]。
¿?		Isabelle Papin 出生。
（两年后）		Gustave Papin 出生。
¿?		13岁时，Isabelle 到 Déziles 家工作 [PH]。
10月	1901	Gustave Papin 与 Clémence Derée 结婚 [PH]
7月	1902	Emilia 出生 [PH]
8月	1904	搬到 Marigné [PH]
3月8日	1905	克里斯蒂娜出生。
4月6日	1905	克里斯蒂娜被托付给 Isabelle [PH]。
8月28日	1910	Gustave 与“Ecommoy 的流氓”争斗。克里斯蒂娜据说当时在那里。

9月15日	1911	莱娅出生
	1911	Emilia 遭 Gustave 强奸（Emilia 是11岁还是9岁？）
5月25日	1912	Clémence 接回克里斯蒂娜 [PH]。
11月30日	1912	Gustave 和 Clémence 获准接受司法援助 [Doc]。
5月4日	1913	作出有利于 Papin 夫人的离婚判决，女儿们的照管被托付给她 [Doc]。
	1913	Emilia 和克里斯蒂娜进入 Bon-Pasteur [PH]。
11月	1913	在 Bon-Pasteur，克里斯蒂娜与“Ouin-Ouin”争斗 [PH]。
¿?		莱娅被托付给 Derée 舅舅和他的女儿（Clémence 的姨母）[PH]
复活节	1915	克里斯蒂娜把莱娅从一次交通事故中救出 [PH]。事故之后 Alberta 夫人的通灵预言：“你的女儿们带有吉卜赛人的标记” [PH]。
	¿1918?	Emilia 想当修女 [PH]。Clémence 给 Ecommoy 堂表亲的信 [PH]
¿11月?	1918	Derée 舅舅去世之后（鉴定报告第12页），Clémence 把莱娅接回自己家中 [PH]；2天后，她把莱娅送进 Saint-Charles 机构寄宿 [PH]。
	1920	克里斯蒂娜向母亲宣布，她想当修女 [PH]。
	1920	Clémence 把克里斯蒂娜从 Bon-Pasteur 接出 [PH 和鉴定报告第1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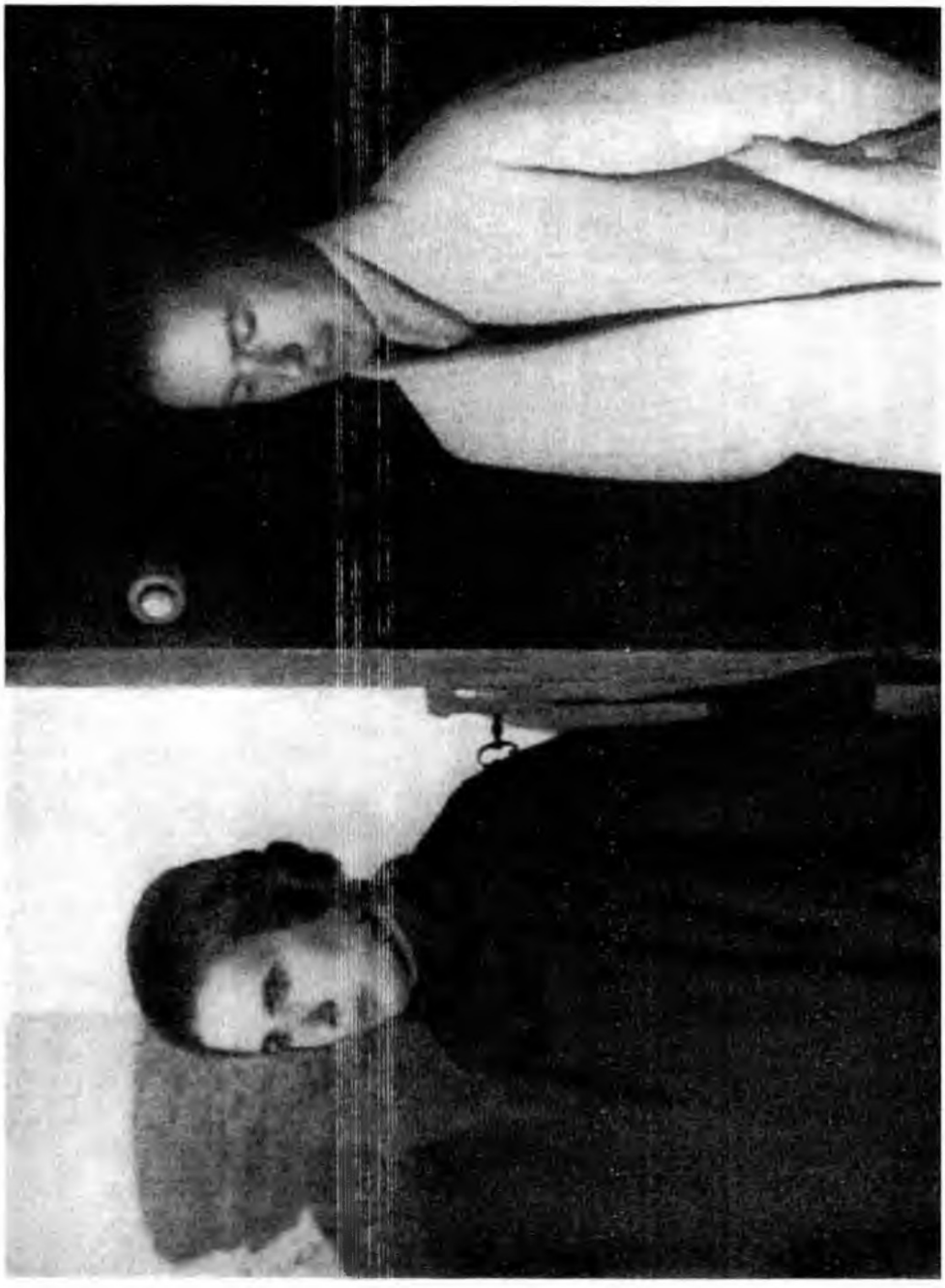
1920-	1923	克里斯蒂娜在 Poirier 家工作。她多次试图回到 Bon-Pasteur［鉴定报告，第12页］
	1924	克莱芒丝把莱娅从 Saint-Charles 机构接出［PH］
¿?		克里斯蒂娜和莱娅一起工作［PH，第172页］
2月	1927	克里斯蒂娜受雇于 Lancelin 家。
4月	1927	莱娅受雇于 Lancelin 家［鉴定报告］，在克里斯蒂娜之后2个月［克里斯蒂娜把这个日期说成她自己受雇的日期（1933年2月3日审讯）］。
10月	1928	纸片事件，据称 Lancelin 夫人曾强迫莱娅把它捡起来。
¿1929?		克莱芒丝父亲的姐妹去世，克莱芒丝曾把莱娅托付给她作乳母。
10月第2个星期日	1929	与母亲不和［鉴定报告和 AL，第599页］。
2月3日	1931	克莱芒丝给两姐妹的信［Doc.］
	1931	克莱芒丝一个姐妹的儿子死于勒芒疯人院［La Sarthe］
3月5日	1931	克莱芒丝给她两个女儿的第2封信［Doc.］
8月底， 9月初	1931	与勒芒市长的事件［鉴定报告和 AL，第584页］。
10月	1932	在市场上，克里斯蒂娜与克莱芒丝相遇［PH，第260页］。
¿?		开始购买小圆面包［PH，第256页］
2月2日	1933	犯罪。警长 Dupuy 对克里斯蒂娜和莱娅进行审讯，随后预审法官进行审讯。莱娅的神经危机［Doc.］
2月3日	1933	Schutzenberger 医生被委派为鉴定专家。第二次审讯［Doc.］
2月	1933	Gustave Papin 据说正同他的两个姐妹住在萨尔特省 Brette［La Sarthe］
2月7日	1933	第三次审讯［Doc.］。
2月8日和22日	1933	对莱娅的审讯［Doc.］

2月5日至11日	1933	克里斯蒂娜和莱娅拒绝进食［鉴定报告，第15及22页］。
4月3日	1933	Truelle 医生和 Baruk 被委派为与 Schutzenberger 协同工作的鉴定专家［鉴定报告］。
6月1日	1933	鉴定专家提交报告，结论是两名被告负有完全责任［Doc.］。
6月8日	1933	重构犯罪经过。在事发现场讯问克里斯蒂娜和莱娅［Doc. 和 La Sarthe］。
6月底	1933	克里斯蒂娜在监狱中开始躁动［PL］
7月11日	1933	克里斯蒂娜在监狱中的危机［鉴定报告］
7月12日	1933	对克里斯蒂娜和莱娅的审讯（在监狱中）：她们关于事实的第二个版本［Doc.］。
7月23日	1933	鉴定专家们再次受委派，确认其第一份报告［La Sarthe］。
7月25/26日	1933	对克里斯蒂娜和莱娅的审讯［Doc.］
7月28日	1933	预审法官给总检察长的命令：“因其请求，照其将进行者。”［Doc.］¿?
9月1日	1933	Lancelin 家属作为民事当事人参加诉讼［La Sarthe］。
9月27日	1933	市政决定［Doc.］
9月30日	1933	审判［La Sarthe，Paris-Soir］。

10月1日	1933	莱娅签署其赦免上诉申请［Doc.］
10月4日	1933	克里斯蒂娜最终拒绝签署赦免上诉申请［La Sarthe］。
10月8日	1933	在报道审判之后，Jérôme 和 Jean Tharaud 对精神病学鉴定报告提出质疑［Paris-Soir］。
11月5、12、17、24日	1933	Maurice Corien 的文章："两个疯女人被判刑了吗？"［Police Magazine］
11月30日	1933	赦免法庭驳回上诉［La Sarthe］
年底	1933	Éluard 和 Péret 发表在《为革命服务的超现实主义》上的文章。 拉康的文章："偏执狂犯罪的动机"［Le Minotaure］。——出版律师公会会长 Houlière 的辩论陈词（民事当事人）、Riégert 先生的陈词（公诉词）以及 G. Brière 的陈词（克里斯蒂娜的辩护）［Revue des grands procès contemporains］1933年11月—12月
12月5日	1933	克里斯蒂娜仍拒绝签署她的赦免请求［La Sarthe］。
1月23日	1934	共和国总统 Albert Lebrun 将加于克里斯蒂娜的刑罚减为终身苦役。
	1934	莱娅被转送至雷恩监狱。
	1934	克里斯蒂娜被转送至雷恩监狱。
5月25日	1934	克里斯蒂娜在雷恩住院。
5月18日	1937	克里斯蒂娜去世。

2月	1943	莱娅出狱。她同母亲住在南特。
	1947	Genet 发表《女仆》。
	1952	J. P. Sartre 在《Saint Genet comédien et martyr》中讨论帕潘姐妹案。
	1960	Simone de Beauvoir，《La force de l'âge》，Gallimard，第136页及以下。

	1963	J. Vauthier（剧本）与 Papatakis（导演）：《Les abysses》 L. Le Guillant，“L'affaire des soeurs Papin”［Les temps modernes，11月］。 G. Bonnot，“地狱之夜”［Les temps modernes，4月］。
	1966	P. Houdyer，《Le diable dans la peau》，Julliard
	1982	莱娅去世



Léa y Christine entrando a la sala del juzgado

莱娅和克里斯蒂娜进入审判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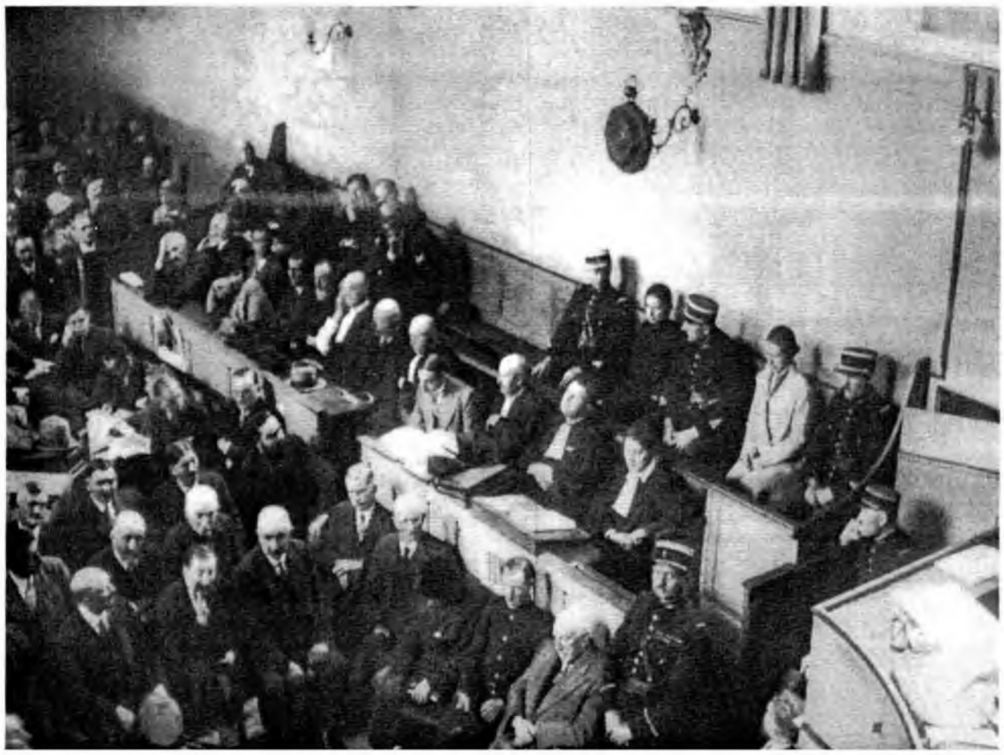
Léa y Christine entrando a la sala del juzgado

莱娅和克里斯蒂娜进入审判厅



El proceso (29 de septiembre de 1933)

审判（1933年9月29日）



El proceso (29 de septiembre de 1933)

审判（1933年9月29日）



La defensora de Christine: Germaine Brière

克里斯蒂娜的辩护人：Germaine Brière



审判（1933年9月29日）

第 5 章

第五章

若干事件及其可能的影响

每个人都从经验知道，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小事、一些表面上较轻微的事实，并非没有后果，它们能够使一种牢固建立的纽带受到质疑，有时甚至会造成这种纽带的最终断裂。

因此，我们将留意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帕潘所提到的那些事件。对于它们各自的重要性，或它们同越入行动之间的联系，我们不预作判断；首先我们只满足于汇集她们每个人围绕这些事件作出的陈述，这些陈述也许会使我们能够给它们定位。

1929 年 10 月第二个星期日：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同她们母亲的最终失和

犯罪次日，人们即将得知，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已经同她们的母亲断绝关系三年了。以下是《萨尔特报》的记者在同克莱芒丝·德雷会面之后所写的内容：

两名犯罪姐妹的母亲对我们所说的话

上午，我们得以同这两名年轻女罪犯的母亲交谈，地点是在她目前受雇的那所房子里，即 Géneral-de-Négrier 大道 22 号，Laroche 夫人家中。

这位母亲当时还不知道前一天发生的骇人惨剧，她接待我们时，既惊讶又夹杂着愤慨。

——先生，您想要什么？她大意上对我们说，我已经三年没有见过我的女儿们了。我不指控任何人。她们是好小姑娘，真的！我已经不明白她们的态度了。先生，我告诉您，在许多事实中有这么一件：

有一天，几年前，我去找我的两个女儿，要她们同我一起去看她们的舅舅 Adrien Derée 先生，他在巴黎 Victor Hugo 街 28 号一位医生家里当司机。我的女儿们已经走了。我在车站找到了她们。要是您知道我发现她们变成了什么样！她们看上去像两个疯女人：她们打着手势，整张脸发亮，面容扭曲。

为了支持她的论点，这位母亲想用一切可能的论据向我们证明，自从她不再见到她的女儿们以来，她们身上发生了变化，

帕潘夫人，自离婚以来自然又用回了她的娘家姓克莱芒蒂娜·德雷，她告诉我们，她于1879年出生在 Saint-Mars-d'Outillé，在 Mansigné 结婚，但她被迫同丈夫古斯塔夫·帕潘长期分居；后者是在勒芒 Louis-Blanc 码头 Carton 的一家磨坊做杂工，应当是在他的故乡，在 Brete，

（萨尔特省）据说在那里同他的两个姐妹一起生活。

> 当我们在德雷夫人面前提到继承这个微妙问题时，她让我们知道，三个月前，她的一个外甥，即她一个住在 Écommoy 的姐妹的儿子，死在勒芒 Eloc-Demazy 街的精神病院里。

德雷夫人现在似乎理解了她的女儿们所犯双重罪行的全部严重性，尽管我们不得不向她隐瞒那些可怕的细节。

> 在我们的调查期间，无论是在 Prémartine 街 51 号 Putault 夫人家里，后者现已去世，德雷夫人曾在那里做了十三年女仆，还是在 boule-

Général-de-Négrier 大道，我们知道她目前受雇在那里，我们都有机会

遇见莱娅·帕潘在孤儿院的一位旧同伴，Mathilde Chevreau 小姐，女仆，住在 Négrier 大道 74 号。

她向我们讲述了一些至少可以说是奇怪的话，那是她的小朋友在年轻的莱娅离开 Saint-Charles 寄宿学校若干年后对她说的。

> 谈到的是寄宿学校的院长修女，Chevreau 小姐称赞她对学生们的善良。莱娅·帕潘据说用一句针对这位可敬修女的威胁性话语回应了这一说法。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同一天，Clémence Derée接受了Dupuy警长的讯问：

……我把克里斯蒂娜安置在Bon-Pasteur，她在那里一直待到15岁。是我把她从这个机构接出来，把她安置到Poirier先生家，在Négrier大道；随后我把她安置到Coudrey先生家，在Conneré；最后安置到朗斯兰先生家，在布吕耶尔街，她在那里已经有7或8年了。起初，我把莱娅安置到我父亲的姐妹Derée小姐家吃奶，

她住在 Saint-Vincent 街。后者已于 4 年前去世。随后我把她安置在 Saint-Charles 学院，直到 13 岁。从这所院校出来后，当时我在 Tuffé 的 Debuteau 先生家做工，我让她同我待了一段时间。我把她放到勒芒 Prémartine 街药剂师 Neuf 先生家，随后又放到 Lancelin 先生家，同她的姐姐在一起，她是在姐姐之后不久进去的。我还要补充说，克里斯蒂娜同样曾在 Tachere 街 Saint-Rémy 夫人家被安置过几个月。

大约三年以来，我的两个女儿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已经不再看我，并且似乎躲着我；她们不再回复我写给她们的信，我为此非常痛苦。有一天，我在 Bruyére 街等我的女儿们，Lancelin 夫人和小姐在场，我问她们我的两个女儿是否很快会出来，她们似乎在嘲笑我。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我的女儿们的态度变到这种程度，因为以前她们很顺从。我的女儿们从未得过任何重病，并且一向表现很好。自 1929 年以来，我再也没有同我的两个女儿交谈过。有几次我在城里遇见她们，但她们从未回应我向她们发出的呼唤。

克莱芒丝·德雷安置某个女儿、随后又把她接回来的这种举动，也许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对她们而言，涉及的是寻找一个收入更高的工作。也许，在一个贫困环境中，在一个习惯于让子女尽早把工资交给家里的时代，这种做法很常见。事实上，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多数更换雇主的情况，都伴随着获得更高的薪水。

不过，为了安置、接回、再次安置、然后再次接回她的这个或那个女儿，克莱芒丝并没有等到她们到了劳动年龄。克里斯蒂娜一个月大时被托付给 Isabelle Papin，随后在 7 岁时被接回；几个月后，她同姐姐 Emilia 一起被送进 Bon-Pasteur 修道院，她的母亲又一次把她从那里接回，以便让她去不同雇主家里工作。莱娅起初在克莱芒丝的一位姑姨家受哺乳，随后被接回，随后被托付给一位叔舅，又一次被接回，再被托付给 Saint-Charles 孤儿院；等莱娅到了劳动年龄，母亲又从那里把她领出。我们不知道 Emilia 是否由母亲抚养，至少直到 11 岁，那时母亲把她托付给 Bon-Pasteur。

克莱芒丝·德雷对同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决裂场景所作的描述，必须由她在 1933 年 4 月 3 日证词中所作的描述来补充：

我结婚 9 年，并于 1913 年离婚。我的三个女儿都托付给了我。长女 Emilia 在 9 岁半时进入 Bon-Pasteur，在那里成了修女。次女克里斯蒂娜同她一起进入那里，当时 7 岁半。我在她 15 岁时让她出来，以便给她安排工作。最小的莱娅 7 岁时被送到 Léon Bollet 大街的 Saint Charles 修女院，我在她 13 岁时把她接回，以便给她安排工作。一直是我负责给我的两个女儿安排工作，也是我把她们安排到 Lancelin 夫人家。起初，她们把积蓄交给我，我把钱存进储蓄银行；后来，我把存折寄给她们，好让她们自己存钱。直到 1929 年，我的女儿们同我一直相处得很好，她们星期天来接我，我们一起出门。从 1929 年 10 月第二个星期日开始，这一切结束了。那一天，因为她们迟迟没有来接我，我便去找她们，我在 Arénes 街遇见 Lancelin 夫人和她的女儿。她们对我说，我的女儿们已经准备好出门了，我便到了 Lancelin 家。我的女儿们过了一会儿出来，对我说她们早上见到了一位同我相像的女士；在我看来，她们对我已经完全变了。她们对我说：“再见，妈妈”，然后就自己往一边走了，把我留下。那一天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们。我给她们写过几次信，她们从未回复我。有一个星期三，我去 Lancelin 夫人家问她们，想让她们来见当天路过勒芒的她们的舅舅们，有人回答我说这很麻烦，而且她们已经出去了。事实上，我在车站找到了她们，她们坐在长椅上，等着我一起到我要乘火车的站台去。我从未知道为什么我的女儿们不再愿意见我。»

如果我们只依据克莱芒丝对她同克里斯蒂娜和莱娅最后一次相遇的叙述，就可以得出结论：决裂并没有冲突。克莱芒丝见女儿们没有到来，便去找她们；她在路上，在 Arénes 街，遇见 L. 夫人和 L. 小姐，她说她们“似乎在嘲笑我”。她们告诉她，她的女儿们马上要出门。克莱芒丝继续往前走，在 Bruyére 街等了她们片刻。她的女儿们看见她后，据说对她说，早上她们见到了一位同她相像的女士；然后，只是简单地说：“再见，妈妈”。

这句话，在一个后来会被证明确实是她们最后一次相遇的情形中，是奇怪的；目前看来，我们无法解开这个谜。

对于这次相遇，克莱芒丝将保留这样一种印象：她的女儿们在她看来已经“完全变了”。她两次说自己不知道这种变化的原因。至于这种变化，我们一无所知，除了她的两个女儿已经不再对她“顺从”这一点。

另一方面，有证词表明，事实上，她们的母亲后来又多次纠缠她们。我们有这两封写给克里斯蒂娜和莱娅的信（在她们房间里发现），尽管《萨尔特报》的记者曾希望它们也许可用来澄清犯罪动机［参见第 48 页］，却没有任何人重视它们。

> 我们复制这两封信，首先是原样版本，随后是一个按照当时小学所提供的“教育”意义来整理的版本。[注1]
>
> [注1] [在我们的版本中，我们选择在正文中保留根据西班牙语整理版本所作的翻译，并在其后保留原语言版本的原样文本，以便读者能够欣赏这一版本的字面性。[译者注]]

勒芒，1931 年 2 月 3 日，我亲爱的两个女儿：

> 我向你们询问你们的消息；如果你们能把消息给我，我会很幸福。我的心直到我最后一口气也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如果环绕你们的生活不令你们喜欢，就回到我这里来。我的心永远会接纳你们。如果你们目前有妨碍，使你们同我分离，那么以后回到我这里来，我会很幸福地把你们接到我的心里。如果你们没有我的地址，就写信给 Saint-Mars-Dautille 的家人，他们永远会知道我在哪里工作。如果你们需要钱，写信给我，我会立刻寄给你们。在生活中，人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有上帝，但人也大大地尽他们的一份力，尤其是围绕你们和我的嫉妒。最后，做你们认为最好的事。我们以为有朋友，而他们常常是巨大的敌人，甚至那些最靠近你们的人也是。你们愿意写信给你们在 Saint-Mars-Dautille 的祖母吗？她会非常幸福地收到她两个孙女的几句话。我最后全心拥抱你们。你们的母亲 Clémence Derée，Prematoire 街 61 号。我等待你们的答复，克里斯蒂娜和莱娅。

勒芒，1931 年 2 月 3 日，我亲爱的 2 个女儿：

> 我问你们的消息，如果你们能给我消息，我会很幸福，我的心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直到我最后一口气，如果环绕你们的生活不再让你们喜欢，就回到我这里来，我的心永远会接纳你们，如果现在有阻碍使你们同我分开，以后就回到我这里来，我会很幸福地把你们接到我的心上，如果你们不再有我的地址，就写信给 Saint Mars Dautille 的家人，他们永远会知道我会在哪里工作，如果你们需要钱，就写信给我，我会马上寄给你们，在生活中，人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只有上帝，但人也大大地做他们的一份，尤其是围绕你们和我的嫉妒，最后，照最好的去做吧，人以为有朋友，而常常那是很大的敌人，甚至那些最靠近地围绕你们的人也是，你们愿意写信给你们在 Saint mars Dautile 的祖母吗，她会那么幸福地收到她这 [2] 个小孙女的一句话，我最后全心拥抱你们，你们的母亲 clemence Derée，prematoire 街 6| 号，我等待你们的答复，christine 和 lea。

三天年里，我的克里斯蒂娜，我的克里斯蒂娜

勒芒，1931 年 3 月 5 日

> 我亲爱的小女儿们，不要担心我的健康，我很好，而且我一直想着你们会回到我的心里来；尽管有一种痛苦的悲伤，我仍然一直指望你们两个；有人告诉我，他们正在做一切，要让你们进入修道院当修女。你们一直对我说，你们绝不会进入修道院，那不是你们的想法。我知道你们的想法，它们非常正直：你们两个待在一起，或者结婚并抚养一个美好的家庭；我知道你们很爱孩子。我绝不会接受类似的事。这不是上帝，这是强行违背上帝的律法。那不会给你们带来好运。但这是我的最后意愿：我不是……总之你们知道。我相信上帝，但只相信上帝。那么：我绝不会由神父来安葬。就是这样。上帝不会因此责怪我。上帝不会因此责怪我。强迫两个

> 年轻姑娘进入修道院。我们不向任何人要求什么。这是对你们的嫉妒；有针对你们和针对我的嫉妒。不要任人摆布。斗争到最后一刻。你们的女主人对此很清楚。我很清楚那些［这里有一个无法辨认的词］。我绝不会踏进天主教教堂一步。是天主教徒让人对你们做这些事，他们刚刚告诉我。我的女儿们，我的女儿们，你们是正直的，不要害怕司法。你们永远会找到我的心来接纳你们。有人使你们偏离你们的母亲，这是为了让你们看不到人们对你们做了什么，看不到近 6 个月以来人们让你们遭受的苦难。我的家人永远会接纳你们。如果可以，就回来，不要理会你们的雇主。上帝永远不会认可把 2 个姑娘违背她们的想法关起来。一个人越正直，在天主教徒中就越不幸。走吧，为了你们的健康，尽快去乡下。不要在意钱。人们会让你们倒下，以便成为你们的主人；人们会把你们送进医院，你们会付出贵得多的代价，而在那里，人们会任意处置你们。走吧，你们将不会是自己的主人。人们会让你们进入随便哪个修道院。不要给你们的 8 天预告。走吧，去乡下。去见 Grignés 雇主们，那是一个好家庭，这不会花你们多少钱，而且你们会有牛奶和新鲜空气。勇气！对你们说话的是我的心，不是我的嘴。

3 天年里，我的克里斯蒂娜，我的克里斯蒂娜

勒芒，1931 年 3 月 5 日

> 我亲爱的小女儿们，不要担心我的健康，我很好，并且我一直想着你们会回到我的心上来，尽管有一种痛苦的悲伤，我仍然一直指望你们 2 个，有人告诉我，人们正在做一切，要让你们进入一所修道院当修女，你们一直对我说，你们绝不会进入修道院，那不是你们的想法，我知道你们的想法，它们很正直，就是你们 2 个留下，或者好好结婚并抚养一个美好的家庭，我知道你们 [2] 个都很爱孩子，我绝不会接受，我绝不会接受一件类似的事，这不是上帝，这是强行违背上帝的律法，那不会给她们带来好运，但这是我的最后意愿，我不是，总之你们知道，我相信上帝，但只相信上帝，那么就是这样，我绝不会由神父来安葬，这就完了，上帝不会怨恨我，而且上帝

> 不会怨恨我，这是强暴，这是违背上帝的信德，强迫 2 个年轻姑娘进修道院；我们不向任何人要求什么，这是对你们的嫉妒，有一种针对你们和针对我的嫉妒。不要任人摆布，斗争到最后一刻。你们的女主人很清楚。我知道这是 /arroshides/〔原文难以辨认：/arroshides/〕。我永远不会再把脚放进一座天主教教堂。是天主教徒让你们遭受这件事，刚有人告诉我。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你们是诚实的，不要害怕司法。我的心永远会找到地方接纳你们。有人使你们离开了你们的母亲，这是为了让你们看不见人家对你们做了什么，看不见人家从 6 个月以来让你们遭受的苦难。我的家人永远会接纳你们；如果你们能，就回来，不要依附你们的主人。上帝永远不会允许 2 个年轻姑娘违背她们的想法被关起来。在天主教徒那里，越是诚实就越是不幸。走吧，尽快去乡下，为了你们的健康；不要看钱。人家会让你们倒下，以便成为你们的主人；会把你们送进医院，你们会付出贵得多的代价，而在那里人家会对你们为所欲为。走吧，你们将不再是自己的女主人。人家会让你们进随便什么修道院。不要给 8 天预告。走吧，去乡下。去见 Grignes 主人，那是一个好家庭，而且这不会使你们花得贵，你们会有牛奶和好的空气。勇敢些，我的心在对你们说话，不是我的嘴。

克莱芒丝的第一封信，正好写于罪行翌日的两年前。这是一种巧合吗？再一次，我们声明自己无力回答，并期待如此种种无力的累积最终会让某种光亮透出来！不过，我们会注意到，这些信并没有被克里斯蒂娜和莱娅扔进垃圾桶，而是被悬置在那里，

1931 年 2 月 3 日的信极其含蓄。在信中，克莱芒丝表达了她对女儿们的疼爱，声明自己愿意重新接纳她们。她区分了上帝之路与人之路，但不知道她所暗指的“嫉妒”是什么。她提醒克里斯蒂娜和莱娅警惕那些表面上的朋友，事实上却是敌人；但再一次，不知道她指的是哪些人；“那些最切近地围绕着她们的人”这一表达

既可以指她自己环境中的某个人（例如，暗指她曾经历过的一种经验），也可以指两姐妹的环境；在后一种情况下，不能排除她所指的是 L. 家。

这里必须记起，埃米莉亚，她的母亲曾把她托付给 Bon-Pasteur，十三年前已经成了修女，而她的决定伴随着同家人的彻底而最终的决裂。我们也会记起，甚至克里斯蒂娜也曾希望进入修会，但她的母亲（克里斯蒂娜当时未成年）反对这件事；此外，在被安置到第一位雇主家以后，克里斯蒂娜曾多次试图最终去到 Bon-Pasteur，直到面对这些努力的徒劳时才终止了那些行动。

克里斯蒂娜和莱娅进入修道院的可能性，在第二封信中被明确表述出来。这一次，克莱芒丝明确说，是神父们在反对上帝：她拒绝以宗教仪式下葬（这封信具有一种近乎遗嘱的价值）。更一般地说，天主教徒被呈现为不可信任的对象："一个人越诚实，在天主教徒中间就越不幸。"然而，克莱芒丝把她两个女儿继续在 L. 家工作，同她们成为修女的危险联系在一起。而这两个主题（雇佣与宗教圣召）的衔接，其地平线是一种支配的问题。成为自己的主人，就是处于能够对天主教徒的召唤说不的条件之中；反过来，失去对自己的支配，就变成失去那种使人能够抵抗这一召唤的清醒。按照克莱芒丝的这封信，似乎存在一种紧急局势。于是她把自己全部的疼爱都压在天平上，以便使女儿们立即离开 L. 家："我的心在对你们说话，不是我的嘴。"

难道 L. 家的人，尤其是夫人，鼓励克里斯蒂娜和莱娅进入修道院吗?

这里摆在台面上的问题，无非就是儿童被拐夺的问题。事实上，撇开那些极度虔诚的家庭不谈，一个孩子进入修道院，是被体验为一种捕获。在这一点上，社会承认的宗教占据着一种非常特殊的位置，它们享有一种独特的特权。事实上，必须注意到，进入宗教使一个孩子同他的家庭分离，其激进程度远远超过通常而言婚姻所造成的分离；

基督的话语从来不会缺席于这样的决定："如果有人到我这里来，却不恨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加 14/26）。为了在今天对这些领域中所涉及的东西有所估量，只需把这些事情移置到教派的层面。父母声明宁愿看到自己的孩子死去，也不愿知道他加入了某个教派，这并不罕见。还可以参照那些卑劣的绑架：整个警察机器、传播媒介的一切资源都为一个家庭服务，并向它献上自己的关切。而区分教派（或实施敲诈的团伙）的东西，于是可以概括为这唯一的要素：当拐夺是一座官方教会所为时，它被合法化，而且没有人发现有什么可批评之处，或者至少，没有人处在能够表达一种不赞成的位置上；而在所有其他情况下，这种不赞成则毫不迟疑地表现出来。

两位女儿同她们母亲的决裂中所涉及的，难道正是一次可能进入修道院吗？目前，没有任何东西允许我们肯定或排除这一点。从克莱芒丝一侧看见的分离，也许并不是克里斯蒂娜和莱娅所决定的那一种。于是，例如，在克莱芒丝的版本中，人们看不出她从女儿们口中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会有什么效力："今天早上我们看见一位像你的女士。"

我们还要考察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关于她们同母亲决裂所说的话。当然，非常少；但这对我们来说将构成又一个理由，去近距离研究它们。

关于她同母亲不和的动机，克里斯蒂娜没有对预审法官说任何话；然而，在 2 月 3 日的审问中，她确实详细描述了她的母亲、她自己以及她的各位雇主之间的游戏。在说过她母亲没有抚养她、提到母亲把她托付给伊莎贝尔·帕潘、随后又提到 Bon-Pasteur 修道院之后，她谈到她的各位雇主。她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他们，要么因为报酬不好（她把所有工资都寄给母亲；而且看起来主要正是母亲因为这个理

由促成了这些更换雇主），要么因为雇主们的要求非常苛刻（而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是克里斯蒂娜自己促成了这些更换）。不过，即使在这些情况下，她的母亲至少有几次也进行了干预。于是，在一次较晚的审问中，法官向克里斯蒂娜讲述了如下故事：

> “勒芒的 M. 夫人，从 1925 年 3 月 7 日到随后的 4 月 21 日雇用了您和您的妹妹，而且她还对你们的服务非常满意；当她向您提出意见，说有一个星期五您在市场上待得太久时，她听见您生硬地回答她；在一种勉强压住的怒火影响下，当您的女主人走开时，您便在厨房里大声说话，并把炉灶上的盘子弄得哗啦作响。几天以后，您的母亲得知此事，便来接你们。

> ——克里斯蒂娜：我记得在 M. 夫人家里的这件事。”

大多数证词相互一致：克里斯蒂娜是一名工作做得很好的女仆，但要向她提出意见并不容易，她历任女主人在对她提出意见之前都会三思。看来，当她收到一条她认为不可接受的意见时，她的母亲从不反对她换地方。

但让我们回到克里斯蒂娜在她与莱娅一起在 L. 家待了一个异常漫长的时期时，是如何唤起母亲—女儿们—女主人们这些纽带的：

在进入 L. 太太家之前，我领取我的工资，并把它们交给我的母亲；她不时随后给我一点钱，用来买我的小东西；后来，我就自己保管。关于这一点，我母亲对 L. 太太不是很满意，因为正是她让她注意到，让我们稍微享用一点自己的工资会更好。我再也没有把我的工资寄给母亲；我把它们存进了一本储蓄银行存折里，而且，为了让我母亲不至于太不高兴，我不时给她一些小礼物。无论如何，我母亲试图让我离开这个地方，她向我指出我的女主人非常苛刻。尽管这有一点真实，但我知道到处都有麻烦，所以我从来不愿听她的，并留在这个地方；总之，我们在那里受到很好的对待，吃得也很好。服务之外，主人们对我们有点疏远。L. 太太从不跟我说话，L. 小姐也不说。只有夫人会为了向我提出意见而跟我说话，有时是或多或少有道理的责备。在进入她家服务时，我就被告知，不应期待她方面有任何亲近，那是这所房子里的规矩。清洁做完后，她到各处检查

而最小的一粒灰尘都会引来意见，以及对同类先前事情的追忆：她还觉得肉铺和杂货店的账单涨得很多。但从我和我妹妹的观点来看，并不是这些做法使我们一点点被激怒。使我“把她打发掉”的是……（这里接着是对罪行展开过程的一段描述）。

克里斯蒂娜的这一陈述，在她同母亲的决裂这一点上是逆向而行的；作为决裂，它甚至没有被唤起。然而，至少在一点上，它确认了母亲的说法：克莱芒丝坚持让她的女儿们离开 L. 家，她这样要求她们，而两姐妹拒绝服从她。克里斯蒂娜没有说到，她们可能进入修道院这一点，是否就是其母亲与 L. 太太之间所涉及的东西。无论如何，她提到，正是关于后者直接对她母亲的一次干预，从那一刻起，两姐妹停止把工资交给她。这里，L. 太太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她不只是一个严厉的女主人，而是一个关心她女仆们的财产、甚至关心她们福祉的女人，一种正义关切推动她希望在女儿们和母亲之间建立一种更正确的纽带。从某种意义上说，L. 太太在这里介入了一件不关她的事：她的女仆们如何管理

自己的工资，并不是她的事。尽管她的干预是有效的，但只有承认她的女仆们在她们与女主人之间承认了一种纽带，且这种纽带属于不同于严格功利关系的另一个秩序，并处在主人对雇员的亲近关系之外，才能设想这一干预；这种纽带在开头已经被宣布。

在这个意义上，最初的澄清（“不要期待我对你有任何亲近”，L. 太太据说曾这样说）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些声明：它们预先说出了实际将要发生的东西，但以一种否定的形式；就像那句观察：“哎呀，我已经很久没有生病了！”第二天人就躺在床上了。

在这样的语境中，波莱特·乌迪耶将从克莱芒丝的一位姐妹口中得到的信息并不显得难以置信；据她说，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在她们彼此之间相处时，称 L. 太太为“妈妈”。

如果说克里斯蒂娜和莱娅进入修道院所涉及的东西，在使 L. 太太同

克莱芒丝相对立的冲突中是决定性的，这一点在这里没有得到确认，但也没有被克里斯蒂娜所说的话排除：L. 太太既然会为了她女儿们的利益、就她们的工资问题而介入并向克莱芒丝说话，那么她完全也可能就她们的圣召问题做同样的事。

不管怎样，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始终向法官断言，她们没有任何理由怨恨自己的被害人，而且凭她们所拥有的积蓄，如果她们在 L. 家服务时并不满意，她们本来确实可以离开 L. 家。

1933 年 7 月 26 日，当被问及同母亲的决裂时，莱娅也回答说：“我母亲用她对我提出的意见使我不快。”我们对莱娅同克里斯蒂娜的纽带所知道的一切，完全使我们有理由把这里涉及的我 [moi] 看作一个类属的我 [moi]，既是克里斯蒂娜的我，也是莱娅的我。而“意见”这个词本身，把我们另一方面对克里斯蒂娜所知道的东西汇合起来：她不能容忍（我不是说“忍受”）女主人们方面任何最轻微的意见（这并不妨碍她忍受她们，因为恰恰是她越不容忍她们，就越是在忍受她们）。

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同精神病学专家们的谈话，是否允许我们更进一步明确 1929 年她们同母亲的决裂是什么？专家们就这一点询问了克莱芒丝、一些证人，随后询问了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必须指出，克莱芒丝没有向他们谈到，她担心看到女儿们进入修会生活，也没有谈到 L. 太太关于她们工资的干预：

> 2 月 9 日（案卷第 53 页），中央警察局长先生问她：“是否属实，大约两年前，您曾对居住在 Coulaine 的 Barrier 夫人说：‘如果我的女儿们不离开 Lancelin 夫妇家，也许会发生一场不幸。’”——她回答：“也许我对 Barrier 夫人说过类似的话，但我的话的意思如下：看到我的女儿们远离我，并且肉眼可见地消瘦下去，我担心她们会生病，这就是我预见的不幸，也正因此我才如此执拗地想把她们从那个使她们非常疲惫的地方弄出来。显然我没能达到我的目的，因为我的女儿们不愿见我。”

L. 先生的陈述具有双重重要性：它既是关于同母亲决裂在两姐妹身上造成的变化的一份证词，也是一个雇主的证词，他观察到这一决裂改变了主人/雇员关系：

> “莱娅和克里斯蒂娜·帕潘姐妹，在我们家服务大约七年以来（日期应当容易准确确定），始终从服务的角度

> 使我们完全满意。”曾有“关于母亲与女儿们之间发生不和以及她们之间几场非常激烈场面的知悉；我们曾声明不愿掺和其中，并要求姑娘们不要让母亲到我们住所来向她们提出要求。当然，这种同母亲的不和使姑娘们的性格变得尖刻，她们变得阴沉而沉默寡言。自这个时期起，除了服务之外，我妻子和我都不再同她们交谈。她们有礼貌，我们感觉到意见会被恶劣地接受；而由于我们的家务服务做得很好，没有任何可批评之处，我们便保持了耐心。”

也许“保持耐心”并不是适合新处境的回应。但让我们注意，L. 先生在这里所说的东西是巨大的：二十八个月里，除了严格功利的交换之外，两个整天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群体从不彼此说话。L. 先生在这里不敢说，他从不跟两姐妹说话，而交流的中断只涉及 L. 太太与她的两个女仆之间的纽带。说实话，这是一个非常有力、决定性的论据，支持这样一个推测：两姐妹在 1929 年 10 月第二个星期天遇到的、并且她们本应注意到其与她们母亲相像的那位女士，不是别人，正是 L. 太太。这里，一个特征就足以使这种认同成为确定的（例如，那一天 L. 太太曾就清洁向克里斯蒂娜或莱娅提出一条意见）。此外，“意见”这个词本身，作为克里斯蒂娜既不能从母亲那里也不能从女主人们那里容忍的东西，已经为她见证了这两个形象的近似。从一位女主人自认为有权向她提出一条稍微强调的意见的那一刻起，克里斯蒂娜就会离开她。

两姐妹朝向 L. 家的纽带装配〔参见第 75 和 76 页〕，在我们看来，现在回应了克里斯蒂娜的愿望：要同另一位母亲打交道，同一种更可实行的母性形态打交道。就此而言，L. 先生的在场固然沉默，却是有效的；相对于她父亲的彻底缺席，这对她来说是一种获益。同样，L. 太太照料她的女仆们的幸福（甚至为了让她们能够支配自己的工资而向她们的母亲出面干预），向她们证明了一种对她们来说闻所未闻的情感。但这一点只有维持到重复同这种母亲转移（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相会之时为止；这种结合固然不可能不发生，而且它就发生在 1929 年 10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当时，她们依托一个特征，把 L. 太太认同为与克莱芒丝属于同一“种类”。从那一刻起，克莱芒丝就

更加彻底地放到一边（这就是决裂的“无冲突”），因为从那一刻起，L. 太太占据了她的位置。而在 L. 家中的紧张程度，又提高了一级。

我们对同母亲断裂的研究在这里揭示出一种对象变更，因为现在它被认出是一种双重断裂。凭借同一个运动，克莱芒丝·德雷被最终移出回路，而两姐妹同 L. 夫人的纽带也被打断了，因为这一纽带呈现出一种更文明化的母性模式。从那一刻起，占据克莱芒丝位置的是 L. 夫人，而克里斯蒂娜则占据 L. 夫人的位置，成为莱娅的爱恋着的母亲。

在说出：“三年以来，她们已经不再见我了”[参见第 153 页]时，克莱芒丝唤起了同她女儿们的断裂。她还说 [参见第 154 页]：“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女儿们不再想见我。”再一次，回答就在问题之中，因为问题指明了目光的功能。随着实在的断裂，她从自己的女儿们那里以倒置的形式接收到她自己的讯息：不再见她，就是向她表示，她把自己的母性缩减为那种投向女儿们的目光，而她那些永无休止的评语正扎根于这种目光之中。正是在 L. 夫人的目光之下，从那一刻起，将会演出（在场景设置的意义上）一种较少审问式的母性模式。双重断裂可以示意如下：





之前：场景；凝视；L.夫人；克莱芒丝；克里斯蒂娜；莱娅。

之后：场景；凝视；克里斯蒂娜；莱娅；L.夫人。

Rinjard 先生见证了这一新处境所特有的紧张，见证了它的演变面向；两姐妹越来越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中，退缩到自身之内，以至于不再回答别人向她们提出的问题：

> Rinjard 先生（文件 64），其受害者们的兄弟和舅舅，声明说：“我的妹妹（Lancelin 夫人）似乎对她女仆们的服务感到满意，而我的印象是，她是因为她们所做的工作而容忍她们那不太讨人喜欢的性格。所谓不太讨人喜欢的性格，我是说，她们给人的印象是封闭的；而且我注意到，尤其是在最后六个月里，对于我可能向她们提出的问题，她们只用一个‘是’或一个‘不是’来回答我。甚至有一天，我问是否发生过什么事件，得到的回答是没有。”

精神科鉴定专家们不顾这一点毫无可信性而确信同母亲的断裂是金钱问题，因此几乎没有把他们的调查推进到这一点上：

> 关于她的母亲，情感性明显减弱。在某一时刻，谈到德雷夫人时，克里斯蒂娜对我们说：“这个女人”；但此外她还解释说，如果在她和母亲之间通常的感情已经消散，那是由于她母亲本人对她的态度。“她，”她说，“无论对我还是对我妹妹都一点也不温柔，她不断责备我们，对我们令人不快；而当她看见我们时，就是为了用批评压得我们透不过气，尤其是在整洁和交出的钱的问题上。”关于这一点，她向我们确认，是她母亲指挥她和她妹妹，替她们选择工作地点，并且每当她认为她们赚得不够多时，就把她们从那里撤走。

在这里再次，如 Logre 医生所观察到的，莱娅的陈述严格重复克里斯蒂娜的断言：

> 无论在莱娅还是在克里斯蒂娜那里，情感性都呈现出某些特殊性，其意义在于，它以某种方式是选择性地指向她的姐姐克里斯蒂娜的。

> 莱娅同她母亲之间的情感纽带非常松弛，但这似乎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德雷夫人并没有抚养她的女儿们，没有照管她们的教学，也没有照管她们的教育；而且，在最近的不快之前，她几乎只是为了替她女儿们从雇主那里争取更高工资才介入。

> 莱娅承认已经中止了同母亲的一切关系；她说，母亲对她并不“和善”，“总是用责备压得她们透不过气，总是训斥她们，批评她们的穿衣方式”；然而，关于她的童年，她没有保留什么坏的回忆，除了她母亲“威胁她和她姐姐要把她们送进救济院”；自从她入狱以来，她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见母亲的愿望。

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对断裂本身没有说什么：她们把自己的评论限于这样的观察，即她们的母亲用



Christine y Léa vistas por su madre

她们的母亲眼中的克里斯蒂娜和莱娅

批评压得她们透不过气，尤其是关于她们的整洁。在这些说法中，没有任何东西会使我们把同母亲的断裂分析为在 L. 夫人身上建立一种母性转移这一点失效。此外，这条线索使我们能够定位所谓的市政厅事件：它是一种企图——未遂的企图——要从这种母性转移中解放出来，因为这种转移如同一切转移一样，意味着一种禁闭。

1931 年 8 月底、9 月初：市政厅事件

那一天，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去了勒芒市政厅，并遇见了当时担任市长的 Le Feuvre 先生。她们的请求是什么？她们这一行动想要达到什么？对她们作出了怎样的回应？对于这些问题曾有不同回答。让我们首先汇集同这一事件有关的材料。

我们先注意到，人们很快就知道了这一事件；犯罪发生两天后，《萨尔特报》（La Sarthe）写道：

两年前，在市长办公室

> 两年前，帕潘姐妹特意穿上漂亮衣服，手上戴着长长的白手套，出现在 Arsène Le Feuvre 先生的办公室里；他当时是勒芒市长。

> 她们在他面前提出了奇怪的断言，指控若干人

> 迫害她们并骚扰她们。由勒芒治安督察员采取措施所作的一项迅速调查，很快表明所有这些说法不过是谎言。

> 不过，由于这两个姑娘当时的态度显得可疑，警长先生便将此事通知了 Lancelin 先生。

Dupuy 警长以下列措辞记录了这一事件：

在布吕耶尔街及其周围，帕潘两姐妹并不为人熟知，她们从不和任何邻居说话，也不

甚至不同邻近房屋里的女仆说话；

然而，她们是

被认为勤劳、干净而认真，但性格沉默寡言、阴郁。她们的行为从未招致批评；

每个星期日，她们一起去大教堂参加八点的弥撒；她们不去舞会，也不去电影院，人们不知道她们有什么朋友。有些人声称她们害怕男人，而且是癔症患者。她们形影不离。几个月前，我亲自确认，这两个姑娘，尤其是年长的克里斯蒂娜，有些不正常。那是在 1931 年 8 月底或 9 月最初几天：两姐妹出现在勒芒市政厅，并请求得到市长 Le Feuvre 先生的接见；她们被带到他的办公室。克里斯蒂娜向这位行政长官说出了一些使他惊讶的断言（因为莱娅只是赞同她姐姐的话），她指控他不但没有保护她们，反而损害她们。市长先生让人把她们带到我的办公室：我无法获得关于她们针对 Le Feuvre 先生的申诉的明确说明。我让人在街区进行调查，收到的情报同她们犯罪后收到的情报一样。我当时已

经形成了一个看法：这两个姑娘是被害妄想者。由于 Lancelin 一家正在度假，无法听取她们雇主的意见。他们回来后，Lancelin 先生来见我。我向他说明了他的女仆们在市长先生面前所作的交涉，以及她们在我办公室里的态度。Lancelin 先生并未否认她们有点古怪，但他补充说，从服务的角度看，她们使他们完全满意，他不能解雇她们。我冒昧地对他说："如果我有这样的女仆，我不会把她们留很久。"Lancelin 先生离开我的办公室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完全信任这两个姑娘。

市政厅事件的当事人在十八个月后受到讯问，以下是他们能够作证的内容：

> 勒芒前市长 Le Feuvre 先生声明："当我还是勒芒市市长时，我记得曾在我的办公室接见过帕潘两姐妹。我无法确定日期。使我震动的一点是她们过度兴奋的状态。为了让有人在场参与这次谈话，我叫来了市政厅秘书长 Bourgoin 先生。我不记得我们相互说了哪些话。我记得的是，她们对我谈到迫害。我尽我所能使她们平静下来，并且为了向她们保证更大的信任，我请她们以我的名义去见中央警长先生。"

> 勒芒市政厅秘书长 Bourgoin 先生（文件 67）声明："我记得曾在勒芒市长 Le Feuvre 先生的办公室里见到帕潘小姐们。我无法确定日期。我完全不记得这些小姐说过的话；

> 她们的语言想必是不连贯而奇怪的，因为我向市长作了如下评论：'如您所见，她们疯疯癫癫。'"

> Lancelin 先生就此说："大约 18 个月前，她们在勒芒市政厅指控勒芒市长 Le Feuvre 先生，我不太清楚指控了什么，并且威胁了他。中央警长先生使我了解了这一事件，事件发生在我们一次外出期间；我回来时，他对我说，我的女仆们在他看来非常激动，但我不记得他曾建议我不要让她们继续为我们服务。"

> Rinjard 先生声明："犯罪之后，在最近这段时间，我听人谈到两个帕潘姑娘曾去拜访当时的市长 Le Feuvre 先生，那是在两三年前。如果我的消息没错，她们曾给他写信，抱怨自己被扣留。Lancelin 先生和夫人当时正在度假。Le Feuvre 先生叫她们来，请她们作出解释。我并不确切知道她们说了什么，但我相信中央警长的部门进行了一项调查，而我不知道调查结果是什么。"

这些证词值得作几点观察：

* 事实上，首先看起来，Dupuy 警长的证词最为可靠。市长和他的秘书长陷入混乱并感到不快，于是求助于他。他接待了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并注意到他无法让她们明确说明她们对市长的申诉。他把调查推进得足够远，以至于决定叫来 L. 先生，把调查结果告诉他。他甚至允许自己给 L. 先生提出一个建议——无疑是鉴于后者对他告知的事情表现出某种听而不闻（L. 先生只是承认她们"古怪"）。奇怪的是，另外两名证人几乎不记得交谈过的话。他则不是。

* 如果把 L. 先生对警长的回答同他本人后来要向预审法官所作的声明相对照，这个回答就显得奇怪。在同警长会谈的时候，他两年来一直知道：两姐妹在家里已经不再同任何人说话，她们完全退缩到自身之内。他的连襟也注意到了这种演变。然而，他没有把这一点告诉警长。他甚至更进一步，把事情轻描淡写：在警长曾说到"迫害"的地方，他在犯罪之后却声明，警长只是告诉他说克里斯蒂娜和莱娅"激动"。

* 克里斯蒂娜提出的指控（又一次由莱娅复制——在 Logre 医生谈到“心理对子”之前，警长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加倍）是明确的：市长不但没有保护她们，反而损害她们。她的表述伴随着一种被 Le Feuvre 先生观察到的兴奋状态[参见“我使她们平静下来”]。Bourgoin 先生（“如您所见，她们疯疯癫癫”）和警长（“我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看法：这两个姑娘是被害妄想者”）得出了同样的结论。L. 先生明确说，这种兴奋相对于市长具有威胁的价值（市长声明：“使我震动的是……”）。

精神科鉴定不能不就这一事件表态，尤其是为了把该案作为迫害性疯狂病例来讨论。为此，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受到了讯问：

> 我们已在情况资料一章中，并在一个专门标题下，汇集了我们称作勒芒市政厅事件的内容。我们想从克里斯蒂娜本人那里知道那一天发生了什么。她向我们解释说，她曾到 Le Feuvre 先生的办公室，“为了设法使她妹妹获得解放”；从这些解释中可以得出，当时她同母亲不和，并且想让莱娅享有更大的自由，能够（她这样相信，而这正是关键点）自由支配自己的钱，于是希望设法使她获得解放。此外，她没有得到满足；但现在她并不十分确切地知道解放究竟是什么，她说自己已经不记得在市政厅里可能说过哪些话；当我们向她指出，她据说曾抱怨，曾谈到来自她的雇主 Lancelin 的迫害时，她否认别人归给她的话，并对我们说：“如果我有什么可抱怨的，我就不会留在我雇主家里。”“我很高兴有我妹妹同我在一起，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争吵。我喜欢 Lancelin 家。如果不是这样，我早就走了。”

> 我们已在情况资料一章和克里斯蒂娜的检查中谈到“勒芒市政厅事件”；我们想知道莱娅对此怎么想。她对我们说，她曾同克里斯蒂娜一起去见 Le Feuvre 先生，因为她想获得解放；另一方面，她并不很明白那究竟是什么。当我们问她时，莱娅解释说，这一举动本可以使她不再和母亲一起去，并因而把她的钱留在自己身边；当我们向她指出，她的姐姐据说曾在市政厅抱怨她在 Lan-

> 她说不记得这件事，并且总是回到同一句话上：

> 如果我们不喜欢她家，我们早就走了。”

以下就是鉴定根据这两次访谈就市政厅事件所说的话：

> 我们已经看到，帕潘两姐妹在 Le Feuvre 先生面前所作的交涉，从……的观点来看，是十分正常的

它所引发的；这是为了取得解放，这一手续的意义和价值，两姐妹中无论哪一个都并不确切知道；她们二人都向我们断言，在那个时候她们没有什么可抱怨 Lancelin 夫妇的（另一方面，后来也一样），而莱娅和克里斯蒂娜一样，都告诉我们，如果她们有什么理由对 Lancelin 夫妇不满，她们只要离开就行；因此帕潘姐妹否认曾为了抱怨她们的雇主而去市政厅。

勒芒前市长 Le Feuvre 先生的回忆并不精确；他记得帕潘姐妹的“过度兴奋状态”，以及她们据说说出的“迫害”这个词；但没有任何突出的事实。

市政厅秘书 Bourgoin 先生不记得说过的话；而在谈到两姐妹的语言时，他谨慎地使用了“想必是”这个表达，一个条件式而含糊的词，而不是用“是”来限定她们的话。

Lancelin 先生似乎对这一事件没有精确的回忆；中央警长先生所给出的、不要把帕潘姑娘们留在他家服务的建议，想必既不很断然，也没有用很有说服力的评论加以阐明，因为 Lancelin 先生对此不记得了，也没有察觉到她们态度中有任何变化。

中央警长先生没有提供更多精确说明，因为无论在他向预审法官所作的证言中，还是在他的笔录中，他都只是叙述一个他并未亲历的场景的回忆；而当他说："克里斯蒂娜·帕潘向这位行政长官说出了使他惊讶的话；她指控他不但没有保护她们，反而损害她们"时，他只是把别人转述给他的一次谈话，在十八个多月之后记录下来。

那么，从我们所关心的严格医学观点来看，我们不能采纳中央警长先生所使用的那些措辞："这两个姑娘是被害妄想者。"事实上，要使这一评价能够引起我们的注意，中央警长先生本应提供有关两姐妹态度的精确说明，并叙述她们说出的那些话；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中央警长先生在其证言中既不是肯定的，也不是断然的，恰恰相反，而是相当谨慎的，因为他写道："我形成了一个看法"，由此表明那是他个人的感受方式，而不是他所拥有的一种确定性；设想如果帕潘姐妹曾经外显出真正的被害妄想，中央警长先生必定会记得那些妄想性陈述，这并非不合情理；他不会满足于给 Lancelin 先生一个建议，而会极力坚持要求那两个年轻女子接受一次精神检查；事实上，中央警长先生由于其职务，习惯于为精神错乱者介入，不至于无法区分两个也许在一次争论后有些紧张的年轻女子，和精神方面患有严重疾病、受到侵害的年轻女子。

我们已经详尽陈述过的、发生在勒芒市政厅的事件，在涉及帕潘姐妹的精神状态方面，在我们看来毫无重要性。事实上，这一事件中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能够认为，在那个时期帕潘姐妹呈现出某种精神障碍；并且，在缺乏精确说明的情况下（如果曾经有这些说明，它们本不会不被报告），我们可以断言，帕潘姐妹在那个时刻并不是该术语的精神病学意义上的被害妄想者。

首先会注意到，在两姐妹同市长、随后同警长会面时，甚至在犯罪之前，绝非涉及一项让莱娅脱离监护（emancipación）[注]的请求。此外，为这一请求所援引的动机也站不住脚，因为克里斯蒂娜和莱娅自1929年以前就已经能够支配自己的工资。当然，没有人认为有必要把这一点说清楚（而且令人震惊的是，无论在预审方面，还是在精神病学研究方面，都可以看到对获取精确信息是多么缺乏意愿），但看来可信的是，L.夫人对克莱芒丝所作的干预，只可能发生在1929年的决裂之前。

> [注] emancipación 在这里指脱离监护、取得独立，也保留"解放"的词义；作者在这一节继续将其同"服从"（sumisión）对读。正文保留法律行动的具体含义，不把它只译成一般政治意义的"解放"。

鉴定报告由于没有考虑到陈述行为的维度而彻底失败了，因为它所记录并予以认同的克里斯蒂娜和莱娅的断言，是在越入行动之后出现的，而且是在克里斯蒂娜首先关切的是要认领这一行动的时候出现的。克里斯蒂娜拒绝一切可能使人相信她没有做她所做之事的东西；然而她的位置是微妙的，因为她并不因此就签署她的行动。我们可以把这一位置的诸要素联结起来，说这个位置只是表面上呈分裂状：对她而言，问题在于不要抹去它们。[注2] 解放是克里斯蒂娜当下的发明，是一个谎言，如果人们把真理理解为 *adequatio rei et intellectus*，即事物与智性的符合；但这是一个说出真理的谎言——若把它作为半真理（拉康）来倾听——因为解放正是服从的准确对位，而服从事实上正是她与母亲之间

纽带的特征，并且促动了被害妄想式的控诉。如果市长不是保护两姐妹，而是威胁她们，那么这在谵妄中就是使她们服从，而不是使她们解放。在这里，必须决意去听“母亲”，[注3] 以便在同音中找到〔参见让·阿卢什：《偏执的不和》。载：《逐字逐句》。Edelp，布宜诺斯艾利斯，1994〕

> [注2] 在其他材料中，克里斯蒂娜向专家们声明如下：“我等待受审，我有信心，这取决于事情将如何被看待，我会被惩罚，直到脖子被砍断，我无所谓，我杀了人，对我来说更糟。”
>
> [注3] [mère“母亲”和maire：“市长”同音。[译者注]]

这个本应把两姐妹带到 Le Feuvre 先生办公室的能指载体。

“莱娅的解放”这一事后（après-coup）的发明，使我们能够明确两姐妹向市长采取行动时的意向。就母亲的监护而言，莱娅在这里显现为克里斯蒂娜的一个替身，更准确地说，是克里斯蒂娜本人之所是的实在支撑，即一个处于监护之下的人。那个被称为“莱娅”的对象，服务于克里斯蒂娜，成为她向市长提出自身要求的支撑：让他停止迫害她（既是克里斯蒂娜，也是莱娅；是作为克里斯蒂娜的莱娅；也是作为克里斯蒂娜而言）。

在这里，与母亲决裂前后各个人物相应位置的图式得到了确认[参见第165页]。事实上，这一图式确认了莱娅的消失（在“之后”已不再有两姐妹），因为她变成了女儿“克里斯蒂娜”，成为一个母亲之温柔情感的对象——这一位置由克里斯蒂娜占据——处在一个母亲的目光之下；这种温柔正是指向这个对象，以便训诫她。

如此，当拉康把市政厅事件置为“犯罪之前妄想观念之表达的唯一痕迹”时，我们便有条件同意他。我们难道还必须补充说，一条痕迹就已经足够了吗?

1930年：一片掉在地上的纸

今天，没有人知道人们是如何开始提到我们将要处理的这个事件的。是克莱芒丝·德雷向《La Sarthe》的记者谈到它的吗？这一推测最为可信，因为该事件“指控”了 L. 夫人，另一方面，也很难想象克里斯蒂娜和莱娅会在犯罪刚刚发生之后，以她们当时的状态叙述此事。然而，它确实在案卷材料中第一次被提及，是从2月3日的讯问开始，并且是在预审法官的主动提问下：

> 预审法官提问：在您的妹妹和Lancelin夫人之间，难道没有发生过一个小事件吗，当时你们的雇主住在省政府广场?

> 克里斯蒂娜：有，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至少2年前。我的妹妹曾告诉我，Lancelin夫人曾掐她，为了让她

捡起地上的什么东西；而我，当时在餐厅里，听见我妹妹敲房间的地板，后来她告诉我，当时Lancelin夫人一边掐她，一边强迫她跪下来捡什么东西；她给我看了掐痕，并对我说：“希望这种事不要再发生”；她没有再向我谈起这个事件，我以为它已经被忘记了。我们做了我们所做的事，并不是因为这个。

2月7日，莱娅向预审法官给出了更详细的描述：当被问到："为什么您和您的姐姐会那样行动？"时，她回答说：

那天傍晚，当她听到保险丝烧断而举起双臂时[注]，我害怕 Lancelin 夫人会对我和我姐姐施加暴力，就像她住在省政府广场时曾经做过的那样；我在她家已经有1年半了，有一天，她看到地上有一片从废纸篓里掉出来的纸。她为此恼怒。当时我正在打扫楼梯，她叫我过去，当我靠近她时，在那片纸所在的小房间里，在我来得及料到她的动作之前，她抓住我的左臂掐我，强迫我跪下来，对我说："这里有一片纸"，然后她放开我，什么也没说就去了她的房间。她这种做法使我惊讶，并深深地羞辱了我，而且它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姐姐，并对她说："她若再这样做，我就自卫。"我姐姐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女主人没有权利这样对她们的女仆施暴。同样，我也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母亲，她也对我说，如果这种事再发生，我就必须自卫。犯罪那天傍晚，当我看见 Lancelin 夫人在听到保险丝烧断时举起双臂，我姐姐以为她就要对她施加她曾对我施加过的同样暴力，Lancelin 小姐也是如此，而我也有同样的恐惧；当她举起双臂时，我们便迎上前去。我完全没有想到，在听到保险丝烧断时，Lancelin 夫人会想要扑向我们，给人一种仿佛在说我们什么也干不好的印象。

> [注] 首句底本印作 levanto（无重音，通常是"我举起"）；本段稍后明确重述，举起双臂的是 Lancelin 夫人。中文按后面的重述恢复为"她"，原文仍保留实际印刷词形。

精神病学鉴定报告尤其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这一事件并不重要，因为克里斯蒂娜和莱娅据说已经不再想到它了（1）：

稍后，在我们报告中专门论述莱娅的部分里，我们提到了我们所谓的："省政府广场事件"，并且我们曾在克里斯蒂娜面前提起它。她向我们声明，Lancelin 夫人做了一个出于恼怒的动作，她的妹妹确实曾经抱怨过，她可能曾说过："不能任人摆布"，但无论如何，她断言："她没有赋予这个事件任何重要性"，并且总是补充

同一句话，像主导动机一样反复出现："如果我们不喜欢待在Lancelin家，我们早就走了。"

莱娅向我们确认，在1930年（正如2月7日讯问笔录中所叙述的那样），她当时在 Lancelin 夫人家，刚刚打扫完，曾把一片从篮子里掉出来的纸留在地毯上；Lancelin 夫人叫她过去，抓住她的左肩，并用力掐她，使她跪下，甚至跌跪在地，同时叫她捡起那片纸，随后让她离开。

莱娅对这种在 Lancelin 夫人身上并不寻常的做法感到十分惊讶，当天晚上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姐姐，并承认曾对克里斯蒂娜说："下一次，我会自卫。"在预审中，莱娅说的是："她别再对我这样做，因为我会自卫"，这句话在文本上稍有不同，但其精神完全相同；克里斯蒂娜据说补充说："不能任人摆布。"德雷夫人，也就是她的母亲，她在几天后向其谈起此事，也据说给了她同样的建议。关于这一事件，她向我们断言，她此后再也没有谈过这件事，甚至没有对她母亲、也没有对她姐姐谈过，而且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想起过它。

鉴定报告相信克里斯蒂娜的一项陈述，把这一事件定位在1930年。我们在这里看到这项工作缺乏谨慎的一个例子，因为它把该事件题名为："省政府广场事件"，这一名称对应的是 L. 家此前的住址，而1930年他们已经住在 Bruyère 街（克莱芒丝是在1929年10月到那里去见她的女儿们）。因此，克里斯

蒂娜提供的指示是错误的；关于所谓事件的日期，我们只能保留莱娅给出的指示：事情发生在她被 L. 家雇用1年半之后，也就是1928年10月。此外，这一日期早于两姐妹同克莱芒丝决裂1年，使我们能够承认莱娅可能曾同她母亲谈过这个事件；若是在1930年，即决裂之后，这样的交流是不可想象的。克里斯蒂娜在这里称为“掐”的东西，必须放在它同训诫的关系中来定位。那一天，L. 夫人对莱娅作出一次训诫；但通过掐她的手臂，并这样强迫她跪下（这种暴力并不是“身体的”，如果所谓身体的意思是 L. 夫人在“身体上”比莱娅更强），通过把那个标记着她对莱娅支配的姿势伴随在自己的训诫之中——这个姿势

意味着，她有权处置她的身体——而且，在这具身体上留下一道痕迹时，她就赋予她的训诫一个令其变得不可忍受的维度。为什么？

这是一个事实：一位女主人并非不处置其女仆的身体，因为在她命令其完成的劳动中，女仆的身体被工具化了。另一方面，这身体也会因其工具性功能而被痕迹标记：因洗涤而被腐蚀的双手，因缝纫工作而发红的眼睛，因擦洗地板而挛缩的背部，等等。劳动者把自己交付给这种对自身身体的支配，恰恰只有通过这样一个事实才重新找到其作为人的尊严：他交付自己，通过工资出租自己，因此在他的雇主与他之间有一个最初的约定。他已经明确给出同意，愿意听命行事；而这种同意——它曾经是、并且仍然是他的同意——在使他的身体服从这些命令的同时，扣除了这些命令的爱欲价值。

正是如此，剩余享乐、落在雇主一方的剩余价值，存在于商品之中（商品中介了这种关系），通过商品，雇主/工人的纽带并不等同于那位著名侯爵同朱丽叶的纽带……也不等同于某些其他人的纽带。但是，当雇主直接操纵那具被置于其服务之中的身体时，他就取消了最初的约定，即工人的同意；他由此扣除了我们上文称为“扣除”的东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爱欲重新获得其权利，其比例等同于尊严所受创伤的比例。不可忍受之处就在这里，因为首先，没有任何东西保证工人会选择这个在身体上强迫他的雇主作为性伴侣！

关于这一事件，克里斯蒂娜和莱娅使用“跪下”这个词，以及“跪着”这一表达。只有身体力量才能使某人跪下。除了愿意这样做的爱欲游戏之外，被迫跪下当然具有自恋创伤的价值；但这种羞辱在这里本身还另外是一种惩罚。莱娅犯了一个过失，而 L. 夫人通过当时对她这样行事来制裁这个过失，恢复平衡（或者，如果愿意这样说，恢复稳定化的不平衡），使有罪者给予她能够羞辱她的满足。在任何惩罚中，当然都有这种施加在有罪者身上的自恋创伤的维度，但惩罚通常给自恋留下一条出路、一种恢复的可能性（例如规定女仆要赔偿她们打坏的物品的规则：这种修复，即便是被迫的，仍然可以

然而被接受，因为它处在替换已被毁坏之物的秩序之中）。在这里，那种以掐来强迫莱娅跪下的惩罚，直接伤害了女仆的自恋；它毫无遮掩地以其所是显露出来，于是后者除了吞下被激起的敌意以外，别无他法。换言之，这种形式的惩罚本身并不带有那些会使事件得以被遗忘的要素。

被遗忘，人们知道它并没有被遗忘。但还有更多。不能不认为，在犯罪现场扔下那两个小面包（*pains*）时，莱娅重新实施了她对那片纸（*papier*）的“遗忘”，并由此同 L. 夫人结清了她的账：在她曾无法吞下一次使她梗在胃里的冒犯之处，她重新安置了秩序。这一推测不仅从想象游戏的角度看是可信的；此外，它还被封印在能指之中：



PAPIER
PAIN

PAPI N

[注]

> [注] 图中把法语 papier（纸）与 pain（面包）的字母并置，组合出姓氏 Papin。正文将此作为作者的推测；下一段明确说，这种结合是“我们”所作，并非莱娅所作，不能据图认定她实际完成了一个文字游戏。

这样书写这些能指，我们重新采用了弗洛伊德关于“famillonario”的书写：



FAMI LI AR
MI LLONARIO

FAMI LLONARIO

[注]

> [注] 这里是西班牙语的凝缩词形：familiar（熟悉、亲近）与 millonario（百万富翁）组合成 famillonario。图保留字母的排列，中文说明各词义。

然而，并没有任何东西产生一个笑话，即使那些可能组成一个创造性隐喻的要素被置于某种邻近关系之中。缺少的恰恰是这个隐喻。羞辱是实在的，像犯罪一样实在，像掉在地上的纸或楼梯平台上的小面包一样实在。正如拉康那句话“……仇恨中最陈旧的隐喻：‘我真能把她的眼睛挖出来’得到了字面上的执行”，已经适用于我们正在研究的事件中的隐喻“使其跪下”（因此它们不作为能指而有效，因为它们并不指向另一个能指），同样，莱娅把“Papin”这个姓氏引入L.家，也不具有引入一个专名的价值；它的转写失败了，它两次落空、流产，因为作为实在界中的对象，无论“papier”还是“pain”都没有写出“Papin”；它们的结合，确实可能写出它，却不是由她完成，而是由我们完成的。

然而，由莱娅置入场景的这些对象之名称的字面性，足以迫使我们在其特殊性中研究纸片事件，同时也禁止我们把它化约为仆人与雇主之间社会冲突的一般性，即便另一方面我们知道，那些将要通向人民阵线的年份，也正是工人诉求从雇主那里争取到他们放弃某些做法的年份，这些做法涉及雇员的外表，甚至涉及他们的身体。因此，在帕潘姐妹犯罪九个月之后，人们可以在《La Sarthe》头版读到这个标题："判例：当女仆有跳蚤时，无权剃光她的头发"（1933年11月11日）。这名女仆把她的控诉带到了依法应当前往之处，而帕潘姐妹并非如此，她们唯一被表述出来的控诉，即勒芒市长那一项，完全属于另一种性质。

此外，我们对纸片事件的阅读，使我们能够标出克里斯蒂娜与莱娅位置之间的差异。莱娅被L.夫人的动作击中，她没有忘记它，也没有放弃在机会出现之时重建正义。但除了这一事件之外，无论是在L.家，还是在她们此前雇主家，抑或在我们对她们童年生活所知甚少的材料中，都没有任何东西表明莱娅同克里斯蒂娜一样，不能忍受训诫。要使一项训诫对她而言变得不可忍受，作为施动者的人还必须伴随一个不只是笨拙的姿势，必须有一个补充物，事实上正是这个补充物使它变得不可忍受。在L.家工作的所有这些年里，看来只有一次这类带有这一补充物的训诫；另一方面我们还知道，L.夫人通常以温柔待莱娅，"像对一个孩子"。

作为对位，现在可以圈定训诫对于克里斯蒂娜的价值和范围。每一项训诫对她而言都具有掐的价值，换句话说，它都带着那个莱娅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碰到的补充物。每一项训诫都被接收为不可忍受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携带着这个享乐的额外赏金，而他人正是在羞辱她时取得了这个赏金。克里斯蒂娜并不把训诫接收为旨在从她那里获得更多或更好的工作；训诫的理由存在于大他者的享乐之中，因为训诫的陈述行为本身就足以使这种享乐被现实地取得。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妄想性之处：即每一项训诫都具有这种地位（对莱娅也是如此），这一训诫的动力学是必要的，而不仅仅是可能的。就克里斯蒂娜而言，这里有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妄想性直觉。

克里斯蒂娜对掐的敏感浮在皮肤表面，不可避免且极端。P. Houdyer搜集到的另一个事件可以为此作证，她把它转录在其著作第85至87页；她把它定为1913年11月：

> — 她曾扑向一个厨房帮工，一个跛脚、嘴唇一直裂到鼻子的女人，名叫"Ouin-Ouin"……需要两个修女才把半死不活的"Ouin-Ouin"从她手里拉开！

> 讲述这个故事的是Léontine D……，时隔五十二年。她曾是克里斯蒂娜在Bon-Pasteur的同伴。

> — 克里斯蒂娜的过错之所以更加严重，是因为对方是个残疾人：这是"违反基督教慈善"的行为，您想想，这可不是好玩的事！……等等！"Ouin-Ouin"的两个同伴声称看见了一切，而且还作证指控克里斯蒂娜！她们发誓说曾有挑衅！……据她们说，"Ouin-Ouin"正安静地要把垃圾拿去喂猪。克里斯蒂娜从医务室回来，在洗衣房里与她迎面相遇……"Ouin-Ouin"一句话也没说地经过，这时，突然，克里斯蒂娜转过身来，扑到了她身上……

> 莱昂蒂娜 D……微笑着，打了个响指，有一瞬间又变回了她当年那个姑娘。

> — 好吧，我宁可告诉您，嗯？……这样一件事……本可能让克里斯蒂娜付出很大代价！

是的。“那本可能”。但铃声已经惊动了嬷嬷

玛丽-朱丽安娜。她以那条坏腿所允许的最快速度摇摇晃晃地赶来，鼻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颤得更厉害。

克里斯蒂娜筋疲力尽，脸上为了让她平静而泼的水还在往下滴，她已经无力自辩。她似乎甚至不明白人们问她什么。但人们请那些“证人”重复她们所看见的。

回答立刻来了：

— 这么说，您当时也在洗衣房？……请给我解释一下，您在那里等什么！

两个厨房帮工沉默不语，于是女院长把当天“负责洗盘子”的四个“大姑娘”叫到她面前。卡门 P……——莱昂蒂娜 D……说明说，她“十五岁时因放荡和堕胎被收容”——满怀信心地走上前来，咬着自己的脸颊。

— 是，是。我有话要说……以所有同伴的名义……

“以所有同伴的名义”，她不得不说，“Ouin-Ouin”是个“该死的臭虫”，是那些小姑娘的恐怖，她们害怕她报复，不敢揭发她……从1月1日到12月31日，她都在煤堆旁窥伺她们，把她们的屁股掐到流血！可以去问那些小姑娘！不止一个人能证明。她们只要把内裤脱下来就行！这个……

玛丽-朱丽安娜嬷嬷已经得到了足够的信息，脸色有些苍白，她用一个手势命令大家安静。太晚了！那句评论已经抛出来了：

— 这条母狗，在她自己发痒的地方掐别人！

第6章

第六章

克里斯蒂娜与莱娅：一个心理对子及其错位

“读她们的供词，人会以为是在读双份。”这就是 Logre 医生在阅读帕潘姐妹案卷时将要得出的最有力结论。这一结论将促使他发明两个具有为此案命名功能的术语：心理对子，或甚至是道德二项式。

拉康抓住这个机会，并且把诊断行程推得更远，将这个“心理对子”解释为一种偏执狂，一种没有诱导要素的二联性妄想。然而，并不能据此断定他把这个二理解为由严格相似的要素构成，因为他的文章只以克里斯蒂娜作结：“克里斯蒂娜在犯罪的绝望经验把她从另一个自我那里撕裂出来以前，在她能够——在她第一次幻觉性妄想危机之后，在那场危机中她以为看见自己的妹妹死了，无疑是死于那一击——在让她们对质的法官面前，向她喊出幻灭激情的话语：‘是的，说是啊’之前，她不得不走过多么漫长的酷刑之路。”

因此，把克里斯蒂娜与莱娅的纽带定位为对子，恰恰在它被承认之处，呈现出一个困难。在本章中，我们将汇集与这一困难有关的要素。

首先，应注意 Logre 医生作为读者的评估；事实上，“人会以为自己在读双份文本”：在八个月的审讯过程中，克里斯蒂娜与莱娅的陈述不断成为彼此的复本（在复制品的意义上），即便在其变化中也是如此。



然而，从犯罪当晚起就很明显，莱娅的态度并不是照着她姐姐摹写的，而且她的陈述是来复加她姐姐的陈述，而不是（从不）相反。事实上，在这个对子中，克里斯蒂娜似乎是那些陈述的诱导要素，而她正是作为对子支撑着这些陈述。

犯罪当晚莱娅的神经危机，她拒绝回答

我们已经汇集了[参见第42页]有关莱娅这次“危机”的资料，它发生在对克里斯蒂娜的第一次审讯期间；同样[参见第39和40页]，我们已经转载了对莱娅第一次审讯的报告。

没有任何要素允许重新质疑精神病学专家们关于这次“危机”所达成的结论：莱娅拼尽全力呼唤她的姐姐，竭力要同她会合，并且在被市警察抓住时挣扎。她后来表示，她想“同她姐姐见面，并再次看见她”。与此同时，这并不是克里斯蒂娜的态度：无论她多么亢奋，她都接受回答预审的问题，并给出她对事实的版本。

当然，在犯罪叙述的生产这一点上，* 两姐妹的立场同样并非没有差异。莱娅拒绝回答，并且一开始就声明：“至于我，我又聋又哑。”她如此坚决地保持在这种拒绝之中，以至于让警长公然违背警察审讯最惯常的规则；“您愿意吗，”他向她提议，“让我把您姐姐的陈述读给您听，然后您告诉我是否准

确？”莱娅很容易就完全确认了她姐姐的陈述！她以一种如此强调的方式这样做[参见第39页]，既采纳克里斯蒂娜关于犯罪爆发、随后展开以及其动机的描述，又把克里斯蒂娜归给她的那一部分揽到自己名下，同她一起说两姐妹做的事完全彼此一样，以至于无需多么高明的智者也能意识到莱娅在撒谎。

莱娅把她将自己的话缩减为只是克里斯蒂娜话语再版的忧虑推到了荒谬。这在以下审讯片段中清楚地显现出来[参见第44和45页]：

> “您第一下打在她哪里？
>
> — 头后面。
>
> — 您打她的时候，有没有以某种方式抓住她？
>
> — 有，我用一只手抓住她的头，用另一只手抓住她一条胳膊。
>
> — 可是，在那种情况下，难道您有三条胳膊吗？
>
> — 没有，但我就是照我向您说的那样犯下我的罪行。”

同检察官一样，法官并没有被莱娅的陈述弄糊涂：“我确信您没有说真话。”但对我们来说，也许问题恰恰在于，我们要让自己上当，以便阅读莱娅的这些陈述，跟随她进入她的谎言，从而凸显一种真理，而这种真理位于事实确立之外的别处。

“至于我，我又聋又哑。”莱娅的这个公式并不是作为克里斯蒂娜那里某个相似公式的加倍重复而来的。这句话是含混的。它也在说，就她自己而言，莱娅什么都不想知道，无论如何既不想听，也不想说。她的“至于我”（它唤起黑格尔式 für uns 的真正概念价值），莱娅把它放弃了。她不是为自己说话，而是为克里斯蒂娜说话。但这个公式也可以被听成：至于我，对于我所目睹的一切，我什么也不会说；此外，我也并非没有参与其中。然而，除了简单重复她所听见的克里斯蒂娜的陈述之外，又如何才能什么也不说，“又聋又哑”？通过把自己的陈述缩减为姐姐的陈述，莱娅就比她绝对拒绝听任何东西同时又拒绝说话，更加与她说自己所是的东西保持一致。人们可以想象这样一种缄默会使精神科医生们陷入怎样的窘境。由于莱娅正是这样又聋又哑，也就是说，坚决如此，她使他们免于这种窘境；她交给他们的话语复制足以让他们什么都察觉不到，这证明她确实是“又聋又哑”。

莱娅唯一值得注意的犹豫，唯一一个特征，在那里，她把自己强加给自己的义务显示为可能被解除的。这个反应是：当预审法官对她说：“如果您说出真话，无论为了您姐姐的利益还是为了您自己的利益，都会更好”，她让自己的情绪流露出来，并且没有任何其他回答，就哭了。

因此，我们必须从 Logre 医生“读双份文本”的印象追溯回去，并意识到这份双重文本是一种产物，而不是一个既定事实。

只有在不认识其生产操作时，它才显得像一个既定事实。这一生产是某种精心制作的成果，在其中，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并不承担同一份额。这样的陈述之所以能够相互叠合，只是因为它们是在克里斯蒂娜与莱娅之间这条不对称纽带中作出的。这里所说的“双重”，并不是被衔接为两个相同要素的在场并置，而毋宁是织物及其里衬、原件及其副本、声音及其回声的重叠。

1933年7月11—12日：克里斯蒂娜的第二次“危机”

犯罪次日，克里斯蒂娜和莱娅被关押在勒芒监狱，但最重要的是，她们彼此隔离。《萨尔特报》的记者转述她们对这一决定的反应，写道这“使莱娅悲伤，使克里斯蒂娜愤怒”[参见第53页]。我们看到，在克里斯蒂娜和莱娅那里，并不是同一种主体姿态（随后发生的一切都加深了这种差异），即便从那一刻起，两姐妹开始共同绝食并拒绝上床。精神病学鉴定提供了一些关于这次最初分离的补充细节：

> 克里斯蒂娜在入狱之初的态度，就是

> 我们所观察到的态度；起初，由于她被迫同

> 自己的妹妹分开，她开始想要绝食，并且在五

> 天里，从2月5日到11日，她吃得很少，随后，在11日，她在用餐时与妹妹团聚，便正常进食。

> 莱娅和她姐姐克里斯蒂娜一样，当她被迫同姐姐分开时，也试图绝食，并于2月11日重新进食，也就是说，从她被允许同姐姐一起用餐的时刻起。

> 当人们想把她同妹妹分开时，监狱官员 Gelly 女士对 Schutzemberger 医生说，2月3日这件事发生时，克里斯蒂娜曾多次试图抓伤她的脸，威胁她，伸着手指向她逼近，说：“以上帝之名，以仁慈的上帝之名，您不会说您不是司法的共犯。”

审讯的第一周就是这样被置于一个强制分离和以绝食作为回应的背景中（专家把它轻描淡写了）。5日，克里斯蒂娜显得“仍然非常亢奋，而莱娅非常虚弱，甚至在某一

时刻给人一种将要失去知觉的印象”[参见2月5日《萨尔特报》]。2月8日，克里斯蒂娜开始显出她同莱娅分离所造成的冲击。《萨尔特报》写道：“她极度苍白，四肢颤抖，目光固定在地上，回答法官的问题时没有太大困难”[参见第54和55页]。然而，审讯变得难以进行，甚至法官也恼火起来：“您恨您的女主人吗？——不，我不恨她，这是假的！——那么您是在某种影响下行动的。来吧！说话！”克里斯蒂娜以“绝对缄默”回应。同一天，面对莱娅，法官遇到的困难也不会更少。读者可参阅这次审讯[参见第69页及以下]，以衡量莱娅所表现出的被动防御达到了何等极端的程度。沉默一小时，随后是几个几乎听不见的单音节词，法官失去耐心：“看着我！”几乎毫无疑问，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拒绝她们的分离，向那个对此负责的人抗议：在法院里以审讯罢工抗议，正如她们在监狱里以绝食抗议。另一方面，这一策略并不荒谬，因为在11日，她们获得了用餐时团聚的权利。

然而，这只是暂时的让步，随后的审讯并没有推进预审。克里斯蒂娜重复她关于犯罪的第一个版本，而莱娅一如既往地很慢才下定决心，最后说：“事实上，确实如此，一切都像我姐姐对你们说的那样发生”[参见2月14日《萨尔特报》]。在其中一次审讯结束后，克里斯蒂娜爆发出一阵剧烈的哭泣，并啜泣着反复说：“可是，我已经说出了全部真相。”

我们已经看到，6月8日的犯罪重构并不会使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她们因不得不分开生活而不满）与预审（因无法顺利完成调查而不满）之间的这种紧张消失。在公众方面，某种紧张情绪同样显现出来，而这桩可憎罪行缺乏动机，则为最疯狂的猜测开辟了通道。于是，此前在判断上如此克制、如此小心不向民众复仇让步的《萨尔特报》，竟然写道：“奇怪的巧合。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帕潘无法彼此交流，却经常对向她们提出的问题给出相同回答。”这无异于暗示两姐妹之间存在思想传递！

三重僵局（在犯罪方面、在预审方面以及在公众方面）等同于一种被阻塞的局面。然而，它最终会发生变化，不是在法院，而是在克里斯蒂娜的牢房里，并且再一次，是由她自己引发的。事实上，一系列事件将导向我们所称的撤回陈述（7月12日），预审正是从这份陈述起被认为已经结束；但也正是从这份陈述起，克里斯蒂娜转向对莱娅的系统性不认，这一立场从那时起一直是她的立场，直到她死亡。我们看到这里发生了何等转折。首先汇集关于这些事件的证词。

I. 监狱总看守致预审法官的信，

1933年7月12日

我荣幸地通知您，年轻的帕潘处于非常亢奋的状态。昨晚我不得不给她穿上约束衣，以阻止她挖出自己的眼睛。

这名在押者宣称，她有意挖出预审法官先生、Brière 先生以及看守们的眼睛。

此外，她还试图咬几名帮助制服她的同监女囚。

II. THIERY EUGÉNIE 的证词，55岁，无职业，勒芒监狱同监女囚

1933年7月12日

昨天上午，克里斯蒂娜·帕潘本来躺着，突然一跃而起，冲向窗户，双手抓住铁栏，喊道：“饶恕！饶恕！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是我攻击了 Lancelin 女士”，并且她在女看守面前重复了这句话；一名同监女囚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她从铁栏上拉下来，使她平静（她似乎处于一种极端亢奋的状态，甚至试图挖出自己的眼睛）。女总看守叫来了她妹妹莱娅；她一看见她，就把她抱在怀里，抱紧到使她窒息。随后，在女看守要求下，她同妹妹一起坐在床边，脱掉自己的衬衣，并在一种不断增强的亢奋状态中对她说：

“对我说是！对我说是！”她的眼睛令人毛骨悚然，并要求女看守让她单独同妹妹待在一起。然而她们被分开了，克里斯蒂娜同我们一起去了工场，在那里她似乎平静下来了。这就是我所看见的一切。

III. TESSIER LUCIE 的证词，60岁，无职业，勒芒监狱中的同监被羁押者

1933年7月22日

作为克里斯蒂娜·帕潘的同监女囚，我能够确认，在这名被告身上，一个月以来——有三次——出现了带有很大暴力性的危机。在这些危机中，她突然从床上起身，冲出去寻找她的妹妹。她说粗话，并大声呼喊她妹妹。她还要她的丈夫和她的孩子。

她亲吻地面，并用舌头在地上、家具上和墙壁上画十字。她曾想在我面前弄瞎自己的眼睛，而由于我正扶着她，她抓住我的右手，把它放进她嘴里、放在她牙齿之间。我不得不扭她的鼻子，才让她松开，而我自己也给了她两个耳光。她从右边跳到左边，以至于女看守们不得不给她穿上约束衣。她仍然非常激动，我们并不安心，尤其是在夜里。不过我和其他同监犯人看守着她，并且下定决心不遭受她的暴力。我顶住她，而她很听我的话。我叫她躺下，她就躺下。有时她说她要向所有伤害她的人复仇。有时她对我们说：“你们生我的气吗？”我回答她：“不，不是的，我们知道您发了一场危机。”当她那场大危机发生时，她口吐白沫，今天我注意到她也有一点。但是她没有暴力发作。她只是跪下来祈祷。在她第一次暴力危机之前，她有过一种幻觉：她说她看见她妹妹被吊在一棵树上，双腿被砍断。有时她对我们说：“我完了，他们要砍我的头，我该怎么办？”我们劝她去找她的律师。她对我们说，如果必须死，她会坚决地去死。在她的危机期间，她一边说猥亵的话，常常一边在我们面前掀起裙子。我认为她是癔症性的，并且她所投身其中的所有表现，都是在她的月经期间出现的。

IV. RAYMONDE LEGEAY 的证词，19岁，女服装工，勒芒监狱同监女囚

1933年7月22日

克里斯蒂娜·帕潘和我一起被拘押，已有一个月来，她受制于暴力危机，在危机期间她哭、嚎叫，并试图咬那些在她周围的人。她嘴唇上有白沫，说猥亵的话，甚至掀起自己的连衣裙。我看见她想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我们不得不介入，把她的手从脸上拉开，女看守们也不得不给她穿上约束衣。

目前她只是祈祷，跪下来，用舌头在地上、墙壁上和柜子上画十字，这是她三周前开始做的事。她夜里躁动，以至于我们睡得不安稳。夜里我看见她朝窗户冲去，接着又朝门冲去，好像门是开着的，而她想要穿过去。有一夜她以为看见她妹妹被吊在树上，双腿被砍断。

精神病学鉴定签署于1933年6月1日，也就是说是在这些事件开始之时；它没有提到这些事件，而后来，专家们也并未认为他们必须就这些事件来怀疑他们的第一项结论。关于两姐妹在狱中的态度，鉴定写道：

> V. 在狱中，自2月以来，克里斯蒂娜并不抱怨自己的命运，承认不和共同被囚的同伴说话，只和她妹妹交换几句话；她说自己睡得很好，没有梦，也没有噩梦，并且胃口很好；自2月以来一直观察她们的Schutzenberger医生，没有在她们身上观察到任何消瘦；在监狱里，她什么也不做，不做任何工作，而当我们问她这种不活动的理由时，这对于一个自童年起就习惯劳动的年轻女子来说多少令人惊讶，她一边微笑一边回答我们："我不必工作，因为我是被告犯"，由此表明她知道监狱规章中规定的规则；当我们坚持这一点时，她向我们确认："如果我被判刑，我会有时间工作的。"

莱娅也是如此：

> 自2月以来在狱中，她并不抱怨自己的命运，她自己说睡得很好，没有梦也没有噩梦，并且胃口很好；自2月以来一直跟踪她的Schutzemberger医生没有在她身上观察到任何消瘦；她在监狱里整日完全无所事事，很少和她妹妹交换几句话，也几乎不和同伴说话。由于我们感到惊讶

> 她竟这样待着，什么也不做，尽管她过去习惯于工作，她带着轻微的微笑回答："我是被告犯，我不必工作"，由此表明她知道监狱制度所规定的规则；而当我们坚持追问时，她确认，等她被判刑时，她将有时间工作。

然而，多亏L. Guillant医生的工作，我们拥有一份出自Schutzemberger医生之手的文本；他在克里斯蒂娜"危机"后的第二天被叫去看她，并在该文本中得出结论说，她曾"投身于一次愤怒发作和模拟行为，以便不再与她妹妹分开"：

> VI. 然而，在我们进入她牢房的同一时刻，克里斯蒂娜的态度本来可能——乍看起来——使我们感到惊讶。她躺在地上，脸颊贴着地板，眼中满是泪水；但几乎可以肯定，这又是一种表现。事实上，女看守刚刚离开她的牢房，我们的脚步声已经引起了她的注意；在检查中我们得以确认：即便她的头发有些灰尘，贴在地上的那侧脸颊却没有任何痕迹；同样，只有几滴眼泪——一滴，或也许两滴——落在了她的罩衫上。

> 同样，在我们的检查中，克里斯蒂娜反复跪下，这是她以前并不做的姿势；但是当我们请她坐下时，她坚持保持这种态度；相反，她会放弃这种态度

> 一旦我们似乎不再对她的态度给予任何注意。

> 星期三，克里斯蒂娜有了一次新的"愤怒危机"；我们先前已经注意到，在最初几天，她曾威胁 Gelly 夫人（女看守）；我们甚至曾预见到，将来可能会产生类似的表现。星期三的场景具有愤怒发作的一切外观，但同时又带有这一补充：在这种表现中有一种戏剧性和功利性的意味；此外，克里斯蒂娜已经在三次不同且反复的场合承认了这一点。几周以来，两姐妹被分开了，而每当有机会给她时，克里斯蒂娜从未停止抗议这种分离。因此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她承认自己这样表现"是为了同她妹妹团聚"。

> 我们询问了克里斯蒂娜关于星期三所发生的那次愤怒危机，那次危机带有通俗情节剧的面貌；她三次向我们承认，她那样行动，是为了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同她妹妹团聚。当我们对她说："您前几天，星期三，是在演戏吗？""是的，先生"，她回答我们，并马上补充道："是的，但我没有演疯子的戏"；而当我们向她指出她这项供认的严重性时，她说："我把自己交到你们手里，因为我不能以别的方式行动。"

这六份文本，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材料，用以评估监狱中那些事件究竟是什么；其高潮时刻似乎可以定位在7月11日至12日夜间的那场“危机”。这场危机，连同那个把两姐妹带到彼此面前的场景，起到了一种切断的功能。它在其事后性中如此显现，因为从那一天起，克里斯蒂娜下定决心，不再通过一种强行逼迫来获得同莱娅继续共同生活；她放弃这种共同生活（无论是在监狱里，还是在断头台上），而在7月19日之后，她再也没有说出“莱娅”这个名字本身。这里附上的三封信见证了一种变化；对于克里斯蒂娜而言，整个问题仍然是评估其代价。

勒芒，1933年7月[19]日

Boutier先生

> 我请求您愿意要求我解释我所说过和叙述过的事情，并愿意准许我见您，以便我作出解释，但我不要单独和您在一起作解释；并且我请求您愿意准许我和我的妹妹莱娅·帕潘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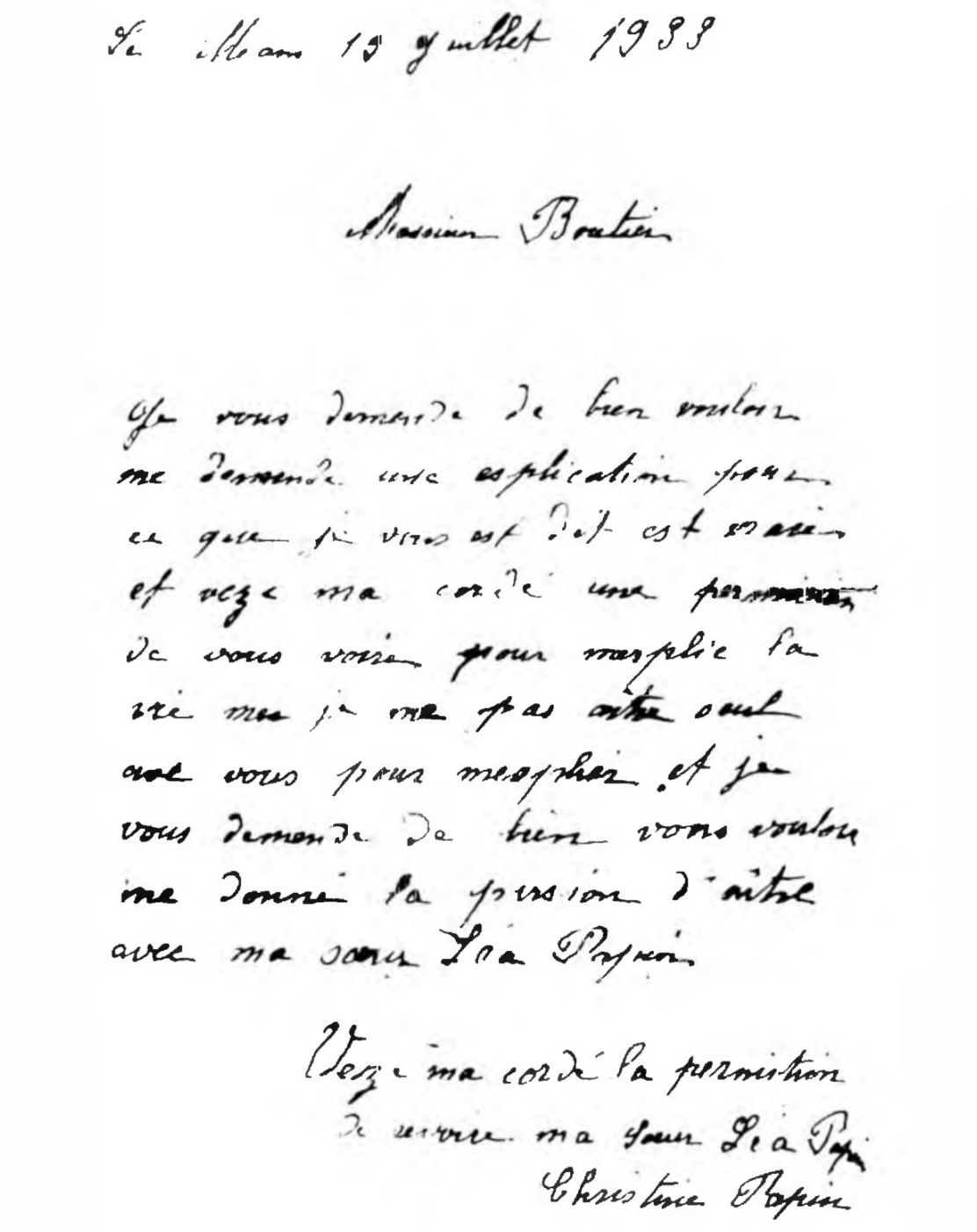
> 请您准许我再见我的妹妹莱娅。

帕潘

克里斯蒂娜·帕潘[注1]

> [注1] 布蒂耶先生
> 我请求您好心要求我作出一个解释，因为我对您说的事已经叙述过了，并且请您准许我得到一个许可去见您，以便向您解释生活，但我不能单独和您在一起向您解释，我请求您好心准许我同我的妹妹莱娅·帕潘在一起
> 请准许我再见我的妹妹莱娅·帕潘
> 克里斯蒂娜·帕潘（Christine Papin）

勒芒，1933年7月19日



Le 18 Juillet 1933

Monsieur Boutin

Je vous demande de bien vouloir
me donner une explication pour
ce que je vous est fait est mal
et veuillez me accorder une permission
de vous voir pour m'expliquer la
vie mes je ne pas entre seul
avec vous pour m'expliquer et je
vous demande de bien vous vouloir
me donner la permission d'entre
avec ma sœur Léa Papin

Veuillez me accorder la permission
de revoir ma sœur Léa Papin
Christine Papin

布捷先生

我请求您愿意向我询问一个解释，关于我对您所说过和叙述过的事情；也请准许我见您，好让我向您解释我的生活；但我不能同您单独在一起向您解释。我还请求您愿意准许我同我的妹妹莱娅·帕潘在一起。

请准许我

再次见到我的妹妹莱娅·帕潘

克里斯蒂娜·帕潘

勒芒，1933年8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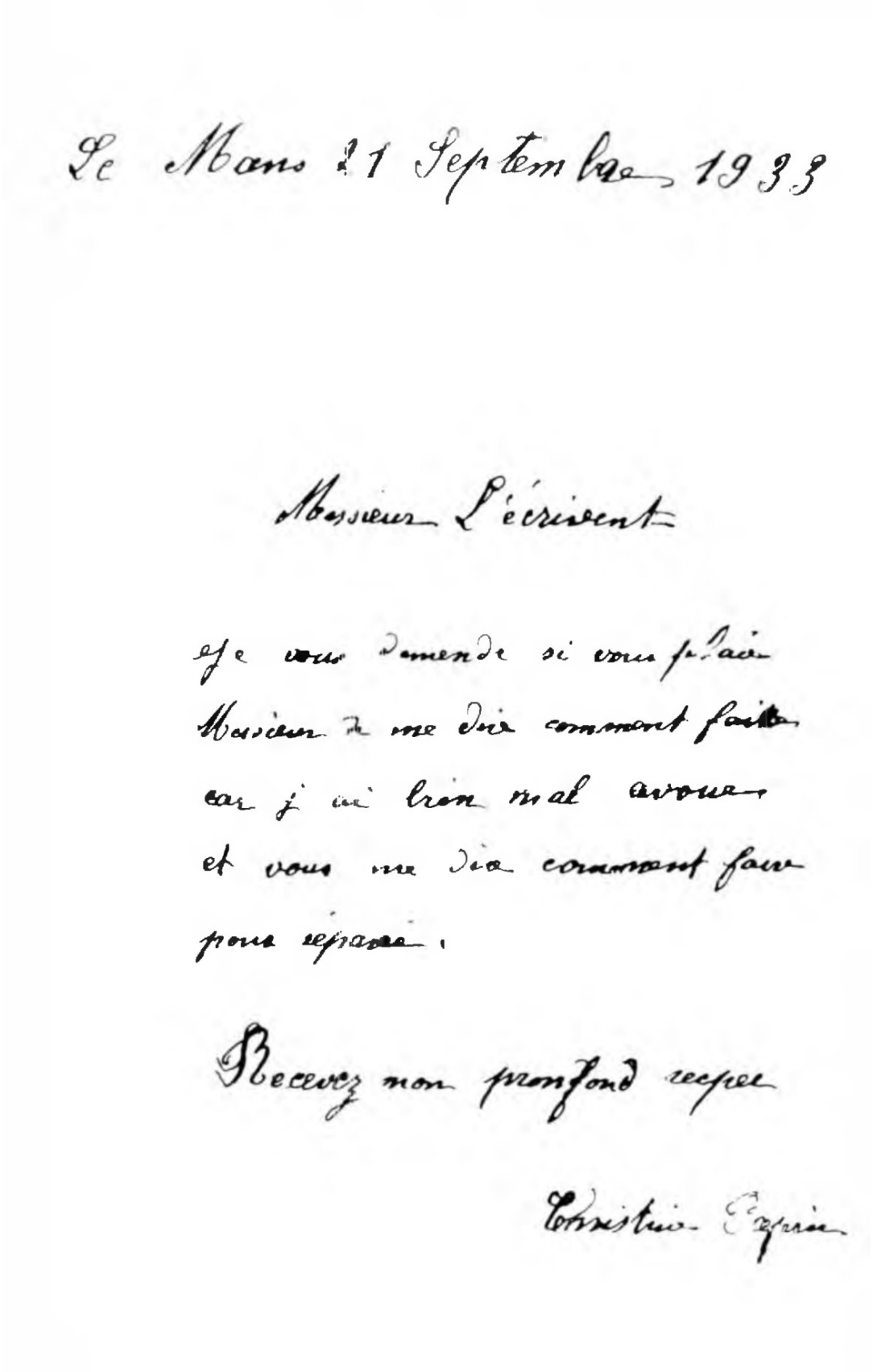
预审法官先生

> 鉴于我一段时间以来所处的道德软弱状态，并且自那以来经过反思，我请求您愿意原谅我打扰了你们所有人，并原谅我对你们说了绝对虚假的事情；我非常后悔曾向你们供认那些事情，因为我是在愤怒的支配下行动的，这一点是真的。希望您愿意原谅我，并且不改变我们的处境。预审法官先生，请接受我恭敬的感谢和我的感激。

克里斯蒂娜·帕潘[注2]

> [注2] 勒芒，1933年8月10日
> 预审法官先生
> 鉴于我在某一段时间以来所处的道德衰弱状态，并且此后已经反思，我请求您好心原谅我打扰了你们所有人，并原谅我对您说了绝对虚假的事情；我非常后悔曾向您承认那些事情，当时是在愤怒支配下行事，这才是真实的。希望您愿意原谅我，并且不要改变我们的处境
> 预审法官先生，请接受我恭敬而感激的谢意
> 克里斯蒂娜·帕潘（Christine Papin）

勒芒，1933年9月21日



Le Mans 21 Septembre 1933

Monsieur L'écrivent

Je vous demande si vous plaît
Monsieur de me dire comment faire
car j'ai bien mal avoue
et vous me dire comment faire
pour réparer.

Recevez mon profond respect

Christine Papin

“写字人”先生（L’écrivent）

> 先生，请您告诉我该怎么做，
> 因为我供认得很不好，[注]
> 而您会告诉我该如何
> 补救。
> 谨致深切敬意。
> 克里斯蒂娜·帕潘
> [注] 手稿的 mal avouer 文法不规范，正文按可辨词形译作“供认得很不好”；dia、réparee、respec 等非规范拼写保留在原文转写中。前述图像和后页原注3的印刷转写是两个见证，词形不完全相同，未把手稿改写成规范法语。

勒芒，1933年9月[21]日

书记员先生

我请求您，先生，请告诉我该怎么做，因为我供认得很糟糕，并请您告诉我怎样做才能弥补。

请接受我深切的敬意。

克里斯蒂娜·帕潘

7月[19]日之后，没有任何克里斯蒂娜关于莱娅的请求的痕迹；而从犯罪的第二天起（事实上两姐妹就是在那一天被分开的），直到这个7月[19]日，她持续的关切和一千次重复的要求，都是要和莱娅在一起。从那以后，问题不再是这个；她8月[10]日和9月[21]日的信件为此作证。

与这种变化相应，克里斯蒂娜“作出不利于自己的陈述”：[注3] 她请求宽恕，因为她在预审中说了谎，因为这给法官造成了麻烦；她承认是在愤怒的支配下杀人的（这正是精神病学专家们的论点，它最彻底地排除了她的无责任能力）；她提议让人帮助她更好地供认；她希望有人告诉她如何“做才能弥补”。8月10日的信甚至表达了这样一种希望：法官丝毫不要改变“我们的处境”；换言之（因为这里大概不是一种威严复数的“我们”），让她与莱娅的分离保持原样。

> [注3] “se charge”可能是“se carga”。[译者注]

与此同时，在最后几次讯问中，她主张一切完全是她独自所为，把莱娅的角色限制为唯一的动作，即

在Lancelin小姐已经死去的身体上刻下切痕[参见撤回声明，第60页：“我和L.小姐搏斗时，我妹妹到了，但我不认为她做了什么，除了在L.小姐的腿上割了几刀；当时，L.小姐已经不动了”]。另一方面，预审并不会保留这个版本，在这个版本中克里斯蒂娜把一切都揽到自己身上。而在最后一次讯问期间，当法官提到莱娅在L.夫人之死中的那一部分时，克里斯蒂娜——尽管她的心境是“调和的”，尽管她关切的是把自己完全交托给她的谈话对象，不去打扰他们——仍然试图断言，莱娅只是按照她的命令行动。例如，她说曾把犯罪的主要武器，也就是锡壶，递给莱娅，而莱娅将坚持说是她自己把它捡起来的[参见第61页]。

当请求宽恕（或希望受到完全惩罚）取代了要和莱娅在一起的请求时，两姐妹的同谋关系让位了；这种同谋关系在犯罪之后仍然把她们焊接在一个契约之中，按照这个契约，她们声明自己在犯罪的执行中占有严格相等的一份。究竟发生了什么，竟产生了如此粗暴而最终的分离？

Lucie Tessier作证说：“在她第一次严重暴力危机之前，她有过一种幻觉：她看见她妹妹，她说，被吊在一棵树上，双腿被砍断”（III）。这个幻觉相对于三次危机而言的先在性，是一个决定性的事实。

据我们所知，这个幻觉是唯一的：即使那可怕的显现被多次呈现出来（这一点我们并不知道，因为L.T.只是说：“她有过一种幻觉……”，没有更具体说明，而另一名同监犯人[IV]则把它定位在单独一个夜晚），也没有另一个幻觉形象的痕迹。这个形象之所以显得更是如此，是因为它被完美地圈定了，但也因此是孤立的。从这个时刻起，随后发生的危机可以被设想为具有对该幻觉进行联结的功能（就弗洛伊德在《纲要》中使用这个术语的意义而言），也就是一些尝试，试图把那被从象征界拒斥、并在实在界中重现的东西插入一个象征网络之中。这些危机同样处在实在界之中。但是，危机所编织的象征网络又如何能够把从未被象征界触及之物纳入象征界呢？三次危机都未能实现对幻觉的联结。

这些危机的内容本身表明，“莱娅”这个对象处在这些危机的中心。至少，前两次危机是如此，因为第三次危机勾勒出另一种构型，在其中克里斯蒂娜在一种退守位置上找到某种支撑。让我们更仔细地研究这一点。

在最初的危机中，包括标志着暴力行动顶点的7月12日那次危机，克里斯蒂娜从床上起身，冲出去寻找莱娅：她大声呼喊她；她说她要向所有伤害过她的人复仇，这些人“事实上并且以强力”把她同她妹妹分开（这里请回想她入狱第一夜被分开时最初的暴力行动：“以天主、善良天主之名，您不会说您不是司法的同谋”，她曾威胁性地对女看守说）。克里斯蒂娜朝窗户冲去，接着朝门冲去，“好像她想穿过去”，Raymonde Legeay说。她撞向墙壁，拒绝那堵把她同莱娅分开的墙的实在。她或许想象，和莱娅在一起会抹去居住在她身上的幻觉之恐怖？无论如何，这必然向她的看守们暗示，情况实际上可能就是这样；为了安抚她，她们在7月12日决定把莱娅“带给”她（没有别的词）。许多年以后，一名女看守会向P. Houdyer声明：“也许克里斯蒂娜是一个怪物，但这样的痛苦本会使岩石也软化。”可是岩石不同于女看守，并不会任由怜悯打动自己。

除了与莱娅相关的东西之外，另外两个组成部分介入了这些危机。首先，似乎可以区分并因此重新组合某些特征，它们重现了越入行动的若干元素。这将对应于克里斯蒂娜的断言，即[参见她的撤回声明]她7月12日的危机与她殴打L.夫人时的那次危机“相同”。这里有兴奋状态，无论在此处还是在彼处，这种状态都会在危机实现到某个阈限之后让位[参见II：7月12日危机之后，她去了监狱工场，最后在那里平静下来]；有她所表现出的暴力；有掀起裙子的动作；有挖出眼睛的动作，这一次是她自己的眼睛，但也有威胁要挖出周围所有人的眼睛，包括她的律师在内，并且完全不顾这位Brière夫人一直不断地向她显示一种充满感情的关切；最后还有她要向所有伤害她的人复仇的断言，这是对犯罪现场中她那句“我要把你们屠杀掉”的回响。

第三个组成部分显露出来，它以罗马宗教的教导为焦点，而克里斯蒂娜整个童年都浸没在这种教导中。事实上，基督教使我们能够收拢这些危机的若干组成元素：克里斯蒂娜用舌头在她牢房的地上和家具上画十字，冲向窗户（人们很难把她从那里拉开），并且祈求一种宽恕，而认为这种宽恕只能来自天上并非鲁莽；她跪下来祈祷。

然而，仔细阅读上文转载的证词时，人们会察觉到，在7月[12]日的大危机之后，这第三个组成部分比另外两个更有力，并且最终占据了整个场地。正是它为克里斯蒂娜构成了我们上文所称的一种“退守位置”：它给她提供了一种可靠的平静。7月13日，Schutzemberger医生观察到，克里斯蒂娜第一次在他面前跪下，甚至在他请她坐下时仍坚持这种姿态［参见第193页］。那一天，克里斯蒂娜和她的精神科医生之间又一次发生了误解。“前几天您是在演戏吗？”他问她。“是的，”她说，“但我没有演疯子的戏。”他没有考虑到这个说明；然而这个说明是有分量的，而且如果把它同Lucie Tessier（III）把克里斯蒂娜视为“癔症者”的观察联系起来，它就获得了意义。“疯子的戏”就是模拟，一种其根源是性的模拟［参见L.T.：“……她所投身的所有表现都出现在她月经期间”］。克里斯蒂娜声明，在她的“危机”中并不是这么回事。然而，必须等到Paulette Houdyer的一项观察，才定位出这个误解：演戏——她指出——在勒芒地区是一种表达，意思是“闹一场”。然而，一场戏同一种模拟并不是一回事。因此，这个误解来得正合时宜，其意义在于，专家的错误正好为克里斯蒂娜的宗教谵妄服务。作为模拟者，在精神科医生眼中，她完全负有责任；他这样告诉她，并收到这个回答：“我把自己交到您手中，因为我不能以别的方式行动。”这正是神秘主义谵妄的公式。这样一句话能合法地指向谁，除了上帝？这样一种决断能为了谁而完成，除了为了祂？很可能克里斯蒂娜是在跪着的时候说出这个誓愿的。

因此，第三次危机，即7月22日的危机，显示出某种平息，它被缩减为仅仅是神秘主义谵妄的上演。“在她的大危机期间，她口吐白沫，而

今天（22日，即Lucie Tessier作出这项声明的日期），我观察到她笑了一下。但她没有暴力发作。她只是跪下并祈祷。”同一天，Raymonde Legeay声明：“目前她只是在祈祷，跪下来，用舌头在地上、墙上和柜子上画十字，这是她三周前开始做的。”这些证词是在克里斯蒂娜一生中最后一次说出莱娅的名字三天之后被誊录下来的。这里我们同样要回忆，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唯一令人惊讶的特征，是克里斯蒂娜在听到宣告她被判处砍头的同一时刻跪下的举动。

因此，如同我们刚刚试图确立的那样，在幻觉之后，7月的三次危机，虽然没有成功地系结幻觉，却并非对克里斯蒂娜毫无效果；它们使她能够在一种神秘主义谵妄中找到最低限度的支撑，以这种谵妄的名义，从那一刻起，她接受自己的命运，因为归根结底（而谵妄本身就是这笔账）它只取决于上帝。她拒绝提出任何哪怕最小的要求，因为那会意味着她想要逃离自己的命运，例如恩赦申请，甚至是请求共和国总统赦免她。“如果必须死，我将坚决地去。”（III）。事实上，她坚决地去了，而在她后来的行为或言说中，没有任何东西会抵消这一“决定”的实行。克里斯蒂娜没有希望，但绝非绝望（绝望更像是把希望推到极致）：她知道自己在良好的手中，在她能够把自己的生命交付其中、能够臣服于其下的唯一双手之中……终于如此。像莱娅在一个令人难忘的事件中那样被迫跪下，如果来自任何人，都是不可忍受的；克里斯蒂娜并不否认她的生活曾是什么样的，她对此极端敏感；神秘主义谵妄只是用一个否定的特殊来奠基肯定的普遍：来自任何人，是的，但不是来自上帝。上帝是那个使你跪下而不在自恋上伤害你者。她对Schutzemberger医生说的那句话，可以通过一个小小的增补来解释：“我把自己交到您手中，哦上帝，因为我不能以别的方式行动。”

看来，在这里，谵妄是在幻觉之上建构起来的，正如按照拉康的说法，思想是靠倚在一个它背向的能指上而支撑起来的。因此，它并不把它整合进来……而且理由充分。它在系结别的东西的同时，也系结着这个元素

“跪着”。因此，不可避免的是，我们无法把谵妄同幻觉的关联之分节推进得更远。相反，幻觉却能够在事后澄清越入行动。从幻觉来看，“挖出眼睛”这个元素不再显得是最糟糕的，不再是那种一个虚假天真的常识“急于宣称”的恐怖之极。只需提到《科洛诺斯的俄狄浦斯》，就足以知道，至少有一个场合，恐怖之极反倒是不挖出自己的眼睛。当克里斯蒂娜看见莱娅被吊在一棵树上、双腿被砍断时，正是这种情形。与其忍受这一幻觉图像的迫害，不如挖出自己的眼睛。克里斯蒂娜被武力阻止这样做；保护她免于伤害自己的关切，切断了对她来说本可成为保护之物的道路，并由此揭示出幻觉图像的强加性质。

从那一刻起，向越入行动提出的问题就变得精确起来。问题不再那么是要知道越入行动实现了什么（这一问题框架只有在弗洛伊德式agieren的登记中，即作为转移或行动展示（acting-out）时，才完全正当），而是要知道是什么召唤了它，是什么作为快乐原则的最后诉求、作为一种不可忍受的张力之降低而呼唤它。越入行动不是恐怖，而是恐怖的降低（即便它不是恐怖的解决）。越入行动是一个回答，而不是一个问题，是一个我们不知道其问题的回答。至多我们现在可以承认，某种类似幻觉的东西前来要求越入行动的解决。

7月[12]日，狱卒们被克里斯蒂娜的大危机所震动，于是让已经被隔离数周的两姐妹彼此相见［参见第193页，Schutzemberger的文本］。不能排除这种隔离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6月底幻觉的触发。不管怎样，幻觉留下了它的印记，而危机试图同这个印记周旋。克里斯蒂娜所面对的是这个莱娅，被克里斯蒂娜幻觉化的莱娅，被吊起、双腿被砍断的莱娅，而不是（如果因此说来，这曾经是事实的话）她妹妹这个人。狱卒们的回应——她们把莱娅带来——因此发生在“边缘处”，发生在一种现实中，这种现实是想象界与象征界的装配，对克里斯蒂娜而言，它再也丝毫不能堵塞莱娅的实在。她拥抱莱娅，但几乎把她勒窒息。“告诉我说是！告诉我说是！”她在一种越来越兴奋的状态中对她说。但那堵墙依然在那里，无法逾越，而莱娅的在场也显得可笑。在这个

“告诉我说是！”的空洞中，那些未被说出的词仿佛缺席了，而它们在丈夫与妻子之间封缄着最彻底的分离：

她：在所有已经走到尽头的事情中，没有什么比……那件事结束得更彻底。

他：迟疑之后：如果我们死了，可是……算上

死亡，您认为呢？

他微笑。她没有微笑。她：我不知道……但也许，是的，算上死亡。

玛格丽特·杜拉斯，《音乐》（La música），载《戏剧 I》（“Théâtre I”），伽利玛出版社，第146页

> [注4] 勒芒，1933年9月21日
> 写字员先生
> 先生，我请求您，如果您愿意，请告诉我该怎么做，因为我承认得很糟，请您告诉我该怎么做来弥补
> 请接受我深切的敬意
> 克里斯蒂娜·帕潘（Christine Papin）

第7章

第七章

精神病性恶病质

这就是克里斯蒂娜逐渐滑向精神分裂症的终点。事实上，她的闭锁将不断加剧（姑且称之为“自闭”，条件是不要让“自闭”这一术语所由产生的那个派生，远离那种拒绝了“自体爱欲”的羞怯），直到1937年5月18日21时，她“因精神病性恶病质”死亡（死亡证明）。

克里斯蒂娜在判决宣布时的最初反应（但我们甚至能谈论“反应”吗？）被记录在《萨尔特报》（La Sarthe）中。审判翌日，人们可以读到：

克里斯蒂娜·帕潘仍不愿签署她的上诉申请

在萨尔特省陪审团作出判决之后，这两名犯罪姐妹采取了极为不同的态度。

克里斯蒂娜在宣读判决时曾想跪下；该判决依据法律规定，“凡被判处死刑者均应被砍头”，并且“执行将在勒芒的一处公共场所进行”。随后，她曾对围在她身边、要把她押送回监狱的看守们声明：

——既然必须砍掉我的头，不如马上就做。

现在，两名罪犯中较年长的那一个似乎已经不再记得对她作出的可怕判决。

在 Vert-Galant 监狱的医务室里，在等待为女死刑犯保留的牢房安置妥当期间，她日夜受到女看守们严密监视，似乎并不担心等待她的命运。

自星期四晚上起，她拒绝摄入任何固体或液体食物；她坐在床上，脚上带着镣铐，夜间穿着束缚衣，保持着同星期五庭审期间一样僵住、冰冷、无法看透的姿态。

然而，她痛苦地抱怨自己成了所有人的笑柄，并且尤其抱怨自己被迫穿制服。衣服尤其不合她身。

——为什么给我这些东西？为什么惩罚我？我什么也没做。

所有人都在嘲笑我，都想伤害我；甚至我的妹妹也不再爱我了！

星期日下午快结束时，Germaine Brière女士去了监狱，在那里同克里斯蒂娜和莱娅进行了长时间会谈。

较年轻的那个正常进食，在

其他被拘押者中间保持平静。她同意以书信方式请求书记官到场，以签署她的上诉申请。

克里斯蒂娜则相反，在说过“是”之后，断然拒绝签署信件，同时也反对监狱司铎、Verseaux神父先生来访。

——为了什么？我全都说了，她声明。

莱娅·帕潘在星期一上午签了字

> 今天上午，书记官Cornilleau先生在Germaine Brière女士陪同下前往监狱，让莱娅签署她的上诉。事实上，姐妹中较年轻的那一个，正如我们上文所说，昨天已经通过信件表示有意履行这项手续。

> 至于克里斯蒂娜，她在表示希望提出上诉的同时，拒绝在双脚被锁链束缚时签字。

> Germaine Brière女士将返回监狱——法定期限星期二届满——以试图说服她的当事人；此外，她仍拒绝进食。

如果人们承认，事实上正如情形似乎显示的那样，对克里斯蒂娜而言，事情已经决定了，那么拒绝签署上诉请求就是合乎逻辑的。已经被决定的东西（同时是“被接收的”和“完成的”）又怎会导致一项新要求的提出？她在走出审判时说的那句话，“既然他们要砍掉我的头，最好马上就做”，纯粹而简单地接续了她的“如果必须死，我将坚决地去”；正是7月的那些事件已经给事情作出了结论，而事实上，判决的宣告并没有引发任何反应，并且通过最社会化之物（一次庭审程序）与最非社会之物之间的一次惊人相遇，完全适合谵妄所等待的东西。“为了什么？”当人们催促她签字时，她说，“我什么都说了。”

这个“我什么都说了”正是促使我们对克里斯蒂娜发生兴趣的东西。它同2月13日讯问中的“然而我说出了全部真相”相呼应，这并不会使我们忽视：现在已经不再有任何“然而”能够重新动员言说。但是，一个言说存在如何能够达到这样的断言：他已经说出了真理的全部，真理已经被全部说出？而转向自闭，难道不是这种确信吗？

如此一来，言说便经由其他途径通过。人们首先询问共和国检察官，想知道克里斯蒂娜拒绝签字会产生什么后果。他回答说：

在多名被判刑者之中，若赦免只给予其中一些人，那么对其他人的判决，在法定期限届满时，具有既判力。但是，在不可分割性的情形中（被传唤到庭并因相关事实被判刑的两姐妹，情形似乎正是如此），某一被告个人的“escribanos”使其同案被告受益，即便后者没有获赦。[注]

> [注] 底本此处清楚印作 escribanos，通常指书记员或公证人，但与这句话的法律语境不合。正文保留原词；未依据上下文，把它无说明地改成“个人上诉”。所给西班牙语底本不足以确定该处本应为何词。

2月4日，克里斯蒂娜的决定像铡刀一样落下：

> 克里斯蒂娜·帕潘拒绝签署她的赦免书

> 她表达的愿望和她妹妹的签名会足够吗?

尽管她的辩护律师——Germaine Brière女士——再三敦促，并于星期二下午再次前往监狱，在那里花了两个小时试图说服她，克里斯蒂娜·帕潘仍拒绝签署她的赦免申请。

莱娅由于签署了她自己的赦免申请，因而在赦免的情形中，这对犯罪姐妹很可能都必须在另一个不同于萨尔特省的巡回重罪法院面前出庭。

> 此外，据我们所知，克里斯蒂娜继续绝食。从星期四起，她拒绝，从星期四起，不仅拒绝固体食物，甚至也拒绝液体，这同她去年7月的态度相反；当时在一次危机期间，她曾重新同意喝水。人们看见她非常虚弱。

这一变得令人担忧的事实，据说已经被报告给司法官员。

11月30日（我们对此前十个月里克里斯蒂娜和莱娅的情况一无所知），上诉法院驳回了赦免。《萨尔特报》写道:

最高法院的决定通知，可能会在几天内告知当事的两人。她们会怎样接受它？至于莱娅，她所签署的赦免申请被驳回，很可能不仅就涉及她个人而言不会对她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她无疑会想到她姐姐的命运，并且她会理解。至于克里斯蒂娜，可以提出的那个问号是重要的。事实上，我们曾多次叙述两姐妹中较年长者的奇异态度。自她被判刑以来，我们记得，她拒绝签署她的上诉；并且正是由于两起案件不可分割的性质，她的案件才得以由

> 上诉法院同她妹妹的案件一起审查。在巡回重罪法院判决之后，克里斯蒂娜·帕潘拒绝进食8天，后来只是在某些条件下才同意停止绝食，而这些条件作为宽仁措施得到了准许。后来，在她的死刑犯牢房中——这间牢房安置在女囚楼医务室内，位于我们所刊照片中那座建筑的左侧——克里斯蒂娜躲进房间最阴暗的角落，背对窗户。我们采访过她的辩护人Germaine Brière女士；她向我们说明，她妹妹曾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强调其

罪行的恐怖，并劝她听天由命，克里斯蒂娜却声称那封信并非来自莱娅。她容易被激怒，心不在焉，不愿工作。她从前是一名出色的女裁缝，如今却以可悲的方式完成交给她、用来占据她漫长囚徒岁月的缝纫活，同时诅咒围绕她的所有人，其中包括她的妹妹；她说妹妹抛弃了她。她断言自己很快就会去见“夫人和小姐”，随后又落入绝对缄默；双手放在膝上，眼睛盯着墙壁，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她只剩下等待

> 赦免委员会以及总统的决定；这一决定将使她免于断头台，或者让她登上断头台，因为应当强调的是，不管某些人怎样想，女性在“法律上”并不免于最高刑罚；惯例显然是赦免被判处死刑的女性，并把她们送往中央监狱终身监禁，因为对女性而言，带苦役的流放并不存在；只有共和国总统将决定克里斯蒂娜·帕潘的命运。我们回忆一下，最后一名被送上断头台的女性是在 1886 年，在布卢瓦。

第二天，《萨尔特报》对克里斯蒂娜如何接受第二次审判请求遭驳回，补充了一些细节:

G.B.女士[注1]以极大的献身精神承担了Bruyère街犯罪女佣们的辩护，她完成了一项痛苦的使命，即将最高法院拒绝赦免的消息告知两名被判刑者。

> [注1] 这里指的是热尔曼·布里埃夫人，克里斯蒂娜的律师。

她首先前往较年轻的莱娅那里；后者听到这个消息时显出某种情绪波动，并激动到几乎流下几滴眼泪。

随后，女律师前往死刑犯的牢房，发现她仍处于同一种姿态中，自9月30日以来没有变化。正如我们昨天所说，克里斯蒂娜·帕潘整天坐在小屋最阴暗的角落，背对着从唯一一扇窗户透进来的光。

她气色很差，显得十分消沉。如果说自从被判刑以来，她曾有过亢奋的时刻，有时甚至达到真正的暴力发作，那么许多天以来，她已经陷入一种极端的麻木之中。赦免请求被拒绝并没有触动她。仿佛她没有意识到这一决定的重要性。

> ——克里斯蒂娜，辩护人说，现在必须签署一份赦免请愿书，我会把它转交给共和国总统。他可以赦免您。

> ——我什么也不会签，被判刑的女人用一种平板而仿佛遥远的声音回答。

> ——这很严重，您知道您可能会被处决……

> ——他们想怎样处置我都行。

甚至当人们向她谈起她妹妹时，克里斯蒂娜·帕潘也不再有丝毫反应，而这种对一切的冷漠，不能不令接近她的人感到震动。

任何坚持都毫无用处：

> ——不值得，她说，我什么也不想请求。

> 据我们所知，Germaine　B女士不过打算为这名被判刑者再作一次尝试，好让她签署她的赦免请愿书。如果辩护人遭遇同样的固执，申诉仍将照样被转送至赦免委员会……

我们再次在1933年12月5日的《萨尔特报》中读到：

今天早晨，监狱总看守Gelly先生正式向两名犯罪女仆通知了赦免法院的裁决；该裁决日期为11月29日，驳回赦免。莱娅以某种平静接到这一消息；它只是正式确认了她已经非正式知道的事。据我们所知，她将乘近期一班开往雷恩的火车离开。事实上，莱娅被判处十年苦役，应在该城的中央监狱服刑。至于克里斯蒂娜，她在死刑犯牢房里仍保持着她那种奇异的态度。她只是站起来，并以她从未放弃过的那种恭顺回答：“谢谢您，先生”；随后，她带着心不在焉的神情，又拿起她的女律师托付给她

的小刺绣活，用来消磨她作为女囚的漫长日子。Germaine Brière女士仍十分殷切地去找克里斯蒂娜，试图使她决定签署一份求恩请愿书。事实上，人们知道，对于被判死刑者来说，在特别委员会作出决定之后，剩下的只有等待共和国总统的垂怜，等待一项仁慈措施。刚刚见过两名罪犯的Germaine Brière女士对我们说： ——克里斯蒂娜一天一天地变化：她越来越苍白、颓丧，双眼闭合，面色灰黄；然而，她仍保持平静。星期五她不愿离开床铺，仍然拒绝签署她的求恩请愿书，用类似于她在签署赦免申请时所表现出的那种被动抵抗来对抗一切论据。另一方面，Germaine Brière女士对我说，我打算亲自向共和国总统提交一份请求，在其中我将强调克里斯蒂娜的无责任能力。

1934年1月22日，死刑被减为终身苦役：

Bruyère街的悲剧到了最后一幕；共和国总统刚刚将对克里斯蒂娜·帕潘宣告的死刑，减为终身苦役。国家元首借以对被判刑者行使赦免权的法令，日期为昨天1月22日。傍晚，一封官方电报通知了勒芒当局杰出的首长Riégert先生，他立即把所采取的减刑措施告知了被判刑者尽责的法律顾问Germaine Brière女士。我们能说这一决定是预料之中的吗？若这样断言，我们并不会冒多大弄错的风险。自从1887年在Romorantin处决Tomas妇人以来，法国没有任何女人遭受过死刑。在某种意义上，把克里斯蒂娜·帕潘送上断头台本会构成一个先例。Albert Lebrun先生不愿如此。两名犯罪女仆中较年轻的莱娅，如人们所知，被判处10年苦役，目前仍在勒芒监狱等待转往雷恩中央监狱。年长者也将走同一条路，被关押在那里直到生命终结；而渐渐地，遗忘的面纱将落下，至少对于广大公众而言，会覆盖住近年引起最大恐怖的刑事案件之一。今天早晨，检察官Riégert将共和国总统为她采取的仁慈措施通知克里斯蒂娜后，她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不过她以从未离弃她的礼貌回答道： ——谢谢您，先生！

《La Sarthe》，1934 年 1 月 23 日，

两天后，克里斯蒂娜被转往 Rennes 中央监狱。关于这次转移，司法当局把话说得明明白白：

> 帕潘姐妹（克里斯蒂娜，即本通知的对象；莱娅，即另一通知的对象）在一阵愤怒危机中，在闻所未闻的凶残条件下，杀死了她们的女主人Lancelin太太和小姐。她们借助一个锡壶猛击受害者，把她们的头打成肉泥；随后挖出她们的眼睛，最后又执着地虐害其中一名受害者，用刀在其肾部 [reims]作出深深的切口。[注2]
>
> [注2] 在法文文本中有一个（sic），表明原文写的是[reims]，而不是[reins]。[译者注]

> 这两姐妹不值得任何怜悯。

> 应为她们保留最严厉、最苛刻的制度（作者加下划线）。

而且，还有更甚者，这一次出自另一支笔（这两段文字由莱娅原样照搬）：

> 我认为，由于其罪行的残暴性，克里斯蒂娜·帕潘不配得到任何宽宥，应被指定为第 3 等级以执行其刑罚。

这种额外的暴力，至少就克里斯蒂娜而言，很快就应显露为没有结果。事实上，约三个月后，监狱负责人被迫请求进行一次精神科检查：

> 下列签署人，中央监狱医生 Porés 医生，证明被拘押者帕潘·克里斯蒂娜的精神状态，需要由精神病医生进行紧急检查。

> Rennes，1934 年 5 月 12 日

接受咨询的 A. Lamache 医生，随后提交了如下报告（其结论部分仅由 Louis Le Guillant 发表在《Le temps modernes》上）：

> 帕潘·克里斯蒂娜数日来在观察牢房中；我们见到她躺着，事实上，自 48 小时以来她拒绝起身；她的面部表情是一名焦虑性忧郁症患者的表情，眉弓

> 紧缩，面部特征紊乱；从一开始，帕潘就表现出对抗，她拒绝看我们，不愿说话，拒绝回答；随后她低声说话，我们很费力才从她那里得到几句话："我不配活着……谢谢……我必须死……谢谢……我一无是处……我不能工作……喂养我是无用的"；而且总是同样一些刻板的句子，几乎一成不变地以"谢谢"结尾。让她面对她妹妹莱娅时，她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也不注意后者向她作出的亲切表示。她认不出自己的妹妹："这不是莱娅，是另一个……她很温柔，但她不是我妹妹……如果她是我妹妹，我就不会处在我现在这种状态中"，她久久地盯着莱娅，说"这不是莱娅"，她认为她妹妹"屈服了，[并且]回到了她从前女主人的家里"。她看着妹妹离去，没有明显情绪。她抗拒我们的检查，拒绝伸出舌头，并且尽管我们一再要求，她仍绝对拒绝喝牛奶。自从她到达中央监狱以来，克里斯蒂娜一直保持一种抑郁的态度；她不从事任何活动，始终沉浸在自己之中，不回答提出的问题，她的缄默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不时说一句"谢谢"，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数周以来她拒绝一切食物，必须给她喂食，起初通过营养灌肠，但很快她又拒绝这些灌肠，目前则通过皮下注射血清来喂养；夜晚躁动，睡眠很不规律。一般状态不佳，消瘦非常明显；心脏跳动很快

结论

> 自到达 Rennes 以来，克里斯蒂娜·帕潘表现为一名忧郁症患者，伴有不配感的观念，这些观念无疑是正当的，但同时伴随着使其生命处于危险中的反应；系统性拒绝一切进食，而且这种情况已持续数周，没有任何好转；毋宁说，这一状态正在加重，并伴随一种明确的忧郁态度，表现为缄默、无法从事任何活动以及失眠；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句子似乎显示出她对妹妹的系统性不认识。讯问非常困难且非常漫长，未能使我们得到更多东西，我们也未能弄清这种对其妹妹不认识的心理过程。尽管曾在医务室或牢房中尝试观察数月，克里斯蒂娜·帕潘仍不能适应监狱生活。

在这份报告之后，Ille-et-Vilaine 省长下令将克里斯蒂娜·帕潘强制安置于 Rennes 公立精神病院。命令日期为 1934 年 5 月 23 日。

1934 年 5 月 30 日的《L'Ouest-Eclair》报道了这一事件：

本该发生的事刚刚发生。克里斯蒂娜·帕潘，勒芒　Bruyère　街那位悲伤的女主角，刚刚被收入雷恩 Saint-Méen 精神病院。[此处为事实摘要] 有几次传出了她健康状况恶化的传闻。我们在雷恩中央监狱能够收集到的信息，使我们能够断言情况正好相反。克里斯蒂娜的状态仍旧一样。我们见到了一些发作，类似于她在监狱中、在审议室以及在预审法官先生办公室中曾有过的发作。

收容入院只是事实的逻辑延续。很久以前就本该介入了。

然而，在召请 Lamache 医生与省长命令之间，可以安置 Clémence Derée 的一次介入，这次介入在许多方面仍然是谜一般的。她在强制安置决定中占了什么份额？直到今天仍无法回答。她亲手写的一封信，日期为 1934 年 5 月 20 日，提出了这个谜的诸要素：

勒芒，1934年5月20日

我亲爱的小克里斯蒂娜

我给你写这两句话，是为了得到你的消息，也得到关于你健康的消息：你是否好好吃饭，你是否工作；如果你给我你的消息，那会让我非常高兴。我们要有勇气，照医生叫你做的去做，这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我好。你曾经那么勇敢，人在生活中必须有勇气。请在你的信里告诉我你是否痛苦，并且像我一样做，要有勇气。你看莱娅怎样工作，你也会做到的。相信你的母亲，并永远做个好女儿。那里的主任先生和夫人，以及围绕着你的所有女主人，要做个好女儿。你会高兴见到我的。勇气，勇气。你看，我有勇气，可是必须有勇气；上天不会抛弃那些有你这种勇气的人。必须说：我要工作，好好吃饭。

你们的箱子都在家里，我照看你们所有的东西。对那些围绕着你的人做个好女儿，好好工作”如果主任先生对你的

> 工作满意，我会很幸福。你可以相信，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还有你的小妹妹莱娅，她为你做一切。你看，她在工作。我结束我的信，全心亲吻你。

> 你的母亲 Clémence Derée，Saint Pavier 街 14 号，N° 14，Cité，Le Mans，Aumon 先生家。[注3]
>
> [注3] 勒芒，1924年5月20日
>
> 我亲爱的小克里斯蒂娜
>
> 我给你写这几句话，是为了得到你的消息和你健康的消息，想知道你是否吃得好，是否工作；如果你给我你的消息，我会非常高兴。鼓起勇气，好好做医生告诉你去做的事，这是为了你的好，也是为了我的好。你曾经那么有勇气，人生中必须有勇气。在你的信里告诉我你哪里痛，等等。像我一样，有勇气。你看莱娅，她工作，等等。你会做到的，相信你的母亲，等等。永远做个好小女孩。主任先生和夫人，以及所有你的女教师，所有围绕着你的人，都在；做个好小女孩，你会高兴见到我的。勇气，勇气。你看我，〔原文此处字形不明：jesmains〕，必须有勇气。上天不会抛弃那些有勇气的人。必须说：我要工作，并且好好吃饭
>
> 你们的箱子在家里，等等。我照料你们所有的东西。对那些围绕着你的人做个好小女孩，并且好好工作。如果主任先生对你的工作满意，我会非常高兴。你可以相信，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等等。你的小妹妹莱娅，她为你做一切。你看，她工作。我结束我的信，全心亲吻你
>
> 你的母亲 克莱芒丝·德雷（Clémence Derée） 圣帕维耶街14号，勒芒市区14号 奥蒙先生家

既然这里同时涉及医生和主任，就可以认为 Clémence Derée 当时是由中央监狱主任告知了克里斯蒂娜的健康状况。但还不止如此。这封信最终到了精神病院，信封上有手写注明：“从中央监狱带来的信”。可是，这个信封没有邮票，这暗示它是由 Clémence Derée 本人带到监狱的，因此，在她获知克里斯蒂娜处于何种状态时，她应当从 Le Mans 来到了 Rennes。遗憾的是，监狱没有探访登记，这一推测未能得到确认。

Clémence Derée 在强制安置决定中起了什么作用？很可能永远无法确切知道。然而，事实仍然是，她前往 Rennes 这一点，在如下方面是有分量的：

这将被定位为越入行动之后母亲/女儿关系的一张新网络。此外，至少时不时地，她会获知或持续获知克里斯蒂娜的健康状况。下列文件为此作证：

> 医疗通报。1934 年 4 月 30 日

> 身体状况不稳定。病人的体力正在

> 逐渐衰弱，恐怕近期会出现致命结局。

> 病人若能收到您的探访，会感到高兴。

> Mouchette 医生

> （此信曾寄给 Derée 女士，勒芒 Prémartine 街 61 号。被退回，并于 1936 年 5 月 5 日寄往 H. P.。）

到达精神病院 24 小时后，Guillerm 医生起草了一份医疗证明：忧郁状态，哭泣，拒绝进食；她请求允许她

> 不进食，因为她不应活着，既然她已被判处死刑（真实事实）。焦虑伴心动过速。

> （1934 年 5 月 25 日）

我们得以同 Guillerm 医生访谈，并在此感谢这次于 1983 年底进行的访谈。

G. 医生告诉我们，在那个时代，罪犯从监狱转入医院是非常罕见的。克里斯蒂娜被接收入医务室；她一直待在那里直到 1937 年 5 月 18 日去世。医务室是一座看护更为严密的病区。

如今我们已不再拥有克里斯蒂娜的病历。G. 医生提出一种假设，即病历在 1944 年的轰炸中被毁。当时护士和病人中约有一百名遇难者，因为那时 G. 医生的科室负荷特别沉重（战争期间，病人曾多达一千名）。尽管人数惊人，G. 医生“从未忘记克里斯蒂娜·帕潘”。

他说，她进入科室时，在其表现中可以看到一种忧郁的调子：“有正当根据的自我控诉”，他补充道。很快，克里斯蒂娜变得“否定性/拒绝性的”：“她沉默不语”，“身体和脸都一动不动”，“什么也不要求”。她拒绝独自进食，但“允许人喂她”：她让人喂食（也许通过探管，G. 医生对此不记得了），让人给她清洗，让人把她带到 G. 医生的办公室。事实上，G. 医生每天查房时都在她床边见到她，有时也让她到他的

办公室来：在那里，她保持同样固定的态度，然而在姿势上并不呈现僵硬：“没有任何东西吸引她的注意。我会记得的”；甚至脸部表情、面部动作、目光都不动。她一动不动，沉默无言，切断了同所有人的一切交流，甚至包括同护士们的交流：“我感觉她在别处，不在科室里。”

“在那个时代，我们没有任何治疗手段：也许后来，她本可以接受电休克、Sakel　疗法、脑叶切除术。”

“我曾试着同她谈罪行本身，也谈她，谈她的历史。只有一次，在她住院很久以后，她吐出了几句话，谈到 Lancelin 家珠宝的邪术。这是她唯一一次说话。”

在她住院的整个期间，克里斯蒂娜没有收到任何探访：既没有来自她的家人（母亲、姐姐）的，也没有来自精神科医生的。在科室里从不担心她会躁动，相反……从来没有任何时刻想到一种可能的越入行动：自杀、暴力发作或躁动。仿佛她总应当停留在瘫痪状态中，停留在她的不动与她的缄默之墙里。

对于 G. 医生来说，这是一种精神分裂症性演变。

由于营养不良，克里斯蒂娜在他的科室中死于肺部或骨骼的一种疾患。

G. 医生认为，在 Le Mans 警察局所作的交涉是一个“被迫害性的”过程。但他并不认为，这一事实本来就能正式地使人预见越入行动。在那个时期，两姐妹勤劳且适应良好；雇主和女佣似乎都很满意。Lancelin 先生没有考虑市长的警告，后者曾认为她们“疯疯癫癫”。

同样，G. 医生向我们指出，专家们的错误在于没有把这个“被迫害性插曲”考虑进去。

鉴定由三位专家完成：巴黎的 Baruk 医生和 Truelle 医生，以及勒芒的 Schutzenberger 医生。他们共同接见被告，但只有本地专家 S. 医生撰写鉴定报告，并取得另外两人的同意。在帕潘姐妹那场轰动一时的审判之后，Truelle 医生在庭审中发言时便不再被认真看待。于是他同 G. 医生取得

联系，询问他是否不认为克里斯蒂娜的个案乃是监狱性精神病的个案。G. 医生尽管 Truelle 曾是他的旧日上司，却断言相反：这并不是一个监狱性精神病的个案。

在 G. 医生看来，这涉及一种二联性精神病（folie à deux），其主动因素是克里斯蒂娜，因为莱娅在同她姐姐分离之后，恢复了正常的行为。服刑十年之后，她同母亲一起住在南特，并于两年前去世（1982 年）。

G. 医生让我们注意到，关于克里斯蒂娜在行动时的责任能力这一司法错误，对她而言并未改变什么，因为她最终被送入精神病院住院。

一位幽默作家说过：“吃东西的人并不孤单。”精神病性恶病质让我们得以瞥见疯狂能够把它的效应延长到何种地步；有机体的生命功能受到影响：吃、喝、睡，最后是呼吸。由于其决绝的特征，这种自溶方式令人想起梭伦的自杀或塞内卡的自杀，那些分两个时段完成的自杀，并且正因如此，它们如此强烈地震撼了想象。精神病性恶病质把这种反复推到它的极限：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坚决地实行自我毁

灭，如同以顺势疗法的剂量进行，直到厄洛斯最终让步。Guillerm 医生的证词引导我们把精神病性恶病质定位为一个具有其连贯性的过程的逻辑结局，而不是一个偶发事件。存在一种精神分裂症式的连贯性；所谓“无动机的笑”，只不过是那些其动机从我们这里逃逸了的笑。

最后一个临时性的词，将由《Ouest-Eclair》专栏作家的笔下，以 vox populi（民众之声）给出：

> 克里斯蒂娜·帕潘死了……她于星期二夜间约 22 点，在雷恩的 Saint-Méen 精神病院去世。
>
> 三年来，她被置于 Guillerm 医生的监护之下，Guillerm 是该院杰出的主任医师之一，对她施以照料。但克里斯蒂娜·帕潘的状态并没有好转。相反……她沉默寡言，几乎从不说话，卧床不起。多次不得不强行给她喂食，因为她拒绝摄取任何食物。有时，她会被猛烈的怒火攫住，以至于她的同伴以及被叫来照料她的人都惧怕她。在罕有的时刻，当她同意说话时，同一句话总是来到她唇边：“求求您，先生，”她恳求道，“让我死吧。”
>
> 也许是对其罪行的悔恨，推动她渴望消失。然而，她一次也没有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在星期二夜里慢慢熄灭，没有一声抱怨，确切地说，是被她强加给自己的种种剥-

夺所熄灭。克里斯蒂娜·帕潘对自己执行了人间司法向她宣判的死刑。在中央监狱里，她的妹妹莱娅继续赎罪。

尾声 I- 克莱芒丝的放弃

克莱芒丝·德雷对她女儿的死作何反应？她大约三年前的一封信，见证了她对于女儿疾病的立场：

勒芒，1934 年 8 月 7 日

主任先生，我请求您劳驾告诉我关于我女儿克里斯蒂娜·帕潘健康状况的消息，以及医生先生是否看出她可怜的脑袋会不会回到它的位置上；不幸的是她没有及时得到照料，总之，医生先生，如果可能，我指望您。

您能够体会我的痛苦，如果她谈到我，她的母亲，请您想想，先生，我是多么痛苦，先生

致以我全部真诚的感谢。

Clémence Derée

N° 14 rue St. Pavin la Cité. 勒芒，Aumon 先生家[注4]

> [注4] 勒芒，1934年8月7日
>
> 主任院长先生，我请求您，如果您愿意，请您好心给我一些关于我女儿克里斯蒂娜·帕潘健康状况的消息，并且如果医生先生看出她可怜的头脑是否会恢复清醒；不幸的是，她没有及时得到照料，总之，医生先生，如有可能，我指望您。您能理解我的考验，如果她谈到我，她的母亲，先生，请想想我受到了何等考验。先生，我所有诚挚的感谢。 克莱芒丝·德雷（Clémence Derée） 圣帕万街14号，市区。 勒芒，奥蒙先生家

在这封信的边上，今天可以读到：“1937 年 5 月 18 日写给母亲，使她知晓其女儿绝望的状态。”不知道 Clémence 是否去了雷恩参加克里斯蒂娜的葬礼。不过，此事不大可能，因为她在 1937 年 6 月以书面方式回复了中央监狱主任的一封信，可以推测该信通知了她死亡一事；如果 Clémence 曾在雷恩，她当然会去监狱探望莱娅，并会在当地直接处理克里斯蒂娜物品的问题。

勒芒（？）1937 年 6 月

雷恩中央监狱主任先生[注5] 答复您 1937 年 5 月 22 日的通知，我向您声明，我放弃留在贵机构中、曾属于（appartenue）我女儿帕潘·克里斯蒂娜的一切，她于 5 月 18 日在雷恩 St Main 精神病院去世。请主任先生接受我恭敬的问候

> [注5] 考虑到这封信中的拼写错误很少（相对于克莱芒丝的其他书信而言），我们可以承认，她在撰写此信时例外地得到了帮助。

Clémence Derée 14 rue St Pavien La cité Le Mans Sarthe[注6]

> [注6] 勒芒，1937年6月（？）日
> 雷恩中央监狱院长先生，答复您1937年5月22日的通知，我向您声明，放弃贵机构中所有遗留的、曾属于我女儿克里斯蒂娜·帕潘的物品，她已于5月18日在雷恩圣曼收容院去世。院长先生，请接受我恭敬的问候
> 克莱芒丝·德雷 萨尔特省勒芒市城内圣帕维安街14号

由此得到确认的是，必须不折不扣地等到克里斯蒂娜之死，她的母亲才会放弃对属于其女儿之物的掌控。以转喻方式而言，她的东西具有克里斯蒂娜本人的价值；事实上，这涉及一种所属的纽带；Clémence 把 appartenu 写成 appartenue 的那处“拼写错误”便见证了这一点。Clémence 的信件表明，在越入行动之后，她仍不停地向自己的女儿们下达指令 [参见 1934 年 5 月 20 日的信：“如果你好好吃饭，如果你好好干活——如果你忍下去 [ravales]，如果你重新吞下去 [ré-avales]——那会

给我如此巨大的快乐”，“这是为了你的好处和我的好处”，“像我一样拿出勇气”，“永远做一个好姑娘”，“必须说我要工作并且好好吃 [maagés] 饭”，——¡és!—][注7]。连吃本身都构成了一个母亲训令的对象！必须等到精神病性恶病质发生，Clémence 才会放弃命令。

> [注7] [这是指与 a manger 同音的动词词尾，但由于以 és 结尾，产生“被吃掉的”。译者注]

尾声 II：莱娅

带着一种惊人的容易，莱娅在越入行动之后，在勒芒监狱中那些事件之后——在那里她被迫面对克里斯蒂娜已经同她彻底决裂这一事实——可以说，莱娅换了手[注8]，置身于其母亲的依附之下，同时并非没有保留对克里斯蒂娜无可置疑的爱，但这份爱注定得不到回应。相对于两姐妹同其母亲决裂之后形成、并本应维持到勒芒监狱事件之前的情境而言，对莱娅来说，新的配置是严格倒转的：曾选择克里斯蒂娜作为女主人（她同 Clémence 的决裂乃是克里斯蒂娜的决裂，而她对此表示赞同），这一选

择伴随着一种被隐秘维持着的对 Clémence 的爱；从此刻起，这被采纳 Clémence 作为女主人所取代，并伴随着一种对克里斯蒂娜的爱，而鉴于其对象，这种爱绝不可能找到它的担保。我们通过关于莱娅在狱中生活以及出狱后生活的少数文件所能瞥见的事实，看到这种倒转在其中得到了意指。

> [注8] [其意义为在执手者之后玩牌的人。译者注]

自抵达雷恩起，莱娅便同 Clémence 取得联系。后者立即回复：

勒芒 1934 年 2 月 26 日 主任先生 先生

我收到了我亲爱的女儿莱娅·帕潘抵达雷恩机构时写给我的信，随信附上一张与我有关的纸，作为克里斯蒂娜·帕潘和莱娅·帕潘的母亲，您此刻那里有我的两个女儿

主任先生 致以我真诚的感谢

Derée Clémence，Rue Saint Pavien La cité N° 14 Le Mans Sarthe[注9]

> [注9] 勒芒，1934年2月26日
> 院长先生
> 先生
> 我已经收到我亲爱的女儿莱娅·帕潘在抵达雷恩机构时写给我的信，我随信附上一份与我有关的证件，因为我是克里斯蒂娜·帕潘和莱娅·帕潘的母亲，而您此刻收容着我的两个女儿
> 院长先生 我诚挚的感谢
> 德雷·克莱芒丝，圣帕维安街 勒芒城内14号，萨尔特省

在莱娅服刑期间，Clémence 同她以及监狱当局保持联系，并向后者慷慨提供她的好建议（！）：

勒芒 1939 年 4 月 23 日 主任先生

我荣幸地请求您愿意寄给我一份我女儿莱娅·帕潘的生存证明，她在中央监狱中，登记号为 N° 86-78，因为我的社会保险需要它，请主任先生接受我全部真诚的感谢，主任先生，我始终指望您给予我女儿莱娅·帕潘您能够给予的良好照料 [bon secours]

同 Papin 离婚的 Clémence Derée[注10]

> [注10] 勒芒，1939年4月23日
> 院长先生
> 我荣幸地请求您愿意给我寄来一份我女儿莱娅·帕潘的在世证明，她在中央监狱，登记号为86-78，因为我的社会保险需要它。院长先生，请接受我全部诚挚的感谢。院长先生，为了您能够给予我女儿莱娅·帕潘的良好救助，我始终指望您
> 与帕潘离婚者 克莱芒丝·德雷

克莱芒丝替莱娅请求，并且是经由监狱主任请求那些“良好照料”［bon　secours］；而这些照料，她曾激烈地拒绝给艾米莉亚，它们来自好牧人［bon pasteur］修道院圣奥古斯丁会的修女们。

在她的三个女儿中，长女将归于上帝，次女归于疯狂，而最小的女儿，最终，将回到她那里。正因如此，我们发现莱娅的一封信，它正是 Clémence 曾寄给中央监狱主任的那则信息的精确对位与倒转；那则信息中，她告诉主任，她放弃留在监狱中、属于克里斯蒂娜的一切。两年后，并且始终经由监狱主任，那则信息在莱娅笔下返回给她：

登记号 N° 8678 工场 2 雷恩监狱，1939 年 8 月 6 日

主任先生

我荣幸地向您的仁慈提出请求，请允许我在我母亲下次来访时把我的衣物用品交给她，

请主任先生惠予接受我最深切的敬意

莱娅·帕潘[注11]

> [注11] 登记号8678 第二工场 雷恩监狱，1939年8月6日
> 院长先生
> 我荣幸地向您的仁慈提出请求，请准许我在我母亲下次探访时把我的衣物用品交还给她。 院长先生，请接受我最深切的敬意。
> 莱娅·帕潘

在她女儿服刑期满时，Clémence 将会来同她一起定居在南特；这一情形将一直维持到她去世。

但在克里斯蒂娜死亡之前，莱娅的两封信证明她牵挂着自己的姐姐，更有甚者，通过某些举动，她把自己的爱意传达给她，越过那一场景的重复，在那场景中克里斯蒂娜向她表明，从此刻起，她不再

承认她就是莱娅 [参见 Lamache 医生的鉴定：“如果她是我妹妹，我就不会处在我如今所处的状态”]。

1934 年 2 月 17 日 主任先生

我今天刚收到 185 法郎这笔钱，我希望您能好心把 120 法郎这笔钱放入我姐姐可支配的个人款项中

请先生接受我深切的敬意

莱娅·帕潘[注12]

> [注12] 1934年2月17日
> 院长先生
> 我今天刚收到185法郎这笔款项，我很想请您仁慈地把120法郎这笔款项放入我姐姐可支配的储金中。院长先生，请接受我深切的敬意
> 莱娅·帕潘

1935 年 2 月 3 日，致雷恩精神病院主任医师

先生

如果您愿意好心给我一些我姐姐的消息。

请先生接受我深切的敬意

莱娅·帕潘[注13]

> [注13] 1935年2月3日，致雷恩收容院主任医师
> 先生 如果您愿意仁慈地给我一些我姐姐的消息。先生，请接受我深切的敬意
> 莱娅·帕潘

我们将看到，在她的一生中，莱娅都将培植这种对克里斯蒂娜的爱。在狱中，“最严厉的制度”以其全部重量压在她身上。

1938 年，她提出一项假释请求，由此产生一份个人通知，于 1938 年 1 月 24 日寄给 Ille-et-Vilaine 省省长和勒芒共和国检察官：

健康：良好，适合一切工作。

工作：分配至雨衣制作工场。非常好的女工。

性格、道德、行为：性格温顺。行为非常良好。道德方面无不利观察。

受教育程度：小学。

同家庭及第三方的关系：同其母亲保持定期且亲切的通信，

积储款（Peculio）：PR 206，PD 920，来自劳动。

诉讼费用：诉讼费用已经支付。

自由生活中可预见的行为：

释放后的生计手段：其母亲 Derée Clémence 女士，厨娘、帮工，居住在……街 14 号，承诺在假释情况下接收被判刑者，为其寻找工作和生计手段。

释放后的可能住所：导致判刑的事实发生在勒芒，而被判刑者若获假释，也将在同一城市栖身。

证明、介入以及第三方承诺：Derée Clémence 女士的承诺，她是厨娘，居住在……，承诺接收其女儿，并为她寻找工作和生计手段。勒芒警察局长的资料。

特别观察。

监督委员会意见：委员会未开会。主任意见：赞成意见。

尽管有这一赞成意见，请求仍将被驳回：

司法部长致雷恩监狱主任的信，1938 年 3 月 12 日：“驳回假释。如果她仍然表现得当，1939 年 3 月可作为新的提议提出。”

在这一驳回通知给她之前，莱娅就已经抱怨强加给她的工作过于严酷。

1938 年 2 月 27 日 主任先生

我来请求您把我从第 2 工场调出，因为我觉得整天站着非常疲惫，而且轻汽油味让我很难受。因此，由于我还有 5 年要服，我希望坐着服完这段时间。

请您，主任先生，接受我深切敬意的表达

莱娅·帕潘[注14]

> [注14] 1938年2月27日
> 院长先生
> 我前来请求您将我从第二工场降级，因为我觉得整天站着非常疲惫，而且汽油味使我很不舒服。因此，由于我还有5年要服，我希望坐着度过这段时间。院长先生，请接受我深切敬意的表达
> 莱娅·帕潘

> 答复：为此请接受医疗检查。主任。

两年后，同一抱怨的重申：1940 年 4 月 14 日 主任先生

我来向您的高度仁慈请求给予十分之一的恩惠，因为我在做苦役，而现在这很艰难，因为

一切都如此昂贵。我会十分感激您。

请主任先生接受我深切的敬意

莱娅·帕潘[注15]

> [注15] 1940年4月14日
> 院长先生
> 我前来向您的高度仁慈请求十分之一的恩惠，因为我服的是苦役，而现在一切都这么昂贵，这很艰难。 我将对此感激您。院长先生，请接受我深切的敬意
> 莱娅·帕潘

> 答复。为此请接受医疗检查。主任。

莱娅于 1943 年按预定日期出狱。

在法律上赎清其刑罚之后，她的生活变成了什么样？人们知道的很少。Paulette Houdyer 在她为《Le Diable dans la peau》（《皮肤里的魔鬼》）所投入的历史调查期间见过她，她把她说成一个“灰色的”、沉默的女人；除了当她让莱娅知道自己对这件案子的看法，即按她的意见，她（莱娅）曾深深爱过自己的姐姐时流下沉重的眼泪之外，她什么也没能从她那里获得。Paulette Houdyer 当然没有坚持，

《France-Soir》一名记者于 1966 年 9 月 16 日的访问则没有那么克制。他的报道确认了这样一种景象：一个沉默的、灰色的、几乎如同影子的女人。但莱娅在那一天，将会对此说得更多。尽管相较于我们在三十年代小报中能够读到的东西，其“新闻报道”风格有所退化，我们认为仍应转载这篇文本；它是我们今天所掌握的关于莱娅入狱之后的唯一文献。

栏目题为：“法庭明星，你们后来变成了什么”；三栏标题宣告：“莱娅

> 帕潘肢解了由她姐姐杀害的两位女主人尸体：如今她想成为修女”（这个标题有两个历史错误和一条未公开的信息：莱娅希望在 Bon-Pasteur 修道院作为修女退隐）。

每到星期六 17 点整，一个有点灰色的老女仆，穿着灰色罩衫和灰色棉袜，便从服务门离开她工作了一整周的豪华酒店。她小跑着穿过法国西部一座古老城市的灰色小街，而我曾发誓要对这座城市的名字保密

她把一个因白围裙而鼓胀起来的手袋紧贴在胸前；那些白围裙被她卷在一张身份证明周围，这张证明二十多年来她从未给任何人看过。在那份因磨损而发灰的文件上，工整地写着她的真实姓名：莱娅·帕潘，1912 年生于勒芒。自 1941 年出狱以来，她一直试图逃脱这个名字的魔咒，甚至连她的雇主们都不知道这个名字。徒劳！

事实上，她可以满怀快意地想象自己名叫玛丽，那是她作为女仆的名字；此时她跪在圣母小堂里，每当她回家度每周休息日时，总会在那里停留。她的祈祷被她的谎言毒害了。她站起身，在提包上偷偷画了一个十字，回到街上，奔向自己的房间。她把门闩插上，躺到自己的铁床上。

于是她就在这里，这个著名的玛丽，被她的过去填满。而从她的肉身与记忆深处复活的，是莱娅，那个反叛者、爱着的人和罪犯。

于是她起身，并且小心翼翼，绝不让自己在镜子里猝然撞见那张有着不对称的灰色眼睛的脸；那面镜子被她放在房间的一角，也许是无意识地放在那里，太阳永远不会去那里发现她的形象。她走向餐具柜，从一个抽屉里掘出照片。所有照片都呈现同一个姑娘，神情高傲，眼睛狂野，头发乌黑：她的姐姐克里斯蒂娜，在被判处死刑后两年，疯死于雷恩的一家精神病院。莱娅在14岁时就被安置为女佣，她保留着一种清洁癖，因此她用一块柔软的布擦拭那发亮的影像。一种爱抚。

而莱娅在狭小的房间里来回走动。她洗自己的围裙，打扫卫生，

她坦白说：

> ——我尽我所能，让我的房间始终只是一个普通房间，也让我的姐姐克里斯蒂娜，她从天上看着我（因为我确信她在天堂），不要嘲笑我。我为她祈祷。我为我们的母亲祈祷，她曾来这里同我一起生活，直到她去世。“为了帮助我”，她说……于是突然间我再也不能祈祷了。克里斯蒂娜看着我。她总是美丽而年轻。她像从前一样微笑：带着讽刺！我垮掉了，缩成一团，因恐惧而出汗，昏厥过去……而我的房间里有一只箱子

> 那是一只带旧锁的箱子，圆盖掀起并折回时吱嘎作响，锁由两枚小插销固定，配有微小的钥匙。要找到钥匙、插进去、转动、拔出来、抬起那些勾在箱身挂钩上的金属舌片，需要一整套仪式

莱娅说，有时我会感觉仿佛有一只手麻痹了我的手腕，于是我把钥匙扔出去……我觉得自己就要做一件坏事。我站起身，发抖。我变老了。

确实，那只箱子装满了罪孽。从中逸出一片……之海

花边、细亚麻布、按往昔女裁缝的方式加工过的细麻布。从前，当太太只满足于平常衣物时，这些就是帕潘姐妹，那些女仆，在阁楼里为自己的节日打开的装饰品。

克里斯蒂娜，目光凶猛，把自己裹在有两指宽镂空的高贵衣裙里。莱娅，更爱打扮也更年轻，把自己裹在阿朗松针绣花边的白色雾气之中。尽管有莱娅的照料，花边和细麻布已经变得灰暗，像她的头发，也像她的影子；她不敢穿上这些遗物，只是在房间里、在盲目的镜子前把它们展开。

星期一，仍陶醉在那些魅惑之中，玛丽，那个女仆，抱歉，莱娅！又回到豪华旅馆里工作。

她常常被托付去擦亮餐具。刀子并不使她不安。若有人受伤，她便冲洗血迹，

> 冷冷地。只有一个迹象能够唤起她的回忆：她洗手、刷手、擦亮双手，时间如此之久，以至于那些年轻姑娘，她的同事们，会来快活地拍一下她的背：

——那么，玛丽，你在做梦吗?

> 灰色的玛丽，双手通红，也就是说双手流血的莱娅，把头低到洗手池的水流之下。她需要这种净化；如果有朝一日，她哪怕因针刺看见最小的一滴血涌出，她都会重复这种净化，直到死……

过去的幽灵灼烧着她，直至把她化为灰烬的颜色。莱娅·帕潘把她温柔的疯狂一直延续到她的遗愿：

> “当我不能再工作时，我请求在勒芒的‘善牧院’成为玛丽修女。我在攒钱，以便被接纳。在‘善牧院’，我的一个姐姐曾做过修女。我会再见到她……”

撇开那些第一人称的伪话语、那些伪第一人称的话语——据说它们会给可疑的胃口提供谈资——我们将从这份证词中保留一些

突出的特征：

* 莱娅穿着灰色，半服丧的颜色，全身都是灰色，包括购物袋。

* 莱娅以女仆身份工作。

* 莱娅让人称她为玛丽。这是她为自己晚年设想的玛丽修女的预先到来。

* 莱娅在家中保存着克里斯蒂娜的照片。

* 莱娅确认曾与克莱芒丝一起生活，并说明这种同居是出于她母亲向她提出的“帮助”的理由。

* 莱娅持有她与克里斯蒂娜在朗斯兰家“空闲”时制作的花边物件。这些花边

是否是介入某种仪式的恋物化对象？鉴于这篇文章的风格，不能这样断言。

还应注意，或许尤其应注意，莱娅的这最后一句话：它是文章中的最后一句（也是唯一被置于引号中的一句），同时也是我们所留存的她的最后一句话：当我不能再工作时，我请求在勒芒的善牧院成为玛丽修女。我在攒钱，以便被接纳。在善牧院，我的一个姐姐曾做过修女。我会再见到她……

也许正是这种“找到埃米莉”的渴望，应当同莱娅在 1942 年所作的奇异行动联系起来：她向萨尔特省省长提出请求。她向他请求暂时中止自己不得停留于勒芒的禁令（为期 48 小时）。这一请求是如何被说明理由的？可查阅的行政文件没有说明。只存留下两封信，第一封写于 1942 年 12 月 9 日，由萨尔特省省长致伊勒-维莱讷省省长。

莱娅请求获准自释放之日起在勒芒停留 48 小时。省长寄送勒芒警察局长报告的副本，并采纳其结论。

在这份日期为 1942 年 12 月 3 日的报告中，警察局长回顾说，以野蛮方式犯下的罪行远未被居民遗忘，而且莱娅的出现并不可取，因为她可能会同受害者家属成员发生接触。“不过，所援引的理由（如果这些理由是严肃的）以及十分有限的期限，若此人在拘押期间表现得当且未受到任何指责，则可成为在此情形下表示宽恕的一个理由，但须遵守以下条件”：莱娅须向警察局长报告自己的在场，以便他能在整个停留期间实施监视；她须承诺不前往犯罪地点，并避免同与朗斯兰夫人一家关系密切的人发生任何接触。

在 1943 年 1 月 30 日的信中，萨尔特省省长向伊勒-维莱讷省省长告知其决定：

答复您 1 月 27 日的来信，我对她来到萨尔特省，尤其是来到勒芒停留 48 小时，表示不赞成。

克莱芒丝·德雷，即便假定在那个日期她尚未与莱娅同住，也已经表明她完全愿意旅行；那么，莱娅要求这样一种许可，究竟是想在勒芒见谁呢？若不是那位被关在修道院里、不可能出行的人，那位在整个事件期间从未露面的人，那位此外也从未被请求出面的人，即埃米莉，还会是谁？

克里斯蒂娜和莱娅都从未能同埃米莉相聚。也许正是这次错失的相遇，使帕潘姐妹直到今天仍在向我们提出要求。

第二部分：早期研究

第二部分

早期研究

第 8 章

第八章

精神分裂症?

尽管拉康在其关于帕潘姐妹的文章中没有讨论精神分裂症的诊断，这一诊断似乎完全可以成立，尤其是从我们今天关于克里斯蒂娜在其越入行动之后的情况所知来看。如果事实上情形如此，那么就会提出一个问题：要知道这一诊断是否自越入行动之前就适用于克里斯蒂娜。相反，如果这一诊断对于之前的时期被排除，而对于越入行动之后的时期被保留，那么就应当把从偏执狂到精神分裂症的过渡设想为可能的（弗洛伊德曾明确考虑过一种类似的过渡）。[注1] 因而，我们被引向追问精神分裂症在弗洛伊德和拉康那里所处的位置，主要是相对于他们赋予偏执狂的特权而言。

> [注1]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关于一个自传性描述的偏执狂病例（Dementia paranoides）的精神分析说明》（Puntualizaciones psicoanalíticas sobre un caso de paranoia (Dementia paranoides) descrito autobiográficamente）。[1911]。阿莫罗图出版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976年，第XII卷，第71页

精神分裂症的诊断

正如 Guillerm 医生所表达的，克里斯蒂娜在雷恩医院中的态度，可以纳入精神分裂症的图景。静止不动、刻板地保持某种姿势的态度以及缄默，可以用“违拗症”和“意志缺失”这些术语来定义；而对朗斯兰首饰的邪术的暗示，可能是一种仍在活动的偏执样谵妄的表达。例如，下面是 Kraepelin 的一则观察，它让人想起克里斯蒂娜的行为：

> 这种对于各种印象都如此特殊且如此显著的反应缺失，同时伴随着智力和

> 记忆的保存，乃是我们正在研究的疾病的特征。更深入的分析还会使我们更加明了。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数周或数月躺着或坐在床边，没有丝毫从事什么事情的需要。他仿佛麻木了，既无动作也无表情，间或无缘无故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发笑，面部特征保持不动。至多偶然看见他翻阅一本书。他不说话，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当有人探访时，他也完全保持冷漠；他不询问家里的情况，几乎不打招呼，便回到自己的房间，仿佛没有体验到最轻微的感觉。给人写信在他看来毫无用处；况且他没有什么可写。然而有一天，他给医生递交了一份文字，前后无连贯，支离破碎，不完整，断断续续，带有幼稚的文字游戏。例如，他要求在治疗中有“更快乐”的东西，有一种完全自由的运动以扩大视野；他想要——ergo——在课程中稍微减少一点精神；并且——nota bene——他以上帝之爱请求不要被同无辜者俱乐部结合起来；工作的使命是生命的香膏。”[注2]
>
> [注2] 克雷佩林，E.《临床精神病学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psychiatrie clinique），Analytica文库，Navarin，巴黎，1984年，第31页。

对于 Kraepelin 而言，“违拗症表现为她（他在评论一名女病人的病例）对每一次针对她所作尝试的愚蠢抵抗，表现为她自愿的缄默，最后表现为完全不可能对她取得任何影响”。[注3]

> [注3] 克雷佩林，E.，同前引书，第41页。

至于意志缺失，以下是 Bleuler 对它的说法：

> 病人显得懒散而怠惰，因为他们不再受到任何推动。他们什么也不做，既不自发地做，也不因某个命令而做。有时他们多年待在床上。如果在轻型形式中他们体验到愿望和恐惧，他们也不做任何事来避开后者或实现前者。但还可以观察到意志衰退的其他形式：一些病人无法抵抗外部或内部的刺激，甚至达到犯罪冲动的地步。[注4]
>
> [注4] 布洛伊勒，E.《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由H. Ey摘要翻译，精神病学研究圈，1964年，第18页。

这种精神分裂症者越入行动的可能性，曾由 Guiraud 在一篇标题颇具提示性的文章中加以研究：“

青春型精神分裂症者的无动机杀人，疾病的释放性反应”。[注5]

> [注5] 吉罗，P.与B.卡耶，《医学心理学年鉴》（Ann. Med. Psych.），1928年11月，第11卷，第352页。

按照 Guiraud 的说法：“这些病人的全部意义在于其暴力的怪异性，在于其反社会反应的表面不连贯性。事实上，所涉及的正是完全无动机的杀人或杀人未遂。”但是，按照 Guiraud，这并非无动机：“暴力反应于是同时显现为一个正在跌入漠然与无行动的有机体最后一次能量的跃动，并且显现为一种欲望转移的结果：从‘治愈疾病’的欲望转移到‘消除社会之恶’的欲望上（通过一种在青春型精神分裂症者中常见的言语与象征的谬推：杀死恶 = 杀死疾病）。”

那么，“无动机”的越入行动似乎并不是偏执狂的特有属性。于是人们可以问：克里斯蒂娜在她的越入行动之前是否就已经是精神分裂症者；套用 Guiraud 的术语，这一越入行动是否对应于一种象征性欲望的转移。

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学

作为备忘，我们列出了 Kraepelin 和 Bleuler 用以描述此疾病的术语：

在 Kraepelin 那里

1. 情感性的缺失，同时伴随判断力的丧失。
2. 冷漠，反应缺失。

1. 对病症无意识。

1. 缄默。

1. 发笑，做鬼脸。

1. 伸手的方式：“向他们伸出张开的手，他们把自己的手完全僵硬地放上来。”

1. 将早发性痴呆同偏执狂区分开来的荒谬谵妄观念：“谵妄表现坦率说是荒谬的，并非出自脑的工作。病人并

像真正的偏执狂那样感到有必要抵抗、确切地认识他人、知晓自己受到迫害的原因；在这里，你们可以随意改变迫害者的人格。诚然，谵妄可以被修改，但它以自身为支撑；它从不是由一种关于事物的特殊构想所组织起来的：它以突发的、离奇的、不连贯的观念形式安置下来，常常受各种感觉性幻觉支配。相反，在偏执狂中，谵妄并入到具有现实存在的基础之上，但解释歪曲了 它们的本性。”[注6]

1. 古怪的语言，支离破碎的断言， 荒谬的措辞，断言的不连贯。
2. 刻板症。

> [注6] 克雷佩林，E.，同前引书，第204页。

1. 违拗症。

1. Befehlautomatie（对命令的受暗示性）。
2. 冲动，兴奋。

1. 紧张症。

1. 身体感觉。

在 Bleuler 那里[注7]

> [注7] 布洛伊勒，E.，同前引书。

可以看到一种症状的等级次序，它继发于 Spaltung：“分裂（Spaltung）是此疾病更复杂表现的先决条件。它给整个症状学打上特殊标记。但是，在这种根据某些情结而被系统化的分裂背后，我们发现了联想过程的一种原始松弛，它能够导致概念的不规则碎裂（Zerspaltung），甚至那些如此坚固以至于构成经验本身要素的概念也会如此。我想用精神分裂症这一名称来指称这两种分裂（Spaltung）形式，它们在作用中常常混淆在一起。”[注8]

[注8] 布洛伊勒，E.，同前引书，第98页

以下是不按顺序列出的征象：自闭、障碍、违拗症、联想障碍、侧答、不连贯、新词、词语沙拉、冷漠、不感兴趣、情感倒错、矛盾情感、幻觉、谵妄、缄默、作态、紧张症、冲动。

由此，可以提出若干观察：

1. 对疾病的描述由一种因果理论支撑（Kraepelin 是智力衰退，Bleuler 是 Spaltung）。因此，不能以批评组织这一描述的理论之名，来贬低一种临床描述。那些冒险的理论（如 Clérambault 的理论）毕竟曾使临床描述成为可能（例如精神自动症的描述）；这些描述不仅严谨，而且还能传达，并可输出到其他理论中。反过来，那些以某种抽象的交流理想之名而自称无理论的描述，只能达到一种模糊、灰暗、混乱的症状学。[注9]

[注9] 最近的例子是《诊断与统计手册》（Manual de diagnóstico y estadística），以DSM III之名为人所知，Masson，巴塞罗那，1983年。

1. 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学主要依靠理解这一概念（就其缺席而言），既在姿势动作层面，也在语言层面。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征象中许多都来自主观评估（作态从哪里开始？），便可以理解精神分裂症的诊断何以被过度使用。

1. 根据前文，这个实体作为一组杂乱征象的共同分母而存在，看起来同一种运动相连：病人的对话者通过这一运动显现出这种主体性，理解给这种主体性标出界限。

另一个临床事实值得强调。可以说，在偏执狂中有一种向主体的向心运动（通过其解释，一切都看着他，一切都对他说话、涉及他、同他相关），而在精神分裂症者那里，观察到的更像是一种离心运动：在谵妄中，所涉及的是一些似乎同主体没有关系的东西（世界的秩序、行星、抽象概念、语言的概念……）。人们常常被引向追问：主体以何种方式被他所陈述的东西所牵涉。事实上，他被他人身体的完整性、他人语言的完整性所牵涉；但他不能通过大他者说出这一点。

关于精神分裂症者的越入行动，我们提出如下假设：它对应于一个偏执狂时刻，在这个时刻，主体试图在镜中给自己构成一个形象，在

他向其发出的攻击中。作为符号并作为功能的自我[注10]会进入实在界。这样一种假设，将使以偏执狂来解释帕潘姐妹的越入行动，同曾负责她们的精神科医生所提出的精神分裂症诊断彼此相容。

[注10] 参见尤其是：拉康，J.，1954年12月1日和8日研讨班。[《弗洛伊德理论和精神分析技术中的自我》（Le moi dans la théorie de Freud et dans la technique de la psychanalyse）]。

弗洛伊德论精神分裂症

弗洛伊德和拉康都未曾表现出同精神分裂症有很多亲缘性；而拉康看来甚至比弗洛伊德更少。

这也许部分地是由于历史原因，由于这样一个事实：Bleuler 曾作过一些胆怯的尝试，向弗洛伊德靠近，而 Jung 在苏黎世的 Burghölzli 是他的学生。以下是 Jung 就 Bleuler 关于精神分裂症一书写给弗洛伊德的话：“他在那里做了卑劣的事情，意在搅浑我们关于 dementia praecox 的清澈观念。”[注11]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向 Jung 明确说：“我写偏执狂，而不是 dementia praecox，因为我认为前者是一个好的临床类型，而后者是一个糟糕的疾病分类学术语。”[注12] 在关于 Schreber 的文本中，弗洛伊德再次批评 dementia praecox 和精神分裂症这两个术语：“鉴于偏执狂同 dementia praecox 的紧密联系，人们不能不追问，对前者所阐明的构想，最终会对当前关于后者的构想产生何种影响。我认为 Kraepelin 所采取的步骤是完全有理由的，即把此前被称为‘偏执狂’的许多东西，同紧张症及其他形式一起，融合为一个新的临床实体，尽管为这一单元选择‘dementia praecox’这个名称乃是一项失误。对于 Bleuler 为这同一组形式提出的‘精神分裂症’这一称谓，也可以提出反对意见：只有当人们不记得它的字面意义时，它才显得可用；此外，它预先判断得过多，因为它用一个在理论中被假定的特征来命名，而这一特征还并非它所独有，并且从其他

> [注11] 《弗洛伊德—荣格通信》（Correspondencia Freud-Jung）。[1911年10月6日荣格致弗洛伊德信] Taurus出版社，马德里，1978年，第511页
>
> [注12] 《弗洛伊德—荣格通信》（Correspondencia Freud-Jung）。[1908年2月17日弗洛伊德致荣格信]，同前引书，第161页

观点来看，不能被宣称为本质性的。”[注13] 弗洛伊德提议以 parafrenia 一词取而代之。

> [注13] 弗洛伊德，同前引书，第69-70页。

因此，关于这一病症名称的讨论，同如何刻画一种为其所特有并属本质的机制这一问题联系在一起。弗洛伊德根据经济动力学来界定它，因为“从力比多理论的观点来看，可以把它[偏执狂]同 dementia praecox 区分开来，依据的是易感固着的不同定位，以及被压抑者回返（症状形成）的不同机制，尽管它同后者共有真正意义上压抑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力比多的脱离，并伴随向自我的退行”。[注14] 还有：“易感固着必须被置于比偏执狂情形更靠后的位置，也就是说，它包含在这样一个发展的开端：该发展从自体爱出发，趋向对象之爱。”[注15]

> [注14] 弗洛伊德，同前引书，第70页。
>
> [注15] 弗洛伊德，同前引书，第71页。

从这里出发，弗洛伊德不仅能够重新归组症状，而且尤其是对这些症状的价值作出一种反转；它们不再是缺陷的标志，而是获得了治愈尝试的价值。[注16]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选择，并且对于任何治疗性进路都具有决定性；弗洛伊德将经由《自恋导论》[注17] 直到他关于精神病的最后几篇文章（1924）[注18] 来确认这一选择。

> [注16] 弗洛伊德，同前引书，第71页。

[注17] 弗洛伊德，S.《自恋导论》（Introducción del narcisismo）（1914）。第XIV卷，阿莫罗图出版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979年。弗洛伊德在那里区分了三组表现：那些对应于正常状态或神经症之保存的表现；病理过程的表现；以及对应于复原的表现。

[注18] 弗洛伊德，S.《神经症与精神病》（Neurosis y Psicosis）[1924]；《神经症与精神病中的现实丧失》（La pérdida de la realidad en la neurosis y la psicosis）[1924]。第XIX卷，阿莫罗图出版社。

从这一观点来看，精神分裂症同偏执狂之间的差异，并不是那种不允许从一个过渡到另一个的差异："一个病例可以以偏执性症状开始，然而发展为早发性痴呆；偏执样现象和精神分裂样现象可以按各种比例结合起来，并且可能产生像 Schreber 那样的病例，它配得上偏执性痴呆之名。"[注19]

[注19] 弗洛伊德，S.《精神分析说明……》（Puntualizaciones psicoanalíticas.....），第XII卷，第71页。

拉康所说的精神分裂症

拉康对精神分裂症的提及比弗洛伊德那里还要少。在关于帕潘姐妹的文章中，精神分裂症这一诊断并未被讨论。1931 年，拉康写了一篇题为《精神分裂书写》（Esquizografía）的文章。然而，在这篇文章中，尽管题目如此，尽管拉康强调的临床征象传统上属于精神分裂症：不连贯[第 378 页]、刻板症[第 376 页]、矛盾情感[第 378 页]，病人仍被呈现为一个偏执狂。[注20]

[注20] 拉康，雅克。《论偏执狂性精神病及其与人格的关系》（De la psychose paranoïaqu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ersonnalité）；随后附《论偏执狂的早期论文》（Premiers écrits sur la paranoia），Le Seuil，巴黎，1975年，第365页。[这篇文章在Siglo XXI版拉康论文的出版中被省略了]。

在他的论文中，拉康讨论了精神分裂症这一诊断——针对 Aimée——但这是为了拒绝它，并且顺带批评这一概念。[注21] 在《文集》中，只能找到一条关于精神分裂症的孤立而神秘的评论："对他[精神分裂症者]来说，整个象征界都是实在的。"[注22]

[注21] 拉康，J.《论偏执狂性精神病及其与人格的关系》（De la psicosis paranoica en sus relaciones con la personalidad）。Siglo XXI出版社，墨西哥，1976年，第184页。

[注22] 拉康，J.《对让·伊波利特关于弗洛伊德〈否定〉的评论的答复》（Respuesta al comentario de Jean Hyppolite sobre la Verneinung de Freud）。载：《文集》（Escritos），第一卷，Siglo XXI出版社，墨西哥，1984年，第377页

我们曾出席拉康 1974 年至 1979 年在 Sainte-Anne 的所有病人展示，并且把它们全部重读了一遍。只有一次提出了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在其中一次展示中，他讨论了紧张症的诊断，并断言紧张症是器质性的（1978 年 3 月 3 日）。有两次，他纠正了被考虑的诊断，说这不是精神分裂症，而在一个病例中是癔症，在另一个病例中是强迫症（1977 年 1 月 14 日与 1979 年 2 月 2 日）。1975 年 5 月 16 日，他就一名病人评论说："他是非社会性的，他没有置身于任何话语之中。不能以他不交流为借口就说这是自闭症：这是他没有被插入任何地方这一事实的后果。谈论自闭症是多余的；非社会性更精确。"

最后，以下是有一次，在 1977 年 3 月 11 日，拉康被引向给出精神分裂症诊断的方式：

> ——病人：……但必须把一切都囊括进去。我也是动物……处于过渡之中……对死亡毫无恐惧。错误并不来自我们。如果我的古鲁是假的，不，他不可能是假的，我相信他。

——拉康：为什么这个“我相信”对您如此重要？您的“我相信”是用来说“我”的。您的“我相信”是用来补偿药物效应的。它承载了药物效应的全部重量。

病人又作了几次回应，等他离开之后，拉康说：“我认为他是一个精神分裂症者。”

> [注23] 克雷佩林，E.，同前引书。

第 9 章

第九章

自我惩罚，还是自恋激情？

是那些精神病女性把拉康带向他所谓的朝向弗洛伊德的“一种滑移”，并带向“在不知情中应用弗洛伊德主义”。[注1] 如同 Aimée 和论文中另一位未被命名的女人（她写道：“我要在这里告诉您，我想以何种方式惩罚我丈夫的主要缺点，因为我重复一遍，死亡不是惩罚”）一样，[注2] 克里斯蒂娜和莱娅迫使他达到一种严谨性，等同于她们自己所施行的严谨性。四十二年之后，拉康继续把 Chesterton 的格言据为己有：“疯子并不是失去了理性的人；疯子是失去了一切，除了他的理性的人。”[注3]

> [注1] 拉康，雅克。《在北美大学的演讲与谈话》（Conférences et entretiens dans des universités nord-américaines），Scilicet，第6-7期，Le Seuil，巴黎，1976年，第15页。
>
> [注2] 拉康，J.《论偏执狂性精神病及其与人格的关系》（De la psicosis paranoica en sus relaciones con la personalidad）。Siglo XXI出版社，墨西哥，1979年，第302页
>
> [注3] 同上，第232页。

他这样宣称：“精神病是一场严谨性的试验。在这个意义上，我会说我是精神病的。我之所以是精神病的，唯一理由在于我始终试图成为严谨的。”……“弗洛伊德不是精神病的。不同于许多人，他不是精神病的，因为他对别的东西感兴趣。他最初的兴趣是癔症。”[注4]

> [注4] 拉康，J.《演讲……》（Conférences...），同前引书，第9页。

1975 年，拉康的这个“版本”强调的是：他曾经作出创新，发明了“一个相当奇怪的名称”：自我惩罚偏执狂；他本来不得不把自己的论文强加给当时的精神科医生。

在这一领域，他遇到弗洛伊德以及自恋问题，并不令人惊讶。自我惩罚以及所谓

“无动机”的“冲动性格”（triebhafte，驱力性的……）的谋杀，在当时——1925-1930 年间——引发了一场重要争论[注5]，这场争论分裂了精神分析家，并且质疑弗洛伊德关于自恋和第二地形学的推进。1932 年，拉康创造了“自我惩罚偏执狂”这一疾病分类学实体，由此进入这场争论，以自己的方式重提 Alexander、Melanie Klein 或 Reich 的立场；他没有明说，却站到了反对法国精神分析家立场的一边，并且抵达了一片在他看来尚属未知的土地：自恋。

> [注5] 见附录I。

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帕潘在 1933 年，借由“无动机”的谋杀及其“解决性”的越入行动，向他提供了一个新的病例，他以不同方式分析这一病例。他放弃了把自我惩罚作为行动及其解决的理由，并创造出在论文中仅仅被瞥见的东西：他对形象功能的第一个个人形式化。关于帕潘姐妹的这篇小文章，在镜像阶段的发明以及想象界与象征界的区分方面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这种区分将逐渐把拉康带向三联结构的发明：实在界、象征界、想象界。

拉康如何处理所谓“无动机”犯罪的动机，以及越入行动之“解决”的动机?

从 Aimée 到克里斯蒂娜和莱娅，他的立场发生了变化。他说，自己把论文挂在“自我惩罚的衣帽架上”：[注6] 但自我惩罚远非一个非常清楚的概念，而提供所期待澄清的也不是弗洛伊德；相反，每一篇文本都带来额外的困难。就拉康而言，他给出了自己对自我惩罚的解释。

> [注6] “这样，我们接近了越入行动的机制，哪怕仅仅是为了满足于自我惩罚这个衣架，它由柏林犯罪学借亚历山大和施陶布之口递给我们，我们也通向了弗洛伊德。”拉康，J.《论我们的先行者》（De nuestros antecedentes）。载：《文集》（Escritos），第一卷，Siglo XXI出版社，墨西哥，1984年，第60页。

越入行动的动机，更多地是由其他精神分析家（Alexander、Reich、Reik、Glover、Nunberg、Fenichel……名单很长）而不是由弗洛伊德本人来处理。此外，在法国，除了 Marie Bonaparte 之外，这一主题只由精神科医生涉及。关于超越受害者而被攻击者究竟是谁的问题，曾是争论对象；而由行动的实现所产生的治愈，则引发了深刻的对立。拉康在所有这些点上创造了自己的立场，并被引向提出最初的

他同弗洛伊德之间分歧的要素；这些分歧围绕自我知识、死亡驱力以及超我的形成，并且是面对弗洛伊德而清楚表达出来的。

如何界定自我惩罚的性质?

只谈自我惩罚，甚至不提罪疚感，这在拉康方面是一个真正的丑闻。他比所有弗洛伊德主义者都更弗洛伊德主义。他用半句话处决了罪疚感：“它代表自我惩罚的主体性一面。”[注7] 他将不再回到这一点。当然，在 1924 年，弗洛伊德已经成功“摆脱”——这个词并不过分——“罪疚感”这个表达，但代价是多少问题啊！

> [注7] 拉康，J.《论精神病……》（De la psicosis...），同前引书，第227页。

在罪疚感与惩罚需要之间：弗洛伊德立场演变中若干困难之点

《自恋导论》，弗洛伊德 1914 年的文本，如 Jones 所说，[注8]已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分析家们：“性驱力和自我驱力彼此分离，这是一个假设——弗洛伊德写道——纯粹转移神经症（癔症和强迫神经症）的分析迫使我采取这个假设。”[注9] 但是，与 Schreber 庭长文本的相遇——这份文本是 Jung 给他的

——以及那场一直发展到随后决裂的争论，促使弗洛伊德“艰难地生出”[注10] 一项关于自恋的新猜想。他奠定了未来第二地形学的基础。众所周知，在这篇文本中不仅可以找到自我理想和理想自我的概念，而且还可以

[注8] 琼斯，欧内斯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平与著作》（Vida y obra de Sigmund Freud），Paidós，布宜诺斯艾利斯，1976年，第II卷，第320页。

[注9] 弗洛伊德，S.《自恋导论》（Introducción del narcisismo），[1914]，第XIV卷，阿莫罗图出版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979年，第75页

[注10] “《自恋》是一场艰难的分娩，并带有相应的一切变形痕迹。它的不完善使我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懊恼感。”弗洛伊德致亚伯拉罕信，1914年4月6日。载：琼斯，E.，同前引书，第322页

在那里读到：当涉及自恋性对象选择时，对象可以是“曾经属于自身的一部分的人”；良心（Gewissen）是作为父母批评之声和社会大众批评之声的化身而产生的；尤其是，“除其个体成分之外，自我理想的社会成分由于未能履行，而释放同性恋力比多，后者转变为一种罪疚意识（schuldbewusstsein，社会焦虑）”。[注11]

[注11] 弗洛伊德，S.，同前引书，第98页。

然而，从下一年开始，弗洛伊德引入了一个矛盾。一方面，他写作《哀悼与忧郁》（1917 年发表）：撤回到自我中的力比多，用来建立自我同被放弃对象的认同，这种自恋性认同比癔症性认同更为原初（Ursprünglicher）。仇恨登场，指向这一替代对象，于是弗洛伊德重新拿起他自 1907 年、随后又在 1909 年已承认为强迫神经症自我惩罚行为的东西。自我惩罚在忧郁者那里变得更为重大，使他既能够向原初对象复仇，又能够折磨他所爱的人。它甚至可以达到自我毁灭，作为“一种针对近人的杀人冲动”转回到自身；“自我把自己当作一个对象，并把本来瞄准一个对象、且代表（vertritt）[注12]自我对外部世界对象的原初反应的敌意，指向自己”。良心（Gewissen）是一个同自我分离的批判性机构，是自我的一项建制。

[注12] 弗洛伊德，S.《哀悼与忧郁》（Duelo y melancolía）[1917]，第 XIV 卷，阿莫罗图出版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979，第 246-247 页。

另一方面，同一年，在《几种性格类型》中，弗洛伊德

他通过如下考虑来界定“出于罪疚感的犯罪者”：

“其隐晦的罪疚感源自俄狄浦斯情结；它是面对两项重大犯罪意图的反应，即杀死父亲以及同母亲发生性关系。”[注13]惩罚需要由罪疚感所激发，而“邪恶”或犯罪行为则通过移置固定这种罪疚，并引发缓解。

[注13] 弗洛伊德，S.《由分析工作阐明的几种性格类型》（Algunos tipos de carácter dilucidados por el trabajo analítico）[1916]，第 XIV 卷，阿莫罗图出版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979，第 338-339 页。

于是可以看到，弗洛伊德只标出一种来自俄狄浦斯的罪疚感，而他标出两种自我惩罚：一种同罪疚感相连，另一种则会是

自我对对象的原初反应的回转；自我通过自恋性“食人式”认同而把自身变成对象，正如弗洛伊德追随 Abraham 而重新提出的那样。

相反，问题远没有简化，而是随着第二地形学的阐述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中，弗洛伊德将试图在这两类机制之间建立桥梁，即“对象与自我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桥梁将支撑后来出现在其他分析家出版物中的发展。

在题为“认同”的第 VII 章中，可以读到：“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史前史中，儿童于是显示出两种在心理上不同的联系：同母亲，是一种直接的性对象投注；同父亲，是一种把他作为模型（vorbildlich）的认同。二者共存一段时间，彼此既不影响也不扰乱。正是由于这种汇合，正常的俄狄浦斯情结诞生了。”[注14]　但弗洛伊德刚刚清楚地陈述这些基础，困难便开始了：认同从一开始就是矛盾情感性的……在理论上，自我对对象的联系在先，但事实上……通向“成为父亲”这一认同的联系，作为一切对象选择的条件是可能的……

> [注14] 弗洛伊德，S.《群众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Psicología de las masas y análisis del yo）[1921]，第 XVIII 卷，前引书，第 99 页。

在重新提出自我因同对象认同而分裂这一断言时（一部分自我纳入丧失的对象，承受另一部分自我对它的攻击性发动），他确立了良心（Gewissen），即“自我的批判性机构，我们称之为自我理想，并把自我观察、道德良心、梦的审查以及在压抑中行使主要影响这些功能归于它”。他把这一良心称作“原初自恋的继承者”。[注15]

> [注15] 同上，第 103 页。

于是，我们在这里遇到弗洛伊德的这一假设：罪疚感（直到此处他都把它同俄狄浦斯犯罪倾向的压抑联系起来）可以被理解为自我与理想之间张力的表达。

第二地形学成功地使他的学生们迷失方向。我们见证了激烈的论战：“超我的主题向我们提供了旧的精神分析构想与新的精神分析构想之间的一条连接线”，Jones 1927 年在巴黎宣称。任何试图理解这一点的人

仅仅通过阅读弗洛伊德最后几部著作来进入精神分析，会走向一场灾难……近两三年来，兴趣强烈地集中在自我心理学的问题上，尤其集中在超我的问题上，以及那些与之密切相关的罪疚与惩罚的问题上。若以当代文献来判断，甚至可以假定精神分析本质上仅限于对超我的研究。因此，就在最近，一位杰出的柏林年轻精神分析家——维也纳的赖希对他的意见作出了恰当的修正——竟被引向主张：神经症心理学的全部本质都包含在这样一句话中：罪疚可以通过受苦来抹除。这是一个我毫不犹豫地称为片面的断言。这一切可能使我们假定，弗洛伊德近些年发表在这一主题上的重要著作，已经把精神分析革命化到重新创造它的程度。“甚至有人谈到‘旧精神分析’，仿佛它是一件已被摧毁的东西，而

‘新精神分析’则会取而代之”。[注16] 在弗洛伊德的两篇文本《自我与本我》（El yo y el ello）[1923]和《受虐狂的经济问题》（El problema económico del masoquismo）[1924]中，究竟是什么引发了如此多的争论、论战、异议、决裂，并且说到底，引发了如此多的困难？

[注16] 琼斯，E.《超我的概念》（La Conception du surmoi），1927 年 4 月 5 日在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宣读。载：《法国精神分析评论》（Revue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第 1 期，第 324 页。

* 超我的双重面孔

始终面对着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对象选择与原始认同之间关系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使得驱力的二元性得以维持，弗洛伊德便诉诸双性性；双性性“使得以目光穿透对象选择与原始认同的星丛变得如此困难，而以可理解的方式描述它们则更加困难”。[注17] 超我（他把它等同于自我理想，却没有展开说明这一第二命名的理由）是“本我的最初对象选择的一个残余”。但它也是一种针对这些选择的强有力的反应形成。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谓自我理想（或超我）的“双重面孔”。1923年，他把这种双重面孔归因于两个生物学因素：人类长期处于无助和幼儿依赖的状态，以及俄狄浦斯情结。在

[注17] 弗洛伊德，S.《自我与本我》（El yo y el ello）[1923]，第 XIX 卷，前引书，第 35 页。

1927年，在英文版中，弗洛伊德修正道：只有第一个因素是生物学的，第二个因素是历史的。

超我怎么可能同时既是原初自恋的继承者，又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

在第五章中，弗洛伊德有一些表述继续见证着这一困难：“超我在自我之内或相对于自我之所以占有其特殊位置，是由于一个必须从两面来估量的因素。第一面，是最初的认同，它发生在自我还很孱弱的时候；第二面，它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因而把最重要的对象引入了自我。”[注18] 弗洛伊德写道，这是一个唯一因素的两面；但十行之后我们读到：“超我从本我的最初对象投注中取得的起源，因而也就是从俄狄浦斯情结中取得的起源……”。

[注18] 同上，第 49 页。

同样又出现了另一矛盾：如果超我是本我的代理人，是生物学和人类物种命运的继承者，那么如何为这一机构的无意识性作出说明，而临床甚至见证了一种有意识的罪疚感？

弗洛伊德首先区分出自我理想的最初发展，它来自与父亲的认同；又区分出一个“后来的发展”，在此期间，教师和权威把命令与禁令铭写在理想自我之中，这些命令与禁令从那时起便以良知（Gewissen）的形式施行道德审查。罪疚感，诞生于道德良知的要求与自我的实现之间的张力，是被感受到的。

弗洛伊德在指涉临床时，在负性治疗反应中区分出一种沉默的罪疚感。在一条注释中，他称之为无意识的（未注明日期的注释）。

他在第 III 章刚刚称为“被感受到的”正常罪疚感，又被他称为有意识的。在强迫性神经症和忧郁症中（弗洛伊德由此指出，罪疚感存在于忧郁症中，而——我们已经看到——在《哀悼与忧郁》中，这一术语并未出现），他称之为强烈有意识的。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它是喧响的（überlaut）。相反，在癔症中，它仍然是无意识的。

弗洛伊德这样解决：“人们还可以再进一步，冒险提出这一前提：罪疚感的很大一部分（grosse Stück）

通常必须是无意识的，因为道德良知（Gewissen）的发生与俄狄浦斯情结密切相连，而后者属于无意识”。[注19] 很大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个问题在《可终结与不可终结的分析》中仍将保持开放。

> [注19] 同上，第 52-53 页。

* 死亡驱力

弗洛伊德在死亡驱力中找到了仇恨、攻击性、超我那无情严酷性的原因。[注20] “超我无疑是通过与父性原型（Vatervorbild）的认同而产生的

> [注20] 同上，第 54 页。

。任何这类认同都具有一种去性化，甚至一种升华的性质。那么，看起来，在这样一种转置（Umsetzung）之际，也发生了驱力的一种解混合[注21]（Entmischung）。在升华之后，爱欲成分不再具有力量来束缚伴随它的全部毁灭性，而这种毁灭性便作为一种趋向（Neigung）释放出来，趋向于攻击和毁灭。正是从这种解混合中，理想汲取了命令式的应当如此的全部严酷而残忍的倾向。”

> [注21] Die Entmischung 传统上曾被译为“驱力的解缠”。帕约新译本所选择的术语“分离”也具有同样的困难。驱力并不是联合或分离的，它们处在一种 Vermischung，即一种混合之中，也处在一种 Entmischung，即一种去混合之中。这个新词依据的是弗洛伊德 1910 年 7 月 19 日致普菲斯特的信：“您的极化观念很出色。我称之为[Entmischung]对立面的分离，我们的本能[驱力]经常参与其中。这就像厨娘把面团一端所有的糖、另一端所有的盐都放进烤炉里烤熟了。这样一来，味道当然就丧失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主题，但尚未发展到最后。”Entmischung 在德语中也是一个新词。[弗洛伊德，S.-普菲斯特，O. P.《通信，1909-1939》（Correspondencia, 1909-1939）。F.C.E.，墨西哥，1966，第 39 页]

* 自我惩罚

一年之后，1924年，在《受虐狂的经济问题》中，弗洛伊德摆脱了“罪疚感”这一“在心理学上不正确的”表达，用“惩罚需要”取而代之，后者“同样完全覆盖了

被观察到的事态”。[注22] 他稍后说：“我们可以把‘无意识罪疚感’这一表达翻译为‘被一种父母权力惩罚的需要’。”

> [注22] 弗洛伊德，S.《受虐狂的经济问题》（El problema económico del masoquismo）[1924]，第 XIX 卷，前引书，第 172 页。

这至少有两个效果：由于他重新把重音放在——用他自己的说法——不再是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方面”，而是自恋认同这一“方面”，弗洛伊德第一次放弃了把超我起源的纽带参照于声音、词表象、所听到之物、声学之物，[注23]而选择了对图像的参照；他使用了一个术语，这个术语他在1932年的《新引论》中将在同一语境里再次使用，即便不是在同一句话里，那就是“Imagos”：[注24]“父母双亲向自我的内投，在儿童那里留下了 Imagos。”教师、权威等人的影响随即会同这些 Imagos 联结起来……这些人，是已经变得更有抵抗力的自我不再需要内投的人物。从父母开始的这一系列的最后一个 Gestalt（形象、形式、人物）就是命运。[注25]

[注23] 弗洛伊德，S.《自我与本我》（El yo y el ello），前引书，第 22 页。

[注24] [法文原文中写的是 Imagines，但阿莫罗图版中写的是 Imagos。译者注]

[注25] 弗洛伊德，S.《受虐狂的经济问题……》（El problema económico...），前引书，第 174 页。

第二个效果：通过把重音放在惩罚需要上，弗洛伊德发展出一种新的方式，用以在与死亡驱力相连的自我惩罚和与性驱力相连的力比多满足之间建立关系。这就是道德受虐狂，它见证着 Vermischung，见证着驱力的混合：“即便是人的自我毁灭，也不可能在没有力比多满足的情况下发生。”[注26]

[注26] 同上，第 176 页。

维也纳-柏林，1922-1928：关于自我惩罚性质的最初争论。

甚至在弗洛伊德写出《自我与本我》之前，争论已经在《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sychoanalyse）中展开；《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则根据各方论战立场的演变，接续——或不接续——那些已经用德语处理过的主题。

柏林的 Alexander，维也纳的 Reich 和 Reik，伦敦的 Melanie Klein，是其中的领军人物；Aichorn、Fenichel、Nunberg、Glover 和 Jones，或多或少也加入了他们。

* Jones

Jones 保持谨慎：“我并不打算详述罪疚感和自我惩罚同神经症之间的关系。那将是去处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在精神分析界仍然激起最激烈的争论，并且远未终结。”[注27] 然而，他采取了一个接近 Reich 的立场：罪疚感象征一种力比多满足，而自我惩罚则是针对它的反应。

[注27] 琼斯，E.《超我的概念》（La conception du surmoi），前引书……，1927。

* Alexander

Alexander 的立场无疑是最重要也最复杂的。

从1922年起，他依托《哀悼与忧郁》和《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把两个尚未很好调适的立场并置起来。[注28] 关于一个患者说“我太弱了”的病例，Alexander 解释说：“另一个人比我强。” 患者重新创造了一种父子情境，而他从未超越过这一情境：与父亲认同，并把父亲作为理想而内投。自我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作战：对于自我理想而言，这是一种施虐的解决；而对于自我而言，则是一种受虐的解决。自我嫉羡理想，并被折磨人的自卑感所惩罚，但它从惩罚中获得一种受虐的快乐，

[注28] 亚历山大，弗兰茨：《性格形成中的阉割情结》（The castration complex in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1923。1922 年发表于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sychoanalyse。文章引文将主要依据 I.J.P.，其副本可以取得。

从这一分析出发，他较多地置身于自恋的斜面，却得出“俄狄浦斯的”、至少是前俄狄浦斯的结论，这些结论受到 Abraham（以及后来 M. Klein）的柏林理论影响：“在阉割情结中，有两种自我惩罚的倾向汇聚为一股流：一方面，是针对来自与父亲冲突的主动阉割愿望的同态复仇惩罚；另一方面，是针对乱伦愿望的惩罚。” 他显然因为让自恋问题停留在暧昧之中而感到窘迫，于是补充道：“后来，在这第二个来源中，阉割恐惧仅仅是对于一种一般性自恋伤口的恐惧。”

反应没有让人久等。Reich 立即写道：“Alexander 低估了阉割情结背后的自恋星丛的力量。”[注29]

[注29] 赖希，威廉。《两种自恋类型》（Deux types narcissiques），I.J.P.，1922，并见《早期著作》（Premiers écrits），帕约，巴黎，1976，第 I 卷，第 144 页。

在多次阐发尝试之后，Alexander 将采取弗洛伊德的解决方案：如果要在不放弃驱力二元性的情况下，把性力比多与自我惩罚衔接起来，那么除了使自我惩罚从死亡驱力中派生出来以外，就没有其他可能。

另一方面，Reich 面对的是同一个困难，并写道：“生殖器力比多，或者更确切地说，生殖器-自恋力比多，一方面；受虐狂和罪疚感，另一方面；二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精神分析中最重要的尚未解决的实践问题。”[注30]

[注30] 赖希，W.《从精神分析观点看生殖器性》（Sur la génitalité du point de vue psychanalytique），I.J.P.，1924，载《早期著作》（Premiers écrits），前引书，第 184 页。

因此，对于 Reich 和 Jones 来说，他们认为自我毁灭的行为来自一种破坏性驱力的转向自身，而这种驱力原本指向外部，

受虐狂来自施虐狂，而不是相反；Alexander 则回答说：“必须区分一种原初死亡驱力和一些继发性转向自身的破坏性倾向。”[注31] 它们汇合，并变得彼此不可辨认。毫无疑问，死亡驱力在生命的一切生物学毁灭中发挥作用，而生命不可避免地导向死亡。另一方面，超我和自我的一部分，是与现实认同的结果，而这些认同使它们负载了来自外部世界的攻击性。但是，自我的部分认同起源于本我，本我对现实的抵抗之种种表现，乃是自我的一种原初受虐狂的标志。

[注31] 亚历山大，F.《惩罚需要与死亡本能》（The need for punishment and the death-instinct），I.J.P.，1929，第 269 页。

* Reich

赖希在常常把亚历山大的立场推到近乎漫画化的同时，发展出一种独创立场："正如弗洛伊德所表明的，罪疚感是焦虑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对父亲的恐惧，这位父亲虽会惩罚，却被爱着；后者是

并继续在自我中作为良知的严厉性发挥功能，

良知。无论如何，重要的临床观察并不允许我们把惩罚需要等同于一种无意识罪疚感。并非每一种罪疚感都会推动自我惩罚；从根本上说，后者是一种试图摆脱良知折磨的尝试。它起源于自我的快乐；这个自我在道德性的遮蔽之下，对超我（i.e. 父亲）作出一种受虐的屈服。在许多病例中，惩罚仅仅指向一个被内投的对象。"[注32] 对 Reich 而言，产生良知焦虑和罪疚感的是力比多的积累。惩罚需要扮演的是次要角色。

> [注32] 赖希，W.《神经症性焦虑的来源》（The sources of the neurotic anxiety），I.J.P.，1926，第 389 页。

他在1928年更精确地界定这一立场："我的观点是，自我惩罚倾向并不是一种最终的心理倾向，例如肛门爱欲或生殖器爱欲，或者性快乐。惩罚需要在原初神经症过程中不起任何作用。它是一种神经症症状。它继发地介入，以维持神经症。"[注33]而亚历山大反对这一点："神经症不是一种自我惩罚；它代表被压抑倾向的一种满足，而这种满足只有在强迫性地忍受一种神经症性痛苦之后才成为可能。神经症不是一种自我惩罚，而是一种驱力和惩罚需要的满足。"[注34]

> [注33] 赖希，W.《关于惩罚需要与神经症过程的讨论。对近期神经症问题理论的批评》（Discussion on the need for punishment and the neurotic process. A criticism of recent theories of the problem of neurosis），I.J.P.，1928，第 236 页。
>
> [注34] 亚历山大，F.《对赖希批评的答复》（A reply to Reich's criticism）。载：《关于惩罚需要与神经症过程的讨论》（Discussion on the need for punishment and the neurotic process），I.J.P.，1928，第 245 页。

* Reik

Reik 曾经处理过这个问题，他再次介入，并试图调和两种论点。

1924年，他通过对战争神经症的研究，被引向把自我自恋位置的动摇视为：自我仿佛突然以最暴烈的方式忆起了被投射到外部世界并以命运形式出现的超我的力量，而这种回忆随后承担起

一种惩罚的功能。[注35] 他再次介入，是为了把两种论点——Reich 的论点和 Alexander 的论点——交织起来：罪疚感触发自我惩罚，而自我惩罚强化力比多并增加驱力满足。但是，力比多积累越强，罪疚感就越增长，等等……这两个因素是互补的。[注36]

> [注35] 赖克，西奥多。《恐怖》（Der Schrecken），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1929。题为《恐怖》（Der Schrecken）的文本写于 1924 年，1950 年由帕约译出。第 322 页，《承认的需要》（Le besoin d'avouer）。
>
> [注36] 赖克，T.《力比多与罪疚感》（Libido und Schuldgefühl），载《恐怖》（Der Schrecken），前引书，第 48 页，帕约译本，第 333 页。

毫无疑问，正是这种调和意愿使他考虑惩罚需要的三个方面：其一，它构成驱力满足的一个先决条件；其二，它以自我惩罚的形式与严格意义上的满足并行；最后，其三，它是被禁止驱力获得满足之后的一种继发性反响。

* Melanie Klein

与这一争论并行，梅兰妮·克莱因踏着亚伯拉罕的足迹，正在阐发她的罪疚理论。人们知道，1927年她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关于儿童分析的研讨会上，是以怎样轰动的方式在英国登场的！[注37]她从各个方面显示出安娜·弗洛伊德的教育性而非精神分析性的态度；显示出后者如何没有澄清最古老的口唇固着和肛门-施虐固着，也没有澄清与之相连的罪疚，而是把一个薄弱的超我归于儿童。[注38]在1927年和1928年的另外两篇文本中，她比亚伯拉罕走得更远；对于亚伯拉罕来说，焦虑在食人层面出现，而罪疚感则在下一阶段，即第一肛门-施虐阶段中发生。她说，俄狄浦斯冲突从发展的最早阶段起就介入。事实上，罪疚感是超我的产物，条件是真正看到超我从精神生活的开端就诞生。超我过度的严厉性来自

[注37] 克莱因，梅兰妮。《儿童分析专题讨论会》（Simposium sobre análisis infantil）[1927]。载：《全集》，第一卷：《对精神分析的贡献》。Paidós-Hormé，布宜诺斯艾利斯，第 137-163 页。

[注38] 克莱因，M.《正常儿童中的犯罪倾向》（Tendencias criminales en niños normales）[1927]及《俄狄浦斯冲突的早期阶段》（Estadios tempranos del conflicto edípico）[1928]。载：前引书，第 165-178 页及第 179-189 页。

儿童想要吞食、殴打、咬啮、毁灭被内投的对象。于是，超我变成某种会咬、会吞食、会切割的东西。口唇期和肛门期的挫折取得惩罚的意义，并使焦虑诞生。后来关于超我的问题，将能够同一种前生殖期固着联系起来。

* 法国人

我们不得不按照国籍来区分这一事件的各位主角，因为关于自我惩罚的争论，正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进入法国，也就是说进入法国精神病学的方式，同时还伴随着关于由非医生实施分析的争论。

这场比赛的开局是由 Marie Bonaparte 完成的，她发表了 Lefebvre 夫人的病例，[注39]一个“弗洛伊德式”的开局。

[注39] 波拿巴，玛丽。《勒费弗尔夫人的案例》（Le cas de Mme Lefebvre），R.F.P.，第 1 期，1927。“勒费弗尔夫人于是说，她必须在贝蒂讷城门外与某人会面。她坐在她儿子后面，在她儿媳左侧，两人都坐在后排，在福特鱼雷型汽车放下的车篷下面。就在第二盏路灯之前，道路转弯的地方，她请求——她对我说——她的儿子停车，借口是她有一点小便需要处理。车一停下，她便取出自己的左轮手枪，把枪抵在她儿媳的左太阳穴上，儿媳当时正转头看着道路，她以一种无情的准确性，用一颗穿过颅骨、从一个太阳穴直达另一个太阳穴的子弹，当场将其杀死。证词唤起了杀人婆婆的悲剧场景，她‘坐在医院楼梯的第三级台阶上’，无动于衷，心不在焉，仿佛对那里发生的事情感到陌生，而在几步之外，一副担架上，她的受害者的尸体就摊放在她面前。勒费弗尔夫人以这种方式冷冷地一枪杀死怀孕五个半月的儿媳，其罪行激起了巨大的恐怖。”

在勒费弗尔病例中，玛丽·波拿巴没有谈到自我惩罚的“性质”。像吉罗或莱维-瓦朗西这样的精神病学家也没有谈到。必须等到科代和拉福格1929年的短文，才能读到理论化的开端。“为了逃避焦虑，病人避入自我惩罚性神经症。”[注40]自我惩罚是一种失败的清算方式，它所清算的是

> [注40] 科代与拉福格。《社会失败与无意识的自我惩罚需要》（Echecs sociaux et besoin inconscient d'autopunition），R.F.P.，1929。

俄狄浦斯情结。”科代和拉福格提到琼斯和梅兰妮·克莱因，提到那些影响

超我形成的前俄狄浦斯阶段，并提到断奶作为最初剥夺的重要性。

真正继勒费弗尔夫人的临床个案之后，在法国引入理论争论的，是 Hesnard 和 Laforgue。[注41]

> [注41] 埃斯纳尔与拉福格，《自我惩罚过程》（Les processus d'autopunition），德诺埃尔，巴黎，1931。

Laforgue 希望以极大的外交手腕行事，并对精神科医生作出让步，而弗洛伊德对此多有责难。Hesnard 和 Laforgue 关于自我惩罚的书，将是一份关于自我惩罚所有立场的报告，若不说是一份摘要的话；每一种论题都以条件式呈现，这也就是说——法语本身迫使如此——“要谨慎对待”。

关于自我惩罚的性质，他们首先采取 Jones 的立场：攻击性表现为一种原始的本能事实（我们知道，那是在法国把 Trieb 译作本能而不是驱力的时期）。随后，自我惩罚转向个体自身，并产生道德文化。任何文化在原初上都是一种禁止与威胁，一种焦虑，一种有效的、外在的威胁。

在这一立场上，他们又加上弗洛伊德的立场，即：驱力的转化以及转向其反面，作为原初机制；在文化的作用之前，存在着亲本认同，它产生罪疚与惩罚。正是外部威胁与亲本认同的附加产生了超我。于是，这种张力

自我-超我的〔张力〕，罪疚与惩罚同它相联，它部分地源自自毁本能。

我们稍后将会看到，他们主要重新采纳 Alexander 的惩罚性行动问题。

从 Odier 以及第一届法语精神分析家会议（日内瓦，1926年）那里，他们重新采纳了这样一种必要性：在惩罚性机构中必须区分不同层级、不同平面，因为在超我机构中缺少那些根本不同的要素。被爱欲化的低级机构（supersí，前超我或反我）（sursoi, présurmoi ou antimoi）与高级的道德机构（超我、自我理想）之间，存在一种不协调的、矛盾的作用。supersí 尤其同乱伦的压抑相联，并无意识地谴责表面上正常的行为（实际上是无意识地乱伦的行为），而超我则是一个

道德机构，它有意识地谴责——例如——受虐癖和娈童癖……

随后，他们到 Ferenczi 那里去寻找：“关于自我的压抑机构的障碍，弗洛伊德采纳了 Ferenczi 关于自我（不如说人格）发展先行于力比多的假设。”对象选择会（仍然用条件式）很早发生，在性功能达到其最终构成之前，因此甚至早于对本能组织的前生殖器阶段的固着。这样，主体就会被迫早早发展出一种过度道德性，以便保卫对对象的爱，使之抵御已经存在的敌意。

顺带，向 Stekel 致一个小小的敬意：“这一切都将是仇恨先于爱的后果”；总之——让我们保持法国人的身份，不要忘记 Pierre Janet——耗竭这一概念恰好被用来解释这些由罪疚产生的行动：“暴力是弱者的力量。”

* 拉康的立场

在这种对所有理论都小心翼翼的语境中，拉康发表了他的论文，并且首先就自我惩罚的性质表明立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拉康把罪疚感视为代表自我惩罚的主体态度。所有那些把自我惩罚看作对罪疚的反应的立场，事实上都被排除了。唯一必须加以考虑的，是自我惩罚现象。更进一步，对拉康而言，正是对自我惩罚决定因素的分析，生成了分析理论中关于

超我发生的理论。

自我惩罚是一种自我惩罚驱力。它来自超我机构，而攻击性驱力则来自

无意识。这两种驱力相互对立。自我惩罚驱力是攻击性驱力的社会化形式。自我惩罚是

社会压抑的严格表达。

当它不能够把攻击性驱力维持在实现之外时，它伴随着性功能的障碍；其失败于是来自力比多发展中对施虐-肛门阶段的固着。可以看到，拉康在这里只是重新采纳 Abraham 的理论。后来他追随 Melanie Klein，把超我变成先于一切心理结构的机构。

最后，在社会本能的发生中，他强调的不是同性恋，而是对象的爱欲化

兄弟姊妹的对象，任何对兄弟姊妹情结的固着，都会带来惩罚性机构的障碍，以及一种偏执狂结构。

在分析帕潘姐妹的罪行时，拉康开始了他的漫长道路，这条道路将把他带向三联体的发明：实在、象征、想象。自我惩罚在那里，在两姐妹的罪行中，仍然有效，但在文本中被置于括号内。攻击性驱力，作为基本驱力，“又带有社会相对性的色彩；它总是具有某种罪行的意向性，几乎总是具有复仇的意向性，常常具有惩罚的意义，也就是说，具有一种源自社会理想的制裁的意义，并且有时，最终，它同道德性的完成行动相认同，具有赎罪（自我惩罚）的范围。这种自我惩罚的需要，这种巨大的罪疚感，也可以在帕潘姐妹的行动中读出，哪怕仅仅是在结局时克里斯蒂娜下跪这一点上。”[注42]

> [注42] 拉康，雅克。《偏执狂犯罪的动机：帕潘姐妹的犯罪》（Motivos del crimen paranoico: el crimen de las hermanas Papin），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第 2 版，墨西哥，1979，第 341 页及第 345 页。

冲动性行动的机制

在《几种性格类型》中，弗洛伊德于1915年一方面区分出神经症者：在他们那里，“力比多投注的内在增长，使迄今被轻视并被容忍的幻想，一旦欲望接近满足并威胁要成为现实，就变成一个令人畏惧的对手”；另一方面，他又区分出所涉及的性格类型，即例外者或罪犯；对他们来说，引发冲突的信号来自一个外部的现实变化。在他们那里，罪疚先于行动而存在，并且通过移置，行动固定了这一罪疚。[注43]

> [注43] 弗洛伊德，S.《几种类型……》（Algunos tipos...），前引书，第 324-325 页。

犯罪行动与神经症症状

1928年，Reich 攻击 Alexander 及其看待症状的“新方式”：不再仅仅把症状看作某种隐藏意义的象征性伪装，

而同样把它看作压抑能力的效能减弱的结果。

事实上，在《神经症与整体人格》（Neurosis y personalidad total）中可以读到：“当

自我和超我的观点越不一致，压抑和有意识的判断在升华中就结合得越不紧密；相反，人格中的神经症性分裂（Spaltung）越大，就越会为超我审查所允许的驱力冲动产生新的释放通道，从而产生神经症症状”。[注44]

> [注44] 亚历山大，F.《整体人格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e der Gesamtpersönlichkeit），I.P.V.，1927，第 47 页；以及《神经症与整体人格》（Neurosis and the whole personality），I.J.P.，1926。

对 Alexander 来说，这一变化的关键点在于，超我丧失了

其压抑行动的效能，当它只是采取一种惩罚系统，借此卸下它的任务，即

调节并压抑驱力。既然已经颁布惩罚，它便尽了自己的职责，于是就可以对本我的推动“闭上眼睛”。因此，在神经症的形成中，超我不仅由于其过度严厉和过分强迫的压抑，使压抑的动力性力量成为最强大的力量之一，而且还通过施加惩罚（自我惩罚），使那些被不适当地限制的驱力得以闯入，因为抑制性的罪疚感已因痛苦而被废除。因此，超我在压抑的破口发生之前强加惩罚。

Alexander 依据的是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中的一句话，Reich 认为这句话“极其晦涩”：“自我理想试图实现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压抑，并且正是这个革命性事件使它获得存在。”就 Reich 而言，他则依据弗洛伊德的另外两篇文本，《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和《抑制、症状与焦虑》，来主张阉割焦虑才是压抑因素。“自我根据其对惩罚的恐惧来压抑，并因此把自己的施虐倾向指向自身。由于超我中攻击性倾向的张力，自我在其道德要求上变得更严格，并变成道德上的受虐者；在这一点上它受到双重推动：在较高的、接近意识的领域中，被一种社会性罪疚感（良心焦虑）推动；而在更深的领域中，则被它对惩罚的恐惧（阉割恐惧）推动。”[注45]

> [注45] 赖希与亚历山大的辩论，前引书，1928，I.J.P.。

Alexander 回应说，这是一种天真的推理；至于 Reich，他会恶意地回答说，这是一种早已为人所知的理论，与精神分析毫无关系，也就是一个年轻女子仍然“由于害怕后果”而保持贞良的理论。

什么将把一个“神经症症状”同一个“犯罪行动”区分开来？神经症者仍然是一个驱力受抑制者；神经症者压抑并满足反社会倾向，是通过移置的替代物来完成的。

Reich 所谓冲动性性格与 Alexander 所谓“神经症性”性格

早在1922年，Reich 就主张，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冲击出发，由此产生的自恋创伤可能调动整个人格，而人格的完整性受到威胁。Ferenczi 强调的是偏执狂可能被触发，而 Reich 和 Alexander 则转向自恋性易激惹，它通向 Reich 所称的“杀人冲动”以及 Alexander 所称的出于惩罚需要的犯罪。

借助许多非常详尽的临床个案，[注46]Reich 把冲动性性格（triebhafte）的杀人冲动或自残置于精神分裂症的危险边缘，仿佛它们是潜伏性精神分裂症的零度。Nunberg 针对这些相同例子所称的“人格解体发作”，Reich 则把它变成超我孤立的表达。冲动性性格具有一个被压抑且被孤立的超我，而施虐冲动可以在没有罪疚感的情况下发生。

> [注46] 赖希，W.《冲动性性格》（Le caractère impulsif）。载：《早期著作》（Premiers écrits），前引书。

Alexander 的阐述要精确且复杂得多。他说，Reich 以 triebhafte Charakter 试图作出一种疾病分类学的划界。他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在这些病例中，人们看到的不是像神经症者那里那样的自塑性症状形成，而是冲动性的 acting-out，是 neurotische、“神经症性”的冲动。但是，如果例如 Glover 能够批评这种疾病分类学，那是因为它过于宽泛。借助插入阴道的刀进行手淫的个案，典型地就是一个神经症性个案；自我惩罚的渴望得到满足，

是通过添加到手淫中的受虐狂成分而得到满足的，这些倾向的巨大张力也被解除。因此，它们塑造主体命运的能力所构成的风险被避免了；这种能力已经丧失。自我损害是冲动性满足的基本成分，正如神经症中的痛苦是神经症症状的基本条件。”[注47]

> [注47] 亚历山大，F.《神经症性性格》（Der neurotische Charakter）。载：I.Z.P.，1928，（及 I.J.P.，1930）。neurótica 与 neurósica 的区分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区分了患有一种神经症的神经症者（neurótico），以及患有一种 neurotische 性格的神经症性者（neurósico），后者在 1938 年亚历山大的《罪犯与他的法官们》（Le criminel et ses juges）中被译为 névrosique。拉康在《文集》（Écrits）第 133 页和第 135 页谈到一种 névrotique 性格和另一种 névrosique 性格。[尽管如此，西班牙文版在法文中明明写着“névrosique”的地方却写成了“neurótico”。《文集》第 125 页和第 127 页。译者注]

但是必须作出比神经症、精神病和倒错更细致的区分。被论战牵引，Alexander 甚至把这种症状学称为怪诞！必须区分神经症、神经症性格、精神病、犯罪性。神经症者将会行动，以阻止其无意识冲突侵入其整个人格。这就是行动的动机。神经症者将以一种高度变形的形式满足反社会倾向，其代价是自我损害。[注48]

> [注48] 见附录 II。

在《神经症性罪犯》（Le criminel névrosique）中，[注49]Alexander 将进一步明确：通过投射和自我惩罚，超我禁止无意识行动。由此，自我相对于超我的依赖松动了。超我的禁止性影响减弱，而自我转而服务于驱力的倾泻。无论是通过投射、移置、掩饰（Verhüllung）还是自我惩罚，超我都被安抚了。取代神经症症状的，是 Agieren：在罪犯那里是有害的，在怪人那里则是反社会的。只有人格的后天获得层面生病了；在某种意义上，神经症者乃是“他们的驱力之原始健康过于巨大”的牺牲品！

[注49] 亚历山大，F.《神经症性罪犯》（Der neurotische Verbrecher）。载：《罪犯与他的法官们》（Der Verbrecher und seine Richter），I.P.V.，1928，1938 年由伽利玛译出。

妥协的形式

对 Reik 来说，供认是一种妥协形式；[注50]我们将会看到，对拉康而言，谵妄才是妥协。Reik 认为，供认确保了对惩罚需要的部分满足。这种满足既包含供认之前的焦虑之苦，也包含被体验为痛苦经验的供认本身。它是一种妥协，取代神经症症状，并且具有与它所避免的 acting-out 相同的功能。

[注50] 赖克，T.《强迫承认与惩罚需要》（Geständniszwang und Strafbedürfnis），写于 1925 年，I.P.V.，1926，帕约译本。《承认的强迫》（La compulsion d’aveu）。载：《承认的需要》（Le besoin d’avouer）。

无论如何，其功能取决于结构；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自我会在一种立即消失的清醒中摆脱供认，或把它移置到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上。相反，在自恋性神经症中，供认将变成超我作为折磨强加给自我的要求。虚假的供认和虚假的自我指控，是对损害责任的认领；这种认领不是在举动之现实的层面上，而是在无意识罪疚感的层面上。

法国精神科医生的立场

尽管犯罪行动本身的机制并未得到发展，然而关于“无动机”犯罪，存在两种不同立场。Guiraud 在1928年[注51]重新提出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一种进入青春型精神分裂症的方式；并且，作为无动机暴力的机制，他提到一种意志，即受生命兴趣丧失所折磨的青春型精神分裂症者，试图通过把自己的疾病转置为一种社会之恶来摆脱它。1932年，[注52]他进一步明确说，青春型精神分裂症者在想要杀死疾病时，会按照其妄想性构造，杀死他在其中看见社会之恶代表的人：军人、老板、布尔什维克、暴君，等等……我们知道这一立场在法国曾经多么占据主导，并催生了许多研究；有关于帕潘姐妹的研究，她们是反抗雇主压迫的女佣；有关于 Pierre

[注51] 吉罗，P. 与卡耶，B.《青春型精神分裂症者那里无动机杀人作为疾病的释放性反应》（Le meurtre immotivé, réaction libératrice de la maladie, chez les hébéphréniques）。载：Ann. Méd.-Psych.，第 12 系列，第 11 卷，1928 年 11 月。

[注52] 吉罗，P.《无动机杀人》（Les meurtres immotivés），《精神病学演进》（L’évolution psychiatrique），1931。

Rivière 的研究，以及受到乡村社会组织变迁影响的农民们的困惑（农民犯罪 sanctionnant 所有权、租佃、剥削关系），还有 Franz Fanon 的研究，他把北非的犯罪冲动性定位为殖民化的效应。

Lévy-Valensi[注53] 在其1931年的《报告》（Rapport）中，把勒费弗尔夫人的个案解释为激情犯罪。至于勒费弗尔夫人，鉴定专家——Raviart、Rouges de Fursac 和 Logre——曾作出结论，认为不存在精神障碍。这里涉及的是对一个“母权暴君”的家庭仇恨。在他们的书《悲剧性的婆婆们》（Les belles-mères tragiques）中，Voivenel 和 Fleury 捍卫的是一种诉求性精神病的论题。

[注53] 莱维-瓦朗西。《激情犯罪》（Les crimes passionnels），载：《法医学、犯罪学与科学警察年鉴》（Ann. de Médecine Légale, de criminologie et de police scientifique），1931。

Lévy-Valensi 认为这是仇恨激情，并区分了纯粹激情者与激情性妄想者。但是，可以说，几乎没有论证。

拉康：“这里涉及一种惩罚性行动”

在其整个构造过程中，谵妄使行动得以保持在距离之外。它是一种妥协形成，是面对杀人冲动的逃逸。[注54]

[注54] 拉康，J.《论精神病……》（De la psicosis...），前引书，第214页。

于是，拉康确立了他自己的犯罪类型学。[注55]他把所有所谓出于利益的犯罪命名为“自我的犯罪”，把纯粹驱力性的犯罪命名为“自身［soi］的犯罪”，正如人们在早发性痴呆中典型地看到的那样［参见 Reich 的 triebhafte Charakter］；它们具有象征性攻击的性质，主体想要杀死自己的疾病，或更一般地说，杀死恶［参见 Guiraud］。

[注55] 同上，第274-5页。

在这两类犯罪之间，拉康放置了“超我的犯罪”：诉求性偏执狂的犯罪与自我惩罚性偏执狂的犯罪。在二者中，行动都具有惩罚性意向。在自我惩罚性偏执狂中，惩罚性意向，也就是说被社会化的攻击性驱力，前来使主体无意识中的攻击性驱力失败，因此行动会失败，危险性很低。在

诉求性精神病中，这种被社会化的攻击性驱力被倒转，而杀人冲动“成功”的风险更高。

难道正是因为这一区分仍然有效，拉康才没有把帕潘姐妹看作偏执狂，而是看作妄想痴呆者（paraphréniques）吗？至少可以这样说，因为她们的自我惩罚未能使她们的罪行失败。然而，她们的诉求性谵妄似乎并不十分成形。稍后我们将看到，正是这种谵妄的缺席，阻碍了把对第一位迫害者的固着转移到一系列相继的头颅上；拉康把这一点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克里斯蒂娜与莱娅如此接近，以至于她们无法取得彼此伤害所需的距离。[注56]

[注56] 拉康，J.《偏执狂犯罪的动机：帕潘姐妹的犯罪》，载：《论精神病……》（De la psicosis.....），前引书，第345页。

自我惩罚的意向指向谁？

如果把 Alexander 除外，发展这一问题的尤其是法国分析家们——悖谬地说。

通过她关于勒费弗尔夫人的临床个案，玛丽·波拿巴或多或少隐含地发展出后来由 Hesnard 和 Laforgue 作为一种严格“俄狄浦斯式”的阐明而提出的东西：被攻击者代表着亲代形象的替代物。“与此同时，俄狄浦斯式的倾向与形象——它们曾支配最初的阉割焦虑——以及昔日伴随着它们的乱伦禁忌，都重新活现。某些亲人，譬如父亲和姐妹，或其象征性替代物——在我们中一人（Hesnard）观察到的一个病例中——以迫害者的形式，客观地物质化了超我的威胁；与此同时，由早年相对于作为竞争者的父亲及其同谋者的嫉妒而在昔日发展出的施虐，则复活并发展，与固定在个体自身之人上的兴趣并行。”[注57]

> [注57] 埃斯纳尔与拉福格。《自我惩罚》（L’autopunition），前引书，第48页。

Guiraud 被这种解释所诱惑（虽不愿承认），便在 1931 年补充说，被杀死的并不只是作为疾病替身的恶，而且那里还可能有两个人之间的融合。一个人被谋杀，是作为另一个人的替身。“在保持我们相对于正统精神分析的完全独立的同时，我们认为

在这类病例中，必须承认无意识动机的作用”（！）。他还援引这样一个父亲的案例：他的女儿 17 岁，获得解放，并开始同男孩子说话。父亲感到有一场不幸在威胁他，他被人跟踪，他的女儿也被人跟踪。他害怕她被人劫走，为了避免这场不幸，他杀死了她。Guiraud 补充说，毫无疑问，他是出于无意识的嫉妒而杀死她；但是“当我们写下嫉妒时，我们在这种情感中看不到任何性的东西；它是害怕失去一个所爱之人，而此人的在场是必要的”。[注58]

> [注58] 吉罗，P.《无动机谋杀》（Les meurtres immotivés），前引书。

一如既往，Alexander 的分析要精细得多。他指出，“第一桩罪行”并不是弑父，而是弑兄弟。可是，该隐杀死亚伯，并不是出于嫉妒。哥哥并不杀父亲，而是杀弟弟，因为他在弟弟身上感受到一种针对他——该隐——的嫉妒，这种嫉妒类似于他这个年长者对其父亲所体验到的嫉妒。正是这样，他在亚伯身上杀死了他自己对父亲所体验到的嫉妒。“这些谋杀具有部分自杀的价值，因为凶手在另一个人身上发现并杀死了他们自己的驱力生活中那被防卫的、被憎恨的部分。”[注59]

> [注59] 亚历山大，F.与施陶布，H.（施陶布是一名法学家），《勒费弗尔夫人谋杀案的心理经济》（Economie psychique du meurtre de Mme Lefebvre），载：《罪犯与他的法官们》（Le criminel et ses juges），伽利玛出版社，1928，第169页。

拉康将要围绕这个问题——惩罚性行动究竟瞄准谁——发展出的立场，将非常清楚地把他置于一条道路上，使他能够——通过对帕潘姐妹罪行的分析——在形象的功能问题上跨出决定性的一步。这一阐发的出发点似乎同弗洛伊德的某种阅读有关，换言之，同一种承受着翻译操作之重量的阅读有关。在他的论文中，拉康引用了弗洛伊德关于 Schreber 庭长文本的译文，该译文由玛丽·波拿巴和 Loewenstein 完成，并且——拉康写道——刚刚刊登在《法国精神分析评论》（Revue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上。他读过它吗？还是说他自己做过一种倾向于对文本作同一解释的翻译？

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译文重取这一段：[注60]

[注60] 弗洛伊德，S.《施雷伯庭长案例》，G.W. VIII，第285-86页。[西班牙文版：参见第XII卷，阿莫罗尔图出版社，前引书，第46-47页。这一次，文中出现的弗洛伊德引文并不对应阿莫罗尔图版，我们从法文版本——由作者们翻译——转译弗洛伊德的引文。译者注]

“正如迫害者分解（zerlegt）为 Flechsig 与上帝一样，Flechsig 自身稍后也裂分（spaltet sich）为两个人格（Persönlichkeiten）。就 Flechsig 而言，分解（Zerlegung）在疾病后来的阶段中推进。此种分解是偏执狂极具特征性的。偏执狂分解（Zerlegt），而歇斯底里则凝缩。或者更确切地说，偏执狂通过其分解，把在无意识幻想中所进行的凝缩和认同重新带回。按照 Jung 的说法，这种分解在 Schreber 那里数次重复，是相关人物之重要性的表达。Flechsig 和上帝向若干人物的所有这些裂分（Spaltungen），同迫害者被分割（Zerteilung）为 Flechsig 与上帝，意味着同一件事。它们是这些同样重要关系的重叠复制（Doublierungen），正如 Rank 在神话中所识别出的那样。

“但是，对于所有这些孤立特征（Einzelzüge）的解释而言，人们得到帮助，是凭借这一提示：迫害者分解为 Flechsig 与上帝；并且凭借这样一种观念：这种分解乃是偏执狂式的反应，针对的是一种先已存在的认同，这种认同关涉这两个人，或关涉他们的特征所属（Zugehörigkeit）于同一系列（Reihe）。”

我们看到，弗洛伊德大量使用关涉碎裂、分解、分割、裂分的术语，并且系统地把重音放在被执行的操作上。正如 Flechsig 和上帝裂分为若干人物一样，迫害者的分割也被再度加倍。在那里，又一次，被指向的是操作。

波拿巴和 Loewenstein 则把重音放在操作的“结果”上：“那些复本”。同样，他们翻译说，在嫉妒的女人归于男人的对象选择中，清楚地显示出那个年龄的影响；在往昔，固着就是在那个年龄发生的：“常常涉及

年长的女人，不适于现实之爱，是奶妈、女仆、童年女友，或姐妹与情敌的再版。”[注61] “再版”既是操作也是结果。可是，弗洛伊德写的是 Auffrischungen，即重新激活（再生、刷新、更新）。复本、再版……拉康写道：“Aimée 的迫害者们，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是一个原型的‘复本’、‘三联本’以及相继的‘印次’。”[注62]（“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很令人惊讶；我们仔细查找过，论文此前并没有这样说过；它说过迫害者是姐妹的替代物，说过 Aimée 将不断把她的仇恨转移到离其真实对象越来越远的对象上……但并没有说过复本、印次或原型。这个“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是否是在指示拉康让弗洛伊德说出的东西？）因为这正是发明之处。在弗洛伊德把重复定位为一种分离操作之处，拉康把重音放在一个原型的相继印次上。

[注61] 弗洛伊德，S.《精神分析评注……》（Puntualizaciones psicoanalíticas.....），第XII卷，前引书，第60页。

[注62] 拉康，J.《论精神病……》（De la psicosis.....），前引书，第229页。

早在论文中，拉康就能从中获得一个逻辑后果：原型就是她自己的形象。1932 年时，这并不完全清楚。一方面，拉康断言：“她明白自己攻击的是她自己”；随后，又进一步说：“迫害者们代表 Aimée 对被解放的女人所形成的形象。这类女人正是 Aimée 梦想成为的东西。代表其理想的同一个形象，也是她仇恨的对象。”[注63]

[注63] 拉康，J.同上，第229-230页。

1933 年，在帕潘姐妹的罪行那里，拉康重取论文中的这一解释："如果在她的谵妄过程中，Aimée 把她那充满爱之仇恨的指控转移到若干相继的头颅上，那是由于一种努力，要从她最初的固着中解放出来；但这种努力流产了：每一个迫害者真正说来都不过是一个新的形象，一个完全且不变地落入自恋之掌握的形象，即那位姐妹的形象，而我们的病人已经把这位姐妹变成了她的理想。我们现在明白，那个玻璃障碍是什么了：正是它使得 Aimée 尽管正在呼喊，却永远无法知道她爱着所有这些迫害者；她们不过是形象。"[注64]

[注64] 拉康，J.《犯罪的动机……》（Motivos del crimen.....），载：《论精神病……》（De la psicosis.....），前引书，第345页。

治愈

这种治愈，这种无意识冲突的解决，Reik 把它等同于他用法语称作"la tentation du désespoir"（绝望的诱惑）的东西。[注65] 行动越是被禁止，果实越是被禁止，驱力的力比多力量就变得越重要。暂时的治愈，是通过罪疚感的暂时平息而获得的，是由于驱力得到了满足；但循环并不因此停止，并且会带来重复。无意识罪疚感越是重新增强，主体就越体验到重复被禁止行动的诱惑。

[注65] [绝望的诱惑]

事实上，关于究竟是什么实现了治愈——解放性行动还是惩罚——的真正争论，将发生在玛丽·波拿巴与亚历山大之间。Lévy-Valensi 在他关于激情犯罪的报告中，确认了行动实现之后障碍得以镇静的准规律性。但是，为什么？

亚历山大早在 1928 年的 I.J.P. 中就曾提及这种治愈：受苦本身并不是一个目标；相反，受苦服务于使罪责消散，而罪责对驱力的抑制功能由此消失。受苦把良心焦虑引向另一条道路，神经症者正是借助自我惩罚从这种良心焦虑中解放出来。惩罚需要的满足，导致良心焦虑的减弱。

但是，分歧将会围绕勒费弗尔个案而明确起来。

M. 波拿巴（在勒费弗尔夫人的个案中）把这名女罪犯的疑病症视为她退行到肛门阶段的一个标志。同样，她对其儿子的占有也是以肛门方式实现的。这里有自恋性退行，而其诉求建立在如下等价之上：儿媳所期待的胎儿代表着阳具母亲最初的阴茎。她之所以是精神病性的，是因为其力比多退行到了自恋阶段。在行动中，超我与本我混淆起来；她杀死自己的儿媳时说："我履行我的义务。"履行她的义务，看似由超我所命令，事实上却由本我所命令。行动是解放性的。正是通过行动，她实现了她无意识的俄狄浦斯欲望。M. 波拿巴只是补充说："然而，受到惩罚的满足是否

同她的治愈毫不相干呢？当人们听见她带着自得谈论她的草垫、囚犯的肉汤，以及丧葬花圈的铁丝——囚犯们整日劳作其上，而这些铁丝弄坏了她的双手——并且当人们看见她带着微笑伸出那些可怕地被弄坏并且满是污迹的手时。"

亚历山大将作出回应。1928 年，在他的《罪犯及其法官》（Le criminel et ses juges）一书中，他为此专辟整整一章。

他在某一点以前重取玛丽·波拿巴的论证：超我与本我通过偏执狂式的现实伪造而结盟，而解放性行动前来实现她对于自己母亲所体验到的古老俄狄浦斯欲望。

“错误！”亚历山大说。如果想理解行动和疾病，就必须在治愈的光照下考察它们。玛丽·波拿巴忽视了勒费弗尔夫人与其母亲的认同，正是这种认同使她能够作为“被抢夺的母亲”而行动。怀孕的是女儿（在这里由儿媳扮演这一角色），而不是母亲（在这里是她自己扮演受损害的母亲这一角色）。她行动起来，就好像当她幻想从母亲那里偷走孩子时，她的母亲会相对于她而行动那样。

那么，真正的分析是：

1. 她指向母亲的俄狄浦斯欲望被归咎于儿媳，

1. 她指向父亲的俄狄浦斯欲望被移置到儿子身上，
2. 她的罪疚感由于她认同于受损害的母亲而被悬置，

1. 她向那些其自身俄狄浦斯欲望被投射其上的人复仇。

正是这种通过认同与投射而产生的偏执狂式角色转换，使行动能够具有对其自身俄狄浦斯欲望的自我惩罚意义。正因如此，过错得到了赎偿；不再有需要悔恨之处，也不再有懊悔；惩罚已经在行动中发生了。监禁的惩罚前来确认自我惩罚，并解除最后的罪疚感。她在其儿媳这个人身上杀死了她自身那些坏的本能。借助投射机制，她完整地实现了俄狄浦斯行动，即杀死母亲；与此同时，她也实现了母亲的复仇，这使她能够无罪疚感地同父亲结合。于是，本我的倾向达到了其圆满，超我的要求得到了满足，有意识的自我被那些

合理化所惊讶；而最终则是一种完全的、无与伦比的幸福，以及在同上帝、同父亲的结合中的和谐。

拉康的解释将依托于亚历山大的解释中的一点：即认为治愈的性质证明了疾病的性质。[注66] 但是，对于谵妄消失所给出的解释，同此前已发表的所有阐发都完全不同；这就是该论文的创新。攻击发生二十天后，Aimée——拉康说——“实现了”[注67]她的惩罚：在监狱中，她体验到各种违法者的陪伴……她能够确认所有亲属对她的谴责和遗弃……此外，她“理解”[注68]到的是，她攻击了她自己。自我惩罚就在这里：攻击他人，就是攻击她自己，而“当她理解这一点时，正是她体验到已完成欲望之满足的时候：已经无用的谵妄消散了”。我们看到，对俄狄浦斯的参照已经极其遥远，重音被放在兄弟情结上；并且，治愈不是俄狄浦斯欲望的满足，甚至也不是使那些欲望得以实现的惩罚。“这些治愈的首要基础是一种内在条件，即：自我惩罚驱力的满足。”[注69]

> [注66] 拉康，J.《论精神病……》（De la psicosis.....），前引书，第230页。
> [注67] [“实现了”（«réalisé»）]
> [注68] [“领会到”（«réalisé»）]

[注69] 同上，第250页。

克里斯蒂娜和莱娅的罪行，将使拉康在即将成为其理论的东西中向前推进：她们不仅仅只是攻击了若干形象，而且，在攻击一对母女之后，她们就是在攻击她们自己，即“连体灵魂”。她们攻击了她们自己；几个月后，拉康在克里斯蒂娜的谵妄中看到了这一点的标志：“她看见她的妹妹死了”，死于克里斯蒂娜给她自己的那一击；这就是一个连体者之死拖带着另一个连体者之死。

拉康沉浸在这一新理论的阐发中，因而稍稍强迫了事实。他称这桩罪行为“突然的、同时的”，并且把行动的发展描述为以“每一个人”[0] 或“她们”为主体：“每一个人抓住一个对手，在其尚活着时把她的眼睛从眼窝中挖出（据说这是犯罪史册中闻所未闻的事实），然后将她了结……她们对受害者的尸体施以残虐，把她们的脸碾碎，等等……”

拉康从未在任何时刻作出区分，无论是在两姐妹之间、在她们的行为之间，还是在她们的话语之间。然而，如同已经显示的那样，毫无疑问，一个并不是另一个的精确重叠；严格说来，她们并不是一个二重体。拉康主张，在二人谵妄中不存在精神传染，也不存在诱导性要素。[注70]在他同那些认为偏执狂是一种病态体质的发展、一种先天性格缺陷的人进行论战时，拉康使用了二人谵妄的案例，并以这样一种完全对称的方式来解释它们，作为如下观点的证据：谵妄是社会张力的产物；两个孤立的主体，由于有过相同的情感、社会和家庭经验，会产生完全相同的谵妄和相同的谵妄性行为，甚至这个双重谵妄的内容还会重取某位尊亲的谵妄内容。[注71]为了继续坚持这一点，拉康把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做成两个连体灵魂。此外，她们的非分离本身又变成“纳喀索斯之恶”，于是，犯罪使得

[注70] 克洛德，H.，米尼奥，P.与拉康，J.《同时性疯癫》（Folies simultanées）。医学-心理学学会，1931年5月21日。

[注71] 拉康，J.《论精神病……》（De la psicosis...），前引书，第258页。

克里斯蒂娜——拉康说，在文本末尾恢复了对事实较为公正的评估——能够从她的另一个自身那里撕裂开来，

即她的姐妹。

作为结论，让我们给出若干条拉康一直追随到 1953 年的路线，这些路线曾由 Aimée、克里斯蒂娜和莱娅给予他。

众所周知，三年后，在 Marienbad，拉康宣读了《镜像阶段》的文本。但与此同时，他写下《超越现实原则》，[注72]在其中——我们可以说——他练习着应用自己的发现。在提出“正是形象激发激情并实施压迫”之后，拉康尝试对治疗作一种现象学描述。分析者把形象的角色强加给分析家。由此，分析家将获得他的权力，并将在面对主体时运用这种权力。从那一刻起，分析家便“以这样一种方式行动：使主体意识到那个在他身上折射为陌异效果的形象的统一性，根据他是代表它、体现它还是认识它”。正是在那篇

[注72] 拉康，J.《超越现实原则》，载：《文集》，第I卷，前引书，第67页。

文本中，拉康也把力比多做成形象效能的一种

象征记号；并且把第二拓扑做成若干想象位置，形象作为发展的赋形者从这些位置发生作用。

在其《文集》的整个过程中，拉康将不断“重写”、给出新的表述、新的方式，来精确说明对帕潘姐妹罪行的分析。

例如，1946 年，他回到镜像阶段的形成性认同，把它说成是在主体中创造出一个想象的结。“事实上，在这个结中，寓居着形象与自杀倾向的关系，这一倾向本质上由纳喀索斯神话表达出来。”[注73] 于是他明确指出自己与弗洛伊德的分歧：“这种自杀倾向，在我们看来，代表着弗洛伊德曾试图在其元心理学中以死亡本能，或原初受虐狂之名来定位的东西；而对我们来说，它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的死亡，远在以一种此外总是如此暧昧的方式反映在人的思想中之前，就已由人在原初困苦的阶段中体验到了；这个阶段是人从出生创伤起直到最初六个月生理性未成熟结束所经历的阶段，随后它又将在断奶创伤中产生回响。”[注74] 可以看出，拉康如何追随着他已经放弃的自我惩罚的踪迹，他随即写道：“于是，原初自我作为本质上异化的东西，和原始牺牲作为本质上自杀性的东西，已经被联系起来了。”那么，犯罪是以下列方式被引发的：“这种不一致（自我与存在之间的原初不一致）的任何解决，只要通过一种

> [注73] 同上，第176页。
> [注74] 同上，第176-177页。

现实与理想的幻觉性重合，就必然一直回响到自恋性自杀攻击的想象之结的深处”。

在那个时候，拉康并没有说明这种取消不一致的幻觉性重合是如何产生的。直到 1950 年，他才再次借助克里斯蒂娜与莱娅，勾勒出一个回答的开端：正是对象变得致犯罪。

当然，他曾一点一点地表述出那种武装了克里斯蒂娜和莱娅手臂的东西。她们从何处获得了这种不知从哪里涌现出来的恶魔般的能量？拉康回答说，当然不是从她们社会处境的压迫中获得的。对于弗洛伊德那个悬置着的问题——自我从何处汲取这种置于现实服务之下的能量？——拉康的回答并非

如他一开始所说，并非来自自我惩罚驱力，而是来自自恋激情。自我是一种激情性的组织。自恋激情武装了两姐妹的手臂，但为什么？

每一个所谓驱力潜伏期，都以欲望对象的一种典型结构的支配为特征。每一次相继的认同都是解决性的，其意义在于它产生自我诸装置的一种新综合，同时能够维持这种根本不一致。«当“他人”的某种“不相适合”使这种解决性认同流产时，它便由此决定了一种对象类型，这种对象在自我辩证法的悬置中变得致犯罪。例如，在违法者的盗窃中，就可以辨认出这些对象结构：粪便的赠与、俄狄浦斯式的要求、食物性在场的挫折、阳具自慰……»。[注75]

> [注75] 拉康，J.《超越现实原则》，前引书。

于是，帕潘姐妹的犯罪便在这个对象的光照下得以澄清；她们曾在那两个小面包中留下了它的痕迹：她们像准备一道好菜那样准备了朗斯兰夫人和她的女儿，像准备两只兔子：把她们击打、放血、剥皮；当一个人是好厨师时，还要挖去眼睛——这在 1900 年的烹饪手册中是完全推荐的——这是摆盘的问题：仍是在同一些手册中，还必须在“大的猎物块”上进行花刀切割——这是烹饪中的准确术语

（在勒芒难道不是说 «encinceluras» 吗？）——以便在浇上酱汁时，汁液在烹煮中浸透肉；而当一切都完成之后——“这才叫做得好！”——便把厨房里的一切清洗干净，这是基本常识。并且这一直延伸到姐妹们使用的厨房器具。事实上，说到底，她们本可以使用熨斗，或园艺工具，或任何东西。没有；在把她们击打之后，她们只拿了那些对于准备一道可食用菜肴有用的东西。正是在精神分析的光照下，这样一种犯罪才是可理解的。

在自杀性的越入行动中，神经症者可以把他们自己生产为对象；而在她们的越入行动中，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则把两具尸体生产为她们已经准备好的口腔对象。在烹饪中，这叫作“整理备烹”：准备好去烹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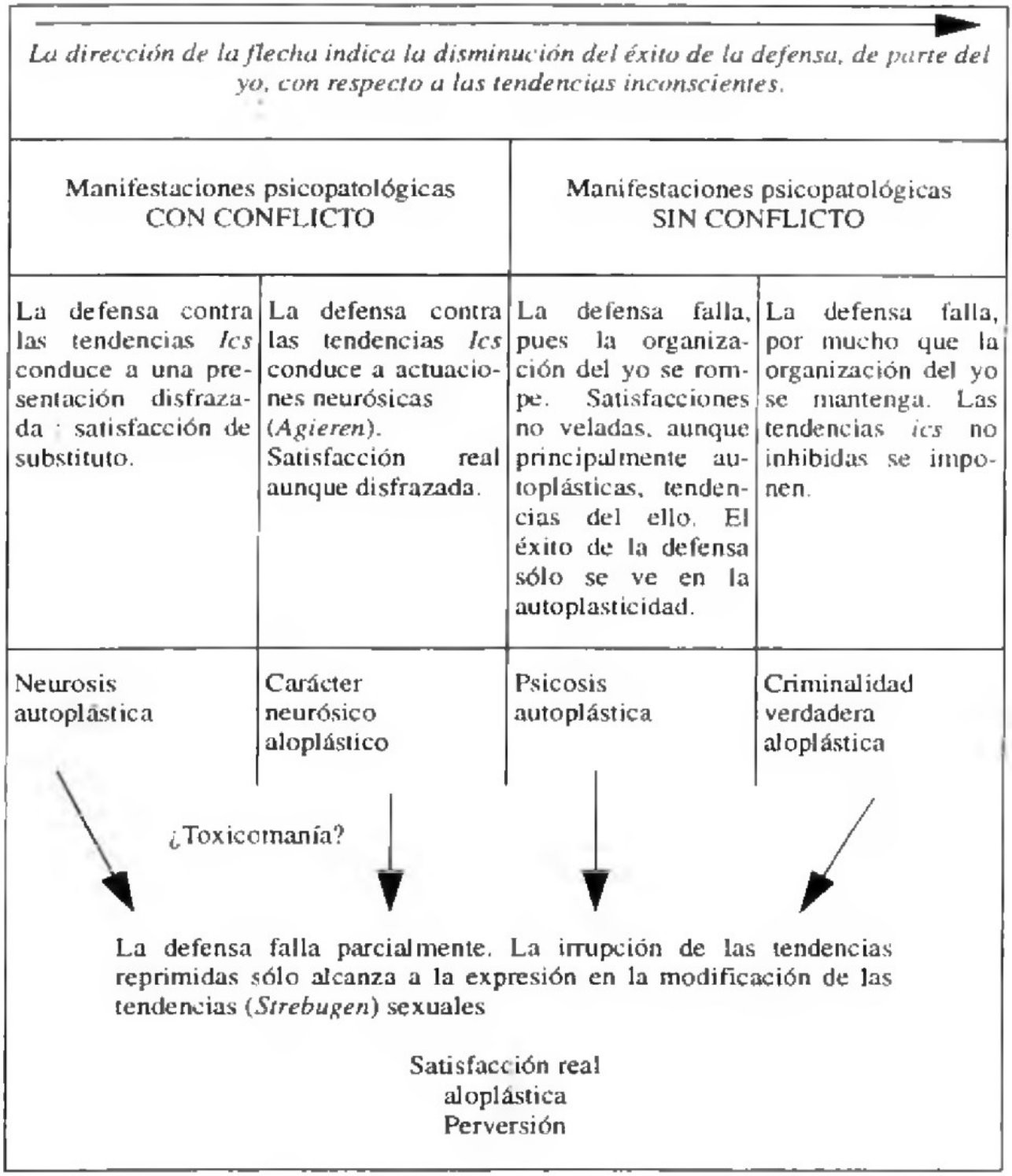
附录

I. 1920-1930 年间关于自我惩罚的主要出版物

1915 —弗洛伊德。《出于罪疚感的犯罪者》。1922 —Alexander。《阉割情结与性格》。Reich。《两种自恋类型》。1923 —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1924 —弗洛伊德。《受虐狂的经济问题》。Alexander。《治疗过程的元心理学描述》。Reik。《惊恐》。1925 —弗洛伊德。《抑制、症状与焦虑》。Reich。《冲动性性格》。Alexander。《神经症与总体人格》。Reik。《忏悔强迫与惩罚需要》（1926 年出版）。Fenichel。《关于惩罚需要的临床》。1926 —Reik。《成功与社会焦虑》。Reich。《神经症性焦虑》。Nunberg。《罪疚感与惩罚需要》。1927 —Reik。《性欲与罪疚感》。《超我的生成》。Alexander。《总体人格的精神分析》。Jones。《超我的概念》。Klein。《正常儿童中的犯罪倾向》。Alexander。《神经症性格》。Bonaparte。《Lefebvre 夫人个案》。1928 —Alexander。《罪犯与他的法官》。Klein。《俄狄浦斯冲突的早期阶段》。Guiraud 与 Cailleux。《无动机谋杀，青春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疾病的释放反应》。1929 —Alexander。《惩罚需要与死亡本能》。Codet 与 Laforgue。《社会失败与无意识的自我惩罚需要》。1930 —Alexander。《神经症性罪犯》。1931 —Aichhorn。《被遗弃状态中的儿童》。Guiraud。《无动机谋杀》。Lévy-Valensi。《激情犯罪》。Hoffman。《一个社会焦虑病例的发展史》。Hesnard 与 Laforgue。《自我惩罚》。1932 —弗洛伊德。《新的讲座》。Reich。《受虐性格》。拉康。《论偏执狂精神病及其与人格的关系》。1933 —拉康。《帕潘姐妹》。

II. 以心理冲突的动力—定位概念为基础，对精神病理学整个领域的概略总览

II. Visión esquemática de conjunto del dominio completo de la psicopatología sobre la base del concepto dinámico-tópico de los conflictos psíquicos



箭头的方向表示，自我对无意识倾向的防御，成功程度逐渐降低。

有冲突的精神病理表现		无冲突的精神病理表现	
对无意识倾向的防御，导致一种伪装的呈现：替代性满足。	对无意识倾向的防御，导致神经症式的行动（Agieren）。满足是真实的，尽管经过伪装。	防御失败，因为自我的组织瓦解了。满足不加遮掩，尽管主要是自塑性的、本我的倾向。防御的成功仅表现在自塑性中。	防御失败，尽管自我的组织仍保持着。未受抑制的无意识倾向强行占据上风。
自塑性神经症	异塑性神经症性格	自塑性精神病	异塑性的真正犯罪

药物成瘾?

防御部分失败。被压抑倾向的闯入，仅在性倾向（Strebungen）的改变中得到表达。

真实满足 异塑性 倒错

第 10 章

第十章

帕潘姐妹是三个人

> 我会刺穿你，腐肉！在一个丑恶的夜晚！

> 我会在你的眼睛里凿出两个巨大的黑洞！你那母牛般的灵魂加入舞蹈！将会离远！你会看见这美丽的来宾！

> 在善童的炉灶—墓地！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Mea culpa》，《Couplets Verveux》。

> 一切可能或不可能的社会中真正的未知者……从来没有人谈它，这不是“政治”！……这是巨大的禁忌！……被禁止的“终极”问题！然而，无论人是站着、四肢着地、躺着、倒过来，在空中还是在地上，人从来只有一个暴君，就是他自己！

又是 Céline，仍然是《Mea culpa》

对于弗洛伊德的问题“女人想要什么？”拉康不无幽默地回答：一个精神分析家！[注1] 至少直到这样一点为止：通过分析操作，精神分析家作为小写对象 a 的实施，与小写 a 的穿孔相关的精神分析家的捕获，被驱逐的精神分析家重新出现在其性伴侣的实在中。一个女人是精神病者，当然并不使她处在这个问题的射程之外。如此，我们将试图去遭遇克里斯蒂娜·帕潘，凭借若干分析陈述，凭借分析已经分离、析出，或已经改变其范围的那些术语（当其来源是精神病学话语时）。

> [注1] 拉康，雅克。1968年2月21日研讨班。[《精神分析行动》（L'acte psychanalytique）]。

事实上，精神分析质疑了——并最终颠覆了——某些公设，而精神病学科学直到今天仍然囿困其中。这里并不是论证这种颠覆之处；回忆若干经验已足以说明那些要素，正是从这些要素出发，我们提出疑问：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帕潘的越入行动曾是什么东西的“解决”？或者还可以问：“这一解决付出了什么代价？”

1. 仅仅从疾病分类学的视角出发是不够的，即使它也汇聚于此，仍不足以具体讨论这个个案[参见我们第八章的结论]。就帕潘姐妹个案而言，事情更加尖锐，因为正如弗洛伊德所写，“一个病例可以以偏执狂症状开始，并发展

然而，直至痴呆”。[注2] 由于精神分析相当大地赋予偏执狂精神病以特权，带着一种偏见，而这种偏见在弗洛伊德和拉康那里具有无可争议的启发价值，我们将把帕潘姐妹的个案总体置于拉康所谓精神病的偏执狂场这一大框架之中。

[注2]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关于一个自传性描述的偏执狂（Dementia paranoides）病例的精神分析评注》[1911]。第XII卷，Amorrortu出版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980，第71页。

1. 继这个并非完全可采纳的命名之后，出现的是经典对立：一边是“推理性疯狂”，其中会有一种程序和思想的一贯性在运作；另一边是“不一致性精神病”，其中这种逻辑会缺失。[注3] Kraepelin 意义上的偏执狂标示出不一致性的某种方式，而 Bleuler 的精神分裂症也并不缺乏一贯性。

[注3] 阿卢什，让。《逐字母》（Letra por letra），EDELP。布宜诺斯艾利斯，1993，第169页及以下。

1. 偏执狂的产物并不是放纵想象的果实，也不是心理组织某个较高层面的衰竭[参见 H. Ey，或更近的 J.P. Changeux：他的神经元人是一个无法说明偏执狂谵妄之建构性特征的假说]。偏执狂谵妄是一座建筑物，它依赖于某种自身机制，而其基础是一个实在的、实际的事件。于是，弗洛伊德观察到，Schreber 庭长的谵妄以被剥夺了一个本会到来的孩子为其出发点，这个孩子本来会在他丧父之痛面前给予他安慰。

1. 谵妄并不是某种把主体从外部世界隔离出来的东西。相反，它是一种“关系谵妄”（拉康），而偏执狂的目标是使世界秩序与谵妄进入组合。这就是说明为何存在 Folie à deux（二联性精神病）的根本理由。谵妄正是这样一种东西，凭借它，“人扬满帆进入

主体间性的领域”（拉康）。

1. 因而，偏执狂谵妄已经在精神分析中，尤其在拉康那里，被承认为一种与大他者关系的扰乱，它同一种转移机制相连。Schreber 以转移的方式安置了一种神圣的钟情妄想，它通过把主动权交给一个大他者——从此被设定为存在着的大他者——而赋予精神病以一致性。像有时那样说精神病个案中没有转移，是一种经证实的蠢话。

1. 这种滑移支撑于一种关于自恋，并相关地关于去人格化的不正确理论。自我（Moi）作为层级，并不是存在中的一个小存在者，而是一个

想象的建构。作为建构，它是一个复杂过程的结果，即镜像阶段的结果。我们将展开这个

自我（Moi）在他人图像 i(a) 上的构成，分离出在这一过程中相互嵌合的四个操作：

a. 对一种具有自身统一性的形式作出区分，

b. 发现这一形式的运动同主体自身身体的运动之间的联结；这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如果没有某种介入，这一形式就会作为一个“你”而具有价值，

c. 它作为第三人称的安置，这意味着“那个他就是我”［ce Lui-là, c'est Moi］这一信念，

d. 事实上，对“他”（Lui）就是“我”（Moi）的这一承认，可以从这样一种运动中推导出来：主体转向一个大他者，请求他批准自己这极其崭新的信念。这一承认以把他人构成为我（Moi）、把他（Lui）构成为大他者的认同，封闭了这一过程。

这一过程是人格化（personación）的过程。这个术语由拉康引入，并显著改变了在此之前人们对“去人格化”所理解的东西；并不存在去人格化，只有人格化过程中的阻滞。所谓去人格化并不是一个人格的解构，而是“流产”的结果

人格化过程的流产：它所引发的不是欢欣，而是焦虑，

镜中出现的东西并不是某种能够被提供给

大他者来承认的东西。因此，借助这种作为谵妄的治愈尝试，大他者竟成为他，成为人格化了的他。精神病主体于是以其“大他者……就是他”［«L'Autre,... c'est Lui»］[注4]来替代“那个就是我［Moi］”。

[注4] 关于“他”（El）在精神分析中的引入及其与父亲功能的衔接，可参阅：阿卢什，J.《Une femme a dit le taire》。载：《Littoral》第11-12期，1984年2月，eres出版社。

1. “自体爱欲”（autoerotismo）这个术语，被一种不良的假正经改造成了“自闭症”（autismo），它遭受了同样的价值反转。事实上，根据刚才所回顾的内容，可以得出结论：其中并没有任何“自体”（auto），理由很简单，因为并没有“自身”（auto）。所谓自体爱欲所指的，并不是主体把自己的我（Moi）当作力比多满足对象的运动，而是在自身缺席时力比多的命运；在自体爱欲中，外部世界远非缺席，而正是这样一个场域：在那里，拉康为主体所称作的“小 a 的紊乱”发生了。这个观察为我们关于精神病中转移的实效性所说的话（第 5 点）提供了锚点。

1. 谵妄具有弗洛伊德曾注意到的这种“治愈”功能，因为它成功地联结了小 a 的这种紊乱。这种秩序化在偏执狂中是显明的，在精神分裂症中则被遮蔽。然而，对精神分裂症者（底本拼作 esquizophrères）[注5]的精神分析揭示出它是活跃的，尤其是在主体历史的关键点上。拉康由此区分出三类对象 a：[注6]部分对象、阳具和谵妄。主体与其谵妄之关系的书写，恰恰就是神经症者幻想的书写，或者也是正常人（正常人并不是从神经症者那里建立出来的平均数，也不是对社会要求的符合）与阳具之关系的书写：$◇a。这是弗洛伊德写给弗利斯的公式的书写：“偏执狂者爱其谵妄，正如他们爱他们自己。”

[注5] “保留下来的笔误”（J. A.）

[注6] 拉康，J.1959年5月20日研讨班[《欲望及其解释》（Le désir et son interprétation）]。

1. 谵妄作为对小 a 紊乱的联结尝试，在赋予想象界以优先地位之中找到其一致性；对大他者的高估、把大他者人格化为他（Lui），就是这样一个旋涡，它吸入一切意义，而这些意义又全然指向大他者存在的观念［参见拉康］。于是，一切意义都具有作为对他的恨爱（hainamoration）的价值

（Lui）。对于构成我（Moi）的想象捕获，正常人以调动一种想象的竞争来回应，这种竞争允许父亲功能的象征整合；神经症者以调动一种象征性的行为来回应，这种行为在想象中实现父亲功能；而谵妄者则以在想象中实现一种实在的父性来回应。

1. 想象界的这种优先地位，也必然伴随主体同象征界之关系的一种特殊模式。一个所谓“精神分裂症者”讲述他童年的噩梦：他来到一座桥的入口，打算穿过河流，但桥坍塌了，而且他越向前走，这一点就越清楚。我们看来，这样一个噩梦以最具范例性的方式说出了主体同能指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他越试图把自己铭写进象征界，象征界就越是缺失于他。因此，拉康观察到，施雷伯的文本中没有任何隐喻；要有隐喻，就必须有替代的可能；然而，如果在渡河时可以用一座桥替代另一座桥，那么相反，却不可能用另一座坍塌的桥来替代一座坍塌的桥。说施雷伯那里没有隐喻，由此被证实为另一种说法，即谵妄中的结点术语保持着它们的重量，继续“本质上指向意义”（拉康）。在 $S_1 > S_2$ 的关系中，主人能指 S_1 不停地不介入知识（S_2），不停地不被知识重新吸收。于是，谵妄直觉呈现为精神病中能指地位的范式，而谵妄解释——它在现象学上有别于谵妄直觉——无论多么字面化，都不应使我们误认：这种字面性每一次都越来越迫切地被召唤来充当拐杖，因为它在其定位能指的功能上有所缺失。从此刻起，它本身就成了迫害的载体。

这些就是我们将据以研究帕潘姐妹越入行动的理论术语或要素。当然，这一回顾是局部的，并指向此处未加展开的其他考量。不过，它也许已经足以使人不至于先验地判定：我们选择从帕潘姐妹个案的转移性极端来切入这个个案，是荒谬的。

二联性精神病（folie à deux）

如果 folie à deux 这个术语有意义，那么它命名的就是某种值得如此命名的东西；如果它所涉及的并不是一个主体被某个近人对其所经历迫害的强有力宣告所感染、并被动接受印象这类事情；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所面对的 folie à deux 个案，把克莱芒丝·德雷（Clémence Derée）同克里斯蒂娜·帕潘，她的次女，联结在一起，而不是——如迄今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把两姐妹克里斯蒂娜和莱娅联结在一起。

事实上，此处汇集的诸要素使我们能够断言——在这一点上没有丝毫疑问——克里斯蒂娜与莱娅的纽带始终是不对称的、非相互性的、不平等的；年长者扮演主动角色，而年幼者只是满足于分享其姐姐的断言，并毫无争辩地遵循她的指示。

关于二联性精神病（folie à deux）的全部精神病学讨论［参见《Littoral》第 3-4 号］在这里都呈现出来，并凝缩在这唯一的个案中：其一极由克里斯蒂娜与莱娅的纽带所代表（对二联性精神病（folie à deux）的“诱导性”解释），另一极（“真正的”二联性精神病（folie à deux），没有支配性元素）则由同时居住在克莱芒丝与克里斯蒂娜之中的迫害所代表。事实上，对于她们二人而言，不可能把一个元素区分为主动、另一个区分为被动；在这种疯狂中，克里斯蒂娜和她母亲一样主动。而她的越入行动，远非把她从这种共同迫害中脱离出来，反而使她更深地沉入其中，直至缄默，直至精神病性恶病质。人们把这样一种演变称为“精神分裂症”，并在延续那个把其过程称为“解离”的判断时，把它归类为“痴呆”。然而，这完全是一种关联，而且甚至是特别严整的关联。因此，我们依据帕潘姐妹的个案，在这里提出：应当把这种精神分裂症从痴呆的图表中分离出来，并把它整合进精神病的偏执狂场域之中。

克莱芒丝的两封信，悬而未决地留在朗斯兰家中两姐妹的房间里，它们作为决定性材料之一而呈现出来，使我们有理由定位这种把克莱芒丝与克里斯蒂娜关联起来的二联性精神病（folie à deux）。它们使我们能够开始重构克莱芒丝的谵妄；这种谵妄并不会这样轻易地自行表白（这远非例外），更不会向随便什么人表白。这两封信也在确定谵妄所指向的实在事件方面为我们定向，

谵妄正是指向这一事件［参见弗洛伊德］。

当《萨尔特报》（La Sarthe）的记者前来向克莱芒丝宣布罪行并收集她的最初反应时［参见第 153 页］，人们可以在她的反应中找到这种克制的一个标志。她对记者说：“我已经三年没见过我的女儿们了。我不指控任何人。”然而，凭借她的两封信，我们知道克莱芒丝实际上是在指控。她的“我不指控任何人”——而且在它被说出的语境中听起来相当奇特：她刚刚得知她的女儿们被指控——因此确实具有否认的效力；并且在这里，这一否认同对她与女儿们断裂的唤起相邻，确认了第二封信中清楚提出的分离与指控之间的纽带。被指控的是这一分离的施动者，与此同时，这样一个施动者的存在也被肯定。我们已经看到，按照克莱芒丝的说法，朗斯兰一家会处在这个位置上。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夫人和小姐，她们在断裂之后遇到克莱芒丝、看见她在路上急于同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和解时，“似乎在嘲笑”克莱芒丝［参见第 153 页］；那一天，她们察觉到了她的软弱，而那种软弱通过那嘲弄的笑向克莱芒丝显露为她们正在享乐于它。

谵妄的公式在克莱芒丝第一封信中已经给出，当时她写道：在生活中，人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有上帝，但人们也大大地做了他们的一份，尤其是那些落在你们和我身上的嫉妒。[注7]这些嫉妒被放置在大他者那里。但此外，也许尤其是，并不是说这些迫害性的嫉妒是被动承受的，而是说它们促使迫害者（也正因此才是迫害者）采取行动，旨在打破她所忍受的情境。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谵妄公式进一步收紧，改写为：“他们因为你们同我在一起而嫉妒你们。”克莱芒丝同克里斯蒂娜和莱娅所处的位置，在她那里若不召唤其迫害者的恶意，就无法成为现实。

> [注7] [作者们逐字转录克莱芒丝的信；包括错误在内。]

1931 年 3 月 5 日的信［参见第 156 页］展开了谵妄的组成部分，明示了其连贯性。也许应当把她终于决定吐露某些东西归因于克莱芒丝当时所经验到的紧迫感。克莱芒丝是在她的女儿们身上受到迫害；那项把她们同她分开的事业正面击中了她，伤害了她最珍爱的东西：我始终指望着你们 2，尽管有一种痛苦的悲伤，有人

告诉我，他们做了一切，要让你们进入修道院。”[注8]面对女儿们的这种远离［参见同一封信中：他们使你们远离你们的母亲，以及我们在此处第 160 页的讨论］，按照她自己的用语，克莱芒丝执拗不休（人们在谈到克里斯蒂娜施加在其受害者身体上的处理时，也会谈到“执拗不休”）地反对那种执拗地想要从她那里夺走女儿的做法，而这在她那里引发了她称之为——这是一个天才的语言发现——一种“痛苦的 {douleureuse}[注9] 悲伤”的东西。

> [注8] [见前注。]
> [注9] [其中以同音方式包含heureuse：幸福的。译者注]

这个迫害者被置于神圣法律之外，而且其方式之激进，正与他炫耀自己同上帝的关系相称。这些关系就是他的诡计，是借以掌控克里斯蒂娜和莱娅的偏斜途径；克莱芒丝自命有权说出这种掌控的真相，她向女儿指出，人们正是以神的名义召唤她们，从而剥夺了她们对自己的控制。这封信揭发这一卑劣手段，旨在让克里斯蒂娜和莱娅重新找到一种即将彻底丧失的清明（紧迫性由此而来）。

这封信把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当时的雇主放在卷入这一阴谋的天主教徒之中：不要理会你们的主人，上帝绝不会承认把 2 个女孩关起来，尽管他们有那些想法……人们会使你们倒下，以便成为你们的主人……人们会对你们为所欲为，离开吧，他们不再会是你们的雇主，人们会让你们进入随便哪座修道院，不要给出你们的 8 天。[注10]

> [注10] 不要依恋你们的主人，上帝永远不会让我们把2个年轻女孩关起来，尽管她们的样子……人们会让你们倒下，为的是成为你们的主人……人们会对你们做他们想对你们做的事，你们走吧，你们将不再是你们的女主人，人们会让你们进随便哪个修院，不要给8天，走吧……

这第二封信呈现出对第一封信中只是被断言的嫉妒的一种展开。在那里，迫害者在其不同形象中被指称出来（［神父们］prêtres，［天主教徒们］cotoliques，克里斯蒂娜和莱娅的［雇主们］métres）：其目标被清楚说出（让她们进入［修道院］couvant），其行动手段也被说出（占有她们，通过剥夺她们自己的判断能力而拥有她们）。

由此可以提出若干观察。

* 对帕潘姐妹之行动的共产主义解释，或者更一般地说，马克思主义解释，把它视为反抗一种

令人愤慨的雇主压迫的正当反叛；即便这种解释没有命中靶心，没有赋予此事以真正的维度，它却仍然——可以这么说——击中了一个恰当的位置；这也解释了为何有些人曾赋予它可信性。事实上，这里涉及掌控，涉及一种滥用的占有，在那里，主体为了另一个人的利益而失去对自身的治理。超现实

主义者的评论，把重点放在克里斯蒂娜在 Bon-Pasteur 修道院所受的宗教教育上，也说出了真相，但同样只是部分地说出了真相。不管怎样，这些反思之所以未能说明这个个案，恰恰在于它们屈从于指认替罪羊（雇主、神父们）的便利。

* 米歇尔·福柯在其《性史》（Historia de la sexualidad）中的分析突出了，在古典希腊思想中，家仆或女人并不处在那种自我对自我的掌控关系之中，而这种关系正是自由人、公民的特征。并不是说这些低等存在从根本上说异于这种掌控，如克莱芒丝的谵妄性极限推进所假定的那样，当时她宣称：他们会对你们为所欲为［on feras ce que on vouderas de vous］；而是说，这种掌控只被部分地赋予给他们，他们同一种更完整掌控的关系，要通过主人的中介。在主人那里，这种自我对自我的关系是直接的；在他们那里，则是间接的。克莱芒丝的谵妄可以被解读为从同一条脉络中产生的东西，这条脉络也正是福柯所描绘的希腊关于掌控的问题化。

* 尽管这一谵妄预示了福柯的分析，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表明一种非常特殊的裂隙；这一裂隙并不像在希腊那样位于性关系的位置，尤其是同男孩们的关系的位置。在主人的话语中，这一裂隙本身的位置表明了陈述与言说之间一种尤其稳固的适配。克莱芒丝的话语值得被称为谵妄性的，因为裂隙在那里位于她的陈述与她的言说之间。因此，她最初的接收者绝不可能服从所收到的指令。给任何人下达不服从任何命令的命令、给出不听从建议的建议、影响他以便使他不受影响，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克莱芒丝·德雷以偏执狂方式认识她的迫害者，这意味着她在他们身上揭发了她自己对女儿们的操作。这就是她那里自我对自我的关系。让克里斯蒂娜和莱娅放弃对她们自身的一切掌控，把自己交到某个外来意志手中，这正是她在他人那里所更加猛烈地反对的东西，因为这关乎她自己针对她们的

目标。在这样的条件下，克里斯蒂娜和莱娅既然始终知道克莱芒丝那里这种自我对自我的关系，她们又怎可能如她所要求的那样，立刻离开朗斯兰一家呢?

* 我们承认，对于克莱芒丝而言，这种保护克里斯蒂娜和莱娅免受宗教占有的根本关切，必定随着她长女埃米莉亚（Emilia）的宗教圣召而成形。帕潘姐妹有三人。这或许就是其谵妄所指向的实在事件。尤其是，绝不能让第一次发生、且她从未承认过的事情重演（正如埃米莉亚穿上会衣之后她同埃米莉亚的彻底断裂所证明的那样）！此外，克莱芒丝发疯到疯狂是有道理的。克里斯蒂娜想要追随埃米莉亚开辟的道路；她在 1920 年向母亲宣布这一点，那是在埃米莉亚进入修道院两年之后，而她的母亲立刻作出反应，利用她尚未成年的事实，把她从 Bon-Pasteur 带走。也许这一姿态为克莱芒丝最终封印了埃米莉亚的丧失，因为直到那时为止，认为母亲与长女之间还通过克里斯蒂娜的中介维持着一种微弱联系，并非荒谬。一旦被安置到第一批雇主家里，克里斯蒂娜就数次试图接近 Bon-Pasteur 和埃米莉亚，由此意识到她的行动是多么徒劳，至少在那个时候是这样。当克里斯蒂娜想要某物时，她就非要不可！必须通过越入行动，才能在缄默状态中抵达埃米莉亚的上帝：而莱娅则必须等到克莱芒丝“自然”死亡，才允许自己表述［参见第 229 页］她希望在 Bon-Pasteur 结束余生的愿望。

* 首先是克里斯蒂娜，其次是莱娅，她们知道克莱芒丝信中所揭发的操纵，在多大程度上也是她自己的操纵。这封信抵达她们手中时，她们同这个女人（克里斯蒂娜原话如此）的断裂已经完成十六个月。从她们幼年起，母亲就按着不知何种幻想［参见第 154 页］的任性，把她们安置又换走；并且她从未停止以其不断的责备使她们“不适”（越入行动那天，两人都来了月经）。在埃米莉亚进入修道院

之后，可以设想，这些接连的迁移获得了一种意义：它们是克莱芒丝对其女儿们之影响力的反复确认，而且是以行动来确认。我安置并换走她们，所以她们不是别人手中的木偶。她们服从我的责备，因此她们不听从别人。

似乎，folie à deux（双人疯狂）这一术语并不意味着克里斯蒂娜和克莱芒丝始终并永久地齐声表述同样的谵妄陈述。这倒更是连接克里斯蒂娜与莱娅的暗示关系的特征。这样的纽带标示出一种伪 folie à deux，在这类情形中，承受诱导的主体一旦同其同伴分离，似乎便从一种精神病中走出来，而这种精神病，

说实在的，从来就不是她自己的。承受一种支配性影响，并不等于“是精神病性的”。

如果从莱娅一生的整体来看，她显露为一个十分出色的航行者；例如，在她出狱之后，她懂得把自己最终前往 Bon-Pasteur 的计划置于括号之中，目的在于不再同此后与她共同生活的母亲正面冲撞（在她们共同生活的那段时间里，并且怀着这个前景，她存钱）；在失去克里斯蒂娜之后，她并没有太多悲伤——然而这一丧失超出了死亡，因为它并不是发生在克里斯蒂娜去世的时刻，而是发生在克里斯蒂娜不再认出她的时候——她从抵达雷恩监狱起，便很快同克莱芒丝和解。她在曾经于一个插曲的时间里（1929-1933）做过一个好小妹妹之后，将重新成为一个“好小女儿”［参见第 212 页］。莱娅是不会沉没的。

在克里斯蒂娜那里值得考虑的，是另一种性质的东西。她的疯狂如何同克莱芒丝的疯狂衔接起来，以至于我们承认可以谈论 folie à deux？一旦排除一种复制关系，这种衔接又是什么？我们只有在考察克里斯蒂娜整个历程，尤其是从其结局出发时，才能处理这些问题。如果越入行动是这一历程中的一个枢纽点、一个转折时刻，那么把越入行动的这一特定位置置于透视之中，便可期待它向我们澄清其“解决性”价值的某些东西。这样，我们将首先研究越入行动之可能性条件的布置，并由此通过其后果的秩序来考察它的功能是什么。

越入行动之可能性条件的布置：没有分析的转移

同克莱芒丝一样，克里斯蒂娜并不很快表述她的被迫害观念。在越入行动之前，唯一的例外是

1931 年 9 月的市政厅事件。拉康把它作为这样的事件予以注意。然而，当精神科专家同她一起提及这一事件时，克里斯蒂娜以这样一种方式回答他，以至于他仍然可能再次误认她当时的举措具有请求从一种迫害中被解放出来的价值。在她越入行动之后，她的保留因而仍部分维持着。也唯有同莱娅在现实中的极端暴力分离，最终才会解除

这种谨慎。

如何说明这种保留？我们在这里不展开介绍其他精神分裂症者分析的个案，尽管这些个案促使我们在这一点上推进一个回答；不过我们仍要说，精神病者同任何人一样，并不会把使得某一陈述能够或不能被说出的言说条件置于括号之中。当所涉及的是特别具有迫害性的思想，并且此外，迫害者群体的

界定仍然不明确时（不知道与我打交道的 X 是否属于这个群体），任何对话者仍然都可能是一个迫害者——而这种可能性本身就是迫害的一个组成部分，会增加其强度。从那时起，说话就可能等同于总是把武器交给

对手。

这种话语的迫害逻辑本身，赋予这一斜坡以其下滑：在连续访谈过程中，它可能把偏执狂者所面对的精神分析家生产为迫害者。不过，一个偏执狂者有时能够在开端处表述自己的谵妄，这是已有充分见证的事实，因此我们可以说，对话者并不总是、并不立即且必然地处在这个位置。在某些个案中，那里有一个余地，它对应于谵妄性转移的建立所需要的时间。然而，当谵妄保持未被表述时，这个余地便缺失了。于是，对话者从一开始就激起一种必须称为正当的不信任，因为它建立在对话者可能属于迫害者群体这一点上。日本关于 amae 的假设，即一种从一开始就由大他者给予的仁慈，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必须有一整套文化。此外，还要加上这样一个事实：一种被保留的谵妄，一种不被表述的谵妄（如果即便如此还能说它是谵妄的话），是一种不履行其“治愈”功能（弗洛伊德）的谵妄。由这两点观察可以得出：在这种话语的迫害逻辑中——我们如此命名它——后者以自闭症为脐点，并以精神病性恶病质

为坠落的终点。不能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写道；精神病性恶病质正是这一著名公式的严格付诸行动。于是，自闭症不再显得是不同于迫害的东西，而毋宁说是迫害的极致。而所谓“精神分裂症”在这一角度下显露为偏执狂的诸形式之一，显露为一种在其明言化上被保留的偏执狂，也就是说，是一种同自身一致的偏执狂。于是，精神病学观察所确认的那些从偏执狂过渡到精神分裂症的个案［参见我们的章节“精神分裂症？”］——克里斯蒂娜就在这一批之中——并不标示出什么天知道的结构变化。它们毋宁是诸精神病之偏执狂场域的典范；它们证实拉康的这一命名是切当的；它们因而邀请我们把精神分裂症定位为一种完全实现的偏执狂。

越入行动的地位及其“解决性”范围的问题，是在并未抵达这样一种结局的情况下被定位的；这样一种结局有时从一开始就已经达到。克里斯蒂娜·帕潘的个案教导我们，因为不能说越入行动替主体避免了她的偏执狂表现形式中的这样一种变化。那么，从此以后，是否应当把关于越入行动具有解决性范围的断言视为废话？当然，在能够以一种不那么先验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其他越入行动的个案值得加以研究。眼下，我们更有限地发问：克里斯蒂娜·帕潘的越入行动究竟为哪一点提供了解决？

我们拟从市政厅事件出发来回答。这个事件发生在同克莱芒丝决裂两年之后，它表明，这一决裂本身并不足以把克里斯蒂娜从她的被迫害观念中解放出来。它也使我们得以瞥见这些观念。

对有关这一事件的文件的呈现，不可能不启动对它的分析（原始事实的幻觉）。我们一方面从它所激起的“人们说”出发阅读了这些文件，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克里斯蒂娜在同精神科医生访谈期间对此事的事后解释。那个公式，即市长迫害她们而不是保护她们，因而通过向精神科医生提出的这一要求而得到了格外的澄清：这是一个要求莱娅获得解放的要求。我们已经看到，从现实的角度看，这第二种表述既无头也无尾；但若同第一种表述联系起来，它在克里斯蒂娜那里便意味着“被保护—

被驯服”与“被迫害”之间的谵妄性等价。这样，她第一种表述中的“而不是”，必须同时被读作一种替代关系和一个指示词：在为了保护她而使她被驯服的同一个地方，正是在那里，她被迫害。

对于克里斯蒂娜来说，一切屈从都具有迫害的价值，这一点在她接受意见的极其特殊的方式中得到提示，无论这些意见来自她的母亲，还是来自她先后不同的女雇主。我们曾就纸片事件讨论过这个问题［参见第 174 - 179 页］，并指出克里斯蒂娜与莱娅在接受意见的方式上所处的位置不同。对于前者来说，一旦有意见向她提出，居于她身上的极端僵硬便如此清楚可感，以至于她的女雇主们在提出意见之前都要反复斟酌。这种僵硬是她最弱的回应，但女雇主们知道，怒火并不遥远。我们曾写道，任何意见对于克里斯蒂娜来说都具有掐捏的价值。掐捏是谵妄性假设的对应面；按照这一假设，大他者在表述其批评意见时，通过羞辱而获得一种享乐（这种由这一假设所突显之物的可能性条件，在于工作已经做得非常好——克里斯蒂娜的工作正是如此——这一点她所有的女雇主都同意）。对于克里斯蒂娜来说，意见的表述本身就指向大他者中这个以其自身享乐为目标的东西。存在着大他者的享乐。因此，对于克里斯蒂娜来说，意见的能指并不指称清洁上的疏忽这一现实，也不指向其他能指，借助那些能指，某个特殊意见会得到解释；它们指向的乃是这个始终相同的意义：大他者确实存在，而且更是由于它以羞辱我为享乐而存在。事实上，我们正全速处在主体间性的领域之中

（拉康）。

克里斯蒂娜的僵硬还可以这样表述：“不是谁想让我下跪，就能让我下跪。”我们记得，在审判期间唯一显著并被注意到的事情，是判决宣读时她的下跪。并不是说她那时接受了司法的决定。走出法庭时，她的那句话：“既然必须砍掉我的头，那最好马上做”，毋宁说同时取决于逞强和一种最坏情况的政策。对她来说，人的司法显然站在迫害者一边；事实上，这一观察可以从如下事实中推导出来：在 Le Mans 监狱里，当她被同莱娅分开时，她扑向这场分离的执行者，并威胁地对他说：以上帝的名义，以仁慈的上帝的名义，您不会说

您不是司法的同谋。司法被算作同谋之一，而与之形成对位的是，对上帝的祈求显现出来，上帝是唯一一个人们可以不受掐捏地对他说“愿你的意志成就，而不是我的意志”的对象。在上帝面前，同上帝一起，我可以

下跪。这就是克里斯蒂娜将在我们命名为她的神秘谵妄之中所做的。

于是，我们在这里遇到同我们在克莱芒丝的谵妄中指出的同一种分离：有上帝，也有人，而后者的行动被克里斯蒂娜和克莱芒丝判断为根本上处于法律之外。

然而，尽管有二联性精神病（folie à deux），却没有两人的谵妄，没有共同的谵妄。克里斯蒂娜并未把克莱芒丝谵妄的所有元素都据为己有。因此，例如，在她同克莱芒丝决裂到她越入行动之间的三年半里，这个每个星期天都像一位夫人那样穿着去做弥撒的她，并不具有她母亲同神父们之间那种关系。克里斯蒂娜的被迫害观念并不是她母亲的观念，而是同后者嵌合在一起。克莱芒丝的谵妄是一种嫉妒谵妄，它迫使她想要使她对剩下的两个女儿的支配永续化。克里斯蒂娜的谵妄是一种诉求谵妄，它推动她想要从这种被她判断为不可忍受的支配中解放出来，而这再次说来是有正当理由的。克莱芒丝执拗地只把克里斯蒂娜和莱娅留在自己身边，她试图使世界秩序符合她的谵妄。但克里斯蒂娜所遭受的迫害正寓于此。克里斯蒂娜诉求不被这个女人、她的母亲逼得下跪。她也旨在使世界秩序符合她的谵妄：她想同已从母亲占有中被抽离出来的艾米莉亚重聚；她以我们已经说过的方式对待她的女主人们；她同克莱芒丝决裂。

但是这些尝试，我们已经看到，要么不可能付诸实践，要么未能成功地使迫害远离。按照她希望被保护而不是被迫害的愿望来给其世界安排秩序的真正可能性，是由 Lancelin 夫人提供给她的；当 Lancelin 夫人在接受了克里斯蒂娜也把莱娅收作女仆的要求之后——换言之，在允许克里斯蒂娜把莱娅收在自己的保护翼下之后——向她表明，她不仅关心工作，也关心她的女仆们的幸福，并且甚至自行允许自己朝着鼓励她们同克莱芒丝决裂的方向进行干预。我们也认为，Lancelin 夫人鼓励克里斯蒂娜和莱娅

把自己的薪水留给她们自己的这一干预，是有效的，并且就把一种母性转移布置到 L. 夫人身上而言是决定性的（在她们之间，她们称她为“妈妈”）；我们把这一布置视为越入行动之可能性条件之一的布置。

弗洛伊德被引导去把某种他当然没有预料到的东西命名为转移。他很早便把转移定位为既是回忆的障碍，又是另一种——被行动化的——回忆方式。他十分清楚地把这种行动化定位为某种在一个场景上产生的东西。沿着这条弗洛伊德的路径继续前行，拉康注意到，这种被行动化的回忆方式是一种绕过审查的方式；这就是以场景化取代话语化的功能。作为一个限制网络，场景要求、促进说：在场景义务较为松弛的地方——在电影中——我们会遇到大量社会上得到承认的糟糕影片的生产。

无论如何，拉康在这一点上的主要贡献，并不能还原为对弗洛伊德的简单重新表述。由于拉康从一开始研究的是越入行动而不是转移，他被引导在二者之间建立一种连接；这种连接对我们在这里阅读帕潘姐妹个案来说是决定性的（它大大晚于《偏执狂犯罪的动机》一文）。这一衔接点被命名为行动展示（acting-out）。事实上，一方面，拉康把行动展示（acting-out）与越入行动这两个术语配对起来；另一方面，他把行动展示（acting-out）定义为一种“没有分析的转移”。没有分析的转移——Lancelin 夫人身上的母性转移只能涉及这种东西——不可能得到分析所允许的结果（甚至这一点也值得加以精确说明！）。除非它永恒化——这是最常见的情形，整个一生都浸泡在这些水中——或者辩证地转向另一种转移，它也可以在越入行动中找到一个出口。越入行动的这一解决，是场景的加倍，是场景之上的场景。它典范地呈现在《哈姆雷特的悲剧》中，在那里，为了使哈姆雷特的抑制解除，场景之上的场景这一空间是必要的（克劳狄斯和王后在那一刻是观众），尽管诚然，这是以他的生命为代价。这里不再更多考虑那些能够澄清这一点的众多文学作品（歌剧占有重要位置），我们还要引用拉康对弗洛伊德所谓年轻女同性恋个案的解读。当她同她心上的女士散步时，偶然遇到父亲的目光，

心上的女士，这就足以产生越入行动；在这一越入行动中，铁路经过的桥边缘把坡道物质化了，它不是场景的坡道，因为事实上，场景就在那儿，在那次不可忍受的相遇之中，而确实毋宁说，是场景之上的场景的坡道，正是它把能指 niederkommen 付诸行动。

正如场景之上的场景需要场景一样，分析之外的转移，作为越入行动之可能性条件而给出。从这一角度看，转移显得像一枚爆炸被悬置的炸弹［参见那桩遥远的场景丑闻：他的女仆看见他的一位漂亮女病人挂在弗洛伊德博士的脖子上］。在克里斯蒂娜对 L. 夫人的母性转移中，究竟有什么东西处于赌注之中，以至于最终以这一越入行动的形式发生了爆炸?

在分析中，转移性的行动化尤其显现在表述姿态的层面，分析者以这一姿态为根据而继续说话。于是，他的话语被编织起来，被置于这一表述姿态的依赖之下。我们在克里斯蒂娜与莱娅一方、L. 一家另一方之间“即将结成”的关系边缘处，遇到那条将要支配各种表述姿态的规则——而在这里它被明确地表述出来：在这个家中，已经搭建起一个话语流通网络，在其中，双方——女仆与雇主——约定只通过克里斯蒂娜与 L. 夫人之间的纽带这一渠道来进行交流。由此，某种亲昵性得到了预防［参见第 161 页］。克里斯蒂娜介入其妹妹与女雇主之间，而这一位置至少在如下方面适合她：它在地位上不同于她在家庭中的位置；不同于克莱芒丝·Derée，L. 夫人接受了这一介入，正如她曾应克里斯蒂娜的请求，接受莱娅进入其服务。于是，两姐妹在 L. 一家服务了一个异常漫长的时间。这个时长并不合克莱芒丝之意，正如她也不能接受克里斯蒂娜对莱娅的影响，而这一时长巩固了这种影响。

然而，对 L. 夫人的母性转移，只有在 L. 夫人就她两个女仆的工资所作的干预之中，才真正得以定位。事实上，正是随着这一干预，亲昵性变得显明（最初是以被否认的形式提出的）。L. 夫人是这样一个人：她能够向她们表现出一种关心，而在这种关心中她并不满足她自己的关切。她的谵妄禁止

克莱芒丝这样做。而严格地说，对克里斯蒂娜而言，这件事是闻所未闻的。

但是，这一已经使克莱芒丝远离的母性转移，在某一天经受了一次辩证的倒转：那一天，L. 夫人在克里斯蒂娜看来将成为某个像克莱芒丝的人 [参见第 164 页]，尽管在此之前她一直可能相信相反的东西。我们已经提出这一猜测：只需一句话，一个多少不受欢迎的评语，就足以使克里斯蒂娜身上发生这样一种认同。那一天，她同克莱芒丝决裂，而且这种决裂更加彻底，正因为 L. 夫人占据了上述位置。从那时起，在 L. 夫人的目光之下，她将在行动中展示（对克里斯蒂娜而言，正如对拉康而言，确定性的唯一参照就是行动），以她自己照料莱娅的方式展示：存在一种母亲照顾女儿的更体面的方式，不同于她迄今所面对的那一种方式；有一段时间，她曾相信 L. 夫人向她呈现了这种方式。决裂之后，克莱芒丝抱怨她的女儿们不再见她，她说出了这第二种母性转移形象的真相；事实上，她们不再见她，是因为从此以后注视她们的是 L. 夫人。克莱芒丝的信息之所以被克里斯蒂娜更加严肃地行动化，是因为它是在一种倒转的形式下被行动化的。

母性转移的这一辩证倒转，勾勒出一个空位。如果说，在其第一种配置中，克里斯蒂娜和莱娅把 L. 夫人的母性形象提供给克莱芒丝的目光，作为某个可以与之共同生活的人的形象，那么，第二种配置所产生的位置置换游戏（作为目光，L. 夫人来到克莱芒丝的位置，一下子把她“好母亲”的位置留给克里斯蒂娜，而莱娅则占据女儿克里斯蒂娜的位置）便使莱娅的位置空置出来。一个孩子被杀了。越入行动的暴力在这里找到了它的能量来源。

因此，母性转移的第二种形象，对于克里斯蒂娜而言，并且在她将之行动化、在其中投入她自己的一份、甚至投入她所拥有的最珍贵之物即她自己的谵妄这一点上，似乎具有最后手段的意义，用来抵御她为了逃离迫害而诉求的那个东西：一种更为平和的母性方式。关键就在这里。而从此以后，一切都将取决于她将在 Lancelin 夫人的目光中读到什么。

越入行动。它所曾解决的东西

“先生，我请您，如果您愿意，请告诉我怎样做，因为我承认得很难受，并请您告诉我怎样做才能修复。”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克里斯蒂娜·帕潘最后写下的话，很可能也是她曾写下的最后的话 [参见第 198 页]。这些话同克里斯蒂娜与 L. 夫人之间最初交换的话奇特地共鸣，而那次谈话本应转向越入行动。我们在这里发现“修复”（réparer）一词 [参见第 36 页]，此外还可以注意到它同“熨烫”（repasser: planchar）在字面上的接近；我们也注意到“做”（faire）——在这封极短的信中出现了两次——与“熨斗”（fer）之间严格的同音。[注]在我们刚刚就对 L. 夫人的母性转移展开的论述之后，把这些词看作能指（是在精神分析意义上，而不是语言学意义上；从语言学上说，它们显然也是能指），并由此推断克里斯蒂娜的要求是什么，并不显得荒谬：在她被置于无力完成自己工作的处境之后，她去见 L. 夫人，向她报告这一事件。“怎样做才能修复？”（Comment faire pour réparer?），这或许就是她的要求以她自身的能指凝缩而成的表述。熨斗（fer）（或“做”[faire]）“出了故障/失调”（detraqué）作为克里斯蒂娜所抗争的一切的换喻而起作用。事物按照她所愿的那样呈现并运转，对她而言越是根本，因为她正是凭借她的意愿——一种越是被行动化就越明确的意愿——来反抗迫害。但是，评语总在那里，可能从他人那里传来，而清洁的质量通常避免了这一点。唯独这一天，工作没有完成。会有人说她与此毫无关系吗？如果她的要求事实上是“怎样做才能修复？”，那么远非如此，并不能确定这就是她所想的。她就是这只熨斗/这个做（fer/faire），正如她用自己的这一表述把“安排/修理”加倍所见证的那样：“我想请求夫人，如果她愿意，请她安排/修理熨斗，这会使我方便（arrangerait），因为我们的熨烫工作落后了。”她恰恰就是那只熨斗，正如她的“做”是她高于一切所拥有的东西。“怎样做才能修复？”[comment faire pour réparer?] 向 L. 夫人表述了她的根本问题，而她则在行动中给出一个回答：她不断向 L. 夫人显示，她知道怎样很好地同

> [注] 原文在“faire/fer”之间建立同音关系，并把“réparer/repasser/arranger”连成修复、熨烫与安排/修理的能指链；中文正文虽已保留原词，仍难完整呈现这一法语音形游戏。

莱娅打交道。但是，在这样做时，她把 L. 夫人盯在眼里，换言之，她在她身上展开一种负性转移（拉康）。从那时起，L. 夫人哪怕最轻微的不快表现，或者更糟，最微小的一句评语，都只能在她身上激起一场猛烈的愤怒。被置疑的是她整个的“做”，而且尤其如此，因为她已经同 L. 夫人跨过了这一步：把它置于目光之下、呈现它、把它奉献给一个目光。

不过，若继续依循她自己所说的话，还需要另一样东西，才会使这种相对受抑的愤怒从争吵转向越入行动。她说过，还需要 Lancelin 小姐的介入。克里斯蒂娜把自己的残酷归咎于 L. 小姐的干预，后者“本该使这场争论停止，而不是让它变得更激烈”[参见第 74 页]。我们更倾向于遵循克里斯蒂娜的这一提示，因为它在形式上同她向市长提出的抱怨完全一样，后者也同样建构在一个“而不是”之上。

极有可能，在争论中，L. 小姐站在了她母亲一边。我们已经指出，这就是打破了女佣与主人之间起初的契约；这也使得在克里斯蒂娜面前，在场了这一契约所抵靠的一切，也就是使她签订它并且直到当前这一刻确实在其中找到保证的东西：保证她能够在同女主人们的关系中，对居于她内心的巨大张力保持某种掌控。看见一个女儿站到她母亲一边：她的一生只有在阻碍这一视觉、这一二联性精神病（folie à deux）的图像时才有意义；而这一图像越是她自己同克莱芒丝的图像，她就越是以全部意志来反对它。

我们会说，这个母女二人同声叫嚷的形象，是克里斯蒂娜无意识自我（moi）的镜像形象，一个她绝不能认可、更不可能提交给一个大他者承认的形象，一个令人焦虑的形象。（偏执狂病例的分析经常显示，自我 {moi} 据以构成的那个形象——i(a)——并不是主体自身身体的形象，而是一个复合形象，一个把若干人物和对象、甚至人体的孤立部分聚集起来的“画面”；当然是碎片化身体，但正是在这种碎片化本身中被当作一个整体来把握。）从那时起，越入行动便以

帕潘姐妹是三个人 297

以一种针对这一形象的攻击（拉康）的名义介入，作为对自我（moi）形象的毁灭，并服务于快乐原则。怎能不看到，精神分裂症式的演变、精神病性恶病质，正是同这一毁灭相一致的东西?

我们可以在克里斯蒂娜完美表述的相互性中，找到这种自我 {moi} 对自我 {moi} 关系的一个标志；这种相互性在那时——在一道闪电般的时间里，就在越入行动之前，也在其展开过程中——把女主人们与女佣们联结起来。因此，克里斯蒂娜在犯罪当天晚上声明：我宁愿剥了我的女主人们的皮，也不愿她们剥我或我妹妹的皮。又如：更强的一方赢了 [C’était au plus forte la pouche]。动作的细节也证明了这种相互性：因为她倒下时踢了我一脚，我就切割了她，为了报复她给我的那一击。克里斯蒂娜在指出自己随后打了 L. 小姐“我自己被打的地方”时，把话说得明明白白。摘除眼球也来自同一操作。同样——甚至——这种相互性也可以从克里斯蒂娜关于越入行动的话中被把握。例如：如果我早知道事情会这样结束，我就不会向 Lancelin 夫人说出我说的那句话，正是它引发了一切；在这里，话语已经不再是女主人所说的某事，而是女佣所说的某事。克里斯蒂娜还谈到受害者说：她们被修理/虐待得很惨 {arrangées},[注11] 她们得到了应得的，这指向越入行动之前紧接着的交换：我要请夫人修理 {arranger} 熨斗[注]。这种相互性的公式，这种正是它自身越入行动的相互性的公式，可以这样写：“啊，你想要的是这个，想要把它修理/安排好，那么好吧，你会得到它！”在这里，并不存在像癔症中那样“不欲望自己所想要之物”的余地。

> [注11] [arrangées：安排好的、收拾好的；口语中：被虐待的。]
> [注] 此处arranger同时牵连“修理熨斗”与“把受害者收拾/弄惨”的口语义，后文公式故意把两义叠合。

这是另一个“证明”：克里斯蒂娜通过她的越入行动，安排/修理了她自身的自恋形象，一个在那一瞬间既被不认识、又被极大现实化的形象。正如她不能承认这一形象，她也不能承认自己是其罪行的作者，不能承认自己负有责任。她的罪行没有署名；而且，她既不会在请求撤销判决的上诉书上签名，也不会在赦免申请上签名；换言之，她不会在任何至少隐含承认自己犯下罪行的申请上签名。我们再一次获得了她立场之严谨的可触证据：一个绝不能对其自恋形象说“那是我”（c'est moi）的人，又怎能签名？这种将一位母亲作为 i(a) 来看的视觉

以及一个女儿在索求中联结在一起，在她那里，是系统性不认识的对象：那个“他”{Lui-là} 就是大他者，未被划杠的大他者，存在着的大他者，因为大他者就是他 {Lui}。

对克里斯蒂娜而言，她的越入行动之后续与后果是什么？我们已经知道，必须排除那种赋予越入行动以治疗德性的说法。克里斯蒂娜在之前和之后都同样是精神病性的。另一方面，也并非更甚。但她是以另一种方式成为精神病性的。她的越入行动仅仅在这一意义上显现为一个转折点：它把克里斯蒂娜

推入偏执狂的一种精神分裂症式形式。这一形式并非没有一致性。一个人在说出“我全都说了”之后沉默不语，为什么要称他为“分裂的”？一个人在声明“人们想怎样处置我就怎样处置我”之后停止自行进食，为什么要称其为“分裂的”？

但是，这一转变的偏斜方式也许同样值得注意。我们已经看到，它继发于同莱娅的决裂，而这一决裂是勒芒监狱中数次危机之后由幻觉造成的事实。我们曾把这些危机 [参见第六章] 解释为一些连结尝试，试图连结那个幻觉：在其中，克里斯蒂娜透过牢房的窗户看见莱娅被吊起来，双腿被砍断。这些危机之后，克里斯蒂娜坚持对莱娅的存在作系统性不认识（如果她是我的妹妹——她会对把她们带到彼此面前的 Lamache 医生说——我就不会处在我现在的状态中），与此同时，她妄想中的索求主题让位于一种宗教主题。

莱娅是母性转移的一个根本组成部分；她是克里斯蒂娜在 Lancelin 夫人的目光之下照料的那个对象。通过攻击这一目光，越入行动移除了转移，剥夺了克里斯蒂娜对莱娅之爱的原因。从那一刻起，这种爱不再有存在理由，而莱娅对于克里斯蒂娜的真实形象，则在其最生动的面貌下显现出来。因此，莱娅的分离、“心理对子”的错位，现在可以被定位为确认母性转移的断裂。而越入行动在这里显露为并非精神病的解决办法，而是转移的解决办法。

这一结论之所以重要，理由不止一个。尤其是，它能够反过来质问转移。转移究竟是什么，以至于越入行动能够成为它的一个解决办法？

尾声

“没有上帝，我对我自己来说过于强大，而我的大脑以也许是所有方式中最残酷的方式爆裂。”

这一公式并非出自克里斯蒂娜·帕潘，而是出自 S. Kierkegaard。（Kierkegaard, S. Point de vue explicatif de mon oeuvre, Oeuvres complétes, T. 16, p. 49）

三人成狂（Tres faciunt insaniam）

附录

三人成狂（tres faciunt insaniam）[注1]

[注1] 这是让·阿卢什一篇文章的译文，该文刊载于《Littoral》杂志第22期（Eres出版社，图卢兹），1987年4月。在文中他提到“弗朗西斯·迪普雷”的书；读者会记得，“弗朗西斯·迪普雷”是本书最初在法国（1984）出版时所用的异名。显然，这篇文章并未收入法文原版。本文由曼努埃尔·埃尔南德斯 G. 翻译。[编者注]

有些人建造牛棚，是为了更好地把我当作一头奶牛。

Aimée

雷电

在承认疯狂可能发生传达这一点时，Ch. Lasègue 和 J. Falret[注2]（1873）——无论他们曾试图把这种可能性限制在怎样狭窄到不能再狭窄的界限之内——引发了一场风暴。不论他们是否有此意图，他们的干预远没有被当作一块新石头来接纳进一门已经积累了许多其他石头的学科，仿佛只是对一个前所未有的临床实体所作的局部研究；相反，对于它似乎与之处于同一层面的那种精神医学话语而言，他们的干预具有一种解释的效力。

[注2] 拉塞格，Ch.与法尔雷，J.《二联性精神病或传染性疯癫》（La folie à deux ou folie communiquée），载拉塞格：《精神病学文集》（Ecrits psychiatriques），Privat出版社，图卢兹，1971。尤其收入由波尔热，E.编定的关于“二联性精神病（folie à deux）”的卷宗，见《Littoral》3/4期，Eres出版社，图卢兹，1982年2月。

这个问题可以在其后果中被把握：从 Régis[注3]（1880）立即试图用来反对它的那道处处漏洞百出的屏障，到必须产生出一位 Clérambault 的二十年努力，

[注3] 雷吉斯，《二联性精神病或同时性疯癫》（La folie à deux ou folie simultanée），载《Littoral》，前引书。

以便把上述“疯狂的传达”从精神医学领域中清除出去，将其带入“风俗研究”的记录域。[注4]

[注4] 例如：“观察从疾病的性质那里借来一种非常特殊的面貌，并且更像是风俗研究，而不是医学观察”。克莱朗博，G. de，《精神病学著作》（Oeuvres psychiatriques），P.U.F.，巴黎，第25页。或者又如：“……整体，由于这一理由，几乎同样属于风俗画，也属于精神病学”，前引书，第64页。

“被传达的疯狂”：这个能指本身首先通过“疯狂”（folie）[注5] 一词出人意料地重新涌现而实现了解释，因为在一种话语中，本来不应再涉及别的，只应涉及“精神疾病”。[注6]

> [注5] 奇怪的是，folie à deux一词将原样进入日耳曼与盎格鲁-撒克逊临床。
>
> [注6] 皮内尔曾谴责“疯癫”一词的使用，以“精神异化”取而代之；J. P. 法尔雷，J. 法尔雷之父、拉塞格的老师，刚刚引入“精神疾病”一词。

奇怪的是，当精神科医生谈到二人疯狂（folie à deux）时，他们不再使用自己的行话，不再以一种表面上的元语言说希腊语或拉丁语；相反，来到他们笔下的是普通日常的说法，尤其是精神病性的普通日常说法：被传达的疯狂（Lasègue 和 Falret）、同时性的疯狂（Régis）、被强加的妄想（Marandon de Montyel）、借来的妄想，甚至被收养的妄想（Clérambault），这些无非都是妄想主题。

为了解释二人疯狂（folie à deux）中所涉及的那种传递，上述最后一位作者甚至展示出一种近乎诗意的隐喻发明力：他谈到——并非不为此道歉——培养基中的一种酵素[注7]，甚至谈到一种被诱发的妄想，像一根插在沙中的茎[注8]，因此既没有深根，也没有真正的发展。这与那种自诩有学养的陈述方式相距甚远，后者让“精神分裂症”、“偏执狂”甚至“精神自动症”这样可怕的术语流通起来。

> [注7] 克莱朗博，前引书，第61页。
>
> [注8] 同上，第43页。

本文将涉及一个猜想：由 Lasègue 和 Falret 不合时宜地开启的问题，在一百年后由拉康得到闭合，而且是通过 R.S.I. 范式实现的。

这个“三重体”的博罗米结式的结联，本会为拉康提供一个“二人疯狂”的一般化公式；它借由这一编码，被重新命名为“共同偏执狂”。这就是承认，正如拉康自1938年起就提出的那样，二人疯狂并不是诸临床实体中的一个，而是把精神病的决定性条件暴露出来的临床形式。圣状的博罗米结，作为共同偏执狂的书写而呈现出来，并且在我们把它读作书写“二人疯狂”一般化公式之物的意义上，因此在我们看来，它具有的价值，是成为并非精神病本身、而是其可能性条件的数学元。

因此，一个人或许只有在至少为三这个数目时，才可能是疯的。

致盲

三人成狂（tres faciunt insaniam）这一断言，若人们愿意费心指出那种奇特的致盲，那么它就不会像乍看之下可能显得那样怪异；这种致盲自 Lasègue 和 Falret 以来，在谈到二人疯狂（folie à deux）时就一直不断显现出来。

原则上，有大量案例不再被接纳为二人疯狂（folie à deux）的案例。让我们引 Sérieux 和 Capgras 在其关于推理性疯狂的决定性著作中的说法。这不是例外，恰恰相反，这是规则；当他们仿佛顺带写道：“外祖母异化，母亲神经质并死于痴呆，姐姐歇斯底里”，[注9]这并不因此就促使他们把他们当时向我们呈现的那个案例看作集体疯狂的案例。在精神分析家一边，也让我们引 Ruth Mac Brunswick：她在向我们呈现一个嫉妒妄想的分析时，注意到她的患者的姐姐后来将在精神病院去世，此前她在那里度

过了生命的最后五年，但并未因此从二人疯狂（folie à deux）的角度来考虑这些事情。也让我们引拉康：他在明确指出他的“艾梅”的母亲有妄想，也许她的姐姐也有妄想之后，并没有把他的研究引向那个方向，最终提出了一个排除二人疯狂诊断的诊断。

[注9] 塞里厄与卡普格拉，《推理性疯癫》（Les folies raisonnantes），Laffite Reprints，马赛，1982，第60页。

这种目盲甚至在承认这是一个二人疯狂案例的地方仍然是可感的。譬如 Régis，在谈到那个案例时——尽管它是决定性的，因为它为他引入“同时性疯狂”这一概念提供了支撑——注意到他向我们呈现的这对同时陷入妄想的夫妇中，丈夫的兄弟也曾有过一次妄想发作，并且仍表现出若干失神时刻，但他在讨论该案例时却丝毫不考虑这一事实。

此外，难道不值得注意的是，当研究向前推进时——如同对 Schreber 所能做的那样，[注10]甚至也包括对帕潘姐妹所能做的那样——人们除了承认在偏执狂者的周围有着比以往任何人敢于设想的更多偏执狂者之外，别无他法（Schreber 的父亲和兄弟，帕潘姐妹的母亲）？

[注10] 参见以色列斯，汉。《施雷伯父与子》（Schreber père et fils），Seuil出版社，巴黎，1986。

二择一

因此，当被置于 Lasègue 和 Falret 所开启的视野中时，拉康在 1975 年年底、借 1932 年论文再版之机对“至少三个偏执狂者”这一概念所作的阐发，就显得没有它起初可能显得的那么离奇、那么“悬空”，甚至也没有那么纠缠不清。于是让我们沿着二人疯狂（folie à deux）这条线索走下去，在那里编织成形的，与其说是一段历史，不如说是一个事件。

仅仅是疯狂可能被传递这一可能性，就激起了我们不得不称之为恐怖的东西。它回应的是什么？回应的是我曾提议称作异化之岩的东西；结果它承担着定义精神疾病的功能，而 Lasègue 和 Falret 在引入他们的“被传达的疯狂”之时，恰恰无法避免重新确认这一点。他们写道，异化者“自足”。[注11]从异化被思考为自足的那一刻起，异化便形成岩石；而 Clérambault 明明认为妄想具有“自我中心”的特征，[注12]也不会说出别的东西。由此，并且是立刻，二人疯狂的问题就有了其强烈的毒性：如果存在一种被传达的疯狂，如何还能继续相信异化者的自足性？

[注11] 《Littoral》所引文章，第115页。

[注12] “……那种一般说来表征诸妄想的自我中心主义……”，前引书，第39页。

三人成狂（Tres faciunt insaniam）305

很快，第二个问题域便与此相连，因为自足性的断言并不能化约其谜团。这个提法的锚点在于人们自 Pinel 以来所撞上的东西，也就是妄想的不可化约特征，它对一切劝服的根本过敏。这里有一个严肃的认识论问题，我在此略过不论，只提一下：问题在于确定什么东西对说话存在而言起着证明的作用。Clérambault 的一位女病人宣称：“人在生活中从来没有任何东西的证明”，[注13]这一陈述具有与“没有性关系”同样的否定性效力，同样的洞穴般的真理。如果这位共同妄想者是对的——而她确实是对的

——那么人们就衡量到了现实标准的空洞无物。说话主体只在行动中找到其确信，并且正是从行动出发，而且是在行动取代这种确信的位置之际，[注14]妄想才获得其不可化约性。在人们没有这一范畴的地方，这种不可化约性是如何被接收的？Lasègue 和 Falret 在这一点上完全明确：妄想的不可化约性取决于异化者，因为他是并且始终是其妄想的“绝对主人 [maître]”。

[注13] 克莱朗博，前引书，第15页。

[注14] 早在引入精神分析行动的概念之前很久，拉康就已经指出了妄想与行动的这种关系；例如：“妄想随着行动目的的实现而停止”。拉康，J.《偏执狂犯罪的动机：帕潘姐妹的犯罪》。载：《偏执狂精神病及其与人格的关系》，Siglo XXI，墨西哥，1976，第342页。

“绝对主人”，这话有点下手过重。但事情就是这样，主人们会在那里，在那些精神病院里；在那里，人们像同黑格尔一起所证实的那样，发现他们并不构成一个社会。Lasègue 和 Falret 似乎没有读过黑格尔，他们没有意识到关于自足性的断言同承认一种支配 [maîtrise] 是相互矛盾的。然而，对我们来说，问题并不是反驳他们提出的东西，而是记下这一点：把二人疯狂（folie à deux）思考为被传达的疯狂，会使这种把异化者认同为主人的做法未经处理，尽管它攻击了异化之岩。

在 Régis 那里，我们将会遇到恰好相反的立场。在 Lasègue 和 Falret 之后八年，通过断言不可能有被传达的疯狂，Régis 高举起异化之岩的旗帜。唷，我们真是逃过一劫！但是这种回到正轨并非没有剩余。如果疯狂可以如 Régis 所主张的那样是“同时性”的，那么从今以后，它就不再能够被构想为一种支配状态。Régis 并没有停止在这一点上追问

[转写说明] 所给底本在此缺印刷页306–307；原注15–20亦缺，未补写。

禁止我们像 Clérambault 所主张的那样，把妄想与精神病分离开来。我们也把他对二人疯狂（folie à deux）的拒绝称为“伪解决”。

不适与野蛮

因此，在 Clérambault 那里，主要使我们关切的，并不是这条质疑二人疯狂（folie à deux）的理论脉络。我们觉得更值得注意的，毋宁是他那种不断参照二人疯狂的两个原型、却始终既不能驳回它们也不能干脆承认它们的方式。在他已发表的一系列临床工作中，一切仿佛是说，被传达的/同时性的这一对立，未能获得概念对立的地位。Clérambault 在这里把某个案例当作属于同时性疯狂的范围，却仍然描述每一个妄想建构参与者的差异化角色（1902）；在谈到另一个案例（1906）时，他将发明“妄想合唱”这个漂亮术语，但又想要指称“女合唱领唱”，[注15]从而甚至以一个 lapsus calami 标出了他对该问题的主体性牵连，因为“合唱领唱”（corifeo）在他使用这一术语的意义上，是一个阳性名词。他注意到，在这个“出自两个原型”的案例中，可以同时观察到某些参与者之间的同时性疯狂，以及同一种疯狂向另一些人的传达。再晚些时候（1907），Clérambault 将在同一个案例中重新发现传达与同时性，甚至是在仅仅涉及两位主角的情况下。

[注15] 克莱朗博，前引书，第38页。

鉴于 Clérambault 那里两个原型之对立的这种漂浮，首领的位置仍然不甚可辨。当然，当最终轮到精神科医生来使首领在场时，这一倾向便可隐约看出。[注16]就疯狂而言，这当然是滥用；但我们在这一点上仍将以某种偏斜来阅读 Clérambault。事实上，他关于二人疯狂（folie à deux）的一个观察，为那值得被称作分离之试验的东西提供了更大的阐明；这一试验由 Lasègue 和 Falret 发明，而且若相信他们，它将给出疯狂之传达的证明。把两个参与者分开，他们说，一个人

[注16] “我们不想要宣传。我们只是居家的女人，想回到平静中去。”然而，当人们来找她们时，安妮特回答：“你们是头儿。”克莱朗博，前引书，第19页。

会继续妄想，而人们将会看到，在另一个人那里，数日之后，妄想逐渐消散。

Clérambault 所呈现的案例，[注17]把一道刺眼的光投向这种如此暴烈、如此愚蠢地暴烈的行动；与此同时，它向我们揭示了在首领形象背后勾勒出的是什么形象。曾有两个人各自在自己的时机介入，意图把这对共同妄想者分开。然而，也正因这一事实，在这两名参与者眼中，他们一个和另一个都获得了迫害者的地位。因此，我们意识到，在医生声称要对疯狂之传达加以控制的试验中，他的行动同样野蛮，他把自己呈现为迫害者；这符合精神病的愿望。依照这一愿望，可以说它所要求的并没有那么多，这是就这一表达的隐喻意义而言；也就是说：这正是它所要求的。

[注17] 克莱朗博，前引书，第47至71页：“但这位[某伯爵]想禁止格拉费夫人接待玛丽·福雷尔的来访，因此（我强调）他将在某个时候成为迫害者”（第53页）。这里所做的，无非是引出这个“因此”的后果。

人们已经理解了，用我们的行话来说，实施这种分离具有越入行动的地位。人们已经理解了，用左拉的话来说，我在此控告司法—精神医学的勾结：正是它通过把一人同另一人分开，而对克里斯蒂娜·帕潘的死亡负有责任。让所有的 Le Pen 都放心吧：击中克里斯蒂娜·帕潘的暴力，并不小于杀死 Lancelin 太太及其女儿的暴力。诗人说，生命不是一件礼物。

二人疯狂（folie à deux）的典范性

拉康虽然以更为谨慎的方式，却像他的“精神病学中唯一的老师”一样，在二人疯狂（folie à deux）的两个原型面前陷入困难。自 1933 年起，他便站在“Régis 式”的同时性疯狂论一边，但他拒绝从这一角度呈现“艾梅”案例，这一点我们必须加以解释。这样的拒绝是论文中的斯宾诺莎主义的结果。事实上，如果每个人都只是按照自己的本质、按照自己的欲望而被感发，那么疯狂的传达当然就是不可设想的，因为真正的传达只存在于客观知识的层面，并且作为这样的知识是可传递的。但是一种“同时性”的感发也几乎不可能是这样，

其理由在于人们看不出两个个体如何能够成为同一个本质。

在《偏执狂犯罪的动机》中，重音这一次坦率地落在二人疯狂（folie à deux）上。拉康在那里重新确认了他对同时性疯狂的站队，但他除了承认克里斯蒂娜·帕潘与莱娅·帕潘在她们同共同妄想、甚至同共同越入行动的关系中存在一种差异之外，别无他法。到结尾处，他只提到前者，事实上承认她是“心理配对”中的主动因素。镜像阶段的发明，加上放弃斯宾诺莎主义参照而转向黑格尔（欲望从此被把握为欲望之欲望），将给予二人疯狂（folie à deux）一个再典范不过的位置。于是，在《家庭复合

体》中，二人疯狂并没有出现在有序的精神病分类之中（尽管这个分类相当混杂）；相反，拉康断言："正是在二人妄想中，我们相信能最好地把握那些可能在精神病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心理条件"。[注18]

> [注18] 拉康，J.《家庭》，Argonauta出版社，巴塞罗那，1978，第110页。这一观察结束了献给精神病的章节；在前面几页（第61页），"二人妄想"为代表"闯入情结"的章节作了结语。

在 Clérambault 那里，二人疯狂（folie à deux）无处可寻；如今它却到处都是，从副精神分裂症到伸冤妄想。因为它潜在地处在复合体本身之定义的核心，而复合体的本质是再生产"环境的某种现实"[注19]（从词源上说，ambi-iens，来自 ire，即围绕而行的东西）。当"对象趋向于同自我混淆"时就有精神病；[注20]请注意，拉康并没有说相反的话。换言之：只有通过二人疯狂（folie à deux）才有精神病；精神病的多样化形式取决于所涉及的复合体的多样性。这个以反认同的方式趋向于同自我混淆的对象，事实上是另一个自我，一个作为他者的自我；但其异质性尚未被辨明，仍有待被确立。

> [注19] 同上，第22页。
> [注20] 同上，第57页。

因此，我们如今在二人疯狂（folie à deux）的层面上，找到了精神病的决定性条件。然而，我们还必须走到拉康所走道路的另一端，才能找到对这种典范性的书写；那是在想象界维度已经同象征界以及

实在界维度构成"三重"之后，在它们的打结问题已经被提出之后，在 sinthome 被作为第四项投入运作之后。

三个偏执狂者与一个圣状

对这一案例的研究——鉴于 Francis Dupré 所完成的工作，他本应将其作为"帕潘一家"的案例来呈现——通向 Clérambault 对一种集体疯狂的观察。事实上，在那里可以找到两个原型：在 Clémence 与其女儿克里斯蒂娜之间，有同时性的二人疯狂（folie à deux），

而在克里斯蒂娜与莱娅之间，则有被传达的疯狂。

然而，除了它提出共同越入行动的问题这一事实之外，帕潘一家的案例并未确认经典描述中、在这一个或另一个原型里，每个人同妄想之关系的样子：妄想合唱是在被传达的疯狂中建立起来的，而同时性疯狂并不是妄想合唱意义上的共同妄想，而是呈现为两个相互应答的妄想，呈现为两个相互嵌合的妄想。在研究这种嵌合时，我们将再次不得不同首领、同分离者、同迫害者打交道。

Clémence 在给女儿们的一封信中给出了她的妄想公式："他们做一切事情，好让你们进修道院"；[注21]她还明确说明了这一行动的动机和手段。动机是："有人嫉妒你们，也嫉妒我"；[注22]手段是：天主教徒（其中包括 Lancelin 太太）使克里斯蒂娜和莱娅远离她们的母亲，也就是说，远离那个她们本可以看见别人对她们做什么的地方；由于紧抓着她们的女主人 [maître]（Lancelin 太太），她的女儿们

失去了她们自己对自身的控制，并最终会屈从于她们的天主教主人之意志，而 Clémence 无论如何都不承认这一意志是神圣意志：“这不是上帝，这是强行歪曲上帝的律法。那不会给你们带来好运”，她以极其预兆性的方式写道。

> [注21] [参见第156页]
> [注22] [参见第157页]

对于 Clémence 所编织的这张网——并非毫无理由，因为她的长女 Emilia 已经进了修道院，而且 Clémence 曾不得不介入，以禁止年幼的克里斯蒂娜跟随她的姐姐——克里斯蒂娜以“妄想还妄想”来回应，正如人们说“以击还击”。面对 Clémence，克里斯蒂娜所面对的是一个

执意要把那份收益资本化为自己所用的人——但最重要的是，她对此毫不知情——而那份收益正是她执意要从天主教徒那里夺走的东西。克里斯蒂娜知道这一点，而她的母亲则把它行动出来；裂缝就在这里，以致没有妄想合唱。

克里斯蒂娜是 Clémence 的对象，而 Sérieux 和 Capgras 会用“迫害者—被迫害者”这一术语来描述 Clémence。[注23]Clémence 的嫉妒妄想（她以同一个运动嫉妒自己的女儿们，又取消、解除其妄想在大他者中围绕她同她的女儿们所建立起来的嫉妒）在克里斯蒂娜那里得到回应：一个伸冤妄想。Clémence 没有察觉到，当她不惜一切代价想保护克里斯蒂娜免受天主教徒影响时，她的目标正是把克里斯蒂娜保持在她自己的影响之下，让她跪倒在她自己的意志面前。因此才有妄想性的回应，克里斯蒂娜的伸冤：“想让我跪下的人，不会得逞”。[注24]在这里，我们再次在大他者的位置上、在迫害者的位置上，觉察到那个分离的主人。

> [注23] 塞里厄与卡普格拉，前引书，第99页。
> [注24] [参见第290页]

Sérieux 和 Capgras 注意到，偏执狂者依照其妄想而行动。[注25]克里斯蒂娜在她同莱娅的关系中就是这样运作的；莱娅是她的“最相似的”（拉康）对象，是她拖入其妄想之中的那个人，但也是她给予其自身所没有之物的那个人，因为，作为伸冤妄想的诱发者，她介入在莱娅与其母亲之间，从而保护前者免受后者嫉妒妄想风暴的侵袭。

> [注25] 塞里厄与卡普格拉，前引书，第124页。

我们怎能不看到，Emilia 进入修道院乃是那个作为参照发挥功能的实在事件（弗洛伊德），它不仅对于 Clémence 的妄想如此，而且对于这整场集体疯狂——此处是同时性的，彼处是被传达的——的衔接也是如此？

精神病与神经症

作为结论，让我们阅读拉康的这段文本；本文正是朝着它推进的，而它将通过把二人疯狂（folie à deux）的典范性提升为范式，来封闭 Lasègue 和 Falret 所开启的问题域。

> 只要一个主体把想象界、象征界与

> 实在界打成三结，它就只由其连续性所支撑（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是同一个且唯一的稠合性），而偏执性精神病所

> 一致之处正在于此。若好好听我今天所陈述的东西，人们可以推导出，在三个偏执狂者那里，可以作为 symptôme 打结上一个第四项；这个第四项本身作为这样一个项——作为人格——而被定位，因为它自身相对于此前三个人格是不同的，并且［会是］它们的 symptôme。这是否意味着它也会是偏执狂的？没有任何东西表明这一点；在那种不只是很可能、而且是确定无疑的情形中，一条博罗米链可以由数量不定的结构成。尽管如此，就这条链而言——从那一刻起，它不再构成一种偏执狂，除非它是共同的——就这条链而言，第四项那可能的、终末的絮凝（在这条编织中，也就是主体性编织中）仍使我们有可能假定，在整个织构上存在某些被选中的点，它们就是这个四结之结的项。而严格说来，圣状恰恰就在于此；并且圣状并不是作为人格，而是［作为］相对于其他三者而言，由其为圣状且为神经症性的东西而得到特定化。[注26]
>
> [注26] 拉康，J.《圣状》（Le sinthome）研讨班，1975年12月15日[转录出自译者]

借由这篇文本，我们于是来到一种博罗米结构面前；顺便说一句，这也正是发生在拉塞格身上的事情，他最后的那些著作集中于癔症。这种博罗米结构在同一步骤中书写共同偏执狂与神经症性圣状。它给我们的分类那种“抽屉式的”、几何学的面貌带来了一种有趣的扰动。那么，如果我们从这里出发，以另一种方式来面对神经症呢？

圣状之结，由于它把三个偏执狂同一个圣状打结在一起，在我们看来，恰切地编码了帕潘家庭的共同偏执狂。它具有一个无可争辩的优点：给予埃米莉亚，即圣状，以其位置，既作为结构元素，又进一步作为并非任意的元素；这个元素由其不是偏执狂而被规定，但又使共同偏执狂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得以维持；这种偏执狂，在临床上并不是偏执狂，至少直到朗斯兰夫人某种不合时宜的、分离性的干预为止，她向自己的女仆们提议应考虑她们自己的利益。博罗米结构的何种变异能够为这种干预作出说明？又是在织构的哪些“被选中的点”上，我们能够铭写这个个案交付给我们的事件系列？从什么时候起，才有这些被打结的稠合体的释放，并因而有临床上由这个

博罗米结构本身的解结而公开化的偏执狂？这些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许多其他问题，都还在等待其解答。

然而，帕潘家庭的个案，已经在相隔大约四十年之后，为拉康在 1975 年作为共同偏执狂的博罗米结构所提出的东西，提供了一种新的、显著的支撑。我们刚刚展开的关于 folie à deux 问题的阅读，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补充性的确认。

由此提出这样一个猜想：它当然还有待检验，但其优点在于已经被表述出来；根据这个猜想，圣状的博罗米结可以作为书写精神病之可能性条件的东西而有效，并且因此就其治疗给出一定数量的方向。

版权页

《帕潘姐妹的双重谋杀》于 1999 年 8 月在 Ediciones y Gráficos Eón, S.A. de C.V. 印刷，地址：Av. México Coyoacán 421. 03330，电话 604 12 04、604 77 61 和 688 91 12，印数 800 册。墨西哥联邦区。